

长江产业经济 视点

2018 下册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南京大学）

目 录

1	产业周期视角下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	孔令池 高 波	001
2	建设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	陈 柳	016
3	“一核两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框架与模式	徐 宁	019
4	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重点	刘志彪	028
5	充分评估改革开放的间接利益	张二震	031
6	从“发展竞争”转向“平等竞争”	刘志彪	033
7	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与关键环节	刘志彪	035
8	工业化与创新驱动：工匠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的指向	刘志彪 王建国	040
9	构筑四大互动体系 锻造智库核心能力	徐 宁	051
10	坚定不移走开放发展之路	张二震	053
11	结构性政策视角下振兴实体经济的思路与路径	刘志彪	057
12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江苏的制度创新与富民问题	刘志彪	064
13	培育全球价值链上的“隐形冠军”	刘志彪	074
14	破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制度痛点	陈 柳	078
15	企业持续充满活力的根本保证	陈传明	081
16	强化实体经济 推动高质量发展	刘志彪	083
17	世界级城市群国际比较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	沈坤荣 赵 倩	089
18	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演化的新趋势和新问题	刘志彪	097
19	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路径	刘志彪	101
20	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研究	洪银兴	104

21	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地方政府竞争问题的新解析	刘志彪	116
22	新时代 经济建设的总纲领	刘志彪	126
23	新苏南模式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展	刘志彪 张月友	132
24	以动态比较优势培育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	刘志彪	137
25	造就边界清晰的“双强体制”	刘志彪	141
26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价值与动力机制	刘志彪 陈 柳	145
27	长三角一体化离不开区域市场一体化	张月友	154
28	在同城化基础上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洪银兴	156
29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轨迹、逻辑与战略转变	凌永辉 刘志彪	158
30	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逻辑、精神和取向 ——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而作	刘志彪	170
31	中美贸易战将走向何方？	张月友	178
32	理清六大关系，建立四位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	刘志彪	180
33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分工结构的调整与重塑	刘志彪	182
34	攀升全球价值链与培育世界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	刘志彪	193
35	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产业体系	刘志彪	204
36	在全球分工演进中创造中国经济奇迹	王修志	208
37	中国奇迹是市场取向改革的胜利	刘志彪	210
38	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	刘志彪	212
39	高质量发展更是一个实践课题	刘志彪	214
40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论	宋文阁	217
41	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与关键环节	刘志彪	223
42	扼住无效投资的“咽喉”	汪德华	227

43	弘扬企业家精神 促进高质量发展	吴跃农	228
44	加快沿江化工产业 转型升级	吴福象	231
45	尽快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要素	刘志彪	234
46	黄金经济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新定位	刘志彪	239
47	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失衡纠偏机制	刘志彪	241
48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吴跃农	245
49	提升服务业全球市场配置能力	吴福象	250
50	用现代化产业链理念认识国有和民营经济	刘志彪	254
51	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原则与实践方向	吴福象	256
52	在全球价值链路径上建设制造强国	刘志彪	259
53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增强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能力	吴跃农	269
54	民营经济：迈向现代化新征程	唐 龙	275
55	民营经济是人民经济强国经济	吴跃农	279
56	推动民营企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吴跃农	283
57	对商业银行反垄断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刘志彪 凌永辉	286
58	逆向外包驱动力的实证研究	张月友 方 瑾	294
59	服务业发展与“结构性减速”辨析—— 兼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张月友 董启昌 倪 敏	315
60	扬长补短 建设新型高校智库	徐 宁	336
61	构建新型智库“三位一体”知识生产模式	徐 宁	339

产业周期视角下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

孔令池^{1a}, 高波^{1b*}

(1. 南京大学 a.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b. 经济学院 南京 210093)

摘要: 基于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制造业面板数据, 深入剖析了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从整体来看, 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制造业集聚达到一定水平后, 会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提升; 分行业来看, 由于产业周期的发展阶段不同, 现阶段我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企业家精神之间也呈现倒U型关系但回归不显著; 分区域来看, 东、中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效应, 与全国总体基本一致。但是, 由于区域发展的阶段不同, 西部地区制造业的集聚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

关键词: 产业周期; 制造业集聚; 企业家精神; U型

中图分类号: F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543 (2018) 08-0000-00

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创新驱动发展, 又必须全面激发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实现“创造性破坏”内生动态过程的关键, 是整合各类生产要素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稀缺无形资源。全面激发企业家精神, 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经济增长内在潜力和持续提升整体竞争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那么, 如何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长期以来,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探讨了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 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一是个人层面, 主要研究了创业动机、教育背景、社会经验、期望信念、性别差异、风险偏好等个体特征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Lu & Tao, 2010^[1]; Djankov et al., 2006^[2]; Yueh, 2009^[3]); 二是企业层面, 主要集中于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等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Kuratko et al., 2008^[4]; 李新春等, 2006^[5]; 蒋春燕, 2011^[6]); 三是社会和国家层面, 主要考察了制度安排、贸易开放、金融发展、文化资本、宗教信仰等方面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李后

※ 本文原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9 期 (总第 197 期)

收稿日期: 2018-0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一般项目“新时代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演化及对策研究”(18BJY112)

作者简介: 孔令池 (1990-), 男, 江苏如东人,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 高波 (1962-), 男, 江苏泰兴人,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发展。

建, 2013^[7]; 朱彤等, 2015^[8]; 李磊等, 2014^[9]; 高波, 2007^[10]; 阮荣平等, 2014^[11]。事实上, 作为世界性经济现象, 产业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产业集聚可以通过分享效应、匹配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等影响企业家精神, 与没有形成产业集聚的区域相比, 产业集聚促使区域内企业家精神水平更高 (Acs & Armington, 2006^[12]45; Glaeser et al., 2010^[13]; 欧雪银, 2013^[14])。2015年,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提出: “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等创业创新资源密集区域, 打造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业创新中心”。这些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动机。

综上所述, 本文着重探讨了制造业集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机制与渠道, 明确了影响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 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提供决策参考, 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将制造业集聚纳入到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通过理论分析阐明和经验数据验证, 对于深入理解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成因和影响企业家精神培育的情景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第二, 基于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 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的非线性影响, 为深入剖析二者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奠定了研究基础; 第三, 从行业技术异质性角度实证检验了不同技术密集度行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并考虑到我国制造业集聚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均衡表象非常明显, 通过空间异质性的考察, 建立起产业与空间的匹配规则, 对于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余下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讨论了产业集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理, 并提出了理论假说; 第三部构建了计量经济模型, 并介绍了选取变量和数据来源; 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和回归结果分析; 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米勒 (Miller, 1983)^[15]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冒险、预见性和剧烈的产品创新活动”。伴随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企业家精神被赋予了多种多样的含义, 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尽管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 但企业家精神是衡量企业家创造就业机会和激发创新潜力的关键性指标, 却获得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基于这一认知, 本文重点论述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影响机制。

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表明, 产业集聚演进过程本质上是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机制。产业周期理论重点揭示产业的演进及发展规律。通常情况下, 产业发展在萌芽、成长、成熟、衰退等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故而, 不同产业生命周期阶段孕育了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发展和消失的过程。有鉴于此, 下文着重探讨了产业集聚与企业家精神的演进机制。

(一) 产业集聚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内在机制

经济发展理论表明,产业集聚会导致大量具有专业技术的工人汇聚一地,为企业相互模仿、学习、交流等活动提供了充足条件,有利于加快新技术、新思想、新观念在企业之间的传递,进而改善现有产品、工艺等科技水准,助推企业的增进性创新。除此之外,产业集聚范围内的企业还可以共享商业服务、金融机构和某些特殊的基础设施等地方公共产品。概况来讲,产业集聚能产生专业化的经济、劳动力供给和技能等外部规模经济,在被地理临近的其他企业获得后,有助于促成知识外溢,形成企业创造和创新的基础(Acs & Armington, 2006^[12]21; Feldman et al., 2005^[16])。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来看,在产业集聚的初期,集聚区域内创新企业数量的增加有利于提供更多的信息,完善上下游产业链,促使企业间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降低企业研究开发与技术商业化的成本,减少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而提升企业家创新精神。与之相对,在产业集聚的衰退阶段,集聚区域内的创新企业趋于依赖传统的技术轨迹和产品路径,对创新鼓励不足,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持续提升(Britton, 2004^[17])。换言之,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后期,绝大多数企业具有相似的资源储备、知识结构和发展能力,原先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专业化外部性,会由于技术与企业常规演变的路径依赖以及认知锁定等问题,最终不利于企业响应市场需求的动态演变和产业技术的更新,抑制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挥(霍春辉、杨锐, 2016^[18])。除此之外,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后期,集聚区域内企业竞争加剧,也不利于企业将技术外部性内部化以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更不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研究假说1:产业集聚与企业家创新精神间存在“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

(二) 产业集聚影响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内在机制

经济发展理论表明,产业集聚可以获取较大的市场规模、较低的生产和运输费用、较多的熟练劳动力以及专业化的生产设备,在生产要素、社会网络、知识信息溢出、柔性专业化和竞争等方面创造优势,形成了丰富的创业资源和良好的创业环境,是企业家启动地区大规模创业活动的关键条件。Krugman (1991)^[19]从中心—外围理论视角论证了产业集群依靠集聚效应可以降低创业者进入产业集群的壁垒和成本,进而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和创业。产业集聚还能产生外部需求效应,通过系统的社会网络体系、知识网络体系和生产网络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为孵化新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大幅提升了企业家创业精神(Frenken et al., 2007^[20])。借助产业集聚,企业可充分利用区域具有比较优势的独特资源,发挥知识信息溢出优势,抗击市场风险、识别新的技术和市场机会,增强创业主体之间的联系,促进培育企业家创业精神。然而,产业集聚并非总能促使新企业的形成,产业集聚对企业家创业精神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初期,集聚区域内宽松的外部市场竞争环境,降低了新企业的进入“门槛”,对新企业的形成往往发挥正面影响;而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后期,不断扩大的产业集中度及垂直分离程度,提高了新企业的进入“门槛”,造成了较高的企业竞争淘汰率,极易导致产业集聚的负面效应占据支配地位(Sorenson & Audia, 2000^[21])。胡安俊(2016)^[22]指出,产业集聚对于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产业集聚存在专业化效应、竞争效应和多样化效应,有利于企业数量和就业

的增加；另一方面产业集聚程度高的地区往往市场的拥挤效应较为显著，不利于企业数量和就业的增加。

研究假说2：产业集聚与企业家创业精神间存在“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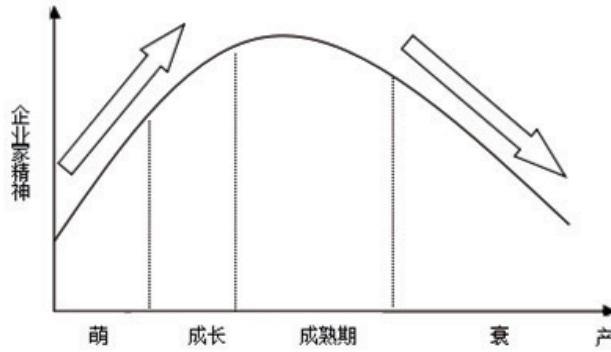


图1 产业集聚与企业家精神关系示意图

三、研究设计

上文从理论上阐明了产业集聚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接下来基于制造业20个行业样本[20个制造业二位码行业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机械制造业。]，重点考察产业周期视角下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

（一）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的研究假设，设定如下待检验的计量模型：

$$(1) IE_{it} = \alpha + \beta_1 aggl_{it} + \beta_2 aggl_{it}^2 + \beta' X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2) BE_{it} = \theta + \varphi_1 aggl_{it} + \varphi_2 aggl_{it}^2 + \varphi' X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上式中， i 代表各省、市、自治区， t 代表考察期内的各个年份。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企业家创新精神（ IE ）和企业家创业精神（ BE ）。 $aggl$ 是制造业集聚水平。 β 、 φ 为待估参数，为控制变量。为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个体效应，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00~2015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制造业面板数据，深入分析了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其中制造业的相关数据，删除了部分缺失数据的行业，最终选取了20个制造业二位码行业作为样本。如无特殊说明，其他数据均来自于Wind数据库、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历年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

1.被解释变量。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主要包括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这里借鉴李宏彬等（2009）^[23]的方法，选取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的授权数之和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IE*）的测度指标；企业家创业精神（*BE*）则采用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予以衡量。企业家创新精神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2016）》。

2.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认知水平，这里借鉴孔令池等（2016）^[24]的方法，利用基尼系数（*Gini*）衡量制造业行业集聚水平，地区平均集中率（*Acr*）衡量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具体计算公式为：

$$Gini_{jt} = \frac{2}{n} \sum_{i=1}^n (i \times s_{ijt}) - \frac{n+1}{n}$$

(3)

$$Acr_{it} = \frac{\sum_j s_{ijt}}{m}$$

(4) 其中，*i*、*j*、*t* 分别是地区、行业和年份，*n*代表地区数，*m*代表行业数。*s_{ijt}*指的是地区*i*行业*j*的就业人员占全国行业*j*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地区*i*按照*s_{ijt}*大小递增排序。*Gini*和*Acr*的取值范围是[0, 1]，取值越大代表制造业集聚程度越高。制造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1—2016）》。

3.控制变量。①人均受教育年限（*Hc*）：（小学学历人数×6+初中学历人口数×9+高中学历人口数×12+大专及其以上学历人口数×16）÷6岁以上人口数；②固定资产投资（*Invf*）：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的比重；③居民消费水平（*Consum*）：按常住人口平均计算居民消费水平；④对外开放度（*Open*）：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年鉴上以美元表示的数据按当年年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金额；⑤政府干预能力（*Gov*）：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中位数	最小值
企业家创新精神	<i>IE</i>	480	15877.83	34059.48	269944	4397	70
企业家创业精神	<i>BE</i>	480	0.59	0.16	1.24	0.60	0.10
地区平均集中度	<i>Acr</i>	480	4.12	3.14	24.52	2.97	1.49

※ 20个制造业二位码行业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机械制造业。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集中度	L_gini	480	2.70	2.94	24.52	1.96	0.65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集中度	C_gini	480	3.01	2.21	12.19	2.10	0.80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集中度	T_gini	480	2.11	0.89	5.27	1.90	0.62
人均受教育年限	Hc	480	8.35	1.02	12.03	8.35	5.92
固定资产投资	$Invf$	480	0.55	0.20	1.24	0.51	0.25
居民消费水平	$Consum$	480	8844.35	6620.66	43007	6858.50	1947
对外开放度	$Open$	480	0.32	0.40	1.72	0.13	0.04
政府干预能力	Gov	480	0.19	0.08	0.61	0.17	0.07

四、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

1. 基准回归

为了形成对照，本文先进行基准回归。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采用优于随机效应模型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下表2所示。其中，第（1）、（2）列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第（3）、（4）列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家创业精神。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企业家创新精神（ IE ）		企业家创业精神（ BE ）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Acr	-0.0364*** (0.0111)	0.0227** (0.0109)	-0.0057** (0.0024)	0.0256*** (0.0082)
Acr^2		-0.0039** (0.0018)		-0.0045** (0.0022)
Hc	0.3513*** (0.0632)	0.3577*** (0.0641)	0.0753*** (0.0104)	0.0753*** (0.0115)
$Invf$	1.5214*** (0.3508)	1.1101*** (0.1425)	0.1875*** (0.0572)	0.1731*** (0.0602)
$Lnconsum$	1.3598*** (0.0809)	1.3347*** (0.0818)	0.1055*** (0.0261)	0.0968*** (0.0256)
$Open$	0.4134*** (0.1521)	0.4363*** (0.1234)	0.0158** (0.0073)	0.0139** (0.0067)
Gov	-0.7205* (0.4142)	-0.6896* (0.3675)	-0.6896* (0.3675)	-0.1057*** (0.0278)
常数项	-6.2151*** (0.3445)	-6.2361*** (0.3463)	-0.1018 (0.1314)	-0.2840** (0.1141)

R ²	0.4391	0.4329	0.4027	0.4308
F	125.35***	124.29***	44.25***	43.49***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数	480	480	480	480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下表统同。

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4）中可决系数在0.40—0.44之间，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模型（1）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制造业集聚水平的二次项时，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之间是显著负相关的，即制造业集聚受制于拥塞效应、路径依赖等，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起阻碍作用。但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仅仅考虑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简单线性关系显然是不科学的。故而，模型（2）和模型（4）考虑加入了制造业集聚的二次项，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集聚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这较好地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1和假说2。使用数学求导公式计算模型（2）和模型（4）制造业集聚水平的顶点位置分别为2.91和2.84。也就是说，当制造业集聚程度超过顶点位置的水平时，随着集聚的进一步扩张将抑制企业家精神的提升。根据前文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描述性统计可知，中位数为2.97，也就是说，目前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制造业集聚水平位于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这从侧面印证了一次项回归系数的方向。

控制变量方面，人力资本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创新是人力资本积累和合理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具备特定专业知识、管理才能与创业经历等人力资本对企业家创业具有正面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均为正，这表明较高的投资水平能够为企业提供创新和创业所需要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创造良好的创新和创业环境，有助于提升企业家精神。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关键是激活企业家精神和民间投资，反过来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增长也会助推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活动，故而居民消费水平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对外开放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政府干预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对比说明经济自由有助于催生企业家精神，而政府过度干预则会造成企业家精神的流失。

2.动态面板回归

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从长期来看是个动态过程，既受当前因素的影响，也与过去因素有关。因此在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性，进一步采用系统GMM方法估计（见表3）。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不仅制造业集聚能培育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也可以促进制造业集聚，即制造业集聚属于内生变量。此外，如果采用一般的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理论上还存在两个方面的内生性问题，一是被解释变量滞后项与随机扰动项相关，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二是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为了避免所得到的回归结果是有偏的，本文采用

Arellano & Bover (1995) ^[25]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 (System GMM) 来克服动态面板数据中出现的上述内生性问题。此外, 还对差分方程随机扰动项进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 并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Hansen过度识别约束检验。

表3 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企业家创新精神 (<i>IE</i>)		企业家创业精神 ()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被解释变量的 滞后项	0.7885*** (0.0186)	0.8251*** (0.0198)	0.8242*** (0.0354)	0.8228*** (0.0402)
<i>Acr</i>	-0.0089** (0.0045)	0.0028** (0.0014)	-0.0078*** (0.0021)	0.0074*** (0.0036)
<i>Acr</i> ²		-0.0005** (0.0002)		-0.0013** (0.00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Hansen 检验	0.5475	0.5657	0.3731	0.4576
AR (1) 检验	0.0014	0.0042	0.0033	0.0120
AR (2) 检验	0.4721	0.6712	0.2374	0.2326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数	450	450	450	450

如上表3所示, 模型 (1) — (4) 中的Hansen过度识别检验接受了原假设, 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地。Arellano-Bond差分后的AR (1) 检验均拒绝原假设, AR (2) 检验均不拒绝原假设, 说明差分后的残差存在一阶自相关, 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模型设定合理。滞后一期的制造业集聚水平的系数均呈正显著, 表现出明显的惯性特征。模型 (1) 和模型 (3) 制造业集聚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显著, 表明制造业集聚程度的加大, 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提升。模型 (2) 和模型 (4) 制造业集聚的一次项估计系数为正, 二次项估计系数为负, 与上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这里不再赘述。综上, 上述两种不同的计量模型, 估计结果均不发生明显变化, 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3.制造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行业异质性检验

制造业行业存在构成多样、性质差异和目标多元等复杂性, 并且各行业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存在差异, 那么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制造业行业的集聚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是否也存在差异? 本文进行了行业异质性检验[劳动密集型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等6个行业; 资本密集型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

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8个行业；技术密集型包括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6个行业。在此只报告了滞后期与制造业集聚的回归结果。具体见下表4。

表4 行业异质性的检验

	企业家创新精神 (<i>IE</i>)			企业家创业精神 (<i>BE</i>)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被解释变量的 滞后项	0.7545*** (0.0185)	0.8176*** (0.0176)	0.8318*** (0.0117)	0.8643*** (0.0181)	0.8598*** (0.0182)	0.8588*** (0.0180)
<i>L_gini</i>	0.0026** (0.0012)			0.0042*** (0.0014)		
<i>L_gini</i> ²	-0.0008*** (0.0003)			-0.0008*** (0.0003)		
<i>C_gini</i>		0.0197* (0.0113)			0.0062** (0.0026)	
<i>C_gini</i> ²		-0.0051** (0.0025)			-0.0015*** (0.0003)	
<i>T_gini</i>			0.0778* (0.0453)			0.0216** (0.0106)
<i>T_gini</i> ²			-0.0167 (0.0106)			-0.0053 (0.00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Hansen 检验	0.577 5	0.422 0	0.504 6	0.426 5	0.326 4	0.351 2
AR (1) 检验	0.008 7	0.002 6	0.006 5	0.001 7	0.021 7	0.007 3
AR (2) 检验	0.330 4	0.326 9	0.314 2	0.242 2	0.377 5	0.368 9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数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如上表4所示，就不同要素密集程度而言，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均显著表现为倒U型关系，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企业家精神也存在倒U型关系但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相对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起步较晚，集聚程度相对较低。根据数学求导公式计算可知，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水平位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因此，持续发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的规模经济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将有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与之相反，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水平位于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主要是由于这两种制造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后期阶段，过于依赖原有的技术轨迹和产品路径，对创新的需求和要求较低，显然不利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提升。此外，这两种制造业较高的产业集中度及垂直分离程度，提高了企业的进入“门槛”，导致了较高的企业竞争淘汰率，妨碍了新企业的形成。分行业的检验结果表明，只有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才能维持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的提升作用。

（二）分样本回归

中国具有大国经济特征，区域发展不平衡。本文将分区域进一步讨论制造业集聚性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表5中模型（1）和（4）是东部地区，模型（2）和（5）是中部地区，模型（3）和（6）是西部地区。

表5 地区异质性的检验

	企业家创新精神（ <i>IE</i> ）			企业家创业精神（ <i>BE</i> ）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0.8502*** (0.0225)	0.8843*** (0.0362)	0.8395*** (0.0198)	0.8328*** (0.0295)	0.8493*** (0.0480)	0.8364*** (0.0349)
<i>Acr</i>	0.0876** (0.0395)	0.0555* (0.0312)	0.0113*** (0.0042)	0.0076*** (0.0012)	0.0116** (0.0057)	0.0011* (0.0006)
<i>Acr</i> ²	-0.0008*** (0.0003)			-0.0008*** (0.0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Hansen 检验	0.5631	0.5039	0.5453	0.5642	0.4596	0.5556
AR（1）检验	0.0208	0.0221	0.0105	0.0109	0.0147	0.0207
AR（2）检验	0.3083	0.3268	0.3041	0.2955	0.4414	0.3395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数	165	120	165	165	120	165

¹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从分区域的估计结果看,制造业集聚的一次项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二次项的系数估计值均为负,即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呈倒U型关系,但西部地区的二次项的系数估计值并不显著。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在发展初期制造业集聚会提升企业家精神,在发展后期制造业集聚会延缓企业家精神提升的步伐。西部地区的倒U型关系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正逐步构建起专业化市场,发挥区域独特资源的比较优势,识别新的技术和市场机会,产业基础仍然较为薄弱,正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萌芽阶段。东、中部地区产业发展起步较早,大部分省、市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位于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区域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发挥我国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作用,一方面需要识别各自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各区域制造业集聚的现存状况、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趋势等,最终在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时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区域特点的比较优势,形成区域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值得说明的是,本文的异质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稳健性,增强了本文实证结论的可靠性。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区位熵测算制造业集聚程度后,对计量模型进行重新估算(见表6)。表6中,模型(1)、(5)是全国总样本,模型(2)、(6)是东部地区,模型(3)、(7)是中部地区,模型(4)、(8)是西部地区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各项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有效地支持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无论从稳健性检验的变量符号还是显著性上看,结果与前文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证明了本文检验过程和结论的稳健性。

表6 稳健性检验

	企业家创新精神 (IE)				企业家创业精神 (BE)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0.8910*** (0.0170)	0.8504*** (0.0147)	0.8413*** (0.0364)	0.8025*** (0.0280)	0.8581*** (0.0457)	0.9227*** (0.0532)	0.8744*** (0.0513)	0.8474*** (0.0436)
Acr	0.0658*** (0.0254)	0.0762** (0.0312)	0.0512* (0.0302)	0.0315*** (0.0107)	0.0092*** (0.0031)	0.0351*** (0.0121)	0.0148*** (0.0021)	0.0244** (0.0105)
Acr^2	-0.0095** (0.0042)	0.0111*** (0.0035)	-0.0106* (0.0063)	-0.0039 (0.0189)	-0.0013*** (0.0003)	-0.0080*** (0.0016)	-0.0009** (0.0004)	-0.0001 (0.0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Hansen 检验	0.6184	0.5218	0.5974	0.4175	0.4326	0.5379	0.5776	0.5522
AR (1) 检验	0.0529	0.0432	0.0358	0.0207	0.0055	0.0239	0.0373	0.0113
AR (2) 检验	0.3636	0.3829	0.4795	0.3121	0.2827	0.3563	0.3692	0.2387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数	450	165	120	165	450	165	120	165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制造业面板数据，深入剖析了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1）从整体来看，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制造业集聚达到一定水平后，会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提升。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省份位于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只有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积极推动产业升级，才能维持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的提升作用。（2）分行业来看，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阶段不同，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显著。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处于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3）分区域来看，由于区域制造业发展的起步阶段不同，东、中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效应，与全国总体基本一致，西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现阶段，我国东、中部地区的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制造业处于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西部地区的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制造业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

从上述研究结论中，我们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启示。第一，不断完善制造业集聚区域中企业内部的社会网络对企业家精神的传播渠道，发展外部网络的制造业集聚效应，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维持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的培植作用。第二，因地制宜地制定产业发展政策。东、中部地区应该积极围绕主导产业发展配套产业，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环节攀升，提高产业链整体竞争力；西部地区应该注意利用产业政策手段，积极承接东、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同时注重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主导产业。第三，培育企业家精神，关键是实现经济自由，深化对外开放等有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做好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推进简政放权，政府保护产权、维持公平交易的法律和规则，逐渐淡化其经济主体意识，为培育企业家精神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 [1] Lu J, Tao Z.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China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0, (3): 261 - 273.
- [2] Djankov S, Qian Y, Roland G, Zhuravskaya E. Who are China's Entrepreneur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2): 348 - 352.
- [3] Yueh L. China's Entrepreneurs [J].World Development, 2009, (4) : 778 - 786.
- [4] Kuratko D F, Morris M H, Govin J G.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J].Palgrave Macmillan, 2008, (2): 10-30.
- [5] 李新春, 苏琦, 董文卓.公司治理与企业家精神[J].经济研究, 2006, (2): 57-68.
- [6] 蒋春燕.高管团队要素对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长三角民营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实证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 2011, (3): 72-84.
- [7] 李后建.市场化、腐败与企业家精神[J].经济科学, 2013, (1): 99-111.
- [8] 朱彤, 刘鹏程, 王小洁.贸易开放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家精神的影响[J].南开经济研究, 2015, (5): 111-125.
- [9] 李磊, 郑妍妍, 刘鹏程.金融发展、职业选择与企业家精神——来自微观调查的证据[J].金融研究, 2014, (6): 193-206.
- [10] 高波.文化、文化资本与企业家精神的区域差异[J].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7, (5): 39-47+143.
- [11] 阮荣平, 郑风田, 刘力.信仰的力量: 宗教有利于创业吗?[J].经济研究, 2014, (3): 171-184.
- [12] Ács, Zoltán J, Armington C. Entrepreneurship, Geograph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M].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1, 45.
- [13] Glaeser E L, Kerr W R, Ponzetto G A M. Clusters of Entrepreneurship[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0, (1): 150-168.
- [14] 欧雪银.企业家精神与产业集聚关系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 2013, (6): 132-141.
- [15] Miller D. The Correlate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ree Types of Firms[J].Management Science, 1983, (7): 770-791.

[16] Feldman M, Francis J, Bercovitz J. Creating a Cluster While Building a Firm: Entrepreneurs and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J].Regional Studies, 2005, (1): 129–141.

[17] Britton J N H. High Technology Localization and Extra-Regional networks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4, (5) : 369–390.

[18] 霍春辉, 杨锐.集聚外部性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J].经济管理, 2016, (3): 20–32.

[19]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3) : 483–499.

[20] Frenken K, Oort F V, Verburg T. Related Variety, Unrelated Varie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Regional Studies, 2007, (5): 685–697.

[21] Sorenson O, Audia P G.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Footwear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89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2): 424–462.

[22] 胡安俊.产业生命周期: 企业家精神、集聚、匹配、转移、空间结构的综合研究[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38–39.

[23] 李宏彬, 李杏, 姚先国, 等.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 2009, (10): 99–108.

[24] 孔令池, 李致平, 徐璇莹.中国服务业空间集聚: 市场决定还是政府主导?[J].上海经济研究, 2016, (9): 73–81+89.

[25] Arellano M, Bover O. 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5, (1): 29–51.

责任编辑、校对: 聂莉芹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on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Cycle

KONG Ling-chi^{1a}, Gao Bo^{1b}

(1a. Institute of Yangtze Industrial Economy, 1b.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overall view,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reaches a certain valu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entrepreneurial spirit. From an industry perspective, there is still an inverted U-typ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intensive and capital-intensive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due to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cycle of the industry. Technology-intensive manufacturing and enterprises the inver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irits of the house is not significant.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on entrepreneurship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national level.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spatially heterogeneous.

Key word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entrepreneurship; U type

建设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

陈柳[※]

在控制力和竞争力上，把丰富的产业、科技、人才资源整合起来，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未来，江苏看产业不能只看规模、体量，而是要把多重资源叠加的优势体现出来，释放出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能量，建设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

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内涵

现代产业体系自主性的构成要素。现代产业体系的自主性主要包括以下构成要素：一是国民性。产业的自主可控是以国民产业权益为主体的，控制力不能脱离国民这个主体，主要强调要使国民为主体的产业权益在国际竞争中得到保证并不受伤害。国民性的指标主要体现在具有产业控制力的企业主体中内资所占的比重、外资的非主导作用等。二是竞争力。产业控制力依靠的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竞争力是在开放条件下基于创新技术、标准等竞争优势而形成的。可以说，一个产业没有国际竞争力，就不会有国际控制能力。三是主导权。在更高层次上，自主可控体现在对这个产业创新方向、技术路线的话语权，确保产品在较长时间内不被替代。四是安全性。自主可控是实现产业安全的基础和核心，也是实现产业安全的重要边界。一国对某一产业控制力弱化，即表示该产业的安全边界受到威胁，产业控制力的提升和实现，是维护产业安全边界和实现产业安全的重要途径。

现代产业体系自主性的来源。现代产业体系自主可控的能力主要来源于以下因素：一是核心技术。利用核心技术控制产业体系是价值链中链主的最常见行为，欧美日主要发达国家仍然在主要产业领域垄断核心技术。二是标准制定。国际高端产业的竞争直接表现为标准的竞争。比如，较长时间困扰中国发展大型商用飞机的问题是获取欧美的适航证。尽管中国民航有自己的适航证，但国际普遍认可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标准，并且EASA和FAA是互认的。三是商业模式。随着新经济模式的发展，部分企业利用商业模式形成的市场势力在产业链条中处于支配地位，如亚马逊、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四是资本联盟。在高端产业的产业链中，一家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企业不太可能控制全部的重要环节，产业链当中的若干企业会通过股权等资本合作建立联盟。

建设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的两个层面

哪些产业需要自主可控。结合国家发展需求和江苏产业特点，选择和确定自主可控的产业

[※]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群众》2018年20期。

可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市场容量原则。中国市场容量巨大，但由于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缺乏与跨国公司竞争的本土企业，国家和消费者将为国外垄断价格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和外汇储备。对此，要有所作为，如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新能源汽车对燃油车的替代趋势为我们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遇，我省的新能源汽车基础较好，在若干环节可以与国际厂商在相似的起跑线竞争；在环保产业方面，发达国家治理环境的技术和经验丰富，但是环境治理的工作在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我们要利用环保产业的内需优势，通过各种有效合作将国际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使得江苏的环保产业水平达到世界前列。二是产业安全原则。部分核心技术首先运用于军工领域，这些产业和技术发展涉及到国防安全乃至国家领土安全等问题。要结合国家军民融合战略，对这些产业有自己的布局。三是基础产业原则。很多关键产业的发展受制于我国的基础产业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基础产业不同于工业化时代的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传统产业，而主要表现为信息产业、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行业运用到的基础技术和材料，如半导体行业、新材料行业等。为此，要提高这些行业关键材料的国产化率。四是前沿趋势原则。江苏作为全国产业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要对前瞻性产业未雨绸缪、积极布局，如提前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因为类人神经计算芯片、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应用系统等人工智能产业的重点领域的发展是未来的方向。

选择产业攻关要发挥自身优势。一是发挥产业集群优势。我省正在加快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万亿元级世界性产业集群，以及数十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要对重要环节发力，在产业集群中培育更多的掌握产业链命脉的“隐形冠军”。要在更高层次上理解高质量发展中“亩均产出”等指标的含义，不仅要看亩均产值乃至亩均税收，更要看企业所处的环节对产业的控制力。二是发挥科研院所学科优势。国内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江苏布局，这些研究机构在各自的领域拥有很强的优势学科。要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主体承担攻关任务，不断完善创新体制，支持科研院所与我省各类创新主体联合攻关，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三是发挥独特的市场优势。中国具有某些相对独特并且巨大的市场，市场因素将促进前沿技术的运用，也为技术创新提供物质基础，如在移动支付、移动社区方面积累了海量用户和数据。要抢抓机遇，选择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的重点环节进行突破。四是发挥在前沿领域的相对后发优势。当前，众多前所未有的新兴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为我省提供了“弯道超车”“换道超越”的机会。相对于发达国家，产业演化过程中技术路线的转换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如在人工智能领域，总体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同时起步，集中攻关可能在某些环节取得行业话语权。

建设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的思路

选择产业链环节实施市场势力对等战略。从产业实践来看，随着现代产业链分工的细化，一条产业链当中可能存在多个重要的环节。如果短期内直接突破不了国外企业掌握的最核心环节，可采取次优的对等战略，即在产业链中选择壁垒大致对等但更能发挥相对优势的环节突

破。“大而全”不能形成对等势力，而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等环节集中突破，为国家产业安全作出贡献。

推动现代产业体系之间的协同发展。现代产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其他产业之间具有协同性。在新兴产业之间，一个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一个产业的瓶颈，也可能制约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比如，电子LCD制造用光刻胶核心技术至今被TOK、JSR、住友化学、信越化学等日本企业所垄断。为此，发展现代产业不应是孤立支持某个产业或企业，而应着手建立重要产业之间的联合技术攻关的机制平台，实现相关行业企业之间的有效对接。

优化现代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从发达国家来看，现代产业都是以集群形式存在的。优化现代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要以全省“一盘棋”思维，发挥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突出作用，着力在区域内谋划布局体现我省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产业地标；深刻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含义的动态性，对于主要是加工性质、仍然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产业和环节，可引导实施产业转移；在小区域范围内，尽量避免对项目的恶性竞争，可借鉴南京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建立项目信息首报避让机制的经验，减少不合理的重复建设。

引导优秀企业加入到关键领域的攻关中。核心领域的技术攻关通常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经历较长时期的亏损，这不仅需要政府各类专项资金支持，更需要已经具备强大实力和有资本持续投入的企业加入。从全国范围来看，阿里、腾讯这些互联网企业，正聚焦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距离互联网较近领域的核心技术；宝能、恒大这些企业，也正在进军新能源企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江苏除了先进制造业，在零售、传统制造、房地产等领域也有不少全国领先、具有相当实力的企业，要引导这些企业运用资本、管理方面的经验投身到建设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中。

运用市场优势增强技术引进的谈判能力。中国巨大的、特有的市场是引进国外高端技术的重要优势。其中，高铁行业是利用国内市场引进、消化、创新技术的典型案例。为此，首先是要选择对我国市场依赖较大的产业进行技术引进和谈判，如环保行业、核电和老龄化产业。其次，对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要通过省级层面协调行业协会等组织进行集中谈判，让消化吸收平台更好地对接国外关键技术环节。

“一核两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框架与模式

徐宁[※]

摘要：〔目的/意义〕高校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应当充分利用其优势积极参与并发挥作用。然而，高校存在诸如体制机制、研究导向等种种不利于新型智库建设的问题和障碍。〔方法/过程〕为破解这些问题，本文提出高校智库建设的“一核两力”框架和模式。〔结果/结论〕首先要进行体制突破与机制创新，构建独立、自主、灵活的智库主体和治理结构，并配以完备、规范、科学的制度体系。其次，要搭建规模适度、梯度分明、结构合理的核心研究团队和体现异质性、广泛性和研究性的外围团队，同时利用技术手段和机制设计实现平台化研究。最后，以构筑“四大互动体系”为思路打造智库高效运营力，为研究力赋能，提升研究质量和智库功能。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一核两力 研究力 运营力 四大互动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在新时代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中办、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和建设格局，是当下新型智库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新型智库与传统科研机构有很大不同：除开展科学研究之外，还要在此基础上将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向社会大众传播知识、与国际社会沟通交流，发挥“咨政”“启民”和“外交”3大功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更丰富，任务更繁杂，要求更多元。

高校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具有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和对外交流广泛的优势，应当强化使命、寻找定位，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传统功能中强调智库属性，着力发挥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和公共外交等智库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多更具体的贡献。

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校使命与建设框架的提出

智库好比一座知识生产工厂，将各种智力资源、数据、政策和社会情况等汇总，进行分析研判，产出见解和观点，产品形式表现为各类研究报告（决策咨询报告、对外发布报告、媒体

[※] 徐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助理、办公室主任，博士。本文原载《智库理论与实践》第3卷第六期。

评论文章等）。按照《意见》的精神，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座“知识生产工厂”需要将产品向政府、公众和国际3个层面市场进行“销售”，高校应当在其中承担更为具体的使命并发挥其功能。

第一，高校学科齐全，理论基础厚实，应主要承担智库的理论创新功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理论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用科学的、系统的、国际化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指导中国发展、传播中国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高校具备学科、人才等优势，应成为智库理论创新的重镇，为智库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指导智库的战略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

第二，高校应充分发挥人才培养功能，为智库行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首要功能，高校有一套完善的多层次、多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和高水平师资队伍。智库研究人才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掌握调查研究、比较研究、数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并具备一定的社会实践阅历，实现“理论—实践—理论”有益循环。高校应根据智库研究特点，在人才培养体系中整合打通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设置智库人才教学体系，为智库培养人才。

第三，学术研究是高校的基础和优势，高校应当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将学术研究向智库研究转化。这其中包括4个方面的转化。一是化研究为决策咨询，即将研究成果转化成为党和政府提供战略咨询和务实管用的公共政策建议，发挥咨政建言功能；二是化研究为公众传播，即将研究成果以专业、理性、权威的声音通过宣传媒介向社会传播，引导社会大众认知，发挥舆论引导功能；三是化研究为社会咨询，即将研究成果为社会各个机构和组织提供咨询服务，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四是化研究为对外交流，即将研究成果进行国际交流，用专业的、国际化的学术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发挥公共外交功能。

然而，我国高校虽然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纷纷根据自身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建设新型智库，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些高校智库在体制机制、团队建设、管理方式、研究模式、评价考核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限制了高校智库功能的发挥，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高校智库的发展^[1]。

由此，笔者提出，高校应当构建“一核两力”的新型智库建设框架。这是一个整体框架体系，目的是运用系统性思维，结合高校特点将学科、人才和外交的优势转化为智库整体能力。具体来说，“一核”指的是高校智库首先应进行顶层设计，在智库主体、治理体系、组织架构、制度建设等方面构建体系，为新型智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两力”则是指取决于研究团队与研究模式的研究力以及关系到智库研究质量、成果转化、品牌传播等方面的运营力，二者构成智库的主体能力，决定智库建设的成效。

这其中，“一核”是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两力”是主攻方向和建设内容。也就是说，高校新型智库建设首先必须解决体制机制等顶层设计的问题。《国家高端智库管

理办法（试行）》明确说明了高端智库所应达到的8个条件，这应当是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的标准，要求需要高校智库在整体组织框架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和创新突破。不解决顶层整体设计的问题，高校智库就会变成传统科研机构模式，难以有效发挥智库功能，达不到中央对新型智库的要求。此外，解决好“一核”的问题后，高校智库建设应该围绕提升“研究力”和“运营力”的目标开展具体工作。在二者的关系上，“研究力”决定了智库研究能力和成果质量，是根本建设目标，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智库被政府、公众、国际社会等受众认可，进而发挥影响力实现智库功能的基本条件；而“运营力”赋能于“研究力”的，主要致力于发挥“雪中送炭效应”和“锦上添花效应”。前者是指“运营力”可以弥补智库研究中的短板，通过运营来完善和扩展智库研究链条，进一步提升研究质量和指向性；后者是指“运营力”可以助力研究，帮助好的研究成果扩大影响，辐射到包括政府和公众在内的更多更广泛的受众。

二、“一核”：新型高校智库的体制突破与机制创新

体制机制是高校智库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在推动高校智库发展上，要“深化高校智库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组织形式”。高校的体制机制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智库主体。中国高校大都为事业单位法人，并在该主体下设置多个学科单位（院系）和行政管理部门，协同运作发挥高校功能。高校建设智库通常有两种模式：一是让现有院系直接成为智库主体，相当于增加院系的智库属性，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二是新设研究机构，整合学科资源和研究力量进行智库研究，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第一种模式要求院系研究人员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注重成果的智库化应用。由于教师个体精力有限，他们更愿意将时间用于教学和学术研究，这就要求院系具备智库研究传统或较强的转化能力；第二种模式设置的智库机构通常附属某个学科或者二级院系，这种依附关系使得智库难以实体化运行，并且在人事管理、财务制度、治理体系等方面也无法突破高校传统的行政管理体系。总之，在主体上，智库的实体化、独立性要求会使得高校智库主体与高校主体产生冲突和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会逐渐成为高校传统体系中的另类并被边缘化，同时产生“三明治陷阱”效应^[2]。

第二是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治理结构反映一个组织运行的制度性安排和决策机制，包括各相关主体间关系、权力分配模式和决策结构。高校治理结构包括学校层面的治理和学院层面的治理，目前中国高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决策机制上以党委会、行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决策^[3]。组织架构上看，院系与学校是隶属关系，党政领导均由学校任命，接受学校领导。院系通常根据学科来设置，以学科发展为重点，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这种典型的行政化治理体系对于新型智库来说有三方面弊端：其一，陈旧的科层式官僚体系导致智库难以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并且实现实体化运行，特别是相较于高校，新型智库更需要在运行中对现实问题反映灵敏，并且能够有效组织资源开展研究，这种治

理体制会形成很大制约；其二，该治理结构不符合现代组织的治理模式，智库容易在建设走向行政化、官僚化，偏离研究的宗旨和轨道，难以达到中央对新型智库的要求；其三，组织架构上，高校智库的重要决策须向学校相关部门及校级领导汇报，经学校层面讨论同意后才能执行，这种层层汇报的结构导致智库的决策环节增多，决策程序复杂，决策速度迟缓，不利于高校开展智库研究。

第三是组织形式和制度建设。中国高校通常有一套较为完备成熟的制度体系，包括章程、财务管理、考核评价等。智库作为二级单位必须首先遵守高校规章制度，按照学校的制度体系运作，在此基础上根据情况和学科特点建立自身的制度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库被学校的大制度体系所束缚，根据其自身运行规律和特点建立制度体系的空间不足，影响智库的制度化建设。例如，智库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体系就是成果评价标准，高校看重的是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获得国家级项目、重要奖项等方面，而智库更看重成果的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等软性指标，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新型智库应当建立起自身独立的流程、科研、财务、考核等多方面制度体系，这一点与前面所谈到的智库主体要求完全一致。

因此，高校智库建设应当紧密结合《意见》的相关精神，从以上3方面问题出发，在依托高校学科平台及学术团队的基础上创新体制机制，构建独立、自主、灵活的智库主体和治理结构，并以完备、规范、科学的制度体系作为运营支撑。

首先，在智库主体上，要着力创新主体形式，给予智库主体充分自主权，确保智库运行灵活高效。这里可探讨成立智库法人主体，满足中宣部对于智库建设的独立性要求；但同时不能同高校主体断绝联系，否则无法依托高校平台开展智库研究。例如，南京大学建设长江产经智库和紫金传媒智库时，采取了“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双主体模式：首先支持智库学术带头人在省民政厅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主体，其性质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由省有关部门进行业务指导，纳入国家社会组织管理体系，每年进行年审；同时，在学校层面成立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由学校相关部门进行指导并整合学科资源，但与学校行政系统相对分离并独立运行，学校给予一定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

其次，在治理结构上，应采取现代组织治理结构，以政校协调、独立治理、自主运营为原则，给予智库主体充分自主权。同时，建立学术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之类的高水平咨询机构，充分参与智库研究方向设定、研究成果评估等研究活动环节，为智库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持。笔者认为，较好的高校智库治理模式应设置3层治理机构：第一层是由有关政府高层和学校高层组成的协调机构，不承担具体事务，旨在为智库建设拓展空间、整合资源，争取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第二层是理事会或董事会，为智库实体最高决策机构，根据章程行使权力，为智库发展的重大问题做决策；第三层是执行机构，对理事会或董事会负责，由智库负责人主持，负责日常的研究和运营工作。

最后，应秉持制度化建设理念，建立完善、有效、科学的制度体系，形成智库的运行系统，确保智库规范有序运作。其中，第一层是基础制度体系，如法人主体的章程、理事会运行规则、学术委员会运行规则、办公会议事规则等，这是智库的基本框架和运行保障；第二层是涉及智库运行的规则体系，应涵盖智库运行的各个方面，如财务制度、预算决算制度、成果管理制度、科研项目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保密制度、奖励制度等等；第三层是根据各个智库的研究方向和特点，制定智库个性化制度体系，如对外交流制度、横向合作制度、媒体合作与传播制度等等。

三、“研究力”：新型高校智库的研究特征与团队建设

高校和智库都具有科学研究的职能，这是核心工作。然而，智库的研究和高校的研究在选题、方法、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4]，高校智库建设过程中应该清楚认识这些差异，并做出相应调整。

第一，研究的理论性导向与应用性导向的差异。高校科学研究理论性较强，往往不太重视应用研究；智库研究则应以理论研究为基础，走向应用，解决实际问题。对于二者来说，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规律、产出知识，应用研究的着力点在于通过研究解决社会中的问题。中国高校大都以学术论文为成果评价导向，学者关注点是能否取得理论研究进展及在高级别期刊上发表论文。智库研究必须聚焦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分析形成原因和机理，以及未来发展走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供决策部门参考。高校建设新型智库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方面的差异。不过，理论与应用研究也并非对立关系，二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形成理论与应用共存相长的有机统一。高校具有明显的理论研究优势，具有对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和储备性研究的能力，这是智库研究的基础，高校应进一步思考如何将该优势有效转化成智库应用研究成果。

第二，个体研究与协同研究的差异。高校的特点是个体研究有余而协同研究不足。高校学者通常是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对某个特定领域持续深入挖掘，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更是如此。研究模式往往是依靠个人或组建以自己学生为主的团队，团队成员专业趋同，广义上看仍然属于个体研究范畴。对智库而言，研究主题是聚焦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问题表象的机理分析不是单个学科的问题，需要进行跨学科、跨领域、跨职业的协同与合作，这种协同研究恰恰是高校学者所不具备的。此外，新型智库建设首先应以服务政府决策为导向，新型高校智库要特别注意跨领域合作，聚焦政府部门关心的主题，将政府决策部门和社会实践领域相关人士整合进来，在发挥高校在理论基础、分析方法、研究平台、科研队伍等方面优势的同时，开展多角度、多层次、多维度的协同研究。

第三，研究深度与速度的差异。智库研究对象的现实性特征需要智库迅速对现实问题产生反应，就政府和大众关心的问题及时给予专业回应。而高校研究的特点是深度突出但速度不

足，高校学者擅长抓住一个点进行长期深入分析，而忽略研究的时效性与应用性，对现实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紧迫性问题关注不够或者反应较慢，难以满足智库的时效性要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研究深度是智库研究的“基石”，高校智库应当首先坚持其研究的“专”与“深”，聚焦某个领域或重大问题，在夯实研究基础、拓展研究深度的同时，保持对时势问题和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敏感性与关注度，基于扎实的科学研究对这些问题调研、分析、研判、跟踪、评估，形成研究报告，用专业、深入、理性的研究成果支撑政府决策、引导社会舆论、引领公众认知。

第四，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高校学者习惯使用学术化的表达方式，注重概念表述的准确性、逻辑推演的严密性以及论据的有效性等，文章大量使用模型、计量、专业图表等晦涩难懂的表达形式，非专业人士难以理解。智库研究成果的主要受众是决策部门或社会大众，不是小众、专业的学术群体，应当在能让受众读懂接受的基础上将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机理成因表达清楚，这对智库成果的表达方式提出了要求。这种深入浅出的表达形式要求智库学者和机构应当具备将学术研究向大众转化的能力，了解政府部门的公文表达方式和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通俗表达形式，使研究成果易于被受众接受。

综上，高校建设新型智库应当注意这些研究上的差异，从团队架构和研究模式两个方面发力，将高校研究能力有效转化为智库研究力，提升智库研究成果质量。笔者认为，高校智库在团队建设和研究模式上应采取“小核心+大外围”模式：“小核心”即搭建规模适度、梯度分明、结构合理的核心研究团队；“大外围”是充分整合来自高校、政府、社会等各界人士加入智库研究体系，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深度整合外部研究资源，形成平台化研究新模式。

“小核心”团队应保持适度的规模、清晰的层次以及合理的结构，并坚持“体制内与体制外相结合，专业化与市场化相结合，学术型与应用型相结合”的理念，聚焦特色领域进行长期深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打造，一是充分利用高校平台吸引高级智库人才（如首席专家、学科带头人等），给予有竞争力的待遇和研究平台。例如，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通过平台吸引了数位政府退休高级官员进入智库。二是搭建智库核心团队，形成人才梯队体系。鉴于智库人才和高校人才有一定区别，应构建智库研究员系列职称体系，从评定标准、评定流程等方面根据智库研究特点设定规则，建立核心团队的职业发展通道。三是建设专职的研究辅助团队，或称研究助理团队。这种团队按照市场化要求进行打造，强调专业化能力，如数据处理、外文翻译、调查研究、文字撰写等，可根据研究需要灵活组合，为核心研究提供辅助。

“大外围”团队的建设首先需要邀请广泛、多元的各领域相关人士加入高校智库研究平台，同时充分运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手段，建立智力资源数据库，进行平台化研究。这其中首先要注意外围团队的数量和结构，考虑智库研究的特点，从地域分布、职业差异、学科种类等

维度构建，并充分利用团队的异质性和互补性形成整合研究效应；其次，构建“智力资源数据库”，搜集外围研究人员的静态和动态信息，形成完备科学的专家标签数据库，为智库所用；第三，要考虑不同类别专家的特点，探索其参与智库研究的方式和模式，如设立“特约研究员”“访问学者”“研究顾问”等多种岗位和相应研究模式；最后，鉴于“大外围”团队的松散性和异质性特点，应进一步利用移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形成顺畅而良好的智库与智力资源互动体系，充分激发他们的研究活力，挖掘其研究潜力为智库服务。

四、“运营力”：构建“四大互动”体系为新型高校智库研究力赋能

高校作为传统科研机构与智库还存在另一个差异：高校重研究轻运营，即运营力不足。智库研究包含选题、调研、分析、行文、成果转化等完整的“研究链条”，靠学者“单打独斗”无法完成整套研究流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库研究工作需要强大的运营力予以支撑，要充分整合政府、学者、媒体、社会组织等主体。

为了解决传统高校研究机构存在的不利于智库研究的种种问题，以智库运营力支撑智库研究力，笔者认为应以“四大互动体系”赋能智库研究。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构建“智政互动、智智互动、智社互动、智媒互动”四大互动体系^[5]，充分整合各领域力量，深度嵌入智库研究与成果转化的各个环节，服务智库建设。

一是“智政互动”。咨政建言是智库的中心工作，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首要功能。对于高校智库而言，能否将研究向决策咨询转化，为党和政府民主科学依法决策提供支持，出“务实管用”的建议，是衡量高校智库建设是否有成效的重要标准。而决策咨询研究的客户是政府决策部门，智库的研究不能脱离政府，采取过去“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模式，必须紧密对接政府并了解其需求和决策环节，搭建智政互动体系。所谓智政互动，是指智库在运营过程中应构建深度嵌入政府决策各个环节的互动模式，全面参与政府的公共政策工作，包括情况调研、问题分析、政策论证、政策实施与评估等工作环节，与政府决策部门信息共享、问题共研、政策共制、效果共评，发挥智库的“外脑”“第二公共政策讨论空间”和“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等作用。

二是“智智互动”。智力资源是智库的生产要素，智库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平台吸引力、品牌影响力和团队整合力“汇智成库”，产出研究成果。智智互动即智库与智力资源的互动，高校智库的智智互动体系应当充分利用高校学科平台优势，在构建规模适度、层次分明的研究团队基础上寻找能够吸引并汇聚这些智力资源的机制、模式和方法。由于智力资源在社会中处于分散、游离的状态，且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智库应当在汇智模式上打破传统的诸如线下研讨会、研究课题单向发包等方式，运用信息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手段，以“三位一体”框架构建智智互动模式^[6]：将多元广泛的智力主体集、完备有效的规则体系和专业高效的运营团队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深度融合、协同运作，形成系统性、一体

化的知识生产体系，为智库分析和研判现实问题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三是“智社互动”。这是智库与其研究对象的对接模式，智库的研究都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开展，需要跟社会研究对象进行沟通、调研及合作，例如企业、社区、政府、民众等。这些社会组织或个人首先是智库的研究对象，智库需要长期跟踪他们在社会中的运行情况出现的问题，通过研究进行分析和提炼；其次，这些社会组织或个人也是智库智力资源的组成部分，可为智库研究提供研究素材、案例，或直接参与研究过程；最后，他们也是政策的服务对象，可为智库在政府政策评估与优化过程中提供第一手资料。高校智库应充当政策制定者（政府）和政策受施者（社会组织）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将社会组织的现状及问题通过理性专业深入分析形成政策建议，另一方面也要打造智社政互动互通平台，通过沟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四是“智媒互动”。媒体的主要功能是传播，如今“智库媒体化”和“媒体智库化”共存的现象充分说明智库与媒体应当是相互深度嵌入的关系。高校智库打造智媒互动模式的关键是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构建合作机制和模式。具体来说，高校具有研究深、视野广、方法多等优势，媒体具备反应快、传播广、机构多等优势，二者有充分的互补性和合作基础。高校智库的智媒互动应当注意与媒体的多元化合作，考虑以下内容：一是不同性质的媒体，如政府媒体、社交媒体、海外媒体等，它们所影响的受众不一样；二是不同传播方式的媒体，如电视媒体、纸媒、自媒体等，它们传播途径不一样。此外，由于高校过去的研究并不常与媒体合作，应充分认识智媒互动的目的，即将智库专业理性的研究提供给大众进行思考和判断，影响大众认知并实现舆论引导功能。

以上四大互动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相互给养，形成系统性有机体，构成高校智库的运营体系，为智库研究力赋能。因此，要根据这个特点构建智库运营团队，打造智库运营力。高校智库运营团队的构建必须摒弃传统的行政化思维，从“行政管理”的定位转变为“专业运营”。运营团队要职业化、专业化，着力提升团队的转化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化能力。

具体来说，首先，转化能力指的是团队将研究成果进行转化的能力，包括向政府转化（咨政目标）和向社会转化（启民目标）。这其中要深入分析各个能力的具体要求：向政府转化需要构建成果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同时搭建沟通渠道，建立研究成果报送机制和反馈机制；向社会转化首先要建立自己的传播媒介（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同时也要跟各个媒体渠道建立合作关系。其次，创新能力是运营十分重要的能力，需要突破传统的管理思维，建立新的工作机制，运用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手段。其中，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进行智库知识生产是重要的创新模式。例如，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创新研究模式，建立“三位一体”平台化研究模式，利用移动互联网打造知识生产平台，全面整合各方面专家资源参与智库研究。同时，探索利用信息化平台进行专家管理和项目管理，

开展精准靶向研究和整合协同研究。第三，国际化能力是指结合公共外交需要，与国际各方面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开展联合研究、外交“二轨对话”等活动。国际化过程中，一方面应注意将研究成果运用国际语言和表达方式对外传播，讲中国故事、传中国声音，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另一方面，还要将国际声音、国际观点和国际成果进行分析并向国内转化，帮助政府决策者更加客观理性认识和了解国际声音，做出更高质量决策。

最后，运营力的打造还要注意团队在岗位设置、专业分工、协作机制、考核激励、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和建设，通过制度和文化“双轮”驱动高效专业的运营团队，真正为智库研究进而为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赋能。

五、结语

对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模式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发挥智库功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贡献的重要课题。在研究高校智库建设模式的基础上，更应深入研究该模式各个机制如何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各智库研究参与主体和个体的内在激励和动力，找到最佳制度方案，充分发挥高校各方面优势，为新型智库建设做出贡献，使高校智库更好地成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沈国麟.中国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三个矛盾[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8(2):30-34.
- [2]李刚.创新机制、重心下移、嵌入决策过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下半场”[J/OL].图书馆论坛,2019(03)[2018-11-1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180925.1532.002.html>.
- [3]高秀梅.大学治理结构:内涵、现状和思路[J].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5,35(2):82-85.
- [4]徐宁.扬长补短建设新型高校智库[N].光明日报,2018-06-14(15).
- [5]徐宁.构筑四大互动体系锻造智库核心能力[N].经济日报,2018-04-19(16).
- [6]徐宁.构建新型智库“三位一体”知识生产模式[N].经济日报,2018-08-30(16).

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重点

刘志彪[※]

习近平同志在今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我们应深入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内涵和战略重点，努力在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取得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新突破。

理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

习近平同志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据此分析，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包括以下7个部分：一是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二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配置资源的主要机制。只有建立这样的市场体系，才能给企业提供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优良环境，才能给消费者创造自由选择、自主消费的空间，才能实现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微观基础。三是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激励和平衡机制。形成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标志。四是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空间布局方面的体现。要形成国土资源利用效率较高、要素密集程度较大、生态容量适度、城乡融合发展、区域良性互动、陆海统筹整体优化的生产力布局结构，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五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态环境基础。要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六是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机制。高水平的开放体系是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与世界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经济体系，要求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七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基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事关能否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赢得国际竞争

[※]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原载《人民日报》

主动，事关能否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于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都决定了我们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过去主要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既要跨越非常规的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特有的关口，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又要跨越常规性的长期性的关口，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只有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成功跨越两大关口，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线图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四大重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供给的结构、质量与不断升级的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结构失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重点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

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体经济是本、是纲，必须大力纠正脱离发展实体经济轨道、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不良倾向。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要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现代金融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血液系统，要使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最宝贵资源，要使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提高实体经济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职业声誉、经济收益。

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主要路径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一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标准是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建立和完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三大制度。二是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政府对权力清单外的事务多做减法。三是“放手”而不“甩手”，为市场活动制定规范，纠正市场失灵，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习近平同志在今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抓好的五项工作：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四大重点和五项工作，科学描绘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线图。

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同志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不仅提出了诸多重大实践任务，而且蕴含着重大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宝库。这里举三个例子。

对发展理论的创新。过去，我国的发展理论主要研究在落后生产力和短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则是在资本和商品供给充裕的条件下，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研究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它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不再是短缺而是过剩，不再是数量而是质量，不再是有无而是好坏，特别是要重点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结构失衡问题。这必然推动发展理论取得新的突破。

对产业经济理论的创新。过去，我们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是建设比较稳固的现代农业基础、比较发达的制造业和门类齐全的现代服务业。这样的目标容易造成产业部门之间的分割，没有突出各产业部门融合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意识。习近平同志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部署，创造性地从要素投入角度而不是部门分类的角度明确了未来产业体系建设的新目标以及协同发展的总要求，是扎根我国发展实践、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重大创新。

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虽然强调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在增长中的作用，但很少研究要素协同作用问题，也没有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度讨论经济发展问题。习近平同志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部署，深入分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之间的关系，系统论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具有中国原创性的重大理论创新。

充分评估改革开放的间接利益

张二震[※]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发展成就。其成功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将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就是积极融入全球化，在扩大开放中实现发展。

对外开放之初，理论界还是有不少疑虑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强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下，中国能不能从对外开放中获益，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都是存在疑虑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我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地域开放，从举办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沿江开放，从沿边开放、内陆开放到全国开放；产业开放，我们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顺应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为本质特征的全球化，大力引进外资，充分利用丰富的低端要素优势，从产业低端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把人口负担化为“人口红利”，并且成功地对接国际高端产业，把引进先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短短几十年就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并且在高铁、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的开放，一直受“低端锁定”“只赚数字不赚钱”“比较优势陷阱”“污染天堂”“妨碍自主创新”“民族经济受损”等质疑。理论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我们融入的是低端产业、低端产业链，被低端锁定了，利润都被跨国公司赚去了。我们虽然是贸易顺差，但是外汇储备很大部分买了美国国债，流向美国去了，留下的是污染和血汗工资。不能说这些质疑没有道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些问题。但是，算账要算大账。我们不能只看贸易投资的直接利益。我认为，以附加价值来衡量我们的开放利益，以价值链的地位来衡量中国的开放水平，存在严重的缺陷，大大低估了中国对外开放对中国发展进步的作用。对外开放的最大利益是开放的间接利益。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和思想观念解放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理论界、实际部门对这方面开放利益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比如，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国际先进要素的源源流入，促进了我国农村巨额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激发了闲置要素的潜在生产力，优化了资源配置，带来了先进的市场经济观念和制度体系。开放带动了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新产业的兴起，带动了城市化进程。总之，对外开放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其显著特征是，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参与者，

[※] 张二震，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新华日报2018年3月14日 第017版

变为全球化的推动者。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30%以上，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我们是个大国经济，而且我们又是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成就，给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十九大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的发展对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成功发展的世界性贡献之一，就是提供了示范和榜样。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应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发展模式的自信。中国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既能够融入全球化，又能保持自身独立自主的发展以及模式提供了可能的选择。

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推动者，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成为全球化的反对者。这证明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的治理体系出现了问题，所以中国第二个方面的贡献，就是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现在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具有两重性，一是具有适应社会大生产和全球化发展的要求，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的积极作用，但是不适应的地方也很多，比如不适应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变化，代表性不足，不能适应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和投资壁垒消除的需求，不适应全球包容性发展的要求。我们原来都讲，全球化实质上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这些规则确实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维护的是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利益，未能充分供给全球的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导致全球化发展利益分配失衡，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也未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亚投行、金砖国家峰会、亚信峰会等等，都是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作贡献。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先进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发展竞争”转向“平等竞争”

刘志彪[※]

民营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背景和发展民营经济的底气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贡献了巨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用“五六七八九”五个数字概括了我国民营经济所具有的特征和作出的贡献。民营经济可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背景和底气，主要来自于：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使命、任务和国情及发展阶段，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民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和政策；二是我国宪法规定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发展公有制经济，从根本上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利益；三是在实践中不断地纠正某些地区、行业及某些时期的错误做法，抓住某些侵犯民营企业产权和利益的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教育，给民营企业以正确的预期。

民营经济的困难与民营企业家的定心丸

近年来，正值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有下行压力的时期，社会上又开始出现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使很多民营企业家感到困惑和担忧。习近平总书记因此重申了“三个没有变”：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这是近期中共中央给广大民营企业家吃的最大的定心丸。

我们情不自禁要问的问题是：既然我国宪法的规定摆在那儿，中央起“定海神针”作用的路线方针政策摆在那儿，为什么在实践中还有很多企业家会对民营经济发展前景持谨慎甚至比较悲观的态度呢？这可能跟这些年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有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遇到困难有四个原因：一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给我国经济和市场预期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二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给企业带来转型升级压力。三是我们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四是企业自身的原因。其实，第一个困难是所有企业都必须正视和客观面对的，是个体和局部无法克服的；第二个困难也是考验所有企业在竞争中能不能胜出的关键因素，无法跨越发展阶段的企业将在竞争中被淘汰。这是市场竞争的残酷之处，也是市场优胜劣汰的魅力所在；第四个困难虽然关乎企业加紧修炼内功的问题，但是也与宏观经济政策预期的不稳定有关，如针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不力，长此以往就会诱使民营企业家的短期掠夺行为，不注重自身素质的提升。我认为，民营经济遇到的最大

[※]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原载北京日报
2018年11月26日第013版

的困难，从而形成民营企业家悲观预期的最大因素，其实是第三个即针对民营企业的不少政策措施无法彻底落地，他们长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落实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需要逐步推动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的过渡，推进公平正义取向的普惠制政策。

对民营企业的一些政策措施长期不落实，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针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如产业和市场准入歧视、税收歧视、信贷和融资歧视、补贴歧视等等。这些歧视分为两种：显性歧视和隐性歧视。由于我国宪法规定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因此显性歧视在各地政府的政策文件规定中应该是很少的，而且越来越少，但是隐性歧视却还很多，尤其是现实中针对民营企业的政策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比较严重。各种针对民营经济的歧视现象，是我国长期以来对企业实行所有制原则和企业规模原则进行分类管理的结果。分类管理的出发点来自于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的动态控制。这种管理方法的大规模运用，则起因于转轨经济中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需要。分类管理的结果，必然产生严重的所有制歧视和企业规模的歧视。因此彻底取消企业按所有制标准进行分类管理的办法，其实就是要取消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实施公平公正公开的一视同仁的管理办法。

落实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消除各种针对民营企业的经济歧视，根据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实践的经验，需要逐步推动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的过渡，推进公平正义取向的普惠制政策。这是给民营企业安心求发展的真正政策定心丸。

过去我国实施产业政策的本意，就是为了贯彻“非均衡”发展战略、加速发展政府所支持的产业和企业，因此在转轨经济中，这种非中性化的产业政策最容易导致对非重点支持企业的不公平对待。在产业政策由地方政府主导运作之后，最容易导致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和对全国统一市场的分割。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已经不是没有市场竞争，也不是没有发展竞争，而是相对缺少平等竞争，缺少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条件。各种行政垄断、行政干预，各种利益联盟和国有企业借助于产业政策等手段严重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导致了严重的寻租和不公正，以及市场取向改革的滞后。这是中国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以及发展方式粗放的主要原因。

基于建设统一市场、坚定不移发展民营经济、扫除平等竞争障碍的要求，首先必须调整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推进经济从“发展竞争”转向“平等竞争”，也就是公平正义取向的、普惠型的竞争政策要逐步替代有倾斜的产业政策，成为我国统一市场运行的奠基石，成为规范市场竞争关系的主导规则，由此确立竞争政策在整个政策体系中的优先地位。这就是我国未来更高层次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体现和主要着力点所在。

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着力点与关键环节

刘志彪[※]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指导未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总纲领。高质量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五大着力点：一要抓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二要抓高质量的市场体系建设，三要抓高质量的分配体系建设，四要抓高质量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五要抓高质量的经济体制建设。在当前的内外部环境，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三大关键环节主要有：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坚实的发展底线；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使精准化的结构性政策有更大的作用空间，重点要在“破”“立”“降”三个字上下功夫。

关键词：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着力点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指导未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总纲领。党中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一、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五大着力点

高质量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要着力解决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用五大新发展理念来理顺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使其构成一个具有内在功能性联系的有机整体。具体来说，就是这个经济体系要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够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在哪里？这是建设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思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除要抓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高质量的开放体系建设外，主要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着力。

第一，要抓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和核心部件。传

[※] 刘志彪，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原载《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4期。

统意义上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就是指要建设农业基础比较稳固、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比较发达、第三产业门类齐全和发展迅速的产业体系，尤其要突出工业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其实这种产业体系，是把产业各部门分割开来看的，是为了制定和运用产业政策调节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它的优点是符合发展中大国经济结构非均衡的现实国情，缺陷是产业政策容易进一步割裂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导致更加非均衡发展的不良后果。党的十九大报告突破了这一表述的限制，从产业增长投入要素的角度，提出要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一崭新的表述，除强调了科技引领、协同发展的总要求外，也着重体现了产业均衡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要求。各投入要素都要为壮大实体经济这一终极目标服务，即要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

第二，要抓高质量的市场体系建设。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机制。建立和完善准入通畅、门类齐全、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的市场体系，才能够给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自主经营、公平竞争优良的环境，才能给消费者创造自由选择、自主消费的空间，才能实现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微观经济基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40年，国民经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失衡现象，其主要表现：一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失衡，二是实体经济与房地产之间的失衡，三是实体经济内部的失衡。这是导致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和运转不灵的根本原因。究其原因，是我们仍处于转轨经济体制，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完全做到，或做得还不够好。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商品市场和某些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问题，但是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深层次的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功能不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还没有真正形成企业资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软预算约束现象，决策的责任主体模糊、财务纪律松弛；同时，劳动力流动呈刚性状态，市场难以彻底出清。这样，当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结构时，企业或要素并不能正常地退出市场，往往会变成各种消耗资源、不提供财富的僵尸企业。二是还没有真正形成功能完善的股票市场。中国的股票市场因制度缺陷，财富增值功能比较弱，不能给社会主体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资产。结果，除限制了股票市场在激励高科技企业发展、调节产业结构动态变化中的巨大作用外，也迫使全社会成员纷纷把原本用来居住的房地产作为资产增值的工具和手段。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巨大的房地产库存和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这些问题必将严重地影响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因而要素市场化配置成为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点问题之一。

第三，要抓高质量的分配体系建设。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激励机制，也是促进或推动产业体系走向供需均衡的动力机制。经济体系的建设必须把激励搞对。只有搞对了激励，才能发挥经济主体的自我发展、收缩和纠偏作用。同时，在追求效率的基础上，用分配和再分配工具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合理，逐步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化解产能过剩、促进内需扩大和消费现代化的主要办法。在追求高速经济

增长阶段，我们利用廉价生产要素渗入全球价值链底部环节进行国际代工，一部分资本所有者和外国资本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但是广大的百姓收入提升的速度，与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总体上并不成比例，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也有加大的趋势。这种不良现象除会引起社会分化和不稳定外，最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效应是影响消费扩大，影响内需崛起，导致产能严重过剩，不能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及时地转向基于扩大内需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因此，未来发展政策调整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要利用分配体系的再造，提高GDP中劳动者收入的比重。这是衡量真实发展水平的“黄金标准”。

第四，要抓高质量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结构。城乡区域发展总的要求是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国土资源利用效率较高、要素密集程度较大、生态容量适度、城市群落连绵、区域发展差距较小的生产力布局目标。按照“时空压缩、增加密度、减少分割”的经济地理重组原则，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系的建设，关键抓三个方面：一是逐步放开对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这是振兴乡村的前提；二是积极推进城市化尤其是城市群战略，吸收农村人口；三是不断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公共福利水平。区域发展体系的建设，要分区域制定分门别类的战略，如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要以公平原则动用国家力量大力扶持加快发展；对有条件可以创新引领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东部地区，可以为其创造条件优化发展。一般来说，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绝大多数地区都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取向。空间生产力优化布局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在空间上加快若干个先进制造业的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设，以此均衡地区发展差异和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第五，要抓高质量的经济体制建设。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基础。并不是西方当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主要特征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市场机制有效率、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尺度。推进高质量发展，未来要适当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增加其民生、文化、生态和社会职能。众所周知，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决策者必须受到硬预算的强烈约束。只有如此才能做出理性的、追求经济效益的决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松弛，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老大难问题，也是粗放发展、债台高筑、可能发生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因。适当减少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有利于把精力集中在缓解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上，也有利于减税降费、推进扩大内需，更有利于确立企业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

二、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环节

高质量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当前的内外部环境下，经济工作、经济政策的关键环节是什么？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另外一个核心问题。

第一，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

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这一要求紧密结合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总体要求，非常明确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运行中地方政府就GDP增长的绩效竞争，一直是与不断深化的市场力量有效地融合在一起的。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展开地方政府之间的增长竞争，是中国经济有别于其他转轨国家的重要特征。这一竞争格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也显示出了一些地区片面追求数量、粗放发展的不良倾向。现在中央要求把这种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锦标赛，改为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体制，这种“指挥棒”怎么指、往哪里指，将成为引领地方和部门干部们努力的方向。如何建立指标体系，制定政策体系，确立标准体系，组织统计体系，进行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直接关系到找准方向、促进科学决策、凝聚发展共识，是引领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要探索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二，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要有发展底线。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这是未来几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千头万绪、纷纭复杂的经济工作中，这“三大攻坚战”是化复杂为简单，是纲举目张的工作。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是为了实现稳定协调发展；抓精准脱贫工作，是为了实现公平共享发展；污染防治工作，是为了实现生态绿色发展。因此，“三大攻坚战”贯彻的是五大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例如，防范重大的金融风险，需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方面，需要我们在实体经济内部大力鼓励技术创新，同时以这些创新类资产为基础，通过金融部门的资产证券化，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收益更稳的可投资资产；另一方面，要强化金融部门的制度创新，利用现代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活动，让更多的科技型企业与资本市场一起成长。这种实体经济、现代金融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协同发展，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建立的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体系。

第三，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使精准化的结构性政策有更大的作用空间，重点要在“破”“立”“降”三个字上下功夫。“破”“立”“降”三个方面，是建设高质量供给体系的具体行动。“破”，需要运用结构性政策进行供给侧调整，促使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更多地流向现代高技术产业中的创新企业，同时要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千方百计地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立”，一是通过人力资源和科技投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增加高质量部门的供给；二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其改造传统部门，降低对过剩部门的资源投入；三是以优质的技术创新类资产为基础，通过金融部门的资产证券化，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收益更稳可投资资产。“降”，是为了以此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提高实体经济投资的回报率，增加其投资吸引力和竞争力。当前要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和物流成本。

参考文献

- [1] 刘世锦.如何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J].中国品牌, 2018, (1) .
- [2] 王昌林.扎实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J].中国经贸导刊, 2018, (1) .
- [3] 黄群慧.浅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J].经济与管理, 2018, (1) .
- [4] 简新华.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几个关键问题[J].

工业化与创新驱动：工匠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的指向

刘志彪 王建国[※]

摘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中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进入到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它又有可能成为阻碍创新成果诞生的因素。我国现在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为了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我们既不能排斥工业化时代与工艺或流程创新相关的工匠精神，也要鼓励具有颠覆性特征的产品创新活动，并在观念、理论和政策上兼而有之、长期共存。我国要通过环境再造，培育一大批优秀企业家队伍，促进创新驱动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工业化；创新驱动；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产品创新；工艺创新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提出“工匠精神”这一议题后引起极大反响。由于契合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要求，因而成为中国话语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工匠精神受到整个社会广泛关注的原因，在于现阶段随着供给能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对商品的性能和质量有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但却饱受假冒伪劣商品之苦，甚至健康与生命安全都受到一定威胁。一方面，收入提升过程中需求发生大幅度外溢，对国外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的同时，国内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在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市场上，中国企业输出资源、付出劳动、却无法获得理想的收益，处于国际分工的最低端。因此，只有大力弘扬追求卓越、用户至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才能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中国制造，才能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中体现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较高的附加价值，摆脱长期处于全球价值分工低端的窘境。

在现阶段强调工匠精神，也受到一些质疑。一些学者指出，工业化以前的手工作坊生产对匠人的技艺要求精湛娴熟且精益求精，因而追求工匠精神的情怀和行为是被社会褒奖的。然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工业化时代，自动化、智能化机器设备的运用、科学管理方式的推广，已经可以将各种原本复杂的工作，分解为各种简单的要素和工序，从而实现高效率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生产，此时，工匠精神的地位和作用下降，是否还有必要再继续强调这样一种执着的精神？另有学者指出，当前经济社会已经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需要和缺少的是原创性、突

破性的创新成果，因而应该更多地强调具有颠覆性的创新能力，鼓励和培育具有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氛围和企业家创新精神，而不是继续强调传统的具有改良特征的工匠精神。因为旧有的工匠精神，强调在现有框架和秩序下注重细节和精益求精，它可能不利于创新性文化和创新活动。

上述疑问和说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笔者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工匠精神以及鼓励工匠精神的文化和制度，直接与其是否拥有真正的世界著名品牌密切相关。培育精益求精、消费者至上的工匠精神，塑造其背后的工匠制度和工匠文化，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转型升级、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所在。但是提倡工匠精神，与呼唤和强调企业家精神两者之间，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中并不是矛盾和冲突的。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这是建国60多年来，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形式，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奠基性的制度创新意义。

为此，笔者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和回答与上述疑问有关的基本经济问题。本文将应用历史的、逻辑的、辩证的观点，分析与工业化与创新驱动时代相对应的工匠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的作用问题，并指出各自使用的领域和具体政策取向。

一、工业化时代：工匠精神的地位和作用

工匠精神可从多角度把握和理解。它主要指在生产和服务的每一个细微的工序和环节中，工人们都以消费者至上的态度注重细微环节，对生产活动和产出品进行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或者说，是生产者不惜花费时间和代价，严谨苛刻地追求产品质量和信誉的行为。一些中国企业缺乏发达国家企业所拥有的这种工匠精神。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振兴实体经济的最大障碍所在^[1]。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无论是作坊式的手工生产时期，还是资本主义的大机器化生产时期，无论是古代的鲁班，还是近代诸如北京同仁堂、云南白药、贵州茅台等“老字号”，抑或是华为等当代世界著名品牌，工匠精神都不可或缺，而且随着发展程度的提升，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产业发展元素。现阶段提倡工匠精神，建设和完善与其相关的支撑制度、文化作用机制，是中国发展实体经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重构的深层次要素^[2]。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追求工匠精神的形式和方法，必然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发生某些变化。欧洲产业革命的历史、日本现代工厂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现代产业发展中，以专业化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工匠生产活动及工匠精神，与旧式传统的小作坊生产中的“匠人”有重要的区别，如后者往往以作坊式产出为主，生产率不高，业主追求精湛的个人技艺，强调全面地亲自掌控生产过程，精益求精等，但是，两者之间也有共同的特征。

在人的心理和精神特征方面，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天主教徒们所奉行的工匠精神，其主要特征是都与小而全的旧时代分工特征相关。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大量的新教徒倾向于投身近代工业，成为工厂里的熟练工人或管理人员。这种生产机器化、大规模工厂化的生产方式，虽然在生产形式上与守在旧有行业、成为大师傅的天主教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支撑教徒们辛勤工作、精益求精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新教徒把自己在尘世间的劳动，作为上帝赋予的天职（Calling），这是新教伦理中最为基本的部分。每个新教徒都把努力工作作为道德义务，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就，来证明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3]因此，尽管社会分工从家庭手工作坊生产进入到了工厂的机器化生产时代，但是教徒们在宗教伦理的驱使下，其心理和精神上追求卓越、用户至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却没有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而是越来越强化。

应该看到，与过去作坊式生产组织方式中的工匠精神不同，现代产业发展中，工匠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科学理性的生产组织方式下，其外在形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们原先掌握的工作技能和生产活动，都可以被机器分解为系统化流程和互联的分工环节。此时的“工匠精神”，不是表现在个体的技能、工作态度、努力和水平上，不是完全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表现在工作小组的群体配合、工艺流程的严密性、人员的专业化合作等形式上。当然，它在各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也不尽相同。

例如，20世纪初的美国，在泰勒的科学管理制度下，复杂的匠人技能通过科学的测定和定量的分析，被分解为一系列简单的标准作业，一条条作业传送带，将一人一岗化的专业分工连接起来，美国制造工业的生产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尽管科学管理的方法，常常因为使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庸而广遭诟病，但这种企业内的分工合作方式，在美国制造业中不断改进，并得以延续。为了适应理性的组织方式，德国特别重视职业训练和职业教育，全社会高度尊重技术工人，与蜂拥式地进入大学的国家不同，一半以上的德国青年会选择接受2-3年高水平、专业、标准的职业教育后，先成为技术工人，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工厂实习。

20世纪70年代，精致而低价的日本产品以其高性能、高质量赢得了世界市场，给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极大冲击，日式的经营管理模式也因此受到举世瞩目。与美国严格的分工合作不同，日本企业生产线上通常同时流动着十几种产品，复杂多变的工作对象提高了工匠的熟练程度与创造力，构成了日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顾客至上”的理念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始终贯穿于每个员工的日常行动之中^[5]。具体来说，企业内的作业小组，替代了美国式的一人一岗制度。在作业小组制度下，新员工通常无需经过事前训练（OffJT）即可上岗，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边工作边受训（OJT），通过轮岗获得可以胜任多个岗位的多项技能，并将此作为在组织内晋升的唯一途径。尽管每个作业小组的标准工作量仍按科学管理方式来测定配置，

但小组内作业分工的界限已变得十分模糊。这种模糊性不仅有利于克服科学管理的机械式分工带来的难以适应市场和技术变化的僵硬性问题，而且更符合人性，促使员工们不断进取，并鼓励其在实践中获得更为丰富的技能。

日本著名的管理学家小池和男将日本企业中员工这种获得熟练技能的能力，称之为“知性熟练”^[6]。日本企业所培养起来的员工们的知性熟练，不仅具有应对市场和技术变化的能力，而且还具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知性熟练根植于重视工作现场与工作实践的“现场主义”土壤，现场主义即倡导要到发生问题的现场去分析原因，找到问题的关键点并寻求对策。与由专家通过客观观察和科学计算来确定作业方法和工作流程的科学管理不同，现场主义重视“人到，眼到，手到”的原则（日语中更抽象地表述为现场、现物、现实），由亲临实践的工人而非专家，从其切身感受出发，经过内省思考，提出改善现状的方法。这种现场主义的改善方法，可以追踪工作现场内的变化而随时进行，方法也是细致而敏捷的，也是美国人倡导的“科学管理”方式所不能及的。

正因为如此，日本企业可以做到在敏感地应对技术与市场变化的同时，又能将质量体现在产品之中。他们注重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某一个环节中出现问题，一定会在这个环节中得到解决，决不会放任其进入到下一个工序，更不会导致其所有后续工序的劳而无功，从而带来工时与材料能源等方面的浪费。日本企业中的“知性熟练”，还在制度化了的精益求精的机制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例如在丰田的“精益化生产”方式中，除了广为人知的“零在库”（Just in Time）外，还有以“自働化”为起点的改善活动。在这里区别于“自动化”的“自働化”概念，是指一旦自动流水线上出现了问题和故障，机器和生产线就会自动停止，而对于所产生的问题，他们不是就事论事地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为满足，而是被要求通过五次“为什么？”的询问，去刨根寻底地找出问题的深层原因，提出防患于未然的改善措施^[7]。这种对问题的深究和不断的学习思考，是日本企业中“知性熟练”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源泉。当然，日本式的精益化生产方式，与他们传统的“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这种“合理性制度安排”，也未必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更何况，在一个注重细节、精益求精的环境中工作，工作压力随之增加。

现代产业发展中，机器生产降低了对工人的体力要求，汗水经济转化为知识技术经济，原有的具有隐性知识特征的技能型劳动和工种，在科学管理方法、机器人等现代生产方式面前，成为可编排的知识体系。但是，机器劳动不能完全替代人的劳动和智慧，它不仅不排斥工人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反而对其有更加严厉的标准和更为严格的要求。尤其是许多依赖于人的知识劳动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活动，与生产者的工匠精神有更为直接的关系^[8]。现代商品生产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依赖不断增强，把丰富的、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的飞轮^[9]，通过生产者服务业的标准化和物化嵌入，现代机器生产成功地实现了对精湛的技艺和技能的系统化、编排化和科学化的总结，这成为提高品质和效

率的基础。同时，围绕工匠精神进行的企业组织创新、工艺或流程的创新，又实现了规模经济的低成本生产，从高度重视工匠精神的德国、日本等国的工业实践中，不难看到这点。

二、创新驱动时代的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世界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依靠大机器生产的生产方式形态，逐步让位于基于科技创新的现代产业发展模式。一方面，标准的机器化生产在扩大产能、提高效率方面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的多样化、消费的迅猛变化，市场竞争的优势却来自于适应不断变化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与这种能力相匹配的产业创新能力。这种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提出了需要不同的工业精神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如维持现行秩序下对生产和工艺进行改良的渐进性创新活动，需要广泛弘扬的是大机器生产方式下的日式、德式的工匠精神；而针对那种从无到有、需要不断变化、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根本性创新活动，则需要发挥美式的企业家精神相关，这种根本性创新，往往表现为产品的创新，较多地出现在技术和市场变化迅猛的新兴产业初创期。

有关这两种不同模式的创新，20世纪70年代后期，管理学家阿伯内西在其《生产率的窘境》一书中有所阐述，见图1^[10]。在某一产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技术创新的内涵存在区别，技术创新涵盖产品的创新与工艺流程的创新，在产业发展早期，产品创新占据主导地位；某个临界点之后，主流设计被确立，工艺或流程的创新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中后期的汽车产业，在汽车产品的主流设计确立以后，竞争主要存在于工艺流程和管理领域。日本工匠们擅长改进、改良型的创新，它的特征是连续的和精益求精的。这也是日本汽车工业在这一时期实现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8]。

21世纪初，哈佛大学的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又一次提示人们，一味地尊奉“顾客是上帝”的信条，过于倚重于精益求精式的技术改进的做法，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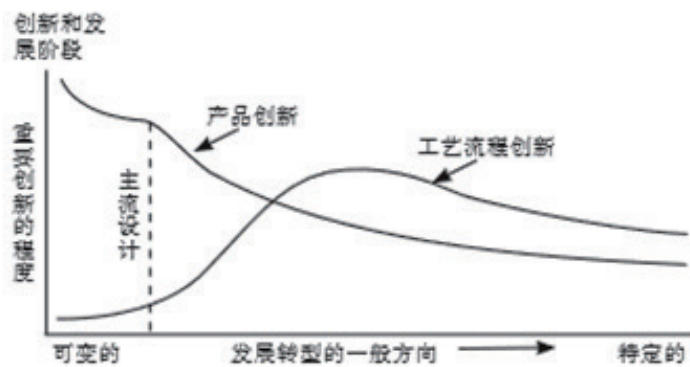


图1 阿伯内西创新发展模式图

机^[11]。克里斯坦森也把创新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既存产品持续不断地加以改良的连续型创新，另一种是以颠覆既存产品价值为前提的创造全新价值的创新。他指出，那些既存的大型优良企业，为了不断满足既有顾客不断增长的需求，往往倚重于前者而轻视后者。正是由于这种倾向，大企业往往会错过参与新兴市场的机会，待市场中的大部分消费者依然接受了创新性产业和产品时，大企业原来拥有的市场份额往往已经受到严重的侵蚀和威胁，被创造全新价值的新兴企业抢占市场，失去竞争优势。

一些学者指出，日式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虽然在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中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当社会的文化习惯都被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所引领，往往会阻碍创新和具有革命性特征的创新产品出现。从美国硅谷与丰田汽车的比较中，大致可以看出日本“工匠型创新”精神的局限性。

强调工匠精神的日本，擅长于维持现行秩序下的渐进性创新，广见于生产流程的改进之中，而强调企业家精神的美国，着重于从无到有的或带有颠覆性的突破性创新，主要体现为产品的创新，较多地出现于技术和市场变化迅猛的新兴产业的初创期。在传统的制造业中，日本遥遥领先，但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高新产业的发展上表现差强人意。这样，我们就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什么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为什么从21世纪初开始，日本的经济却一直停滞不前，经济的主导权为什么会重新回到美国手里。

20世纪末，人类迎来了新一轮IT、交通、生物、材料技术等方面的产业技术革命，技术范式的突飞猛进变化，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在这场产业革命中，美国企业依靠企业家精神，创新、创造了更多的新价值、新业态、新产品和新市场，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创新性还表现在制度上，适应于颠覆性创新的企业组织制度，是以打破原组织的旧有秩序为前提的。如美国硅谷的苹果、谷歌、脸书等企业，职工在同一公司就业的平均时间为5-7年，流动成为常态。而且员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业务量安排等方面，拥有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

三、进入新时代我国企业家精神及其环境的塑造

当西方发达国家在反思工匠精神与企业家精神孰优孰劣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以及二元结构的发展态势，决定了我们既要培育和重建工匠精神，也要营造企业家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作用。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性质，决定了我国不是工匠精神多了，阻碍了创新，而是这种精神少了，支撑中国人的工匠精神的文化体系遭到了颠覆，从而影响了高质量经济体系的建设。同样，企业家精神支撑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是中国经济取得奇迹的重要的内生因素之一，但是现在到了进一步发挥这种精神，需要再次优化其环境的关键时刻。

企业家精神既是一个古老的学术命题，也是一个崭新的内涵不断丰富的范畴。在经济理论

界，主要有强调创新特征的德国学派，强调冒险特质的芝加哥学派，以及强调发现市场机会的奥地利学派。每一种学派后面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代表。笔者认为，企业家精神，既是一种无形的资源，也是一种决策和行动能力，它是一个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作为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的无形资源，企业家精神具有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企业家精神所内涵的四种独特能力：

一是企业家的认知能力。企业家在决策过程中使用的是基于直观推断的逻辑，而不是大企业经理阶层利用的程序化的计划决策。在不完全和不确定信息的复杂世界中进行战略决策，使用直观推断方法可以简化决策过程，使企业家的思考出现显著的跳跃，由此产生各种创新成果。而经理式认知更多地是以实际的逻辑为基础的，是线性的。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决策面对的是模糊的和不确定性的环境，市场的发展很少以确定的、逻辑的方式演化，如果使用逻辑进行决策，往往会使决策者变得无所适从。

二是企业家的发现能力。这可以归结为当某种机会出现时，某个人具有抓住这种稍纵即逝的机会的洞察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取决于与市场贴近的程度、过去积累的经验和对学习机制的自我强化效应，甚至可能与某人的先天禀赋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这说明了企业家发现能力是一种难以模仿的异质性资源，是某些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根源。企业家的发现能力有别于知识专家。知识专家不能够完全认识到他们知识的价值，以及如何使自己的知识变成利润，否则专家就将会成为企业家。

三是企业家的实现机遇能力。一般的技术知识专家不具备企业家所拥有的那种专业化的投资能力。企业家思想给予的方式是通过企业组织的方式来运作所发现的知识，或者是直接把所发现的知识在市场上出售。

四是企业家的协调知识能力。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新的资源组合”的形式。生产新资源有这么几种情形：由企业家利用发明改革或革新生产模式，或运用一种未尝试过的技术生产新商品，或用一种新的方法生产老商品，通过开发一种新的原材料的来源，或新的产品渠道，或通过重组形成一个产业。

综上，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独特的能力和行动，它既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按所有制、按企业规模或按行业划分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现阶段的中国为什么要强调培育壮大企业家队伍、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一是企业家的创新创业能力，表明其是直接创造财富的主体，中国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创新和财富充分地涌流，这当然要大力培育、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二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看，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这里的“关键少数”其实就是三支队伍的建设，即干部队伍、科技人员队伍、企业家队伍。其中，企业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舞台的主角，是我们这个工商时代的精英；三是从实践上看，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关心爱护企业家与侵犯企业家利益、财产甚至个人安全的不良现象，影响了企业家的预期和积极性。这些问题不克服、不解决，就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企业家是一种特别稀缺的社会资源”，这应该成为一种共识。一是企业家作为一种发展资源，作为创新和创业的具体实践者，本身就是稀缺的。二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鼓励人们通过读书做官、鄙视经商的不良倾向，这会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导致中国企业家生存发展环境不够优化、中国缺少真正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因素。三是实践中，一些企业家的特征呈现为“贫困主导型”，没有及时转化为“兴趣爱好主导型”，即在贫困时追求创业赚钱，赚了钱之后富裕了，就不思进取，从而导致企业家精神退化，这也会影响国家实现长期的、稳定的经济增长。

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是一项长期工程，非一朝一夕可达成。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保护企业家的“环境再造”。发挥企业家精神最需要的是有自由宽松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营商环境。要坚决地树立这样一种理念：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来说，企业家是我们这个工商时代舞台上的精英，人们应该感谢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为社会创造财富中的创新和创造力。对于环境再造来说，《中共中央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已经从一个总体要求、三个营造、三个弘扬、三个加强等十个方面，提出非常好的政策取向。这些好的政策取向要进一步在实践中落实、落地，要有细化、有细则、有执行和责任主体。

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良好营商环境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史，既是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释放和发挥作用的历史，也是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和优化的进程，这是中国经济维持近40年的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和基础。当前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主要是营商环境出了问题，在法治机制嵌入市场运行方面，一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为此，必须在改善和优化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上下功夫，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实现产权保护制度的法治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颁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要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保护和鼓励企业家精神，其实不如讲稳定其政策预期，稳预期其实就是要稳政策，稳政策更需要稳法律法规，稳市场营商环境。

第二，要由产业政策管理转向竞争政策或反垄断法，并以此来规范市场秩序和行为。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已经不是没有市场竞争，也不是没有市场自由，更不是没有发展竞争，而是缺少“平等竞争”，缺少自由竞争的公平环境和条件。因此，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首先必须推进经济从“发展竞争”转向“平等竞争”，确立横向的竞争政策在整个政策体系中的优先地位，明确竞争政策或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这是我国在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体现。

第三，宏观经济政策法治化。宏观政策是政府调控市场的手段，它将形成企业主要的营商环境。与市场会存在失误一样，宏观调控政策也会产生失误。为防止宏观调控政策出现随意性、盲目性和不协调性等问题，需要把政府的宏观调控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主要包括：一是依法划清宏观调控的范围，防止随意扩大调控领域；二是要界定宏观调控职权，实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投资清单、财力清单管理，并把其逐步公开化；三是要规范宏观调控行为，明确宏观调控方法，防止随意性、盲目性；四是要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性，明确宏观调控责任。如金融宏观调控，直接关系到国家金融安全，关系到避免出现大规模、系统性金融危机，需加强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这“一行三会”之间的协调性和配合性。

四、研究的政策含义及建议

西方发达国家业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学者们正在反思工匠精神的局限性，同时研究发挥企业家精神，即颠覆性创新的条件和机制的实现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呈现多元混合分布的格局，既有原始的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我国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从这个意义上说，现阶段我国不仅要强调手工业和工业化时期的工匠精神，不断累积工艺或流程的创新能力，培育工匠型的熟练技能，还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的战略要求，充分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

在网络信息、新材料、通讯、生命科学等领域中，由于利用了体制特征和相应的优势，我国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未能实现的快速、飞跃性的发展，突显了巨大的后发优势。如果说，实现更多的工艺或流程创新，是加快推进现代化、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的话，那么实现更多企业家式的颠覆性、革命性创新，则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不二法门，是创造更多边际创新成果的重要途径。

按照权变学说，普适而一成不变的最佳组织制度与管理方法是不存在的。企业的组织构成，必须随其所处的内外条件而作出相应的选择，而且不同类型的企业通常应有不同的选择。无论是持续性的工艺、流程创新（代表工匠精神），还是飞跃性的颠覆性创新（代表企业家精神），都不是源于自上而下的命令或计划，而是来源于员工的自发进取精神及活跃的自由探索环境。全球进入创新驱动时代，我国虽然面临加速完成工业化的重任，但是绝对不能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断改良的工匠精神，与具有飞跃式的、颠覆性特征的创新活动，在观念上、理论上、政策上和机制上相互对立起来，不能采取相互排斥的态度，而是要兼而有之。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同一组织中类似于美式和日式的制度与管理，并不是完全的互补关系，极有可能相互冲突，造成内耗。

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才能同时支持两类不同的创造性？根据本文的分析研究，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从战略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应该充分利用我国拥有几千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优势，开展

具有连续型积累特征的创新工作。民营企业很难在飞机、航空、造船、核电等这些现代巨型工业上超越国有企业，因此应当进一步推动承担这些任务的国有企业通过创新的积累，不断地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并实现赶超，真正达到世界级企业的水平。而民营企业的创新精神和灵活性，更适合于承担飞跃式的、具有颠覆特征的创新活动，应当进一步鼓励和推动民营企业家的根本性创新活动。

二是从产业发展阶段看。在市场、技术和管理相对比较成熟的产业中，如机床、汽车等产业，更适合于提倡和发扬光大工匠精神；而对成长性较高的现代新兴产业，则更多地要强调发挥飞跃式的、颠覆性的创新精神。这是既能保持经济具有潜在增长动力又能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和基础。

三是从创新的微观主体看。对处于成长初期的持续性创新活动，政府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支持，有助于技术和能力的突破，并形成国际竞争力。但是，具有根本性特征的创新活动，不可能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行政命令，更不可能来源于政府的预先计划，而主要源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源于企业员工的进取精神，源于社会和企业形成的活跃的自由的探索环境，源于宽容失败的包容性氛围。因此，在政府促进其发展的政策上，可以多用横向的竞争政策，利用竞争刺激、激励和驱动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

参考文献：

- [1]刘志彪.工匠精神:生于制度还是孕于文化[N].北京日报, 2016-05-09.
- [2]刘志彪.工匠精神需要制度和文化支撑[N].人民日报,201604-27(19).
- [3]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 陈维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 [4]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原理[M].马凤才,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 [5] William G. Ouchi, Theory Z. How American Business Can Meet the Japanese Challeng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 [6]小池和男.日本の熟練すぐれた人材形成システム[M].有斐閣選書, 1981.
- [7]大野耐一.トヨタ生産方式——脱規模の経営をめざして—[M].ダイヤモンド社, 1978.
- [8]刘志彪, 王建国.工匠精神与“破坏性”创新如何兼而有之? [N].解放日报, 2017-06-13.

[9]赫伯特·G·格鲁伯, 迈克尔·A·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M].陈彪如, 译.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

[10]William J. Abernathy, The Productivity Dilemma. Roadblock to Innovation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M]. Maryland: JHU Press, 1978, p72.

[11]Clayton M.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M].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构筑四大互动体系 锻造智库核心能力

徐宁[※]

据统计，目前我国各领域智库已超过3000家，智库建设可谓如火如荼。智库的首要工作是研究，核心能力也体现在研究上，但部分智库在建设存在“重招式而轻内功”现象，核心研究能力锻造不足。

与传统科研院所相比，智库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智库研究不仅要从理论出发，更要结合理论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和建议。第二，智库研究的选题应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三，智库研究更强调时效性和实用性，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化解。第四，智库研究需要通过全面的协同组织，跨学科、跨地域、跨职业，综合协调政产学研媒等多方力量。第五，管理能力和效率将对研究质量与智库成果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对于智力资源的管理。第六，智库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不局限于学术范畴，除了要对政府决策和政策产生影响之外，还要强调其成果的传播广度和社会影响力。

智库研究的特点，决定了智库运营模式的选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不断进行体制机制的探索和创新，着力构筑智政互动、智智互动、智社互动、智媒互动有机融合的互动体系，以高水平、专业化的运营团队促进核心能力的形成。

一是智政互动。智库的首要目标是根据自己的专业定位，对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分析研判，提出对策建议，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专业保障。构建智库与政府部门的互动平台，特别是与社会发展实践有密切联系的部门，可以充分发挥智库客观、专业的优势，以政府需求为导向进行研究，这有助于智库研究出“务实管用”的研究成果，为前瞻性、储备性研究夯实基础。

二是智智互动，即“智库”与“智力”的互动。通过机制设计，调动各方智力资源，形成“小核心大外围”研究梯队，使智库真正成为“智力之库”，避免出现“有库无智”的情形。例如，调动高校智力资源，关键是要在成果激励制度上认可智库类成果。此外，智库也要设计各种制度对松散的智力资源进行挑选、凝聚和激励，将所有研究力量整合成一个拳头，形成一套“松散但不分散”的智力资源管理体系。

三是智社互动，即智库与社会组织的互动。这既包括社会的经济组织如企业、非营利组织

[※] 徐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经济日报2018年4月19日第016版。

等，也包括社会的基础组织如家庭、个人等。要充分发挥智库的“桥梁”作用，将社会组织的状况和问题进行提炼、抽象和分析，形成政策建议。例如，对于企业来说，智库的“桥梁”作用就是在深入了解企业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理性专业的分析形成政策建议。同时，也要致力于打造智企政互动互通平台，让政府为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

四是智媒互动。智库的另一大职能是以独立、理性、专业的声音，影响大众和社会认知。构筑智媒互动平台，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通过媒体进行剖析，提供一个专业理性的视角供大众进行思考和判断。此外，也可以通过智媒互动平台传播并普及一些基础理论知识，提升社会大众整体认知的理论基础。

四大互动体系并非孤立存在，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相互支撑、相互给养，围绕服务于党和国家决策的需要，形成一整套完备有效的选题机制、调研机制、成稿机制和发布机制，为智库所用，真正为党和政府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支撑。

坚定不移走开放发展之路

张二震[※]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这一重要论述，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将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就是积极融入全球化，在扩大开放中实现发展。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催生了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理论，开放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又反过来指导开放的实践，不断把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推向新阶段。

一、改革开放缔造中国奇迹

40年前的中国，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尤其对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思想的禁锢，改革开放打开了封闭的大门，中国人民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新审视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最终在思想上、理论上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应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但与此同时，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国际经济体系，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地域开放，从开办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沿江开放，从沿边开放、内陆开放到全国开放；产业开放，我们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顺应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为本质特征的全球化，大力引进外资，充分利用丰富的低端要素优势，从产业低端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把人口负担化为“人口红利”，并且成功对接国际高端产业，把引进先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短短几十年就使中国成为世界性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并在高铁、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40年来，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的外汇储备也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中国人民创造了开放发展的人间奇迹！

[※] 张二震，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国家治理》2018年12月第二期。

二、改革开放的中国经验

作为一个基础薄弱、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为什么能做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中脱颖而出，实现从融入全球化到推动全球化乃至引领全球化的转变呢？

第一，正确认识时代，正确认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新特点和发展趋势，走合乎世界潮流、符合本国实际的开放道路，把对外开放与建立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结合起来，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寻求发展和突破的机会。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兴起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并为具备基本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一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各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纷纷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随之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二是国际分工出现了新特征。伴随着国际生产分割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出现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特别是国际生产分割技术的发展，促成了国际分工格局的深刻演变，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在要素分工条件下，各国的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进口什么、出口什么，而是取决于以什么样的要素参与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有多少。这种分工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可能。产品价值链的全球分解，不仅可以降低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门槛，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发达国家现有的成熟技术和资本，通过优势要素的组合激发乃至创造比较优势，进而实现产业升级。

可见，这一轮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存在发展机遇的。但是，机遇是一回事，能否抓住机遇实现发展，又是另一回事。能否把握机遇，要看是否具备条件。对于中国来说，能在全球化进程中紧抓发展机遇主要在于三点。一是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政治稳定；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融入全球化提供了制度基础。二是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成功地将社会主义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提供了制度基础；既坚持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又积极融入全球化发展体系。三是我们有数亿勤劳、智慧的人民，敢干、敢闯、敢试、敢拼。我们是大国经济，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成就，对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有极大的示范效应。由于中国的发展没有照搬西方模式，中国的成功对那些既希望融入全球化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成功发展的世界性贡献之一，就是提供了示范和榜样，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第二，辩证看待当代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尊重规则、遵守规则、利用规则，更要参与完善规则。

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国际经贸规则，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这些规则体系反映了资本全球扩张的要求，更加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这些规则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维持国际经济的运行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打开国门以后，我们对国际经济规则知之不多，更谈不上影响规则、制定规则。接受现行规则，利用其合理部分，可以降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成本，直接分享现行公共产品带来的利益。

应该承认，对外开放之初，理论界还是有不少疑虑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强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下，中国能不能从对外开放中获益，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此都存在疑虑。中国开放发展的实践证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贸规则，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优惠安排的规则，大体上是合理的，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的。应该强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干出来的，而不是别人“帮助”建设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的，“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中国的发展利用了全球化的机遇，但是，中国是用为全世界提供优质廉价的产品和劳务的形式融入全球化的。这与当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入”编年史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度演进、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加重、新兴经济体崛起、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现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在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的功能方面表现出严重不足，未能充分提供全球经济运行的公共产品，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对公共产品所产生的新需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不仅导致南北发展差距拉大，发达国家劳动者也未能获益，发达国家反而转向“逆全球化”。而社会主义中国则扛起了“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大旗，做国际秩序

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完善者。维护什么？维护的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多边贸易体系和规则，维护的是发展中国家正当的发展权益。为什么要完善国际经济治理？这是因为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理论的创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是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对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正确理论指引，得到了全世界的赞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各国都能平等参与其中，让各国经济都有更加平衡、协调、联动的发展，各种文明相互尊重、融合，消除由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制度差异、国家实力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公平现象，通过共同发展、共享发展让普通百姓有更多、更广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这些都反映了社会主义中国“兼济天下”的宏大抱负，与以往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不顾一切地逐利、整个世界成为跨国公司和少数利益集团投资场所，崇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有着根本不同。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现阶段后的内在需求，反映的是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律的正确认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的，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始终不渝坚持扩大开放，实现了从融入全球化到推动全球化乃至引领全球化的历史性转变。

结构性政策视角下振兴实体经济的思路与路径

刘志彪[※]

摘要: 中国实体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尤其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增加了制造业发展的机会成本,使制造业发展环境进一步恶化。在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条件下,振兴实体经济不能仅依靠行政手段推动投资增长,还需要加速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完善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功能的基础上,重点在“破”“立”“降”三个字上下功夫,即破除无效供给、培育新动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了优化实体经济环境、强化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文章阐释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思路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 要素市场改革; 结构性失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重大任务。这一任务较过去“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的提法,体现了最高决策层对恢复和壮大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总任务下,从三个方面强调了强化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一是要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二是要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三是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以上三点分别说明了实体经济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的地位 and 作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内容和应达到的水准、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方法。

提出大力振兴实体经济这一任务的主要背景涉及以下三方面。一是我国实体经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不断衰退,制造业内部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在结构上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部门如煤炭、钢材等产能严重过剩,而现代高新技术产业部门产能不足,依赖进口。二是虚拟经济严重泡沫化,以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过火的”虚拟经济,严重挤压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吸纳了主要的信贷资源、市场资源和物质资源,使实体经济盈利甚微。三是西方发达国家兴起再工业化的浪潮,资本回流至发达国家,同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制造业竞争加剧,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环境趋紧。

振兴实体经济虽然一直是决策层工作的重心,但是社会各界对于我国实体经济衰退的原因以及振兴实体经济的途径,在理论上缺少共识,在实践上缺乏有力度的一致性行动。2006年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42%,此后虽然相对比重在波动中一路下滑,2012年不足

[※]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

40%，2015年下降到34.3%，但是制造业产出规模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就达19.8%，高于美国的19.4%，220余种工业产品产量都位居世界前列。有学者认为，我国制造业占比已经超过发展阶段所应有的水平，历史上处于同等或更高发展水平的国家，制造业占比都比我国低，或者说，我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进入了所谓的“后工业化”时期，因此必然发生一定的衰退，去工业化也是必然趋势。在实践中，还有人认为，高度重视和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就是要加足马力、集中资源投资制造业，是要建设大工程、开展大项目。其实，不区分制造业产能结构性过剩和产能不足并存的现实，一味地追求增加制造业投资，只会加剧产能过剩，无法拉长真正的短板。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这些问题，不能准确地判断政策取向，不仅难以完成振兴实体经济的任务，而且还会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本文将从宏观上分析我国实体经济衰退的真实原因，从理论和实践各个方面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重点探讨如何运用结构性政策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

一、重大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为应对危机的冲击所推行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极大地加剧了产能过剩，使房地产泡沫进一步变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体经济衰退的直接诱发因素。

近10年来，实体经济衰退的具体状况，可以从我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观察得到。2015年上榜企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49%，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如果按照2014年商业银行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3%计算，2015年有128家即近1/4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于1年定期存款收益率。2017我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为8.51%，与上年相比上升了1.45个百分点。但从长期趋势看，其净资产利润率总体上呈现下降的态势，2017年上榜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与2008年上榜企业相比，低近7个百分点。我国制造业在较长期发生衰退的直接原因，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长期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无法引起逐利资本的投资兴趣，无法在长期中发展壮大。

在制造业企业绩效大面积滑坡的背景下，我国金融类企业的资产规模、利润却不断扩张。2014年20家银行营业收入合计占500强企业收入总额的8.1%，资产和净利润分别占比63.4%和52.2%。这意味着仅20家银行利润便已超过剩余480家企业的利润总额。根据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银行有10家，工建农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营业收入居全球银行前四名。2016年这10家银行利润达1738亿美元，占我国全部109家上榜企业利润总额的55%。金融业吸纳了制造业发展的主要资源，挤压制造业利润空间，由此形成金融业与制造业收益冰火两重天的格局。另外，自2000年以来，在高利润驱动下，房地产业投资额年平均增幅达20%以上，其中，2000—2013年平均增幅达24%，每年净增10万亿元人民币。

根据上市公司数据，2011—2016年金融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12%，而同期的制造业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不足9%。让制造业取得社会平均回报率，是提高其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实体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与制造业占比相对较高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因为我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过程，进入了所谓的“后工业化”时期，所以要加速转型发展服务业。制造业占比高经济不一定会衰退，这二者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相对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或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我国制造业占比高，这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进行低端国际代工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在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它们纷纷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缺乏比较优势的加工、制造、装配、生产过程，我国作为承接制造业转移的世界工厂，制造业的比重自然相对高一些。对于我国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的判断，存在重大争议。这个判断偏向于数量标准，对工业的技术和质量体系考虑不足。有学者认为，我国工业发展规模大，但是层次偏低，缺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我国制造业大量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过度依赖国外技术。根据工业与信息化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第一大进口工业品是代表现代信息技术核心的集成电路，2015年进口芯片的外汇超过2100亿美元，2016年达2271亿美元，占工业品进口总额的19.3%，超过了石油进口所使用的外汇，成为单一产品进口量最大的用汇领域。我国几乎可以生产所有的工业产品，但是从纺织业到集成电路产业，生产产品的高端设备几乎全部进口，而且在很多产品上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因此，我国的工业化是初步工业化，必须继续加大对高端设备的研发与制造的投入，建设高质量的现代工业体系。只有对核心技术的依赖降低到一定程度，自主掌握了大部分核心技术，才算完成了工业化。制造业升级是要进一步进入集成电路、汽车制造、飞机制造等西方工业的核心地带，而不是过早地进入所谓的“去工业化”阶段，更不能过早地形成金融、科技等现代服务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实体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投资少，而是经济结构存在重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供需结构的失衡。规模巨大的供给能力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市场需求，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导致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失衡。行政性垄断金融体系表现出的重大问题是资金“脱实向虚”，大量资金仅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加大了金融风险，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日益严重。三是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的失衡。由于金融工具创新不足和资本市场发展不顺利，房地产由以居住为主的耐用消费品，变异为居民理财的主要标的和工具，涌入房地产市场的巨额资金推动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推高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

上述这些结构性的扭曲，直接导致经济运行失灵、效率降低。实体经济供需失衡导致一般制造业投资越多，产能过剩越严重；实体经济与金融失衡使资本对投资制造业失去兴趣；实体经济与房地产失衡恶化了制造业的投资环境，直接或间接地拉高了“中国制造”的各种成本。这些问题显然无法通过增加投资规模来解决，而是需要扭转利益结构，给经济主体正确的价格信号，引导和调整资源配置。实体经济供需失衡需要促使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更多地流向现代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创新企业，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化解产能过剩；实体经济与金融和房地产失衡需要破除金融部门的行政垄断，创新金融手段和工具，以更多优质

资产供给来平抑“虚火上升”的虚拟经济，提高实体经济投资的回报率，增加投资吸引力。总之，要运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结构性政策”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此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增强其吸引力和竞争力。

二、纠偏重大结构性失衡的基本思路

一个需要立即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成长过程中伴随着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毋庸讳言，重大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仍处于转轨经济体制，对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两方面的配合，还没有完全做到，或做得还不够好。

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商品市场、货币市场等运行机制的问题，但是一直面临着加速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问题。深层次的要素市场尤其是广义的资本市场发展不足，必然导致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错配。当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普遍性是指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是为利润而生产，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产生生产过剩。这是一般规律，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消除的矛盾。结合我国的特殊情况看，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功能不完善，这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还没有真正形成企业资产市场，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软预算约束，难以彻底市场出清，决策的责任主体模糊、财务纪律松弛，当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结构时，它们并不能正常地退出市场，往往会变成各种消耗资源、不创造财富的僵尸企业；二是还没有真正形成功能完善的股票市场。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的股票市场因存在制度缺陷，财富增值功能较弱，不能给社会主体提供满意的金融资产，限制了股票市场在激励高科技企业发展和调节产业结构动态变化方面的巨大作用，还迫使全社会纷纷把原本用来居住的房地产作为资产增值工具和手段。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巨大的房地产库存和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政策的着力点和基本使命也有根本性的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要作出根本性的转变，要从追求投资规模和GDP增长速度，转向追求经济体系质量和经济系统的协同性，扭转经济结构重大失衡。如果经济政策不能实现这种转型，不仅无法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也无法实现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还会进一步引发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

例如，在国家贫困、人民收入低的发展阶段，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千方百计地增加居民收入，只有收入增加了，扣除基本消费之后，才能有较多的储蓄用于投资，才能提高生产能力和市场供给。因此过去生产能力的短缺，实质上也是资本短缺。此时，供给侧管理的政策取向，一是通过提升生产率来提高收入水平；二是要在收入水平既定的目标下，通过压低消费品价格扩大储蓄的比例，增强资本形成能力；三是提高投资能力，迅速增加和提升投资的比例和速度，提高生产能力和市场供应量，由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缓解供给不

足。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短缺经济的特征基本消失，出现“双过剩”，即一方面生产加工能力严重过剩，产出库存水平长期居于高位；另一方面社会可供投资理财的优质资产供给不足，过剩的资本没有出处，巨额资本追逐有限的优质资产，不断地推高资产价格，堆积资产泡沫。因此，这一阶段商品和资本的过剩，对应着日益严重的资产短缺，即“资产荒”。此时，供给管理的核心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一是要由缓解劳动力过剩，千方百计地解决就业问题，转变为努力缓解产能过剩，解决企业开工不足的问题；二是要由解决商品和资本短缺问题，转变为解决商品和资本过剩问题，重点是寻找产品的销路和资本的投资机会；三是要缓解资产短缺问题，给日益增长的理财需求提供更多的优质金融资产。在资本市场功能不完善的前提下，以资产价格迅速高企为主要特征的“资产荒”，对恶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是拉高了资产的价格，资金的机会成本随之提高，使原本盈利能力较弱的制造业进一步呈现融资难、融资贵的不良格局，使企业盈利水平持续下降；二是高企的房地产价格，严重挤占了居民正常的消费需求，抑制其他产业的需求，从而出现严重的内需不振和产能过剩；三是吸引了一大批做实业的企业家开始从事房地产开发和资产经营，放弃实体经济。由此可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和完善要素市场功能，以此缓解“资产荒”，其实是缓解制造业的融资成本高问题，降低实体企业的成本，优化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增加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如果资产价格不断飙升的趋势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效应得到有效的抑制，在高杠杆利用的态势下，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就会上升。

扭转重大结构性失衡的基本思路，一是运用行政手段打压资产需求，如冻结资产交易，人为地抑制资产价格虚高，强制实现其与实体经济的均衡；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通过大力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提供更多更优的资产平抑市场需求和价格，缓解“资产荒”。从根本上看，前一种方法行政效率高，但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能延缓矛盾的爆发时间；后一种方法顺应了虚拟经济发展的需求，能够形成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良性循环，通过加快金融创新，完善资本市场，增加资产供给，提供更多的可投资的优质金融资产，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上市和融资，鼓励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可投资的实物资产。

以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来纠偏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是我们一再主张的政策取向。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不是过火、过度，而是长期处于金融发展理论中所说的“金融抑制”状态。我国资本的实物生产能力强，但由于金融创新不足，金融手段、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都严重发育不良，制度不够完善，导致金融资产的创造能力弱。在实体经济领域表现为产能严重过剩，竞争过度，价格不断被压低；在虚拟经济领域表现为金融资产长期供给不足，投资渠道单一，房地产资产被过多的货币所追逐，形成房地产市场的严重泡沫。尤其是在股票市场长期低迷、屡次大幅度波动的态势下，居民的这种理财选择行为，直接导致房地产投资过多过大，房地产价格飙升。因此简单地运用行政手段无法内在地、彻底地解决我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问题。

三、振兴实体经济的若干政策建议

在资产短缺的背景下，为了加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壮大实体经济，中央最高决策层主张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这个龙头，重点在“破”“立”“降”三个字上做文章、下功夫。所谓破，就是要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所谓立，就是要培育新动能，同时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所谓降，就是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负担，使其逐步恢复竞争力。但是，要使“破”“立”“降”三个方面的措施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围绕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来推动创新驱动，以此纠偏重大经济结构失衡。具体来看，至少有下列环节的政策设计要求：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一：股票市场融资功能与财富增值功能对称化改革。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重融资功能，轻财富增值功能。IPO数和融资金额经常全球排名第一，但是股指却经常全球“垫底”；一级市场“热得烫手”，二级市场“冷得发抖”。长此以往，吸收不到增量资金支持的股市呈现持续的低迷状态，反过来影响企业的上市和融资。振兴我国股市的基本目标，是要实现融资功能与财富增值功能的对称。具体来说，要把保障投资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此启动股市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如建立IPO与退市之间的挂钩制度，加大对有欺诈行为、侵犯投资者利益行为的上市公司的监管和惩罚力度，建立一套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办法。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二：房地产市场去投资功能。去投资功能不是不要资产的保值增值功能，而是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原则，突出显示其耐用消费品的功能。在股市的财产功能有所恢复的前提下，一部分投资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便会自动流入，平稳地化解房地产泡沫的危险，实现软着陆。粗略估算，我国房地产市场沉淀的资金量达80万亿人民币，而股市每天的交易额只有3000多亿人民币，历史上最大的股票单日交易额也只有3万亿人民币。因此即便房地产市场5%的资金流入股市，也会使股市彻底地活跃起来。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三：在资本市场活跃度上升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政策鼓励上市公司之间相互兼并，化解产能过剩，提升企业集中度，清除低效率企业尤其是僵尸企业，提高企业对价格的控制能力。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所要达到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在资本市场兼并功能不完善的条件下，只能通过行政手段一刀切地强制推行，容易伤害民营企业的效率。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四：以性质不同的金融市场扶持处于不同阶段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在不同的发展演化阶段需要不同金融市场的支持和扶植。在新技术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早期发展阶段，不适合投放商业银行的稳健货币资金，适合于投入风险资本。以优质的技术创新类资产为基础，通过金融部门的资产证券化，既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活动，让更多的科技型企业与

资本市场一起成长，同时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收益更稳的可投资资产。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五：坚决打破要素市场的垄断，通过竞争机制降低实体经济企业发展成本。生产要素市场存在各种垄断是我国实体经济企业的投入成本长期居高的重要原因。以我国商业银行业为例，以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结构、行为、绩效三个标准看，在进入方面长期存在非常高的行政障碍，具有行政垄断性质，同时也存在严重的市场垄断。银行业垄断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实体经济的利润。因此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不应该成为反垄断的“法外之地”，这关系到实体经济的振兴、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有序发展。只有抓住反垄断这个“牛鼻子”，才能把银行业的改革引向深入，才能使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四、结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新时代创新驱动国家的建设和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重任，很大一部分需要资本市场承担。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构成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素市场。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科技创新活动就难以顺利进行，就不可能满足社会的理财需求，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一条走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道路。这条道路还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探索。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江苏的制度创新与富民问题

刘志彪[※]

内容提要：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度发展在激励结构上有根本的不同。前者需要形成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制度结构，而后者仅需要刺激要素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其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面临和需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强化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能力，把五大发展理念及其重要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法规、新政策和新工作载体等，引入原有驱动高速度经济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中，实现新的高质量发展组合；二是实施聚焦富民战略，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和环境，去鼓励民众创新创业，投入更多的生产性努力，大力发展本土民营经济，真正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江苏经济的发展含金量低的老问题。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制度创新 五大发展理念 富民战略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等，在很多年前就遭遇了资本投入边际收益递减、全要素生产率连续降低的窘境。^①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快速的发展，在各种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扬的趋势和背景下，发达地区只有率先扬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非均衡战略，尽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才有可能使自身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为全国在发展阶段的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承担探索成本，充当改革开放的典型和标兵，展示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功能。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为什么可以在我国现代化事业中走在前面？这些先行地区的勇为人先、自加压力的改革开放精神来自于哪里？应该说，这些先行地区对每一次重大发展机遇的把握，每一次攀上重大的发展台阶和取得新的经济奇迹，都是思想大解放的产物，都是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能力提升的结果，都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巨大胜利。同样，进入新时代跨越发展阶段转换的窗口期和攻坚期，也离不开上述这些精神，而且要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旗帜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取得新经验和新辉煌。例如，对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来说，推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各地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措施。这些问题如果不通过解放思想、进行更大胆的改革和制度创

[※] 刘志彪，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原载《现代经济探讨》2018年第9期。

新，那么涉及行政边界开放和协调问题是难以实现的。

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到了不解放思想和进行大胆的制度创新，就无法继续前进、不进则退的重要关口。本文以江苏为例，对发达地区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尤其突出对江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解决的老问题的分析，即我们对江苏的富民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我试图通过这些分析，为江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较为深入和系统性的建议。

一、江苏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评估和展望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江苏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特征相配合，可用经济学理论中的三个重要的“套利”概念来反映：

一是“农转工”阶段，即“苏南模式”的兴起和兴盛阶段，它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农村工业化发展路径，可以看成是“国内市场套利”或城乡套利阶段。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和生产要素往城市流动。这阶段中农村社队企业变成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变成中小企业，不断进军原来被城市计划经济控制的领域，从而打开了市场经济的大门。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伟大的、最激奋人心的重大事件，从江苏广东浙江大量的乡镇企业进入到城市工业为基本标志。

二是“内转外”阶段，即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转向利用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阶段，可以看成是“国际市场套利”或国内外套利阶段。表现为1988年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浦东开发开放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三个时期。这个阶段江苏主动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发展出口导向的经济，使贸易量呈现爆炸式增长，从而给经济赋予了巨大的增长动能。进出口贸易对于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以来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一以上。

三是“投转创”阶段，即根据转型升级的要求，把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化为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发展阶段，可以看成是“要素市场套利”阶段。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江苏就率先在全国提出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人充分认识到，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现在国内各种要素的价格都在上升，这就很容易导致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上升。如果这种生产成本的上升，不能被随之而来的生产率上升、技术进步所消化掉，就会导致江苏产业竞争力的削弱，而竞争对手的竞争力，如中南美国家、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都正在往前赶。所以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身经济增速下降，生产率下降，整个经济体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中高等收入的演化中，如果没有伴随研发投入、人均专利拥有量的迅速提高，一般来说这个经济体就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正在面对着这样一种套利阶段的转换，这是跨入到现代化经济体系时必须高度重视的门槛。

总的来看，江苏发展在上述前两个套利阶段应该是及时地抓住了机遇，赶超战略也是非常

成功的，基本奠定了它在国内外经济的重要地位，但进入“要素市场套利”这一关键的发展阶段，虽然它也高度重视科教兴省战略的实施，其区域创新能力已连续八年全国第一，成为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但这种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占领国际市场高地的要求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江苏经济还没有真正摆脱要素和投资驱动发展的基本格局，对外技术依赖度还很高，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还不能说已经取得了成功，建设创新型省份的目标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实现。

为什么过去的那些套利活动一直都能成功，而到了要素市场套利这个发展阶段，虽然经过了二十年左右的艰苦努力，但是却仍然很难跨越学习模仿阶段？全方位进入自主创新发展轨道的巨大障碍在哪呢？这是一个现在从上到下、方方面面都在严肃思考的重要问题。对此可以探究的途径很多，结论也各不相同，如有些人认为是缺乏支持技术创新的良好机制，如资本市场功能不健全不强大，无法支持风险性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也有人认为当今社会缺少容错的机制和环境，这当然不利于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创新活动；更有人从根子上挖掘，认为问题出在我国的应试型教育体制上，等等。我觉得就事论事来看，其根本的原因是，在走向要素市场套利的这个发达国家才完成了的高级阶段，江苏缺少了一个高强度的“制度套利”的必经阶段的支撑。这里讲的“制度套利”，是指的一个经济体因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学习、模仿和制度创新而获取的红利。科技创新的前提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高于科技创新。离开了这种制度套利，科技创新就缺少内在的基础和条件，就是不稳定的、不牢靠的，也是难以持续的。

第一，过去的那两种套利阶段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在短缺经济时期，只要激励结构能够促进投资规模增加和生产能力增加，或者能够引进外资搞一般制造业就可以了，这些活动对大规模制度创新的反应并不敏感，只要搞好开发区、给一些优惠政策，一般的制造在很多地方都能搞。但是，对于人力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资本密集的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来说，由于它们是制度敏感性和制度依赖型的产业，如更注重知识产权保护，更需要有严厉的法治体系，因此如果没有制度创新的突破和新制度的供给，就无法顺利跨越这道坎。

第二，驱动创新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完全是因为增加了生产要素投入，而更多的是要靠制度安排，只有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才能真正驱动创新。这方面，道格拉斯·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证。2008—2009年我在名古屋大学做访问教授时，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多和田真教授多次向我介绍，日本过去也是以“反求工程”的方式学习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技术。日本真正进入创新驱动社会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那时的日美贸易争霸战中，美国开始运用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限制日本企业进行模仿和反求美国的技术，从而迫使日本企业开始重视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也开始了艰苦的自主创新。因此是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贯彻实施，才逼迫日本经济全面进入自主创新的轨道。

中国经济发展不缺钱、不缺市场，也不缺人才，缺的是好的制度供给。现在江苏进入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把政府的工作重点和重心，放在制定

规则、创新规则、修正和完善规则上。这其实就是重要的改革，就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就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体，也是驱动创新的主体。政府强，就应该强在制度创新上和供给上，不应该强在直接指挥企业家去干什么、不干什么方面。过去江苏是强政府，是强在搞经济活动方面，这就把本应强的市场和企业家给比下去了。强化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能力，就是要求政府减少直接指挥经济活动的职能，主要要把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机构、新法规、新政策和新工作载体等，引入原有的驱动高速度经济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组合。

江苏政府“制度套利”的目标，我认为最需要学习的是德国模式。目前世界各国比较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美国和德国两种。美国人稀地广、资源丰富，现今产业以高科技、创新、金融等见长。德国人口稠密，资源贫乏，以高端智能制造业和出口著称。江苏的省情与德国相似，人口相当(大约8000万)，但是经济规模大约只有德国的30%。现阶段江苏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装备制造业方面，制造业规模全国第一，装备制造业也是全国第一。因此江苏似乎更应该选择学习德国的发展模式，一是力争经济规模在2035年左右达到德国的50%以上，在2050年左右基本上靠近德国；二是在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上形成制造强省格局，有更多的在全球价值链上领先的“隐形冠军”，有更多的跨国公司和世界著名品牌。

二、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

江苏政府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的主线，要对表党中央确定的“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分享”这五大发展理念，运用系统性思维和动态的观点，重点结合江苏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和瓶颈进行，关键是要优化相关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

1. 针对发展动力弱化的问题，重点要强化与引领性发展、建设创新驱动省份有关的制度供给。现在讲创新最热心的是政府部门，其实，剃头挑子不能光是一头热，最需要发挥的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政府最该考虑的不是去指定创新的领域、方向和项目，也不是自己如何去投资和下命令，而是如何建立起促使企业家进行创新的动力、压力和引力三个机制。

在动力机制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运行良好的法治体系，坚定地保护企业财产权，给企业家稳定的长期的研发和投资的预期；在压力机制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建立平等竞争的条件，保护竞争而不保护企业，竞争和反垄断法要尽快走到政策体系的前台；在引力机制方面，最重要的是要能通过利益诱导，把资源集中投放到实体经济，投放到社会边际收益最大的科技创新领域。对此我提两个具体的建议：

(1) 江苏要把目前分散在政府各部门、各厅局的各种专项资金，通过建立利益和责任对等分享机制，集中起来成立支持科技创新的公司化、市场化运作的投资基金。这个建议目前似乎不容易被政府部门接受，主要是因为会受到权力部门的全力抵制。但是如果原本用于支持创新的

这些分散使用的资金不能够集中地、市场化地使用，这些资金的存在和继续投入，只能是浪费社会资源，不仅起不到大规模地、实际性地推动创新的作用，而且还容易出现廉政风险问题。

(2)江苏要扬弃长期过度注重外资经济，忽略内生动力型的、根植于本土的民营企业的政策取向。江苏现在不仅缺乏华为这样的本土创新企业，而且也缺乏市值规模千亿以上的上市公司。截止2018年5月底，深沪市场总市值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上市公司，江苏只有恒瑞医药、三六零、洋河股份、药明康德、苏宁易购、华泰证券6家，广东却至少有20多家，而且江苏这些上市公司一大半是传统产业。这些年我们在苏南调研，跑了很多的乡镇和企业，感受到外资企业都在全球布局，说走就走。苏州园区就陆续有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已经搬到东南亚等地地方去了，一大批外资企业正在准备撤出中国。外资企业根本不会也不愿意把它们的研发环节放在中国。

2.针对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要重点强化与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新体系相关的制度供给

(1)在长三角地区，上海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地位与江苏制造业中心地位的分工很明确。政府不必长期为江苏服务业比重低而发愁。毗邻上海的事实，成就了江苏的制造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江苏的服务业发展空间，例如金融业、运输物流业等。江苏在建设南京副中心城市的同时，也要考虑对接上海、充分利用上海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金融功能的问题。中国的创新企业一般在硅谷融资，在深圳发展。长三角地区要研究如何让这些企业上海融资，在江苏发展。

(2)当代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是智能化制造，途径是通过两化融合，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去改造传统制造业，现在把这叫做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江苏的制造业基础好，浙江的互联网有优势。江苏的制造业要加互联网，这有点像德国制造业4.0的发展方向；浙江的互联网要加制造业，这有些像美国模式。认真研究德国，可以给江苏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更好更高的政策启示。与制造业大省地位相适应，江苏省要鼓励人们从事实体经济，鼓励工匠精神，要在全中国率先建立首席技工制度。

(3)在服务业中，江苏旅游发展状态相对资源明显滞后，主要是未放到应有的该重视的地位。差距正是发展空间。后工业化社会应该让旅游发挥综合作用。

(4)要鼓励企业重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现在经济总体上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时期，是利用先进技术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最佳时期。建议设立以进口装备为主的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基金，可以与国家外汇基金公司合作，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如500亿美元以上的江苏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基金公司，采取信贷和融资租赁方式，专项用于进口中小企业所需的技术装备，全部用于改造中低端产业，这至少可以促进江苏中小企业整体提升技术水平10—15年。

3.针对外向型经济提档升级的问题,要把建设高水平双向立体开放型经济体系,作为服务于建设创新驱动省份的手段和工具

“走出去”与“引进来”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全球智慧和资源为我所用。在当今逆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我们需要逐步扬弃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全面实施基于内需优势的新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是要以我国不断成长的巨大的内需为基础,依托于大城市或城市群,大力虹吸全球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为中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对江苏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扬子江城市群在利用全球智慧、建设创新驱动国家中的载体和平台的作用,成为全球人才宜居、创新创业的最佳城市。在高铁经济和互联网经济时代,苏南、苏中、苏北的三大地域划分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依据高铁建设一小时左右的生活圈,以此构建城市群,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吸引人才和产业的空间开发战略。

4.针对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要重点强化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制度供给

重化工业长期发展下的江苏,环境保护是第一压力,要把它转化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具体问题是:苏南要加快技术改造,加快腾笼换鸟,而苏北能否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是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协调化发展的新路?应该说,从大国经济的角度看,中国整体上绕开传统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一步就进入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不太现实的选择。但是这不排除某些地区依据于严密的国内产业分工,绕开一般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可能性。这需要苏北地区各市按照比较优势,创造特色和优势。如某些地区可以定位为长三角地区提供安全高增值的现代农产品基地;有些地区适合于发展旅游产业;有的则更适宜发展港口物流经济;风电和其他能源工业发达的地区,则可以发展大数据产业,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苏北不可能放弃发展先进制造业优势。关键是要探索实施严格的环保制度和机制。可以探索在全省实施建立和健全以单位GDP能耗、污染物排放为基础的交易制度。实行这一交易制度有利于促进各地区能耗量的持续下降,促进欠发达地区的青山绿水得到有效的保护。

5.针对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要建设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

(1)江苏进入高质量发展,最需要解决的是GDP中的含金量低的老大难问题,即经济增长快,但是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不高的问题。通过鼓励创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来提高GDP中的工资福利含量是一条路子,但是还要有分配改革的配合。(2)江苏人口老龄化全国领先,提高全社会的养老福利和保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其中,养老产业是夕阳工程和朝阳产业,江苏应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遇,补短板,把养老产业摆上重要议事日程。(3)关于农村养老。可以学习德国老人互助养老的做法,就是老人把房子卖了,住进一个很大的公寓,养老公寓中医疗生活条件齐全,老人互相照顾。

三、富民:江苏进入高质量发展障碍和解决途径

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富民。富民是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终点。而富民问题恰恰是江苏过去的发展方式中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过去,江苏经济工作的焦点不在于此。那么聚焦到哪儿了?应该说主要聚焦在追求产能和供给的数量上了。过去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我们面临资本短缺和商品短缺。现在我们是资本过剩、商品过剩,不聚焦富民,不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居民福利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扩大内需,这个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游戏就无法持续下去,只会越搞越产能过剩。只有从追求数量转向提高供给质量,才能使富民后的需求不发生内需外溢,才能使消费升级成为支持本国创新的主要力量。而且,才可以从根本上回归发展经济的目的,避免发展格局陷入难以自拔的中等收入陷阱。

从宏观上看,过去四十年的追赶战略形成了“中国经济奇迹”,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突出的、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老大难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启动了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的追赶战略,除了要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经济目标外,在民主与法治、文化软实力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还有更加严格的标准,如提出了社会保障全覆盖、收入差距缩小、医疗服务人人享受、严格环保等新要求。显然,与过去追赶战略中把资源集中于经济建设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相比,进入新时代的新一轮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其基本特征是“五位一体”的相对均衡发展,民生问题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怎么样才叫富裕?富的标准是什么?富与不富是相对的。纵向比,我们现在已经从温饱、小康水平阶段,走向了追求高水平小康的阶段,正在启动基本现代化建设;横向看,我们与发达国家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上的差距还很大,存在继续努力、奋起追赶的巨大的空间。

富还是不富,不是用生产量来衡量的,而是用生产中最终由民众分享的程度、实际水平来衡量的。而且,“富”还是一个动态的标准。例如,世界银行曾经用总国民收入指标(GNI)划分世界各国经济的发达程度,2008年,人均GNI小于975美元即属于低收入国家,976—3588美元属于中低收入国家,3856—11905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而大于11905美元就属于高收入国家。到了2015年,这个标准有所提高,相应地分别变为:1025;1026—4035;4036—12475;12475以上。江苏如果以人均GDP来计算,这在2008—2013年都属于中上等收入,2013之后进入了高收入行列。

其实,江苏的人均GDP高,并不能算真正的富裕。早在2010年,根据美国个人和家庭收入统计,人均年收入1—3万美元归属于贫困或低收入,中位数收入群体是3—5万美元,中产阶级为5—8万美元,而高收入的富裕阶层要大于8万美元。2015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2094.25美元,2016年到43432.50美元。同年江苏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只有4742.63美元和4828.15美元,只有美国的1/9强。其中农村居民只有2610.14美元和2650.59美元。

当然，如果在国内比，江苏居民的富裕程度，平均来说处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水平。其中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处于城市组中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水平，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处于农村组中的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水平。也即是说，江苏农民收入水平，在全国农村的位置，要比江苏城市居民在全国城市的位置高。这是符合现实的，说明江苏农村相对于其他地区要发达。

富民还要解决究竟要富谁的问题。这个需要进行阶层分析。首先，聚焦富民要富的是民，不是政府机构，不是企业主，也不是金融机构，而主要是普通老百姓。要让民众过好日子，政府和一些过去分配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就要过紧日子。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中，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拿多了，现在要在分配上突出向居民、向劳动者这些主体倾斜。

另外，聚焦富民也不是要“富”所有的“民”，民也是分阶层的。有些“民”，还很穷，而有些民，已经高度富裕，如拥有较大资本积累的资本所有者、高收入的先富起来阶层，他们要做的，应该是为富民政策做贡献。因此，聚焦富民必须首先弄清楚在我们的社会各阶层中，哪些人早已经富起来了，现在不是要富他们，而是要他们帮助那些不富裕的穷人；哪些人不仅没有富裕起来，而且还存在基本的生存问题，需要通过精准扶贫，帮他们从贫困尽快转向温饱、从而加速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富民的重点可能在于培育一个日益增长、壮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只有这个阶层不断地成长和壮大，才能保障社会持续稳定地发展，才能意味着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实现基本现代化，才能圆我们的中国梦。

从空间上看，聚焦富民就是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苏南苏北苏中之间的收入差距。江苏城乡差距虽然在全国是最小的，但是苏南苏北苏中发展差距比较大，尤其是徐州、盐城、淮安、连云港和宿迁五个地级市，无论是城镇常住居民，还是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等，都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阶段。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扬子江城市群的塑造等战略构想和坚决实施，有利于打破富民战略按长江天险进行南中北横切划分的传统套路，实施纵向的跨江融合发展和渗透。

富民战略究竟应该由谁来实施？这需要进行主体分析。富民不应该是个体、家庭的要求，而应该是官、企、民、社会组织等的多主体联合行动，是一种基于个体、家庭努力的集体联合行动。因此，对于努力追求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的政府来说，富民目标就是它的一个基本战略，一个必须动员全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集体行动。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因此作为企业集合的产业富民，就是政府落实富民政策措施的基础性组织形式。由于国民经济财富是由产业活动所创造，因此强调产业富民，就是强调通过鼓励生产性努力，来追求居民财富增加，这就是实体经济活动；相反，那些非生产性活动增加的

收入，如财产收入、再分配和转移收入等，鼓励的是非生产性努力，是虚拟经济活动。所以产业富民是最根本的富民途径和措施，是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可替代的。

产业富民有一个产业选择的问题。一般来说，必须选择生产率高、附加值高的产业。符合这个条件的产业，除了先进制造业外，还有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以及一部分用信息网络技术改造过的生活服务业，如旅游、购物、娱乐等。苏北如果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是走出一条生态化发展的新路，那么宿迁、淮安以及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围绕洪泽湖、高邮湖、骆马湖，就必须建设打造成生态经济区。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一块虽然是最有生态价值的地区，但是发展什么产业为妥？仅仅搞旅游业行不？我觉得不够，因为仅一个宿迁市就有600万人口，仅仅搞旅游业，产业容量不足以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和致富问题。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聚焦富民战略中必须始终遵守的基本原则。其中，提低限高的富民策略，需要强大的政府职能来支撑。提低，不仅是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更重要的是要完善和提升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如居民在医疗、教育、基本住宅、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减少，等于增加收入，等于平均地提升了居民富裕程度。限高，则需要在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基础上，对少数高收入者的收入进行更大力度的再分配调节。

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除了国家税收制度调整外，关键是靠市场、靠民间、靠企业的功能的发挥。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其实已经演变为“工薪阶层税”，非常不利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未来，我们应该提倡、鼓励发展良好、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进行内部分配改革，让它们成为“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崛起”的主要力量。

最后是我们要用什么办法来富民？这涉及对富民的手段的选择。从总的方面来看，影响富民的根本因素就两个，一个是生产性努力，另一个是分配性努力。富民不能仅仅是分配性尤其是再分配努力，这种性质的分配因素多了，不仅会使民众的生产性努力受到抑制，而且也会扭曲市场机制，挫伤劳动投入的积极性，不可能持续下去。

生产性努力是指一切创造财富、增加财富总盘子的活动。它是富民的前提和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它只能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总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中提高生产率的办法，也只能是技术进步、机器劳动替代人类劳动、鼓励劳动者积极性提高、改善经济体制等。只有财富总盘子不断地做大，人均财富才能不断地增加。分配性努力，是指一切不增加财富总量、而仅仅是分配和再分配财富的活动。在创造的财富一定的前提下，分配性努力是零和游戏，即我失去的，就是你所得到的，反之亦然。影响居民财富增加的分配性努力，还可以区分为初次分配性努力和再分配性努力两种。前者是在实体经济生产领域内部发生的，后者是在生产领域与非常生产领域之间发生的，更多地与具有强权的国家性质有关系。

初次分配性努力的具体形式至少有两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财富在国内居民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分配。GDP中外资拿得多，自然本国居民就会拿的少。依靠吸收外资来发展经济的地方，如苏南地区，都普遍存在这一分配失衡的问题。

二是财富在创业者与打工者之间的比例。资本所有者拿多了，创业的人多了，就会出现平均财富大大高于中位数财富量的格局。如浙江与江苏的差距就主要在此。

再分配性努力，形式比较多。对我们的分析来说，比较有意义的是：

一是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在财富一定的前提下，政府和企业从这个总盘子中拿多了，居民就不可能很富裕。江苏过去一直上交国家财政比较多，藏富于民不足，这是江苏聚焦富民战略的软肋。

二是金融因素。现在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弱，而虚拟经济过火，善于和敢于利用金融杠杆、敢于炒作资产增值的地方，往往要比单纯做制造业的地方富裕。这种分配性努力是造成在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之间不成比例的根本原因。

从扭转分配性努力入手，鼓励生产性努力，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提高GDP中的含金量。为此江苏主要可以从强壮制造业开始做起。江苏过去靠制造业起家，也要靠制造业走向未来。制造业强大的生产率，是富民的基础，是整体生产率提升从而是劳动者收入提升的基础。

培育全球价值链上的“隐形冠军”

刘志彪[※]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中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制造2025》描绘了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方向、具体路径和政策取向。笔者从全球价值链（GVC）中产业链向上延伸的角度，对建设制造强国提出一些补充性的分析。

中国制造企业应不断向上延伸产业链

笔者提出，鼓励中国制造企业努力向上不断地延伸产业链，在生产者主导的价值链中，就是培育GVC上的“隐形冠军”，就是产业升级的具体行动，就是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做大，就是当前和未来产业政策应该鼓励和支持的方向。从全球经济的内在联系来看，这次中美贸易摩擦，美方欲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痛下狠手，其实想打乱的是中国参与GVC的分工循环体系，并试图抑制《中国制造2025》规划实施的进程。事实说明，建设制造强国必须高度警惕那些拥有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中间投入品供应商，在关键时刻对中国产业安全发出威胁。而具有这类性质和能力的供应商，一般被称为“隐形冠军”，指在某个细分市场绝对领先世界但却鲜为人知的企业。这些“隐形冠军”不直接与终端消费者发生联系，但却因掌握行业的关键知识和技能，享有其他企业无法替代的优势地位，因而往往是具体产业命运的真正控制者。

“隐形冠军”的特征

GVC上的“隐形冠军”，一般具有以下显著特性。1.中间投入性。在投入产出的产业链上，这些企业的产出是GVC下游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中间投入，它们的销售收入就是下游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投入成本，即作为原材料、零部件等计入下游最终产品企业的会计成本。2.知识技术密集性。在产业活动的内容上，由于这些企业的生产活动需要消耗或投入巨大的人类脑力劳动，因此，其产出中含有丰富、密集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该部门是把知识、技术、技能和人力资本带入最终商品部门生产的“飞轮”。3.报酬递增性。从成本收益来看，这些企业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投入性质，因此，属于报酬递增的产业部门。最典型的是，芯片的生产活动。第一张芯片的生产成本几乎全部是前期投入的固定成本，但是后续批量化生产的芯片的边际成本几乎趋向于零。由此，其生产随着规模的增大而出现报酬递

[※] 刘志彪，南京大学教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本文原载《中国经济报告》2018年第6期

增的现象。4.产品高度差异性。在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同类厂商中，其品质因人力资本投入水平的差异，相互间都会表现出巨大差异，这是这些中间投入品生产企业的重要特性之一。产出之间的差异，不是最终消费者可以用心理感知的，也不是可以主观准确评价的，而是需要由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师等按技术标准和等级等参数进行测试。5.较高的进入障碍。对知识技术的投入差异，构成“隐形冠军”类的中间投入产业最大的进入壁垒和障碍。中国企业如果没有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和工匠型的、历史性的耐心，如果没有长期在GVC上进行国际代工的经验 and 对其深刻了解与理解，要在这类GVC上“走上去、走进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软肋和痛点

中国企业过去处在GVC上的加工装配等生产的最终环节，往往是属于高技术产业的低端环节。目前处于这个价值链上游的“隐形冠军”在全世界有3000多家，其中德国数量最多，拥有1300多家。中国虽然是世界制造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产业规模也列世界前茅，但是这些产业往往大而不强，极度缺乏像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那样的行业“隐形冠军”，其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材料大都垄断在国外“隐形冠军”企业手中。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发动机和汽车发动机，小到圆珠笔笔头的球珠、高铁列车上的螺丝钉、电子产业的高档芯片、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等，都是中国在产业链上的软肋和痛点。与此具有技术经济关联的下游的中国产业，都有可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发生时的牺牲品。中国主导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可能都通过依赖投资或收购兼并下游的加工厂和零售店来达到，而是需要培育更多的“隐形冠军”，才能突破发展瓶颈，迈向GVC的中高端。“隐形冠军”决定着中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点。因此，未来应根据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性和紧迫性，某些最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逐步向上延伸产业链，专注于产业链上的技术知识密集环节。总之，要争取把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应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

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更多GVC上的“隐形冠军”，说明我们过去认可的某些经济理论已经过时，尤其是不能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去继续实施所谓的扬长避短策略，放弃对GVC上游的某些高知识技术密集环节的追赶，而是应该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实施扬长补短策略，全力拓宽瓶颈部门。过去在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下，我们长期定位于GVC上的低成本环节，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当开放战略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初级要素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会使其产出增加并使其出口具有竞争力；同时会使缺少比较优势的资本品进口增加。这样，国际贸易的规模就成为内生变量。对本国比较优势偏离度越小，其产出就越有国际竞争力，出口就越多；同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品产业产出会

减少，相应地对其进口会增加。但是由于有竞争力的出口会带来更多的收入，使得该国有条件实现这种进口。这一理论基本上反映了过去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贸易量迅速增长的历史轨迹。不过，该理论对未来中国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建设制造强国战略，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其中问题之一是：当我们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产品时，并不能排斥其他初级要素密集的经济体也作为竞争者参与竞争。当某些可能具有更强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进入全球化市场，而地区的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产业升级因种种原因出现滞后时，再继续把竞争优势集聚于原来的初级要素，可能非但难以实现出口收入的持续增加，反而会陷入“贫困化增长”的不良格局。问题之二是：案例研究证明，以不适当的方式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很容易在全球价值链的网络中，被走“高端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先进企业俘获，很容易在市场势力非对称、非均衡的网络中，被长期锁定在GVC的低端，长期走“低端道路”，其产业升级的任何实质性努力，都会遭到高端企业的阻击，因而只能长期维持粗放型增长模式。问题之三是：这种定位容易在不安全和不稳定的GVC中，成为被上游企业遏制的对象，从而影响国家产业安全。这个事实已经为这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践所证明。根据动态的竞争优势理论，对战略性瓶颈部门的拓宽，可以从幼稚产业开始。按照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可以对幼稚产业设置阶段性的成长保护期，以隔开外来竞争。在保护期内，政府要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鼓励企业提高竞争力。除了可以补贴消费者、使用者，以及鼓励国内消费者优先购买国货外，还可以通过鼓励产业内的优势企业进行资产兼并，迅速做大做强。需要强调的是，现在的产业政策采取鼓励生产者提高产量的办法是低效的，甚至容易导致相关政府部门“被俘获”，出现欺诈和腐败现象。应该按照发达国家补贴幼稚性新兴产业的通常做法，主要采取补贴消费者的办法。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让国内消费者或用户用货币投票机制选出最强的生产者，淘汰落后企业。同时可以减少欺诈和腐败现象。

如何培育中国的“隐形冠军”

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更多GVC上的“隐形冠军”，对于中国打造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制造业是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如果说小国经济可以通过嵌入全球经济实现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从而建立起依赖外部关系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来说，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依靠不断增长的、规模巨大的内需优势，去建设独立自主的、开放的工业经济体系，是中国最需要选择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的、关键的技术和知识，是市场换不来的，也是金钱买不到的，必须自主研发，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基础厚实的制造业和强大的军事工业。不过，我们强调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必须自主研发，并不是主张闭关锁国、关门研发，而是要在GVC的开放链条上，大胆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要素，善于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当然，考虑到国际分工，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诸如芯片、精密仪器、飞机发动机、传感器等所有领域和环节都取得绝对优势和控制地位。另外，中国目前欠缺的技术，也不可能都由国家出面来不惜代价地组织追赶。因此，一是在实施扬长补短策略的过程中，需要集中力量去补最短

的“板”，由此边际收益会更高；二是更需要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民间、市场和中小企业在战略追赶中的主体作用。根据笔者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长期观察，未来中国企业攀升GVC，可以采取的针对性政策是：让大型国有企业搞连续性的累积性创新，而破坏式的颠覆式创新则放心地交给民营企业去做。前者需要长期的积累，有时必须忍受一定时期的甚至较大的亏损，比如大飞机项目、大型船舰、大型电机工程等；后者处于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竞争的最高境界是颠覆产业和产品的界限和定义，民营企业当之无愧会成为主力军。三是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产业中，在开始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应对国内的民营企业开放。加大对内开放有利于民营企业把这些产业的竞争力迅速提高，以防止急促的对外开放使这些产业丧失竞争力。

破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制度痛点

陈柳[※]

一般说来，实体经济指关乎货物与服务实际生产的那一部分经济。从行业来看，农业、建筑业、工业、金融以外的服务业，都被认为是实体经济。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以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衡量实体经济（非金融企业和住户）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据统计，2017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74.64万亿元，同比增长12%。2017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9.44万亿元，比上年多1.63万亿元。另一方面，2016年初以来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M2增速之间逐渐背离，社融增速显著快于M2增速，金融去杠杆被认为是主要原因。说明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总量支持其实一直是在增强的。

以社融为指标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程度，与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的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感受形成了较强烈的反差。这不是总量指标出现了问题，而是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配置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部分僵尸国有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这些实体经济的部分占据了大量的金融资源，而数量巨大的效率较高、吸纳大量就业、杠杆率较低的中小微企业没有被正规金融机构服务到，这导致了融资总量与结构的巨大差异。从当前的金融体系看，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两条路径在制度设计上均很难服务中小微企业。

从直接融资看，在交易所市场利用股票进行融资是高壁垒的。虽然在A股市场上较早设立了中小板和创业板，并且按照中国证监会对企业首次发行股票的办法，创业板上市的最低要求只需要“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一千万元”。但在实际操作中，能够申报IPO的企业门槛至少要3000万-5000万的盈利水平、几个亿的营业收入，才能被认为具备一定“可持续经营能力”。这样的企业往往是地区发展中的明星企业，与我们认为的中小企业是无关的。

从债券融资的路径看，目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有企业债、公司债、银行间债券等债券类型，均具有一定刚性兑付的性质，主要服务于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和其他大型企业。从企业债来说，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性质的债券占据绝大部分。从公司债来说，审核部门是证监会和交易所，主要服务于上市公司和金融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发行公司债的上市公司净资产规模一般不低于15亿，发行规模至少几个亿。从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发行的中票短融等债券来看，发行方基本都是央企等国有大中型企业。债券市场曾经尝试设计“中小企业私募债”服务中小企业，可惜以尴尬收场。

[※]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新华日报 2018 年 3 月 7 日第 013 版。

从间接融资看，首先，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有大生意做，可以忽视中小微企业的小生意。在重化工和城镇化的阶段，存在大量重资产、基础设施以及政府背景的项目，这也是当前中国的银行业规模处于国际前列的重要原因，这一优势是国外银行所不具备的。其次，商业银行缺乏真正以信用为基础的风险定价模式。由于我国信用基础设施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产业组织形式上也没有形成大量中小微企业围绕大型企业集团服务的产业组织结构，这为商业银行识别小微企业贷款风险带来了困难。因此，银行在贷款投放中扩张了政府背景和国有性质的信用，对中小微企业控制风险的方式只能依靠单一的抵押和担保。当缺乏土地、物业这些硬通货抵押和其他主体的强担保时，中小微企业的银行融资就很困难。最后，中国的大银行模式，其组织架构与管理模式与服务中小微企业所需要的能力不甚匹配。中小微企业单笔业务规模小，现有的银行业务模式很难下沉到中小微企业的汪洋大海中获取有效客户。

普惠金融、小贷、P2P、新三板等近年来一系列金融改革的探索给我们的启示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制度设计应当对市场各个主体实现内生激励，否则单纯依靠对金融机构的指标考核难以有好的效果。因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着力点应该是既要努力提高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可及性，又要实现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补偿，同时要努力降低中小企业成本。为此建议：

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在融资领域信用滥用。历经多年改革，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近年来由于政府融资平台的涌现却有愈演愈烈之势。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导致金融领域价格信号失真，国有平台仅因为所有制性质而不是资产质量、经营效益就可以以低利率获取大量融资，从而对民营企业融资形成了挤出效应，导致近年来始终比较宽松的资金面没有外溢到广大中小微企业。

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机构要形成服务中小微企业的生态系统。间接融资仍然是中小微企业的主要力量，从实践来看，硬性规定大型金融机构向小微机构贷款达到多少额度、多少比重的效果并不好。可以将大型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与地方性金融机构、小贷公司、互联网金融企业等下沉渠道结合，发挥后者可以与广大小微企业低成本“面对面”沟通评估的优势。在具体做法上，可以鼓励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向部分治理规范（包括部分国资参股）的小贷公司和P2P公司贷款，增厚小贷公司经营能力、降低P2P公司的资金成本。

加快个人和企业的信用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信用评价机制就无法摆脱抵押担保的传统金融模式，构建广泛的征信体系是降低金融企业成本、促进资金流向中小企业的重要方面。阿里等互联网企业利用平台优势构建信用体系，对生态圈内企业的小额贷款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信用体系建设中政府应当有所作为。在大数据时代，完全可以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推进个人和企业各类信息公开与共享。要立足长远制定十年左右的规划，初步为个人和企业建立形成涵盖整个生命周期的信用体系，使小微企业和个人的金融服务模式与国际接轨。

活跃新三板市场带动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直接融资对中小微企业也是不可或缺的，不同

于间接融资，它的作用在于能够发掘未来的明星企业。作为注册制的试验田，新三板市场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没有历史包袱的平台。当务之急是通过适当降低投资者壁垒、改进交易方式等举措吸引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不仅能够让企业按照市场化方式挂牌，还能够让投资者按照市场化方式退出，这样才能让广大中小企业更好地按照市场化方式融资。

企业持续充满活力的根本保证

陈传明[※]

中国经济近40年实现“超预期”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及其相应政策不断充实和完善的结果，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逐渐形成活力是其重要原因。“企业本位论”的提出、与之相应的企业社会角色与功能转换、企业制度的“逆向改革”以及企业家主体地位的逐渐确立为企业活力的形成和持续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企业本位”的确立是企业形成活力的基础。4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然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从单纯的产品生产者逐渐转型为可以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即“企业本位”的逐步确立、企业社会角色与功能的逐渐转换。早期的企业改革主要是围绕着企业经营权的下放来进行的，力图通过相关权力的下放，使企业成为商品经济的主体，把企业塑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商品经济本体地位的确立、自主经营权的下放以及相对经济利益的落实，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的特点选择生产的方向和规模，不仅激发了企业的经营积极性，而且保证了有限资源的合理利用，从而促进了企业活力的形成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

企业制度的“逆向改革”保证了企业本位的稳步实现和企业活力的逐渐形成。企业制度是调节所有者、经营者以及劳动者等不同参与者群体或个体间相互关系的一系列规范的总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至少包括了产权制度、经营制度以及管理制度等三个层面。产权制度规范了所有者、经营者以及劳动者的权、利关系；经营制度主要用以调节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管理制度则主要是经营者协调劳动者关系的规则。产权制度的性质决定了经营制度的特点，而经营制度的特点则在根本上影响着管理制度的形成和调整。根据这个逻辑，企业制度改革应该首先是变革产权制度，然后据此对经营制度以及管理制度作相应的改变。然而，产权制度的变革是企业制度的根本性调整，这可能带来企业制度的急速变革，从而可能造成企业经营的混乱，甚至危及企业的生存。因此，在企业制度变革的实践中需要寻找一条渐进的路径。

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实践依循的正是一条反方向的渐进路径。1978年以后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从管理制度破题的：宏观上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微观上企业开始探索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放权让利”不仅调动了企业自主经营的积极性，而且使

[※] 陈传明，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企业发展战略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新华日报2018年3月14日第017版。

企业逐渐走向市场、熟悉市场、适应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迅速提升，国家对企业实行“承包”“租赁”等经营制度的改革也逐渐水到渠成。当“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的潜力充分挖掘、其内在矛盾逐渐显现时，在根本上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便逐渐成为全体社会的共识。这种从管理制度调整到经营制度变革、最后到产权制度改造的渐进变革是企业制度的“逆向变革”。正是这种“逆向变革”保证了企业制度改革的稳妥进行，从而保证了企业本位的稳步实现以及企业活力的逐渐形成。

从企业本位走向企业家主体地位是企业持续充满活力的根本保证。企业能否有效地自主经营、企业活力形成后能否持续并不断增强在根本上取决于企业家的努力。从企业本位走向企业家主体地位是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逻辑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在实现企业本位的同时，为企业家成为市场主体提供了可能。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需要进一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目前的国有资产管理是以各类资产经营公司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为表现形式的。在这种体制下国有参股企业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主组织日常、甚至战略经营，但是相关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国有股份单一持有人在法律上、理论上以及逻辑上仍然存在对这些企业的经营进行间接、甚至直接干预的可能，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管理者们仍然有可能表现出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官员相类似的行为。

为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具体企业国有股份的“多元化代理”以及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应该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改革可以选的方向。与此同时，还需要建立和健全审计监督机制、完善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以促进成为主体的企业家们正确地运用相应的权能贡献市场经济的发展。

强化实体经济 推动高质量发展

刘志彪[※]

摘要：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本文理解“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剖析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发展失衡问题，以及实体经济内部的结构矛盾。最后，提出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在引导经济发展脱虚向实的同时，推动以虚促实和新旧产业融合。

关键词：十九大报告；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要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实体经济既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着力点，又是打造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素之一。切实提高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是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抓手，也是解决我国当前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关键点。

一、理解“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是对十九大报告要求的一个具体落实。这次会议的主题词是“发展高质量经济”。按人民日报社论定义，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这就进一步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转向了高质量发展。

推进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求。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是继过去两年来“三去一降一补”行动取得阶段性成就之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又一个必然的重要的行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之后的必然。过去是短缺经济，主要应该用速度加快解决“有”“无”的问题；现在是过剩经济，必须开始用质量去解决“好”“坏”的问题。二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我国的供给体系如果不能提高产出的质量，那么日益增长的民众需求很大一部分就会转移到国外，从而导致国内产能进一步严重过剩，不能实现再生产的正常循环。三是缓解新时代我国社

[※] 刘志彪，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现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长三角区域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本文原载《产业经济评论》2018年3月25日。

会主要矛盾的必然。现在民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没有高质量经济体系来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社会主要矛盾就会加剧，摩擦就会增加，社会发展就不稳定。

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201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这一要求紧密结合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总体要求，非常明确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地方政府就GDP增长的绩效竞争，一直是与不断深化的市场力量有效地融合在一起的。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展开地方政府之间的增长竞争，是中国经济有别于其他转轨国家的重要特征。这一竞争格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也显示出了一些地区片面追求数量、粗放发展的不良倾向。现在中央要求把这种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锦标赛，改为“高质量发展”的新竞争，这种“指挥棒”怎么指、往哪里指，将引领地方和部门干部们努力的方向。如何建立指标体系，制定政策体系，确立标准体系，组织统计体系，进行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直接关系到找准方向、促进科学决策、凝聚发展共识，是引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探索解决的重大问题。

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坚实的发展底线。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是未来几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经济工作中，这三大攻坚战是化复杂为简单，是纲举目张的工作。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是为了实现稳定协调发展；抓精准脱贫工作，是为了实现公平共享发展；污染防治工作，是为了实现生态绿色发展。因此，三大攻坚战践行了五大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例如，防范重大的金融风险，需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方面，需要我们在实体经济内部大力鼓励技术创新，同时以这些创新类资产为基础，通过金融部门的资产证券化，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收益更稳的可投资资产；另一方面，要强化金融部门的制度创新，利用现代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活动，让更多的科技型企业与资本市场一起成长。这种实体经济、现代金融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协同发展，就是十九大报告要求建立的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体系。

推进高质量发展，未来要适当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增加其民生、文化、生态和社会职能。为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我们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众所周知的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决策者必须受到硬预算的强烈约束，只有如此才能做出理性的、追求经济效益的决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松弛，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老大难问题，也是粗放发展、债台高筑、可能发生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因。适当减少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有利于其把精力集中在缓解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上，也有利于减税降费、推进

扩大内需，更有利于确立企业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

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具体的措施和行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具体布置了2018年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工作。根据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根本性问题，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重点要在“破”、“立”、“降”三个字上下功夫。破立降是追求供给体系高质量的具体行动。破，需要运用结构性政策进行供给侧调整，促使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更多地流向现代高技术产业中的创新企业，同时要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千方百计地化解产能过剩。立，一是通过人力资源和科技投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增加高质量部门的供给；二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其改造传统部门，减少对过剩部门的资源投入；三是以优质的技术创新类资产为基础，通过金融部门的资产证券化，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收益更稳的可投资资产。降，是为了以此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提高实体经济投资的回报率，增加其投资吸引力和竞争力。当前要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二、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过虚，虚实分裂对立”，没有很好地形成良性互动。

一是部分实体经济部门产能过剩严重，盈利率较低。一方面以钢铁、水泥和煤炭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严重闲置，另一方面，产能过剩现象也逐步蔓延到风电和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超额供给导致市场竞争过度，实体经济部门的盈利率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同时随着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许多实体企业亏损加剧，只能依靠银行输血勉强维持，导致大量社会资源被锁定在低效率行业，遏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在实体经济内部持续积累泡沫风险。

二是实体经济从“汗水经济”向“头脑经济”转型困难。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充分利用了第一波全球化的机遇，从低端切入全球价值链，迅速实现了生产能力扩张，经济常态从商品短缺转变为商品过剩。但很多企业由于缺乏核心专利和创新能力，无法转型进入高端消费市场，只能在低端市场中过度竞争，加剧了产能过剩。近年来，伴随着资源和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这种注重“体量”发展忽视“内功修炼”的模式逐渐面临发展瓶颈。

三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形成体外循环。因为实体经济回报率较低，导致资金涌入虚拟经济，货币供应难以有效转化为现实的流动性，无法形成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最终对消费者需求和内需的扩大形成抑制。更重要的是，大量资本沉淀在虚拟经济内部循环中，意味着包括研发等在内的生产活动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又会进一步阻碍企业转型升级步伐。

四是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未形成良好的互动与融合。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可为新经济的发

展提供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市场机遇，新兴产业的发展可通过技术扩散，实现新旧产业的联动与融合，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在这一轮的互联网信息革命的浪潮中，我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企业。但是，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经济形式并没有和传统产业形成良好的互动与融合，而是割裂发展，新动能未能有效拉动旧产业。

总体来说，实体经济发展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发展失衡，以及实体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这两个问题，都不能简单地通过扩大投资规模解决，而是需要扭转利益结构，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的调整。前者需要平抑虚火上升的虚拟经济，以此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提高实体经济投资的回报率，增加其投资吸引力；后者则需要运用结构性政策进行供给侧调整，促使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更多地流向现代高技术产业中的创新企业，同时要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千方百计地化解产能过剩。为此，在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之后，宏观经济管理和政策的重心也要做出根本性的转变，要从追求投资规模、GDP增长速度，转向追求提高经济体系的质量，转向扭转重大经济结构失衡，转向追求经济系统的协同性，否则，不仅无法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也无法做到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还会进一步引发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

三、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

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努力提升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扎实推进实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正如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那样，要运用结构性政策强化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在引导经济发展脱虚向实的同时，推动以虚促实和新旧产业融合。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以市场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挤出实体经济中的水分。政府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短期可以通过行政手段遏制产能过剩的持续恶化，从长期来看更应该让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让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因此，政府应该更多地采用环保政策、竞争政策等化解低质和无效的生产能力。（1）纠正部分地区存在的违反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所谓“优惠”土政策和融资便利，不允许在增量部分继续出现无效供给，要让微观主体承担市场竞争的后果；（2）针对已经形成的过剩产能，坚决停止财政输血，让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同时可以采取债转股和专项技术补贴等方式帮助部分资质较好的企业实现技术升级；（3）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鼓励行业中的优势企业对亏损企业进行收购兼并，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行业利润，为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提供足够的利润空间。

第二，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要成为创新活动的主体。（1）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他们在市场开拓上锐意进取、在产品开发

上敢于尝试、在组织管理上勇于革新；（2）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那些具有很高创新能力的技术工人既能收获切实的物质回报，也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3）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全面保障知识创造者的权益，严厉打击任何形式的侵权行为，让创新者有回报、侵权者受惩罚；（4）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重视并完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一批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的劳动者队伍。在努力提高企业内源性创新能力的同时，政府还应当持续优化外源性创新的效果，一方面依托大院大所和重大科技项目，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原创性成果的重大突破，同时以大规模技术改造等形式提高基础设施网络的质量，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一方面以科研考核体制改革为契机，以股权合作为纽带，以混合所有制的新型研发机构为载体，推动高校院所、地方平台和社会资本多方融合发展。

第三，在全面开放的格局下，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在新一轮的全球化变革中，我国要依托“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摆脱在原有产品内分工框架下企业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困境，重新构建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价值链。（1）将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生产能力向部分资源和劳动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在与当地经济共享繁荣的同时，加速实现产业组织形态的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优化；（2）利用我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多样化的需求种类，采用逆向发包以及研发总部等形式，虹吸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向国内市场集聚，逐步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和规划者，将更多的核心生产环节纳入到中国的产业体系中，最终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3）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通过合作、入股和并购的方式，获取高端的生产能力，在研发、设计和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积累竞争优势。

第四，加快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当前以间接金融为主的融资体系在加剧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的同时，也蕴含了极高的债务风险。融资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被极大削弱。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以股权融资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作用，是实现虚实经济良性互动的关键。（1）鼓励高质量企业上市融资，加快优质信贷的证券化速度，盘活资金存量，通过大幅度供给优质资产的方式化解“资产荒”造成的虚拟经济泡沫，同时还能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流入实体经济领域，为研发活动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激励企业持续提升创新能力；（2）规范资本市场制度和加强上市企业监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将劣质金融资产逐出市场，在提高资本市场总体质量的同时强化投资者信心；（3）规范政府自身融资平台建设，对已经形成的基建资产项目要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降低债务规模，对新建项目可采用PPP等方式来引入多种资本，降低债务风险；（4）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经济中去，使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不断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五，以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作为抓手，推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传统产业并不等于夕阳产业，经过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完全可以重获新生并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新兴产业通过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迅速获得市场需求和优质生产资源，加快

自身成长速度和提高质量。新旧产业协同发展，关键在于制定产业政策时，要优先选择扶持那些具有交叉性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新兴企业和传统企业在技术研发、市场开发上相互合作，组成企业联盟来推广具有新旧融合性质的经济发展模式。（1）允许新的经济形式先行先试，支持企业在采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减少政策阻碍，敢于制度创新；（2）通过建设综合性的科技服务和专利交易平台，推动原创性科技成果的流通与转让，加快新技术与应用场景的结合，充分发挥集成式创新在新旧产业融合中的催化剂作用，让创新成果迅速楔入应用领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 [1]刘志彪.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关系的再思考[J].学习与探索,2015(9):82-89.
- [2]刘志彪,王宇.推动虚实平衡强化实体经济发展[EB/OL].(2017-11-05)[2018-02-08].http://www.sohu.com/a/202403056_701468.
- [3]刘志彪.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EB/OL].(2018-01-15)[2018-02-0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9629252429022121&wfr=spider&for=pc>.

世界级城市群国际比较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

沈坤荣 赵倩[※]

内容提要：城市群崛起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世界级城市群对创新资源与全球市场的有效整合，使之成为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以现代化体系构建为重点的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空间布局优化和要素集聚作用更加突出。以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为契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提升长三角区域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扬子江城市群作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苏对接湾区经济、重塑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江苏应以基建网络扩张打破地理边界，以有效合作新机制构建打破行政边界，促进资本、劳动、人才、信息自由流动，使城市群发展理念更好融入“1+3”重点功能区战略，进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一体化；“1+3”重点功能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新一轮城市化进程，是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因素。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世界级城市群的本质特征和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探索实践及其面临的挑战，提出长三角要以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江苏作为长三角的重要一员，要以扬子江城市群建设为重点，主动融入世界级城市群总体框架，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世界级城市群：理论实质与国际经验

（一）城市群的崛起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城市群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将城市看作经济增长的引擎。^①经济集聚通过规模效应、技术外溢和不完全竞争引导经济活动在空间集中，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各类要素自发向资本回报率高的地区集聚。^②城市空间集聚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致使市场边界不断扩大，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使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不断下降。此外，城市空间集聚有利于促进劳动分工和知识溢出，产生正向外部性，促进创新并带动收益递增。^③城市群是制造业与服务业高度集聚的产物，可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利用，并进一步

[※] 沈坤荣，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首席专家，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赵倩，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推动区域形成合理的发展格局和健全的协调机制。高端的城市集群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加快生产要素集中、公共服务均衡化和环境保护。

世界级城市群大多分布在湾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深度开放，各种要素向湾区快速集聚，沿海港湾地区高速发展，形成了以世界级港口为基础、以产业集聚为动力、以广阔腹地支撑的湾区城市群。可以说，湾区城市群由滨海经济、港口经济、都市经济与网络经济高度融合而成，这种特有的经济格局是海岸贸易、都市商圈与湾区地理形态的聚合体。^④湾区城市群对于区域转型升级、资源高效配置、技术变革有强大的引领作用，一般包括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四个阶段。^⑤目前世界三大湾区分别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

（二）三大世界级城市群概况

东京湾区由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和埼玉县组成，主要大中型城市包括东京、横滨、川崎、船桥、千叶。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数据，东京湾区陆地面积1.2万平方公里，2014年人口超359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8.3%；GDP达1.4万亿美元，占全国的32.3%，人均GDP达3.8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达83.3%；拥有本田、日立、软银、索尼等38家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东京湾区沿岸有横滨港、东京港、千叶港等多个港口，拥有全球最密集的轨道交通网。东京湾区是日本最大的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创新中心，东京是众多银行总部所在地，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地带集中了钢铁、冶金、电子、机械、汽车等主要工业部门。此外，东京湾区拥有充满活力的产学研创新体系，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武藏工业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等知名研究型单位与大企业保持良好的校企合作，共同加快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纽约湾区由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组成，主要大中型城市包括纽约、纽瓦克。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纽约湾区陆地面积17.6万平方公里，2016年人口近323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0.0%；GDP达2.3万亿美元，占全国的12.5%，人均GDP达7.2万美元；是摩根大通、IBM、强生、辉瑞制药等26家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所在地；纽约湾区沿岸最著名的港口是纽约港。纽约湾区城市群的差异化特征明显，纽约是世界金融的中央枢纽和全球商业中心，汇聚世界一百多家大中型银行、保险公司的总部。康州是全美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也较为发达。新泽西州是全美的制药业中心，拥有二十多家制药和医疗技术公司总部或中心。同时，纽约湾区囊括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学府。

旧金山湾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主要大中型城市包括洛杉矶、旧金山、奥克兰、圣何塞，硅谷位于旧金山湾南端。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旧金山湾区陆地面积42.4万平方公里，2016年人口近393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2.1%；GDP达2.6万亿美元，占全国的14.0%，人均GDP达6.6万美元；是苹果、谷歌、英特尔、脸书等16家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所在地。旧金山湾区是美国的创新中心，拥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级研究型大学，也吸引

了众多高科技企业和风投资本。此外,旧金山湾区拥有优美的自然生态和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对于全球的高素质人才充满吸引力。

(三)世界级城市群的本质特征

比较三大世界级城市群可以发现,湾区城市群有效整合了创新资源与全球市场,成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成熟的湾区城市群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国际化视野与创新功能区兼备的核心城市。因临近海湾,湾区具备避风、防冻的优点,适宜建造港口群,形成发达的港口城市。港口城市处于对外开放前沿,便于招商引资、引进消化再吸收新技术,是高端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门户,率先成为湾区的核心城市。高度开放的环境、高端要素的集聚更容易孵化创新型企业,因此核心城市具有较好的创新基础,而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化以及完善的产学研创新体系,极大提高了核心城市的创新能力,并通过示范作用、外溢效应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此外,核心城市的转型升级改变了湾区的产业格局,湾区城市群内部形成了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产业分工关系,富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和充满活力的企业成为湾区城市群进一步发展的载体。

2.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体系。高效便捷的现代市场体系离不开发达的交通网络,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湾区城市群率先打造现代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完善的城际基础设施、发达的航运功能、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并逐渐向腹地延伸。网络化基础设施有利于降低货物运输成本,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不仅有利于湾区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的产业合作、共同发展,还有利于湾区城市群与广阔腹地的良性互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劳动、资本、人力资本、信息向湾区城市群集聚,共同支撑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体系,涌现出一批跨国企业与国际知名品牌。而湾区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也吸引高素质人才居住,知识外溢效应显著。

3.统一的区域治理机制。由于横跨多个平行的行政区域,湾区城市群需要统筹规划的范围包括:城际基础设施衔接、产业结构差异互补、公共服务均衡化、生态环境保护等。东京湾区除了统一的大东京规划之外,每个地区也各有规划,所有规划的协调衔接工作都由智库完成。纽约湾区的统筹规划由跨行政区域的纽约区域规划协会(简称RPA)完成,从20世纪20年代起,该非政府机构负责研究指导纽约湾区发展的长期计划,2014年RPA启动纽约大都市地区第四次发展规划,致力于从区域视野解决就业、贫穷、基础设施、气候等问题。旧金山湾区建立的区域治理机制涵盖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空气质量等方面,旨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探索实践与现实挑战

(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包括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陆地面积5.7万平方公里，2016年人口68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9%；GDP达1.3万亿美元，占全国的12.4%；人均GDP达2.0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达64.8%；是17家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所在地；拥有以香港港、广州港、深圳港为核心的世界级港口群。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正进一步完善，历时14年筹建的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亮灯，已具备通车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呈现多元化产业格局。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创新型城市，研发强度超过4%，自主创新能力较强；以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主，拥有腾讯、华为等世界级创新企业。广州是华南地区的高端制造业中心和贸易枢纽，汽车制造业、重大装备制造业增速较快。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物流、金融服务业发达。博彩旅游业是澳门的支柱型产业，近年来澳门致力于打造葡语系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如果香港的金融资本、深圳的创新和珠三角的制造业形成良性互动，将有利于实现三地的协同效应。随着支持政策逐步落实、基建网络不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比肩世界级城市群。

（二）长三角城市群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世界级城市群的崛起将进一步提升该地区的竞争力。从现有区域整合来看，城市群建设的核心是要素集聚。江苏是长三角的核心腹地，扬子江城市群（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扬州、泰州、南通沿江8市）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苏对接湾区经济、重塑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自2016年5月11日起实施。长三角城市群由26个城市组成，包括上海、江苏9市（扬子江城市群8市+盐城）、浙江8市（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台州）、安徽8市（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宣城），陆地面积21.1万平方公里，2016年人口151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0.9%；GDP达2.1万亿美元，占全国的20.0%，人均GDP达1.4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达53.3%；是15家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所在地；拥有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两大世界级港口以及南京、马鞍山等众多中小港口。以上海为核心、涵盖江苏、浙江、安徽沿海沿江区域的长三角城市群，由于有更为坚实的产业基础、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更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必然会在未来5~10年中成长为世界级城市群。

从城市定位来看，上海致力于打造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苏州、南京是全国先进制造业中心，苏南五市是“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南通成立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打造江苏沿海新兴的区域枢纽港；此外，扬子江城市群为上海提供广阔的经济腹地。杭州是“互联网+”双创中心、拥有全新的商业模式以及阿里巴巴

巴、网易等知名互联网企业；宁波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制造业基地，宁波一舟山港的货运吞吐量位列全国第一，宁波也是“中国制造2025”首个试点示范城市。合肥新晋“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新型显示面板生产基地，初步形成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此外，安徽率先践行“互联网+现代农业”理念，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涌现了三只松鼠等知名特色农产品电商企业。

(三)中国湾区城市群构想面临的挑战

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中国湾区城市群构想可能面临诸多困难。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有利于提高要素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影响产业布局和空间结构选择，应该得到优先发展。但是，在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下，跨界公共事务存在治理困境，跨界公共资源易陷入“公地悲剧”，公共服务均衡化难以推进。^⑥此外，行政边界的固化割裂了区域的经济联系，不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会加剧区域资源配置扭曲，增加协同发展的制度成本。在城市群发育过程中，行政边界还会影响城市用地空间的扩张，减少土地的有效供给。^⑦由地方政府干预形成的产业集群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城市缺乏明确的职能定位，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降低了经济集聚的绩效。^⑧地方保护及资源错配不仅损害本地区的环境福利绩效，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加剧邻近地区的环境福利绩效损失。^⑨而权威性区域协调

表 1 中国湾区城市群构想（基于 2016 年统计数据）

		面积 (km ²)	人口 (万)	GDP (亿美元)	人均 GDP (万美元)	第三产业占比 (%)	GDP 占全国比例 (%)	2017 年世界 500 强 (个)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56562	6800	13328	1.96	64.8	12.4	17
其中	广东 9 市	55425	5998	9780	1.63	56.1	9.1	11
	特别行政区	1137	802	3548	4.42	88.7	3.3	6
长三角城市群		210553	15102	21430	1.42	53.3	20.0	15
其中	江苏 9 市	65868	5701	9326	1.64	50.6	8.7	4
	浙江 8 市	66217	4169	5732	1.37	50.9	5.3	3
	安徽 8 市	72128	2812	2310	0.82	41.1	2.2	0
	上海	6340	2420	4062	1.68	69.8	3.8	8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财富中文网。

组织的缺失，导致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协调较为困难，规模效应不显著。

与粤港澳大湾区相比，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区域内部的差异化发展程度较低(见表1)。但是，由于“一国两制”的制度环境形成了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税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政治、法律、贸易制度差异以及由制度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产生的隔阂。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存在多个核心城市，内部的竞争可能会趋于长期化，不利于城市间有效合作机制的构建。相较而言，长三角城市群拥有兼容性的区域制度，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面临的制度阻碍相对较小。此外，长三角城市群的地理位置紧密相

连，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能源保障安全方面先行一步。

长三角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综合动因与基本思路

加快一体化进程的目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劳动力资源优势，通过低价供地及税收优惠政策，抓住全球要素分工合作的机遇，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开启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伴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模式开始从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而高质量发展的实现离不开创新驱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城市作为要素集聚的中心、创新孵化的中心，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载体。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单一城市规模快速扩张；而新阶段意味着空间优化布局和要素集聚的作用更加突出，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进程需要进一步推进。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来看，由于高铁、公路、轨道交通、通信等硬件基础设施和互联网等软件基础设施的发展，地方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最优规模不断扩大，这是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客观要求。此外，城市群的建设会缓解地方政府间的过度竞争，增强地方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环保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协调配合，最终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加快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第一，创新发展。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适宜创新的体制机制会加快技术进步步伐，因此，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内涵。坚持创新发展，才能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三角地区拥有丰富的科教、人才资源，大量科技成果诞生于科研院所，为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共建共享协同创新平台，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同时加强科技评估工作，严格监督政府创新补贴的使用。第二，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证，强调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可持续性。经过多年的发展，长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网络初步形成，但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仍存在较大困难，“以邻为壑”的现象仍然存在。为此，需要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努力实现地区教育均衡发展，完善跨省环境污染纠纷的协调机制。第三，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是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与经济发

展的有机结合，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生态环境的修复是苏北、皖西、浙西等欠发达地区重要的发展与富民手段，应通过开发生态产业促进当地生态环境的修复和美丽乡村的建设，形成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农民增收协同共进的良好局面，打造长三角地区重要生态经济走廊。第四，共享发展。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省级政府应加大对财力较为薄弱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县乡级政府提供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能力。第五，开放发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仅促进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有效拓展发展空间，还倒逼国内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具体而言，应当逐步落实上海、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举措，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江苏顺应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扬子江城市群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未来的发展，就是要积极顺应城市群的发展趋势，将湾区城市群发展理念融入“1+3”发展战略，及早规划，准确定位，在新一轮发展中谋取先机。

(一)以“1+3”功能区发展规划对接湾区经济

当前，江苏正在高起点规划“1+3”功能区发展，需要将湾区城市群发展理念融入扬子江城市群和沿海经济带的规划定位，以全球眼光对两大功能区进行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定位。要聚力创新，充分利用扬子江城市群制造业发展优势，依托上海这个全球创新中心，着力提升扬子江城市群二次开发和技术孵化能力，提升沿海经济带新兴技术的产业化能力，推动扬子江城市群产业升级和沿海经济带形成若干个产业集群块，建成具有世界水平的高端制造业基地。推动沿海经济带建立发达的交通枢纽，打造港口与铁路、公路连接的多式联运中心，强化航运服务集聚功能。要充分发挥江苏沿海空间广阔和扬子江城市群人口的规模优势，大力发展面向高端消费人群的金融、文创、旅游等先进服务业，实现高端制造业与先进服务业协同发展。

(二)以基建网络的扩张打破地理边界

湾区城市群的共同特点是对内联系紧密、对外高度开放，区域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这就需要建设包括交通、通讯以及公共服务在内的网络化基础设施，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第一，建立超越省级的规划中心，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水平，建立稳定高效的能源、水资源供应体系，实现区域内油、气、电、水同类型同网同价，打造一体化都市圈。第二，建立省级公共交通、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结算中心，推进区域内公共设施和服务互联共享，实现公共服务“一卡通”。第三，补齐江苏北沿江、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和长江过江通道建设的“短板”，在加快北沿江高铁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江北及沿海城市城际轨道交通，使泰州、扬州、南通、盐城等地与上海及苏南城市深度融合。

(三)以更加有效的合作新机制打破行政边界

建立健全更加有效的合作新机制是实现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前提。为了促进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市场，第一，要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区域协调机制，突破区域协同发展的行政边界制约，共建长三角市场规则体系，实现区域内部资源整合与区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第二，要设立跨扬子江城市群与沿海经济带两大省级功能区的协调机构，合理规划两大功能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力布局，推动功能区之间与功能区内部错位发展；第三，要建立常态化的区域内城市间交流合作协调机制，加强区域内部的合作，实现长三角地区的资源互补与功能融合，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四)建立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

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创新的主体。要把建立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作为江苏主动顺应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第一方略,不但使人才“引得来”,还要使人才“使上劲”,更要使人才“留得住”。一是根据功能区定位,以规划引人才,以产业引人才,以市场引人才,避免区域间人才引进的恶性竞争,实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的优化配置。二是加强各类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等创新创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公共财政对创新创业的扶持与补助力度,营造有利于创新的低成本创业环境,使人才“使上劲”,技术与知识“用得上”。三是加强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公租房、廉租房建设,降低新市民的居住成本。此外,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大力推广“不见面审批”,降低准入门槛,让各类人才真正“留得住”,成为江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要素。

注释

①BlackD. andHendersonV. , “ATheoryofUrbanGrowth”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2), pp. 252 ~ 284.

②KrugmanP. R. , GeographyandTrade, Cambridge:MITPress, 1991.

③AudretschD. B. andFeldmanM. P. , “R & DSpilloversandtheGeographyofInnovationandProduction” , AmericanEconomicReview, 1996, 86(3), pp. 630 ~ 640.

④张锐:《世界湾区经济的建设经验与启示》,《中国国情国力》2017年第5期。

⑤伍凤兰、陶一桃、申勇:《湾区经济演进的动力机制研究——国际案例与启示》,《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年第23期。

⑥赵聚军:《行政区划调整如何助推区域协同发展?——以京津冀地区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2期。

⑦王成龙、刘慧、张梦天:《行政边界对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研究》,《地理研究》2016年第1期。

⑧师博、沈坤荣:《政府干预、经济集聚与能源效率》,《管理世界》2013年第10期。

⑨宋马林、金培振:《地方保护、资源错配与环境福利绩效》,《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

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演化的新趋势和新问题

——《全球化视角下的需求约束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书评

刘志彪[※]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发展问题，是近二十多年来我的学术研究中一直感兴趣并努力去解释、分析和提出政策建议的话题。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通过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开放化、交互化和本土化，逐步与国际贸易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融合，不仅取得了比较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众多的学术新秀。孙军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作的《全球化视角下的需求约束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这本专著，正是我提倡的产业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之间基于研究范式“开放化、交互化和本土化”的尝试和努力。应他请求，我很乐意就这个问题谈谈认识，并对他的书进行一些评价。

众所周知，过去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主要的特征和方式。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利用开放的这样一种手段，在加快经济全球化方面采取了一些实质性的措施。2000年以来，随着加入WTO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中国的发展主要是抓住了20世纪末期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中出现的生产垂直分割的趋势，基于外需，在沿海地区采取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推动出口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带来了中国贸易的“爆炸式”增长，确立了自己“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不过，这种利用外需、淡化内需的发展模式也引致了我国产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

一是我国企业长期在全球价值链（GVC）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容易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高质量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我国相当多的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一些产能又有所扩大。目前，在全球经济进行结构调整、贸易摩擦加大的情况下，仅靠国外需求很难解决产能过剩和产品质量不高问题。

二是在GVC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容易陷入成本和价格的比较优势陷阱，忽视产业升级。中国现在面临着国内外要素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低价竞争优势正不断地让位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低价竞争态势下企业的生产率的提升，不能消化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从而容易导致产

[※]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3月第2期。

业竞争力衰减。

三是嵌入GVC的发展模式也导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样陷入发展困境。目前我国很多所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上并不能代表高技术、高收益，而仍然是以传统的技术、工艺和组织方式承接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加工组装环节，他们同样延承了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困难较大。

四是相关研究和现实表明，一国的环境问题与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方式以及所处的位置密不可分。因此，中国在嵌入全球价值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的同时，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不得不以资源和环境换取经济的增长，造成资源开采过度、环境污染恶化，成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和环境污染大国。

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审视国外市场的作用，重新认识内需和国内市场的价值。客观地说，像中国这样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大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实施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正逐步回归到“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处在了“三期叠加”期，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品成本不断上升、外部需求萎缩、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中等收入陷阱”隐现、发展动力机制急需转换等问题。面对国际、国内的诸多挑战，2016年，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实际上，供给侧和需求侧是一面镜子的正反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供给侧改革的顺利推进，离不开需求侧尤其是内需对其的拉动和支撑。长期来看，如果不把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不提高中国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本土的过剩生产能力既无法在出口导向中消化，也无法在扩大内需中消化。这就提出了要重视内需和国内市场、通过有效内需的启动助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命题。基于内需的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内需和国内市场能够形成国内价值链（NVC），NVC可以充分发挥国内外产业特别是国内循环的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改变全球价值链在国内链条太短的缺陷。这不仅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高产品质量，积累高端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而且也会使经营利润更可能多地留在本国，而不是汇出和外流。

其次，基于内需和国内市场就是要用足国外高级生产要素，而不是基于国外市场用足本国低端生产要素，这内在要求我们的政策不仅要关注引资和出口，更要关注进口和对外投资，不仅要关注项目的引进，更要关注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吸收。这其中最关键的 policy 目标是扬弃出口导向战略，搭建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和创新载体，并以此吸引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尤其

是各类高级人才。

再次，内需和国内市场的启动有助于我国企业运用“逆向发包”原理，利用他国的禀赋优势，就地吸收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和人才，增强企业全球竞争力，实现自身的不断升级。

“逆向发包”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国家的战略选择，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向发达国家进行“逆向发包”从而主动获取产业升级的先进技术，为中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做贡献。

孙军的专著《全球化视角下的需求约束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正是抓住了这一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具有自己独特视角和风格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本书的研究结合国外市场，立足国内市场，跟踪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趋势和新问题，深入分析了内外需转换大背景下我国产业演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驱动机制以及推动产业转型的政策建议。综观全书，我认为该书不仅分析视角比较新颖，而且在理论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提出了一个内含需求因素的产业演化的理论模型，分析了需求约束条件下一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演化状况，并且用数值模拟形式对其进行了刻画，得出了一系列与从供给角度出发所不同的结论。其发现从需求角度出发来研究经济增长和产业演化比从供给角度来对此进行分析更符合对现实的描述。另外，在开放条件下，政府的政策行为尤其是对本土需求空间的挖掘、利用及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的鼓励对于后发国家技术的赶超变得尤为重要。

第二，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并结合市场结构特征对产业组织政策的适用性进行了理论探讨。指出了不稳定状态下企业自身的研发水平不可能达到最优，即使在均衡状态下，也未必最优。进而，对具有不同组织特征的产业所实施的产业政策也不应完全一致。不过，为了激励企业研发，无论哪种产业组织政策，均不应对市场机制造成干扰和破坏。

第三，给出了需求约束下技术进步带来环境污染的数理模型并对其进行赋值，发现了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考虑更多的是自身利润状况，而不是进步本身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这导致了环境污染的持续增加，而末端治理模式使得发达国家企业或者将污染部分向后发国家转移或者进行技术创新，但新技术又会导致新的污染产生，而且愈发不可持续，后发国家对污染的治理更应该采取顶端治理模式，不断吸收世界上先进的产业升级和环境治理理念，加快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模式，加快绿色发展步伐。

第四，该书不仅在理论上对需求驱动产业演化提出了重要的理论逻辑，而且搜集了翔实的数据，并从不同侧面对这些理论命题加以证实。在逻辑结构方面，遵循从理论研究到经验分析到政策建议这样一个顺次递进的过程，而且这些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充分说明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对学术问题的分析和把握能力。

当然，由于新事物、新现象和新问题层出不穷，因此，该书也未能将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纳入其中，而这些对新常态下如何挖掘大国内需、更好地利用外需并将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相匹配进而驱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是行政式的产能压缩很难提升经济增长潜能，而且产能压缩会引发企业倒闭和坏账表面化等问题，同时也会引发行业愈发集中化进而形成垄断等现象。因此，如何将去产能和市场化机制相配合，在实现上述目标的同时引导资金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尤其是新兴行业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二是随着老百姓消费能力的不断增强，其对产品层次和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但国人大量购买外国货，甚至去医院体检这样的事情也越来越依赖于国外，那么如何疏导供给侧，并与需求侧相协调，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三是虽然我国目前不少行业仍存在着产能过剩，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有购买欲望但是买不起的人群非常之多，因此，如何通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精准扶贫等政策改善目前我国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局部过多的局面也是一个重要话题；四是互联网平台越做越大，网络效应日益突出。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那么，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对于需求聚焦的优势，发展共享经济，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也是下一步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五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正在形成，如何对接“一带一路”国外市场联动内需市场，重整需求侧，构建NVC，形成“以我为主”的GVC体系，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将是下一步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因此，虽然该书的研究有其创新性和鲜明的特点，但今后仍需在研究视角、理论、方法和数据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路径

刘志彪[※]

长三角一体化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在推进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长三角各地的决策层形成的共识，需要在执行层面设计出各方利益共享的机制，只有参与方都能尝到一体化的甜头，才是真正可执行、可持续的高质量一体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整体发展水平提高的办法，逐渐在我国经济发展政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宣布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多次到上海考察当地的发展经验，力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2003年，习近平同志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与上海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浙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议书》；随后与江苏签署了《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协议》。他要求浙江应该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市场的拓展、环境保护以及科技、信息、教育、人才等方面，全方位地主动对接上海。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到上海工作后明确指出，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仅仅靠上海不能完成，要整个长三角、长江流域来互为补充。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把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一体化的经验运用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上，提出了7个“着力”，要求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使京津冀三地朝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3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考察，要求上海市努力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又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明确了“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目标追求，“上海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的推进路径，“凝心聚力抓好落实”的关键保障，为新时代长三角合作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现在，长三角地区各地党委和政府都在认真研究和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千方百计争取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方面做出特色和贡献。长三角一体化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在互联互通、生态保护、产业创新、市场改革、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重要收获。

[※]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3月第2期。

二、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八大路径

在推进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长三角各地的决策层形成的共识，需要在执行层面设计出各方利益共享的机制，只有参与方都能尝到一体化的甜头，才是真正实现可执行、可持续的高质量一体化。长三角种种非一体化的表现，无论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互联互通的不通畅，抑或体制、机制问题形成的市场障碍，直接原因还在于“一亩三分地”的地方保护主义。不论是过去还是当前，地方政府出于短期利益的“各自为政”都是正常现象，关键是要通过制度设计形成各地竞相开放的动力机制，通过顶层设计找到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推进路径。

第一，需要充分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的基本区域合作格局。当前，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和协调各地制造业发展等方面。经济学揭示区域内部需要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对低的合理分布，在长三角区域内部，上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苏浙皖等地可以很好地控制制造成本，使长三角地区成为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综合较低的区域，可以很好地促进区域协调。因而，世界级城市和城市群的衡量标准应该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例如金融、航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占GDP和服务业的比重若分别达到50%和70%，这样就能很好地支撑区域的高质量发展。苏浙皖各扬所长的路径，就是进一步嵌入全球价值链，增加对价值链高端、高附加值环节的控制；过去是依靠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加工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主要是被动嵌入，附加值较低；当前，苏浙皖地区需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主动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体系。

第二，长三角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结合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长期以来，我国及长三角地区以向东开放为主，长三角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发展较快。当前，我国需要构建东西双向开放的新格局，尤其突出了向西开放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我国及长三角面向全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以我为主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上海等中心城市可能成为企业总部集聚地区，长三角地区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工业园区等，开始将传统制造加工职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转移。另一方面，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也要充分结合长江经济带建设，逐步将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转移，避免相关产业过度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实现真正的溢出效应。

第三，长三角高质量发展需要复制推广国家在长三角改革创新成果。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国家密集分布了大量的国家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的试点等，上海的试点机制最多，江苏也有沿海开发开放、苏南现代化与自主创新示范区、城乡统筹等，浙江更有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宁波“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等，这些各地的体制改革创新经验在长三角地区内部的复制和推广也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过程。本次规划应该思考并提出相应的举措和设想。

第四，长三角高质量发展需要推动重大改革举措的集成联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实质上是区域内部各地的高水平开放，一体化的核心含义是破除政府设置的行政壁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就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尤其是政府对各地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封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能在抽象层面上进行空谈，需要先就一些关键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业发展合作等）进行渐进式的改革，这样会快速推动区域内相关体制的整体创新。

第五，需要进一步明确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内容。浙江和江苏的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点，需要构建“一圈、两带、一廊”：“一圈”是环太湖地区，重点开展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解决太湖污染等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两带”一是指宁杭生态经济带，要探索生态保护和高科技园区协同发展的路径，二是运河文化经济带；“一廊”是指科技走廊，如何发挥上海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创新，政府可以探索设立高科技产业基金，重点投资有成长性的项目。浙江和安徽的一体化重点是解决新安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和旅游资源的协同开发问题等。江苏和安徽的一体化重点是制造业产能转移的问题，如何将江苏部分过剩产能向皖江地区转移，再有，就是如何打造以南京为中心的都市圈和商圈，这也会影响到合肥、蚌埠和徐州等地区，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

第六，需要探讨如何在有形的飞地上打造无形的互联网平台。长三角地区可以借鉴江阴靖江园区的先进经验，借助飞地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打造互联网平台，江苏制造业需要+互联网，浙江的互联网需要+制造业。

第七，长三角高质量发展需要鼓励以企业为主体开展并购投资发展，实现以企业为主体进行产业合作与协调。政府要大力鼓励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并购活动。并购是产生一体化的基础，并购可以通过企业主体来协调政府和其他市场主体无法协调的领域。建立和完善长三角区域内部的企业兼并机制，可以借鉴欧盟的竞争法。

第八，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也需要产业政策的支撑。国家产业政策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这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现阶段需要建立横向性、功能性和竞争性产业政策，建立竞争协调机制，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则。过多的地方纵向产业政策会破坏区域内部的一体化发展，这尤其需要各地政府在部分关键领域（如交通、环保、旅游等）率先探索签订一体化和统一的规则。

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 机制研究

洪银兴[※]

摘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涉及三个系统：一是进入市场的要素；二是在一定产权制度约束下的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三是市场秩序。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取决于这三个系统的有效性，这三个方面正是现阶段完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机制的内容，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财产权利的激励是更为重要的激励，产权的界定、配置和流转具有更强更有效的激励，完善产权制度的目标就是要解决产权的有效激励问题。现阶段完善产权制度内容主要涉及：严格保护产权，产权顺畅流转，完善产权结构，员工持股。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不只是指市场决定资源流到哪里去，还涉及市场决定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要素在部门、企业中怎么组合。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效率目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现阶段要素要实现市场化配置有如下要求：建设完备的要素市场，各种要素都要进入市场，要素价格市场化。

关键词：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产权；混合所有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这两个重点可以说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条件，目标是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完善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市场经济实现高效率运行的重要机制。但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尚未到位，理应成为现阶段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

一、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基石，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改革可以以市场化改革来概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认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确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就回归到了市场经济的本义。所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就是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为什么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根据价值规律作用分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有两大功能：一是市场选择功能，也就是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二是市场激励功能，即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市场上只承认

竞争的权威，不承认别的任何权威。优胜劣汰、奖惩分明，既是选择又是激励。市场机制的这两个功能是靠市场机制的运行实现的。

从总体上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涉及三个系统：一是进入市场的要素；二是在一定产权制度约束下的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三是市场秩序。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就取决于这三个系统的有效性。这三个方面正是现阶段完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机制的内容。

1.有效的产权制度

近期又掀起了是否需要消灭私有制的讨论。中国40年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这个理论框框：一是明确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只要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不会提出消灭私有制的任务。二是所有制理论的进展已经不再拘泥于公有还是私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明确了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公有制经济指的是国有资产，而不完全是公有制企业；另一方面明确了包含私有产权的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在此背景下，人们更为关注的不是企业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而是企业的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关注现代产权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

中外学术界一直存在公有制不能同市场经济结合的争论，其实质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疑问。从理论上讲，纯粹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同市场经济是难以有效结合的。而中国改革的创造就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尤其是推进多元产权的产权制度改革。在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相互融合、相互竞争的条件下，即使是公有产权也可以同市场经济结合。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它是市场秩序的基础，是保障市场主体活力的基础，也是保障市场预期的基础。有恒产者有恒心，只要产权得到有效保护，无论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就会有良好的预期，也会有长期的市场行为。具体说，有效的产权制度成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交易就是所有权的交易。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仅仅是指人对物的权利，还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任何商品（包括资产）只有在产权界定清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交易，市场价格机制也才能发挥作用，资源也才可能得到有效配置。

第二，产权被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市场配置资源不只是指资源流到哪里去，还涉及资本、劳动、技术、管理、土地等要素的组合。市场调节中决定为谁生产就是指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在社会总产品中凭借所有权获取收益。各种要素的收益取决于在各自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并决定各种要素投入的组合，由此实现市场所配置的资源最有效率的组合。

第三，产权决定经济行为者的责任。为什么市场主体能够服从市场调节，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产权利益与其市场行为相关。就象马克思所说， $W-G$ 是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一定是商品所有者。现实中经济行为收益同风险相匹配，最致命的风险是产权丧失，最重要的收益是财产增值。这意味着有效的产权制度要求明晰企业资产权的归属、控制、收益和风险。

第四，产权制度安排具有降低市场配置资源成本的功能。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是市场经济固有的制度性成本。现实中企业之间不仅需要为寻找市场支付成本，相互之间的竞争也需要支付成本。通过并购之类的产权制度安排，企业代替市场，就能降低交易成本，这也是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青木昌彦（2001）进一步指出：“交易作为一种自发秩序，很可能首先出现于拥有习俗性产权的人群当中。虽然旨在限制不诚实和欺诈行为的法律有助于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和拓展，但若没有产权和交易规范的同步演化，它本身是不可能创造或替代市场的。”这就是说，产权制度越是发展，市场交易成本也越低。

现实中，产权制度分为无效率的产权制度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基于上述市场经济与产权制度关系的分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建立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基于国家的职能，诺思（1994）指出：“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这意味着，建立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国家所要推进改革的重要方面。

2.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几乎是同义语。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前提和实现形式。如果要素没有市场化配置，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就是空话。市场机制运行的前提是消费者主权、机会均等、自由竞争、企业自主经营、资源自由流动。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市场有四大机制在起作用：一是等价交换机制，根据价值规律含义，就是指个别劳动化为社会必要劳动；二是信息机制的作用，也就是买者和卖者交流沟通，并且产生横向信息反馈，市场的信息作用关键是横向的信息反馈，我们过去讲计划经济也有信息，那是纵向，从上到下的；三是竞争机制的作用，优胜劣汰；四是风险和利益机制，竞争和风险相联系，经济行为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承担风险。由于这四大机制的作用，市场配置资源就最为有效，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需要让市场经济这四大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这四大机制有效作用的前提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何谓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其基本条件是什么？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相对于要素行政化配置而言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在讲到利润平均化的时候，就描绘了这种景象：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马克思还讲到实现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前提：一是社会内部已经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

断；二是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①从这点来看，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要素流动没有任何人为的障碍，打破市场垄断，没有法律限制，也没有行政限制，尤其是要打破要素配置的行政审批制度；二是要为要素自由流动提供顺畅的通道，包括各类要素市场，尤其是发达的金融通道。

3.有效的市场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目标是效率。是否有效的关键在市场秩序。要素只有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上配置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理论对市场秩序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的。最早的市场秩序理论是强调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秩序，竞争越充分越有效率。其后的理论发现，市场完全竞争并不存在。完全竞争只是教科书中的假设，不完全竞争市场则是现实。后来理论又进一步发现，不仅竞争是不完全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交易费用理论又说明，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现实中的市场不仅仅竞争不充分，也可能存在“血拼式”过度竞争。现在“血拼式”过度竞争比比皆是，互相之间竞相压价，采取各种各样零和的竞争手段，竞争都很残酷，竞争费用居高不下。根据上面的认识，新的市场秩序理论开始转向建立有秩序的竞争。只有竞争是有秩序的，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成本才是最低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我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的混乱现象更为严重，难以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这就是说，中国要实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首先要解决的是建立统一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也就是建立与有效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配套的市场竞争秩序，主要涉及以下内容：一是建立有效的保障契约得以实现的秩序。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交易双方“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后果。”^②二是打破各类垄断，包括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三是建立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涉及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等价交换、公平交易。与此相关的是建立诚信文化。四是改革市场监管体系，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二、以有效激励为目标完善产权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产权制度的目标是要解决产权的有效激励。市场经济理论经历了两个阶段，原来的市场经济理论基本上可以概括为选择理论，优胜劣汰、资源配置都是强调选择。在信息经济学产生以后，产生了新的理论范式，就是激励范式。这是针对信息不完全的市场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而言的。面对信息不完全的市场及相关的市场行为，就要在制度安排上建立相关的激励制度，这更多的体现在产权制度的安排上。

产权是具有排他性的财产权利，涉及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类的财产权。通常所说的产权制度，涉及产权界定、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等问题。根据英文单词，产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Ownership）指的是所有权。强调财产的归属，突出所有权。从所有权角度

研究产权就涉及到产权的保护、流转、转让、交易以及多元股权的混合等。产权的第二个含义（PropertyRights）指的是产权的内部结构，包含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在内，是一束权利组成的产权结构。在产权结构中，财产权利可以分割为所有权、经营权。如国有企业的产权分割为所有权和经营权，股份公司产权分割为出资者产权和法人财产权，农村土地制度中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根据产权的两个层面的含义，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在第一个层面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在第二个层面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

回顾中国产权理论研究的进展，是先明确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过去公有资产只能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经营，按照现代产权理论，公有资产可以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经营。后来进一步又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明确公有资产在股份制中可实现。这里面实际上有三个层次，要么是所有，要么是所在，要么是支配。公有资产在公有企业，那是所有的；公有资产到非公有制企业就是所在；公有资产在企业中占控股地位，就可以起支配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公有资产和非公有资产进入到同一个企业中，在同一个企业中共同发展。这样一来，改革的意义就非常明确，多元产权主体的混合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民营企业也可以参与国有企业改制。但在此背景下所形成的产权制度都要体现界定清晰、权责明确、处置有效、规范科学的要求。

在已有的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产权制度是要突出产权的有效激励功能。对经济行为者所谓的激励，通常讲的是收入的激励。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财产权利的激励是更为重要的激励。产权激励是市场经济最强大的动力源，产权的界定、配置和流转具有更强更有效的激励。产权激励制度把人们经济活动的努力和财产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把经济活动的风险和财产收益联系在一起，这是稳定持久的激励。中国改革的成功得益于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激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哪一项改革不是财产权利的激励？其产生的明显效果人所共知。

观察现阶段三大活力经济，即私人经济、外资经济、上市公司经济，可以发现，这三大经济中都包含私人产权。含有私人产权的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就在于包含私人产权的经济有自身利益的关心，因而是最有竞争力的。长期以来公有制效益上不去，根本原因是公有产权没有自身利益的关心。基于这种考虑，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不是放弃公有产权，而是引入私有产权。资本进入企业是合在一起运行的，私人要关心自身的产权利益就得关心包含公有产权在内的整体资本运行。这正是产权的有效激励。针对中国产权制度现状，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产权的有效激励目标，完善产权制度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1. 严格保护产权

保护产权是完善产权制度的重要环节。保护产权要以公平为核心，全面保护，依法保护。

目前完善保护产权制度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公有财产和非公有财产“两个不可侵犯”的要求。现实中对此的要求：首先，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特别要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现实中的突出问题是在产权交易和改制时公有资产往往被低估。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特别是保护民营企业财产权和财产收益。现实中的突出问题是侵犯民营企业财产问题时有发生。应该说界定和保护产权是国家职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背景下的国家不能只是国有资产的代表，也应成为非国有资产的代表（代表不等于所有）。国家不只是保护国有资产，还要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及其合法利益。国家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当然也有必要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2）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是产权制度建设的短板。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向创新驱动，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创新的动力，也是从知识产权大国迈向知识产权强国的标志。知识创新及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技术的推广都需要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就需要完善有利于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包括有效保护职务发明人的产权权益。没有这种保护就不会有创新的动力。新知识新技术需要推广，创新成果对创新者来说还要实现创新价值的最大化。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包括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转让、质押、投融资等制度的完善。

（3）构建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这是中国目前产权制度所缺失的。根据“公地悲剧理论”，共有产权条件下，可能使人们不付报酬过度使用公地，导致公共资源的枯竭。针对公地的悲剧，明确产权可以使共有资源得到爱护和节约使用。中国现阶段根据生态文明和保护环境的需要，迫切需要明确全部国土空间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构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有偿使用制度，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者权益，公平分享自然资源资产收益，从而使各类自然资源得到所有权的保护。

保护产权不仅需要国家法律之类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需要有道德和伦理习俗等方面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辅之，形成保护各类产权的价值观。这就是诺斯（1994）所说的：“如果每个人都相信私人家庭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在室内无人而门不闭户的情况下不用担心房屋被毁或被盗。”

2. 产权顺畅流转

产权流转顺畅是完善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在产权流转中实现企业产权结构重组、存量结构调整，不仅可以优化资产质量，还能激励资产运行效率的提高。对产权流转，制度经济学家都有明确的指示。青木昌彦（2001）认为，产权的初始界定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产权的交易和重新调整，“如果所有权可转让给出价最高的人，那么社会福利将趋于最大化。” Coase

（1937）认为：如果产权最初被错误地分配了，那么交易就会发生，并持续到产权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拥有为止。在现阶段体现产权激励的产权流转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资本在产权流转中提高效率，尤其是国有资本。投入企业的资本不应是静态的，可以在顺畅的流转中实现保值增值。长期以来，为什么国有企业长期亏损？国有企业资产效益不高？原因就是国有资产一旦进了企业以后，就死在那里了，就不动了，企业再亏损也不能流出，最后国有资产也就被毁掉了。这种国有资产不能流转的产权制度实际上造成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产权流转就要求国有资本在流转中保证国有资本的优质高效。与此相应，需要建立资本退出机制，促使企业承担产权责任。其路径包括：建立企业破产制度，企业出售，被兼并等。

（2）企业在资产重组中做强做优做大。对国有经济来说，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要求的，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对民营企业来说，其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单一所有者的资本达不到规模经济；二是单一所有者的企业建立不起现代企业制度。在单一所有者的私营企业中存在的家企不分问题，同政企不分一样，都会严重影响效率。私营企业通过吸收包括公有资本在内的其他法人资本进入，参与改造国有企业，收购、兼并公有产权，甚至达到控股，可以说是最为有效并快捷的做大做强的路径。在这里，谁兼并谁？谁重组谁？取决于谁的效率高。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谁的效率高，谁就是兼并重组的主体。由此使资产向高效率企业集中。就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置“僵尸”企业一样，更多地需要通过并购的办法来处置，这样既可以降低处置成本，更能使束缚在其中的资产由死变活。

（3）在产权流转中完善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一方面，国有资本通过吸收非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做优。最典型的案例是近期联通的混改。阿里巴巴、腾讯等进入国企联通公司，不仅一下子做大联通的资本规模，更重要的是有能力开发5G之类的高新技术，一举进入该产业领域的前沿，国有企业也因民营资本的进入增强了活力。另一方面，民营资本也可通过吸收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做优。其路径包括控股国有企业、进入国有资本主导的垄断行业。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各类资本都有所有、所在和支配产权的选择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其目标是使混合所有制经济产生更高的效率。

产权流转并非一定有激励作用。产权流转要有激励作用，就有有效和安全两方面要求：产权流转一般在入股和产权交易中进行，这就有资产价值的准确估价问题。产权进入公开市场交易比私下交易对产权价值的评价更为客观公正。尤其是公有产权与私人产权交易时公有产权往往被低估，原因是公有产权没有得到自身财产利益的关心。这表明产权在规范的资本市场流转最为有效。这就提出建设多层次的完善的资本市场的要求。一方面，资本市场需要给投资者提供多元投资场所和多种投资工具，尤其是产权顺畅流转的机制和工具，既涉及证券市场，

又涉及产权交易市场；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机制，给进入交易的产权客观的市场评价（如竞价机制）。产权流转的安全性指的是入股和交易的产权必须是安全的。就如诺思（1994）所说：“私人所有者之间通过市场契约转让的产权必须是排他性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必须是可度量的，而且必须是能行使的。”如果入股或购买的企业债务缠身，股价再便宜，也会因承接过高的债务而难以行使所获取产权。中国的一些企业海外并购，只关注购买的股价而不关注所购买企业的债务和员工权益，结果导致血本无归。

3. 完善产权结构

产权内包含了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其中的权益是可以分离的。现阶段完善产权制度的重要方面是进一步完善产权内部权益相分离的结构。

（1）完善法人财产权。无论是公有制企业改制为股份制，还是混合所有制采取股份制形式，都存在出资者产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公司制的核心问题就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关键是完善法人财产权。公司法人财产权是指法律赋予公司法人对自己的法定财产所应享有并行使的一切法定权利，其中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以及财产收益的分配权等。就其与出资者关系来说，出资者注入公司的资本与其他出资者注入资本融为一体，由公司法人支配，出资者既不能收回，也无权干预公司法人对自己的法定财产行使各项法定权力。这样，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公司法人有足够的能力享有一切有关的民事权利，承担一切有关的民事责任，并尽一切有关的民事义务。有了这种权利，不论股权结构发生什么样变化，企业的存续都有了确实保证。在现阶段进一步完善法人财产权，一方面要全面落实法人财产权利，防止股东的不当干预；另一方面要明确法人向出资者负责的责任，防止内部人控制，侵害股东权益。

（2）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当年农村改革成功就在于从土地集体所有中分离出承包经营权，产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明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改革。其中，延长承包期，给农民定心丸，激励其对土地的长期投资。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土地经营权，并允许其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推动了土地集中，激励产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将集中的土地进行规模经营和采用适宜达到一定土地规模的创新技术，发展现代农业。

4. 员工持股

员工持股实质是员工分享剩余。过去讲农村改革成功在耕者有其田，城市改革成功就在工者有其产。企业中员工持股获取财产性收入，不仅是实实在在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对企业资产有了自身财产利益的关心。其对自身财产利益的关心必然体现在对企业整体资产的关心上。

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员工持股的产权激励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激励，即

分享剩余。尤其是在创新型经济中，对创业团队的激励、对科技人员的激励一般都要采取员工持股的方式。员工持股的产权除了以传统的方式即以现金或实物资本的投入数量来确定其所持有的股权外，还可以通过对企业经营层和员工的人力资本定价来确定。激励手段主要有股票赠与、股票购买计划、期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与员工持股相配套的是公司上市。美国硅谷的成功就在于，科技企业一旦上市，科技企业家和科技人员持有股权的价值也就随着公司价值的提升而提升，因而对科技创新和创业有巨大的激励作用。

三、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为目标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

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是服从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所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涉及到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市场决定资源流到哪里去；二是市场决定各种要素（资源）的组合。就是说，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这些要素在部门、企业中怎么组合？这也是一个要素的配置问题。这两个方面的资源配置都有效率要求。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效率目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涉及多方面作用，如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人力资本投资等。所有这些因素起作用的前提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针对中国现状，根据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有效性的目标，要素要实现市场化配置有如下要求。

1.建设完备的要素市场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首先要求存在完备的生产要素市场，从而使各种生产要素同等地进入市场。中国改革以来，虽然大部分要素市场已经形成并开放，但毕竟是从非市场的计划经济转化来的，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还存在以下三个短板，因而需要补市场建设的短板。

（1）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资金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主渠道。包括银行和各个层次的资本市场的金融体系越发达，越有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制的特征是重银行轻市场。由此产生的供给侧问题是银行贷款的数量太大，企业杠杆率太高，利息负担太重，因此，供给侧改革要去杠杆。但是去杠杆绝不意味着企业不要融通资金，而是由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鼓励股权融资。由此遇到资本市场供给不足的瓶颈。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就是要给投资者、给企业提供多元的投资场所、多种投资工具。而这个多层次资本市场，涵盖了各种证券，包括债券、股票、基金、期权，以及不采取证券形式的产权交易市场。这个市场不但要建，还要规范好。

（2）规范土地市场。中国进入市场交易的是土地使用权，土地市场是包含了土地的出让、转让、租赁等交易内容的市场。土地市场包括两级：一级市场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划拨，二级市场是土地流通。土地市场建设的重点在规范。首先是一级市场上的规划和政策规范，严格转让使用权土地的用途，尤其是要明确建设用地和房地产用地、公益性地产还是商业性地产。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市也要有明确的规范。在此前提下，一级市场既然是市场就要引入公平竞争的机制。其次是在二级市场上不仅要充分竞争，也需要建立防止过度投机的监管机制。

(3) 发展技术市场。中国正在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突出解决科技创新成果(新技术)如何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问题。技术转移的重要路径是技术交易市场。现实中新技术供求信息不对称问题最为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企业需要的技术不知从哪里取得,大学科研机构创新的技术不知用到哪里去;二是新技术供给者为防止被仿冒而不愿公开新技术的完全信息,而新技术的需求者则因得不到完全信息而不愿购买和采用新技术。两者的脱节是技术要素的最大浪费。因此,新技术转移中两个信息不对称问题就成为发展技术交易市场的要求:一是技术市场本身的建设,尤其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克服新技术供求信息的不对称;二是促使活跃的科技中介成为技术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强化技术市场上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作,技术市场既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防止各种侵权行为的发生,又要推动知识产权的运作,在许可转让中实现知识产权价值最大化。

2. 各种要素都要进入市场

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必须要解决的是各种要素都进入市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府对生产要素放得越彻底,要素的流动也就越自由。就目前来说,各种要素进入市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各种要素都进入市场需要打破体制性障碍。

(1) 各个要素市场充分开放。这实际上是要解决要素顺畅进入市场的通道问题。现在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有两个:一是劳动力市场开放问题,主要是指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问题。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地缘行业的分割和身份性别的歧视,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不仅仅是要让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后还要解决城市劳动力进入农村的问题。这个通道解决好了,城乡发展就深度融合了。二是大数据的市场分享问题,这是新问题。在信息社会,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大数据成为通常讲的除资本、劳动、技术、管理、土地以外的新的发展要素,甚至要比石油资源还重要。现在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大型的电商企业掌握足够大的大数据,依靠大数据垄断市场。正因为大数据已经成为现代的经济资源,就需要解决怎么进一步发挥大数据推动发展的作用,推动大数据市场的充分开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学习,专门研究大数据问题,要求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

(2) 资本进出的自由选择。这是要素自由流动的微观基础。要素怎么进入市场、怎么自由流动,是在资本的自由选择中实现的。资本自由选择有两个条件:一是需要营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建立公平统一、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机制。政府审批和准入的制度安排阻碍资本的自主选择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国家通过负面清单的准入制度安排为资本的自由选择提供了制度性保证。二是需要有效的资本退出机制。这里有两个方面特别重要:一方面是强化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解放束缚在低效率企业中的各种要素,使其退出后进入市场。如果没有退出,进入市场的要素一定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是灵活的资本市场退出机制。这对支持创新创业的风险投资特别重要,风险投资在资本市场及时退出,可以使风险投资源源不断。

3.要素价格市场化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其配置是否有效，关键看是由谁来定价？由国家定价还是由市场定价？如果市场配置资源，要素价格就必须由市场来定。马克思讲到：“竞争，同供求比例的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的总量归结到这个标准上来。”这个标准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是要素市场价格的调节供求平衡并实现要素有效配置的功能。针对中国要素价格决定的现状，要素价格市场化需要突出解决以下三大问题。

（1）物质性生产要素价格形成的市场化。现在竞争性领域价格基本已经放开，由市场定价。但是，涉及水、电、气、电信这样一些垄断性领域中的物质性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对资源性产品和垄断行业试图通过国家定价办法来进行规制，目的是消除其垄断性超额利润，但政府规制的效果并不理想。现实中往往是政府限价的垄断企业，要么产品供不应求，要么服务质量低劣。针对政府规制和部门的垄断造成的低效率问题，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地在自然垄断行业中掀起了“管制改革”的浪潮。在科技进步和企业组织创新成果的推动下，某些受规制产业不再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这使对相关行业的规制手段失去了现实必要性。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也改变了自然垄断的范围。随着产业的发展和产业需求的扩大，企业内部的垂直一体化分工中有相当部分环节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例如，电力生产中的发电环节、电力设备生产环节就具有明显的竞争性。针对某些产业环节适合于竞争而其他环节适合于垄断经营的混合产业结构，规制改革的措施是，将竞争性业务从垄断性业务中分离出来，例如，电力行业规制改革，只是保留网络部分的垄断和国家定价，而把发电、电力设备生产、供电服务等环节作为竞争性环节交给市场定价。这样，政府定价范围就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同时赋予被规制企业以更多的确定商品价格或服务收费的自由度，使被规制企业更加趋于按商业原则经营。各种激励性规制方式使企业受到利润刺激或竞争的刺激，对于促进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2）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价格形成的市场化。这就是各种要素的价格在市场上形成。例如，利率市场化就是在货币资本市场形成利息率。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市场形成的各个生产要素的价格比例。这种要素价格比例不只是受供求调节，还对供求双方都起调节作用。要素供给方根据要素价格比例调整要素供给，要素需求方则是根据要素价格比例安排所需要素的有效组合，即用多少资本、用多少劳动、用多少土地？都看要素的市场供求及由此决定的要素价格比例。因为这些要素有的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有的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时候就有一个最有效率的要素组合问题。企业依据由市场决定的生产要素价格比例，对投入要素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以最低的成本使用生产要素。这是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重要体现。

（3）健全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报酬由各个要素市场供求状况决定的机制。企业和要素所有者能否对要素价格作出反应，就要看要素报酬多大程度上反映要素市场的

供求状况。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的实质就是各种要素的报酬。要素报酬实际上有三个含义：一是按照要素的投入来决定报酬；二是按要素的贡献来决定报酬；三是按照要素的市场供求来决定报酬。要素报酬应该是这三方面的综合。这里仅说明要素的市场供求状况对报酬的决定作用。各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实际上是要素使用者分别给要素所有者支付报酬，各种要素的供求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要素价格必然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在这里要素报酬的客观依据就是市场对各种要素的供求关系所形成的市场评价，也就是通常说的物以稀为贵。以此为准基点再考虑各种要素在企业中的投入和贡献就形成分配比例。从而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收入结构。这种收入分配结构是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落实。其效果不仅是促进企业根据要素报酬比例形成有效的要素组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还能充分动员稀缺要素的供给。现阶段不仅仅劳动力是私有的，其他生产要素有相当部分也是私有的，如物质资本、技术、管理等。这些要素相比劳动要素都是稀缺的。依据要素市场供求状况安排的分配机制，不仅能把稀缺的要素充分动员起来，还能促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稀缺资源的供给。

以上指出了要素市场化配置所涉及的主要方面。需要强调的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要能达到整体的效率目标，关键在市场整体有效。市场整体有效的关键在市场秩序和规范。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市场发育程度低，因此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的混乱现象更为严重，难以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因此需要推进以市场整体有效为目标的市场秩序和规范建设。建立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基于信息不完全建立克服机会主义行为的体制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等，所有这些都是当前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

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地方政府竞争问题的新解析

刘志彪[※]

摘要：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机制，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行动。在新一轮扩大地方政府自主权的背景下，矫正过去的地方政府竞争制度、重塑中国经济新动力，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选择。过去地方政府竞争是以GDP和财政收入增长为中心，现在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要通过对统计体系、标准体系、绩效评价、政策体系等方面的创新，以新发展理念修正地方政府竞争的目标函数及其构成。重构高效的纵向治理体系和横向治理体系，是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任务。

关键词：地方政府竞争；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增长与发展

中国经济奇迹是改革开放40年来遵循市场取向型改革原则的重大胜利。市场取向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在计划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除了中央政府在纵向方面向地方政府分权外，还不断在横向方面塑造有力量的竞争主体，这样就培育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强大动力。过去20年来，描述这种现象并从转轨中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来解释中国经济取得超高速增长的原因，一直是中外经济学人试图努力探索的目标^[1]。研究者一般认为，一方面，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语境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独特现象，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强大增长引擎；另一方面，它也是引发中国经济结构运行中发生重大失衡问题的重要原因，如房地产泡沫、市场非一体化、债务风险、发展粗放等问题，可能都与地方政府过度介入市场运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鉴于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在过去发展中的一些副作用，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必须逐步扬弃“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竞争模式，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这种三维纵向治理结构模式改造成为标准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即“中央政府—市场”这种二维纵向的治理结构模式。这一观点的核心是要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逐步“去地方政府化”，让其减少经济权力和责任，专司区域性公共事务和对市场的监督与仲裁活动。其主要依据是：地方政府作为三维纵向治理结构模式的中间层，目前其功能几乎等同于在市场中追求经济利益的主体，地方政府领导则犹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其“政绩”主要表现为公司领导的升迁，从而实现行政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这就忽略了政府本来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2]；以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是财政收入为最高动力的地方政府逐利化或公司化，在社会治理方面无章无法，

更多带来的是灾难^[3]。

与这些观点不同，笔者认为，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现代化强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目标，需要给中国经济持续不断地塑造新发展动力。未来，我们可以在新型发展理念指导下，继续保持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的内在固有优势，通过改革和完善这个中国特有的竞争体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强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防止其可能出现的一些副作用。本文对地方政府竞争变化的背景分析也表明，在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尤其是近年来地方经济实践中，我国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不仅没有退出运行或被虚置，而是以一种崭新的形式，正在启动一场席卷全国的竞争浪潮。从为高速度而竞争转向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是体制机制转轨的最重要表现之一，它必将对我国区域未来发展格局和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的作用。

本文将对新一轮地方政府竞争的背景、动因、特点、效应等问题展开初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展望它的发展演化及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一、为增长而竞争转向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背景和动力

众所周知，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中央命令型计划经济体制在放权让利的改革中，一方面把很多经济决策权下放到地方政府、部门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没有实质性地全部下放给一般企业和居民个人；另一方面，又设计了地方政府间就经济业绩进行分散化竞争的规则和制度框架，以GDP、财政收入等考核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决定官员晋升或是否留任的基本依据，把这些指标的完成与当地官员的晋升、收入、福利紧密联系起来。在这种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双重“刺激—反应”机制的作用下，地方政府官员便具有了类似于企业的行为动机和一部分不完整的公司功能，而其官员便具有了作为“企业家”的决策权力和动机^[4]。

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来说，地方政府官员“企业家化”，一方面，克服了计划体制中发展动力来源于单一的中央政府推动的局限性，“一条腿走路”变成了“两条腿走路”，地方政府官员更具信息优势和决策效率；另一方面，给地方政府放权让利，让其具有强大的竞争压力，也会在塑造新的“准市场主体”的同时，培育出真正的具有强大竞争动力的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具有天然的适应市场竞争的特点^[5]。实践也证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半壁江山。

党的十八大之后，过去一直延续的地方政府就GDP、财政收入等增长而竞争的制度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显然，至此过去单一的为增长而竞争的机制，便成为为增长和均衡发展而竞争的机制。

2012年底以来，中央指向的竞争规则改变，极大地影响了地方政府官员参与地区竞争和干预市场活动的预期、动力结构和行为方式，叠加这个期间国家掀起的严厉的反腐败斗争，地方政府官员选择“不作为”，成为经济社会运行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追逐经济增长的竞争热情随之趋降。这是经济增长率不断降低的一个直接原因。随着中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的增加，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了几个大平台，“L型增长”轨迹和格局既定。一时，中国经济增长还需不需要地方政府竞争机制来推动的问题，成为各方面所关注的焦点。

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速度经济阶段已经转向了高质量经济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这个阶段国家经济建设的总纲领。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显然竞争规则的彻底改变已经是工作议程，为增长而竞争的机制将彻底转化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机制。

2018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修宪建议，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实施。这意味着什么？很明显，这等于说是要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相当于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进一步放权、扩权。目的也是很明显，就是要在改善新的考评政绩机制的同时，通过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为全国掀起新一轮的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体制奠定法治的坚实基础。

因此可以总结，党的十八大之后，尤其是2017年以来，地区间竞争的浪潮迭起，与3个因素或者动力有直接的关系：一是我国经济增长减速的现实背景，国家需要重塑发展的新动能；二是从高速度经济阶段向高质量经济阶段转型，需要竞争规则的彻底改变；三是中央政府层面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推动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扩大。

从实践上看，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形式一直在变化，内容丰富多彩。如2000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已举办7届，至2010年有1500多个省、市、县、乡镇等各级地方政府申报奖项，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至2013年，这一内容主要是侧重社会管理的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申报项目超过1800余项，入围项目达到139项^[6]。当前，地方政府就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一轮的竞争态势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迅速展开。如2018年新年春节刚过，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就召开全省大会对比广东、浙江、江苏，主动揭示山东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为山东获国家新批准的旧动能转换综合试点作战前动员；济南提出了向郑州、合肥、杭州学习；西安市围绕“大西安”大在在哪里的问题，思考大西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正式提出要将西安建成国家中心城市；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一连发出六问：杭州离一流城市还有多远？武汉等城市提出冲击国家级中心城市的目标；南京2017年提出要对标杭州等城市比学赶超，等等。其中，南京市委市政府用对标方式学习其他先进城市的方式，让我

们最为典型地看到了新一轮风起云涌的地方政府竞争态势^[7]：

创新对标要争一流城市，对标城市是深圳；产业对标要攀高端，对标城市是广州、苏州；营商环境对标要做最优，对标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建对标要提品质，对标城市是杭州、上海；民生对标要优化供给，对标城市是上海；开放对标要国际化，对标城市是广州；改革对标要抓突破，对标城市是上海、深圳；生态对标要补短板，对标城市是杭州。

显而易见，这种地方政府就高质量发展竞争的机制和模式，跟以前一样，具有强烈的模仿学习的特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和背景下，这种标杆式学习，会加速缩小地区间、城市间的发展差距以及发展趋向的同质性，意味着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地方政府介入经济的动力也会更强烈。

二、新时代需要建立和完善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制度安排

美国学者Oi在研究当代中国乡镇政府的政治经济问题时首次提出了“地方性国家统合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这个概念，用于解释在中国地方政权、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之间所形成的统合关系^[8]。“地方政府公司化”概念可能是对上述重要概念的本土化延伸，可以比较准确地描述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以及可能的发展效应。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我们很容易发现，过去的“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虽然有一些重要的优点和特性，但是也确实存有许多弊端。十八大和十九大提出的修正考核评价体系 and 机制，就是为了在继续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扩大地方自主权的条件下，纠偏地方政府的发展偏好与中央意欲的全社会目标之间的差距，给地方政府竞争的目标函数输入新的发展理念，以矫正其竞争行为。

值得思考的是，进入新时代，我们为什么不把高质量发展的任务全部交给市场和企业，而仍然需要通过政府改革，去建立和完善一种新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和制度的安排？

第一，为了实现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仍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速度需要持续的、强大的增长引擎的取得，不仅仅是通过纯粹的市场调节和企业交易行为就可以达到的。GDP增速仍将是中國一些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的逻辑基石，是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量化指标。2035年要实现基本现代化，按现在的币值，人均GDP要达到2万多美元。这意味着从2020年开始接下来的15年中，或者在2016年8260美元的基础上，经济增长得保持5%左右的速度，才能保证届时按战略规划要求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全球只有日本一个国家持续保持了30年的中高速增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高速成长了40年，但如果把5%左右的增长速度持续到2035年，那么就意味着中国要保持近60年的中高速增长。这是全球以市场规则调节的经济增长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根据中国过去的经验，这必须通过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来达到，以保持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第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效缓解这一矛盾也需要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不平衡是供给的结构有问题，不充分是供给的程度有问题，它们都是供求结构的失衡。导致这种失衡的内在原因究竟是什么？是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的突出矛盾和问题^[9]。显然，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方法，需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即要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实践中，我们可以按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要求，通过鼓励地方政府采取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方式，来引导企业实现这些任务。如对供给数量不充分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鼓励地方政府进行产量竞争；而对于供给质量不充分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把质量参数输入到地方政府的竞争目标或者考核标准中，使其引导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间接地实现。

第三，过去，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安排所留下的一些重要和隐患的问题，不可能全部丢给市场和企业去解决，而必须继续由政府去消化和承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同时实施精准的地方性产业政策进行结构调节。如现在绝大多数的落后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都是过去在地区竞争中依靠政府投资和靠高杠杆维持的。对现在列入国家竞争政策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尤其是僵尸企业，“解铃还须系铃人”，还是需要政府出手，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这些事务的解决，完全靠市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信的。其实，以企业 and 市场为基础进行结构的自调节，与提倡地方政府高质量竞争、发挥地方性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之间，并不是矛盾和冲突的。产业政策是利益诱导性的，而不是由地方政府去确定具体项目或选择把资源投向哪一家企业，具体的投资机会还是要由企业家来摸索和把握。因此实现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通过改变对地方政府的竞争规则和激励机制来实现，完全可以通过用新发展理念升级功能性地方产业政策来实现。如果竞争规则和产业政策能够更多地强调生态环境、创新发展、人民幸福生活等等竞争标准，则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提高发展质量就不是空中楼阁。在中国的政治结构和制度约束下，完全可以在你追我赶的竞赛中，看谁能够更多、更好地为市场活动提供更多的“外部经济性”，从而间接助推发展质量的加速提升。

第四，以鼓励地方政府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方法，来实现新时期国家经济建设总纲领的目的，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新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如可能要比过去更多地强调通过做强国有资本的方式来实现，从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局部效率；再如，有可能要授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社会经济职能，如补短板就需要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投资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抑制社会经济组织的自我发育和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场主体的某些功能，等等。应该看到，这是发展中大国经济处于转型阶段时所必须付出的一些社会成本。此外，我们还不能忘记，中国具有悠久的政府控制文化传统，其现实基础十分

深厚。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减少行政干预离不开政府自我革命，离不开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比如在消灭无效企业、安排职工离岗转岗等事务的过程中，不靠行政命令、单靠市场机制也是绝对不行的。当然，不管用哪种手段，最终都是为了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未来现代化经济体制建设，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握好的关键点。

三、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体制可能具有的特点

重塑新一轮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地方政府制度和总体态势，是全面深化改革内容的一项极其重要的选择。总体来看，过去是为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而竞争；现在要以人民为中心，为缓解新时期主要社会经济矛盾而竞争，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这一轮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标准，也是我们推崇和鼓励新一轮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理由。具体来看，新一轮地方政府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制度安排，可能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从经济发展阶段上看，过去的为增长而竞争的机制，是以短缺经济的总态势为基本背景，因此地方政府竞争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推进物质财富的超高速增长，以满足短缺经济中民众需求的巨大缺口；现在的竞争基准的提出，是以过剩经济为基本前提和趋势，因此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制度安排，会更加重视实体经济中的产能过剩、新增债务等问题，会更加重视虚拟经济中出现的资产短缺、资产泡沫问题，会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等状况，而不仅仅是GDP增长和财政收入。

第二，从实现目的的手段看，过去的竞争基准决定了实现目的手段比较简单，只要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增加储蓄、加大投资规模、扩大生产能力，即可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物质产品；而在现在的竞争基准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高质量化、口味多元化、需求服务化，为此必须按照市场需求进行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利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供给质量和投资效率，这就需要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竞争模式，创新因素在新的竞争评价中将会占据重要的权重^[10]。

第三，从化解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看，过去的竞争基准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要求突出重点和非均衡发展，为了争取更快的速度，往往要求把有限的资源重点倾斜发展某些产业、某些地区，以期通过重点发展来带动一般、通过局部带动整体，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等等。而现在的竞争基准则要求协调均衡增长，不仅是总量均衡，而且是结构均衡；不仅是产业结构发展均衡，如一二三次产业之间、三大产业内部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且是空间发展结构上动态发展均衡；不仅实体经济内部要均衡，而且要实现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房地产业之间的均衡；不仅要快，而且要好，要高质量发展；不仅讲效率，还要讲平等，等等。

第四，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看，过去的竞争基准是在贫困走向小康的道路上实施的，物资的匮乏使人顾不上对环境的保护和利用，绿水青山、绿色发展是放在次要位置的，增

长往往以资源高额消耗、环境严重破坏为代价。在高涨的环保压力下，竞争基准要求发展始终贯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五，从发展的手段和成果分配看，过去的竞争基准体现的是一部人参与、少部分人有获得感的发展理念。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逻辑地带动绝大部分人富裕；GDP上去了，干部得到了晋升，但是GDP中工资福利的含量并不高，大部分民众并没有真正的获得感。现在的竞争基准体现的是共享发展的理念，关注的是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舒适度，更能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建设的热情。让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最终实现人人享有。如实践中以共用、互换、租借代替占有的共享经济模式，涉及诸如工具、设备、汽车、住房、信息等广大的服务领域，不仅引发了商品服务消费的变革，而且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达到可与传统模式匹敌的经济规模。

第六，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机制看，过去的竞争基准是出口增加外汇储备，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提升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开放战略和开放政策鼓励的是单一的出口导向，鼓励的是利用别国的市场，鼓励的是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低端进行国际代工。现在的竞争基准是要建设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是发展深度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与世界经济之间有着良性循环关系的经济，不仅可以输出商品和要素，而且也可以利用内需不断扩大的优势吸收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不仅可以引进来，而且可以走出去；不仅可以沿“一带一路”对东开放，而且可以向西、向南开放。

显然，新一轮地方政府就高质量发展所进行竞争，其实就是全面进入了发展高质量经济阶段，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行动机制。

四、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要吸取为增长而竞争的经验教训

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是我国过去地方政府间竞争制度安排的产物，由此引发的某些问题也是我们在设计新一轮地方政府竞争规则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制度设计，必须把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改造为非盈利公司化的倾向，也即要更多地剥离地方政府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职能，让其更多地考虑基于公共利益的发展，以及辖区内的社会治理问题。

根据过去的经验，无论强调什么内容的竞争，地方政府都必然会逻辑地动用其行政权力来参与竞争或竞赛，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主要有过多干预经济主体的决策、导致经济碎片化倾向、不愿意充分履行公共事务责任、债务负担过重等等。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带来的，而是由旧的地方政府职能和旧的竞争规则不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所引发的现实问题。其实，在新一轮地方政府竞争规则的设计中，可以通过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通过事先修改规则，认真地执行新规则，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来有效地避免上述这些副作用。

如何避免地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主体自主决策？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机制设计下，追求GDP

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最有效的手段是增加投资。为此，地方政府就可能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资决策，或者倾向于膨胀自己的投资职能，替代经济主体的市场化决策。当我们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标准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中，放低这些增长标准的权重后，地方政府干预或者代替企业决策的动机就会大大降低。同理，增加地方政府进行社会治理方面的考核评价指标和相应的权重，自然可以有效地避免其不愿意充分履行公共事务责任的弊端。

如何避免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经济碎片化倾向？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是经济碎片化的起因，破除公司化倾向，把其改造为具有非营利化倾向的经济主体，是一个基本的方向。但是与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公司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具有完整的行政权力体系，我们在倡导地方政府竞争制度时，必须高度重视有效制度的设计问题，避免其可能的反专业化分工合作、逆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弊端。基本办法就是要破除把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经济利益与辖区边界内的市场利益挂钩的不良制度。如在经济区内，要把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努力列入考核评价指标，减弱财政收入与个人福利、政治晋升之间的联系，等等。

如何避免日趋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问题？^{〔11〕}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风险确实与地方政府参与竞争的制度安排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种风险是在财权、事权和调控权不对称的中央地方关系中发生的，是在土地财政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在所形成的特殊举债融资机制下发生的。严格上说，这种债务风险的发生与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制度安排之间并没有逻辑的、必然的对应联系。未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的改革，通过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配套，来降低其高负债的可能性，防止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五、结语：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纵横治理体系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驱使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对具有中国特色和竞争力的地方政府竞争制度进行修正和改造，建立和完善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制度体系就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我们不能把过去为中国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体系“像倒洗澡水一样把婴儿也一起倒掉了”。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这种三维主体的纵向治理结构模式，适应我国集中统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发展高度不平衡、情况千差万别的国情。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伟大事业中，如果不充分发挥这3个层次的积极性，尤其是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仅仅具有高层某个层面的积极性，这个经济建设的总纲领就无法落地和落实。因此，如何再次让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中强大起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重新构建一个高效的“纵向治理体系”，是未来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在区县一级形成了一个高效且极具执行力的基层政府组织。随着中央进一步对地方政府进行放权，以绩效考核改革为抓手，通过鼓励区域发展竞争来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便于提高经济发展活力。

区域之间政府的发展竞争,属于“横向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地方政府之间既可以有发展竞争,也可以有发展的合作。竞争与合作是一体两面的机制。在这个经济全球化、分工日益细化的时代,各地方政府撤除行政壁垒,竞相开放自己的市场,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是大势所趋,是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含义。2014年2月,习近平同志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要求,首次界定了政府在区域发展一体化方面的基本职责和基本工作内容,也是未来地方政府在高质量发展竞争与合作中,必须遵循的基本职能。概括起来就是7个方面:一要负责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的顶层设计;二要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发挥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三要理顺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四要调整优化城市布局 and 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和一体化;五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六要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构建现代化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七要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破除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

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新一轮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和合作,必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产生时空压缩、增加密度、减少分割的经济地理重组效应,从而实现国土资源利用效率较高、要素密集程度较大、城市群落连绵、区域发展差距较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

参考文献:

- [1] 周业安,宋紫峰.中国地方政府竞争30年[J].教学与研究,2009(11):28-36.
- [2] 张占斌.“地方政府公司化”反思[J].决策,2006(11):32-33.
- [3] 邓聿文.地方政府公司化削弱社会信任感[J].领导科学,2009(14):18.
- [4] 刘志彪.我国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与债务风险:形成机制与化解策略[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50(5):24-31.
- [5] 张维迎,栗树和.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J].经济研究,1998(12):13-22.
- [6] 何艳玲,李妮.为创新而竞争:一种新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70(1):87-96.
- [7] 毛庆.聚焦“1+8”推动对标找差取得实质突破[N].南京日报,2018-02-23(3).
- [8] OIJC.States and peasa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9] 龚雯,许志峰,王珂.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

么干 [N]. 人民日报, 201601-04.

[10] 陈国权, 黄振威. 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热点主题与理论前瞻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40(4):14-26.

[11] 傅勇, 张晏.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J]. 管理世界, 2007(3):4-12.

新时代经济建设的总纲领

刘志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总纲领，就是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十九大报告中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创新性地提出来的一个突出的、具有建设性的重要范畴。它的内涵和建设标准是什么？为什么现阶段要提出这样的经济建设总纲领？应该如何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内涵和建设标准

过去，我们曾经提出过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或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等要求。十九大报告新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经济现代化”和“现代产业体系”这两个概念的内涵。

与上述两个概念不同的地方在于，“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是指变革的历史和动态的进程，而是与构成现代化强国的其他要素(如现代化社会体系、现代化生态系统、现代化法治体系等)对应，指一种可以定性或定量描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状态、目标和结构；它不仅是针对产业构成、产业结构而言，也不仅是用此来描述产业高度化水平，而是指整个国家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系统，在发展总量和速度、发展水平和质量、发展结构和要素、空间布局的性状、体制机制运行、开放发展程度等诸多方面的现代化水平和状态。

根据十九大报告精神，新时代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建设标准和框架，主要应该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一是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只要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5%左右，到2050年左右，中国人均收入就能达到世界现代化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的经济总量就会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

二是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然而，中国可以在衡量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的其他指标方面奋起直追，领先世界。如在教育年限、预期寿命等方面，中国的进步都十分迅速。

三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结构。在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的语境下，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我国是指要全面地构建比较稳固的现代农业基础，比较发达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等级的装备制造业，以

及门类齐全、迅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总体要求是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这样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

四是现代化空间布局结构和协调程度。指国土资源利用效率较高、要素密集程度较大、生态容量适度、城市群落连绵、区域发展差距较小的生产力布局结构。

五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并不是西方当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主要特征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和政府的“两只手”都要起作用，这是中国发展的优势所在。

六是高水平的开放经济体系。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是全方位立体开放的经济体系，是深度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与世界经济之间有着良性循环关系的经济，不仅可以输出商品和要素，而且也可以吸收商品和要素，但绝不是依赖型的输入型经济(如技术依赖度比较小)；不仅可以引进来，而且可以走出去；不仅可以向东开放，而且可以沿着“一带一路”向西向南开放。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方针和战略意义

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这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总方针的提出，是十九大对过去中国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众所周知，过去的赶超战略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急需要解决的、突出的、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表现为经济运行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现象。

进入新时代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为此必须在战略上从追求增长速度转型为追求质量经济体系，实现经济发展速度与民生幸福的双重追赶。这一战略转变趋势叠加我国人口提前老龄化的社会环境，意味着中国发展环境和条件将发生巨大的变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就是可能会出现以要素价格不断上扬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趋势。如果这种成本上升的趋势不能为生产率上升速度所消化，不能从依赖于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向创新驱动、提高生产率和附加价值的竞争优势，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力将有所衰减，经济运行将可能出现滞胀格局并陷入发展的陷阱。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全面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是跨越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口的迫切要求。

第一，只有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改变长期以来在赶超型旧体制下形成的速度、数量偏好的粗放型发展特征，才能使供给结构较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和不断升级的趋势，才能真正地化解过剩产能、降低经济杠杆，加快振兴实体经济。

第二，只有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大力推进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才能在符合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领域，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和新增长点，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同时使传统产业得到更新改造、焕发生机，使落后产业得以淘汰出局。

第三，只有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鼓励各级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和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和机制，才能不断地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第四，只有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才能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在高水平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创新经济，才能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抓住机遇奋力前进的主动作为。积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边际投入效率递减背景下，迎接新时代经济变革趋势所提供的战略机遇的不二法门。因为，在这个背景下，只有努力地向结构调整要速度、向结构变化要质量，向结构转换要效益，才能解决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质量、效率、动力的三大变革。从供给侧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是供给结构、质量体系与不断升级的社会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结构失衡”，从而导致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和运转不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纠正扭曲的供需错配，提高产出的质量和效率，从而缓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重点是要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和素质性的矛盾和问题，在具体的路径和方略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重点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抑制以炒房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火、过旺的不良态势。实体经济振兴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避免过度追求数量的倾向，增强我国经济质量的优势。

二是要把握科技进步的基本方向，重点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并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三是要运用一切手段鼓励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鼓励企业在经济周期的底部阶段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对购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可以按一定的比例给予税收的优惠和贴息贷款的支持等等。

四是要加快发展和迅速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水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就是指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五是要重点促进产业集群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打造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企业以集群这种组织方式发展，同时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是当今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

六是要重点强化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这除了可以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外，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多、更持续的“外部经济性”。

七是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八是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同时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建设四者协同的产业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

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要素协同的产业体系，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在这四个要素的关系中，实体经济是纲，是目标，是导向，任何脱离发展实体经济轨道、使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不良倾向，都会伤害国民经济，都需要纠偏；科技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现代金融则是其健康持续发展的血液系统；人力资源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一生产力。

建设四要素协同的产业体系的这个愿景，除了吸收了内生增长理论的精华外，还把它和发展实体经济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提倡现代经济增长更多地要发挥高级先进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而不是去孤军奋战；鼓励由金融支撑的创新驱动增长；鼓励把过去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的汗水经济转变为人力资源驱动型的智慧经济。

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这种协同。我国现实发展中的问题是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后者发展有脱离前者的不良倾向。同时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支撑力度不够，往往呈现为“两张皮”的不良格局。未来实现要素之间的联动发展，一方面要通过金融创新供给更多的优质资产，缓解资产荒，平抑资产价格；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吸收更多资本流入实体经济，为金融领域供应更多可投资的资产。这些工作都需要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源的源源不断的支

持。

之所以要实施上述的要素协同方式，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了，这一变化对经济政策提出了转型的要求。过去我国是资本不足和商品短缺，国家宏观政策的导向是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储蓄率，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生产能力，增加市场的有效供给；进入20世纪末后，我国已经完全摆脱了双短缺经济的特征。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国家的发展任务不再是要努力增加生产能力，而是联动解决资本和商品的双过剩、同时千方百计地增加优质资产的供给。这要比仅增加储蓄、扩大供给问题要复杂得多。

一方面，我们要引导企业在实体经济领域加快技术创新和优化供给结构，努力淘汰落后产能，或者通过培育潜在市场消化过剩产能，或通过深度加入全球化输出过剩资本；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在虚拟经济领域强化金融创新，增加优质资产的供给，满足居民在收入提升之后不断增长的投资理财需要，从而解决由资产短缺所带来的资产泡沫问题。

这两个任务其实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即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引导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化解实体经济领域的过剩产能。反过来，对虚拟经济发展中资产价格过高等问题，也可以通过实体经济的发展来平抑和调节，如通过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资产配置的选择机会。这些都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所面临的新问题。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若干重点问题

新时代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的基本路径和基本方略，需要我们结合中国国情和客观实际把它们具体化为行动纲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问题主要有：

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选择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第一动力和战略支撑后，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舞台上的角色、功能和地位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角色上，会由追赶者变为赶超者，甚至变为领跑者；在功能上，会由技术标准的遵守者和跟踪者，变成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市场地位上，将由追随者和弱势者，变成主导者或竞争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新技术的源头，必须经历时间更长、花费更多、风险更大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过程。

振兴乡村经济。这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环节。“三农”问题任何时候都是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无疑是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有效方法和路径。

区域协调发展。这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空间支撑结构。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充分，这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花大力气去纠正的问题，也是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所在。

全方位开放。它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良性循环机制。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全面进步，过去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红利。当前新一轮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兴起，中国要利用自己的内需优势，形成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和良性循环机制，吸收全球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

新苏南模式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 协同发展

刘志彪 张月友[※]

摘要：江苏南部地区对传统的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进行的实质性改造和创新，激发了新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协同发展的新动能和新活力。由此形成的“新苏南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苏经验。

关键词：新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协同发展；新苏南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支持各类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是我党坚定不移的既定方针和政策。江苏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的排头兵，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坚持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协同发展，由此形成的“新苏南模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是江苏南部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实践的重要驱动力。

演变历程和历史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的所有制结构演变，总体上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轨迹。以“苏南模式”演变为主线，苏南所有制结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关键节点。

1. 第一个节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主要标志

苏南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传统计划经济与人民公社的体制环境下，苏南地区由集体兴办乡镇企业、乡村企业，是我国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重大创举。当时的乡镇企业是一种集行政管理权与企业经营权为一体的混合型组织，这种政企一体的组织形式对地区经济发展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来自传统公有制制度的行政壁垒和行政压力，促进本地乡镇企业与周边大中城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横向联合；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解决资金短缺难题，通过公社内部积累的集体财产直接转化为创办乡镇企业资金来源，突破了当时国有信贷资金无法流向乡镇企业的巨大瓶颈。

2.第二个节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外商投资企业大量涌入为主要标志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决定实行沿海开放战略，随后在90年代初期，将上海浦东作为重点开发开放区域，苏南地区抓住机遇，利用邻近上海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浦东，外资、外贸、外经（简称“三外”）齐上，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苏南地区的各类开发园区先后建立，成为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平台。经过20多年的发展，苏南地区已经成为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最为密集的区域，世界500强企业中超过八成落户于苏南。

3.第三个节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以股份合作经济、民营经济兴起为主要标志

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产权结构在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全面发展，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农村集体产权结构，逐渐显露其抑制企业组织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弊端，成为阻碍苏南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为此，1997年起，苏南乡镇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股份化与民营化改制，经历了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演变轨迹。

显著特征

1.迄今为止仍需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庞大的竞争性国有资产，在苏南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为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苏南经济基础较好，国有资产总量较大。虽然国有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股份化、民营化改制比较彻底，但绝大多数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仍然保留了国有控股地位或国有法人控股地位。国有经济注重的不仅是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社会效益。虽然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在优化资源配置、推进转型升级及保障民生事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及公益性事业领域发挥了资源配置以及资本投入的导向、带动力作用，为苏南的城市建设、新农村建设以及经济转型升级作出了重要贡献。

2.新集体经济在产权、管理、经营及分配等方面均具有区别于一般集体经济的新特点

（1）在新世纪初，虽然苏南的乡镇企业纷纷进行民营化改制，但集体经济并未就此消失，反而在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调整之后，演化出了新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江苏目前的集体经济主要活跃于农村，是通过农村股份改革，重构苏南集体经济组织形态市场运行微观基础，以股份合作社、经济合作社及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它包括四种典型形式：一是资产租赁型，这种形式收益持久而稳定，因而比较普遍；二是企业股份型，主要是指乡镇企业改制时余留下一部分股份，这种形式使村民获益更多、更直接；三是农业开发型，主要是通过对土地的集中整治，建设“格田成方、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为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奠定基础；四是联合发展型，有利于打破各村各自为战、零散低效的格局，加快村级

经济抱团联合发展步伐，使村级经济变身为企业化发展的联盟经济。

（2）苏南新集体经济特点的具体体现：一是在产权界定方面，通过清产核资、股权界定和股份量化，将集体经营性净资产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明确了农村集体资产权属关系；二是在管理机制方面，能人经济与民主管理有效结合，苏南各市县也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农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信息平台，并联通到村，加强集体“三资”监管，减少违规和腐败行为的发生；三是在经营选择方面，基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和产业，经营渠道选择普遍为资本经营、资产资源租赁和承包经营，通常的做法是兴建标准化厂房、打工楼及商业用房等物业用于出租，经营风险小，收益持久而稳定；在收益分配方面，主要实行“按股分红”和共享公共福利相结合，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益状况与成员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村民成员得到的实惠更多、更直接、更公平合理。

3. 外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苏南主要是通过完善外商投资环境，发展以吸收FDI（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加工贸易经济。但这种简单粗放的加工贸易模式，使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容易形成对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的锁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苏南本地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攀升。近年来，探索这一模式的升级是苏南发展外资经济的重点。一方面，外资经济在江苏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的加工贸易模式正在逐渐改变，开始有更多的本土企业通过加强本土企业之间、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间的产业关联来升级进出口贸易模式，进而促进经济结构升级。

4. 苏南民营经济具有次生性、模仿性和后发性，属于“次生型”民营经济

苏南民营经济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民营化改制，带有鲜明的江苏特色。苏南的民营经济之所以选择这种发展模式，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对政治风险的有意回避，二是政府的有力推动，三是对后发型制度创新优势的有效运用。可以说，苏南发展次生型民营经济一定程度上是以较小代价实现了较大收益，但也正由于这种约束，导致苏南民营经济的市场性发育不充分。改制后的民营经济实体，或多或少地带有旧集体经济模式的痕迹，在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外部的经营决策以及与政府关系等方面，依然存在对原有发展路径的依赖。本质上，苏南民营经济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因此，苏南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产业定位上，比较偏重于制造业部门，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弱。但这同时也表明，苏南民营经济的产业空间、发展前景仍然广阔。

现阶段苏南国有经济和新集体经济、外资经济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协同演进趋势，三者的产业划分也并不是完全地“楚汉分明”，三者实际上是相互交融的关系。其中，苏南内资企业为外资企业配套，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外资企业全球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苏南集体经济也为外资、民资提供基础设施、标准厂房和职工宿舍等。

原因分析

现阶段苏南地区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演进关系，本质上是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的竞争性互补关系。这种关系的微观基础，是不同所有制产权主体的特征差异。它既体现在目标效用函数上，也体现在激励相容约束上。

1. 目标效用函数差异，内生地规定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业分布上的互补选择

不同所有制主体追求目标效用函数最大化，但每一种所有制主体考虑的影响因素不同。如果是私有制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产业选择上，哪些产业预期利润高，私有制主体就会选择进入哪些产业。一般而言，预期利润较高的产业大多市场竞争性较强，因此，苏南民营、外资企业也比较集中地分布于市场竞争性强的产业领域。对于国企和新集体经济来说，就不只是单一地追求经济性目标，还要包括社会性目标、政治性目标等，其目标效用函数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为此苏南的公有制经济在产业选择上，自然会偏重于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石油及天然气等自然垄断部门。

2. 激励相容约束的差异，决定了不同所有制产权主体的产业指向具有互补性

私有制产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严格明晰的产权安排。由于这种产权安排是排他性的，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容易形成对称性均衡，相容于统一的企业制度框架之内。相应地，企业的交易成本被降至最低，而决策效率则相对较高，对市场变化也相对比较敏感。因而民企和外资在产业选择上，比较倾向于选择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差异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如零售、餐饮等服务性行业。然而，对于国企和新集体经济企业而言，其产权界定与私有制企业之间有较大的不同，而且其产权安排也是非排他性的，企业内部的激励相容约束达成一致的 transaction 成本较高，决策效率通常较低，对市场变化也不甚敏感。为此，这些公有企业的产业分布，往往比较倾向于标准化、规模化程度高而市场竞争性、需求价格弹性相对较小的行业。如苏南新集体经济的产业分布，目前主要集中在标准化住宅建设、大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租赁及控股集体母公司股份等方面。

总之，不同所有制主体在目标效用函数和激励相容约束上的差异性，实际上也是不同所有制的比较优势所在，因而不同所有制主体可以基于产权差异，充分发挥相互间的优势互补作用，从而实现产业的科学定位、合理分布和协同发展。

成功经验

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居住以村庄形态存在、农民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决定了我国需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苏南农村的蓬勃生机与新集体经济给予的充沛活力和潜力分不开。从苏南实践看，发展“新集体经济”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方向。

1.我国农村所有制结构中集体经济与民营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向

与苏南模式中的传统集体经济相比，“新集体经济”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规律，与民营经济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苏南众多的民营经济发达村，大多也是集体经济的强村。在这些村，集体经济基本上退出了市场竞争领域，转而定位于为民营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如集体宿舍、标准厂房及交易场所等不动产形态的租赁服务。同时，民营企业为集体经济提供收入来源，以及改进管理机制的竞争活力和动力。

2.实现强村富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集体经济的特征是民有民享，具有较强的救济、福利和保障功能，是有效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苏南众多村庄随着集体经济地不断发展，实现了强村发展和富民兴业有机统一。如2013年苏州、无锡两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2万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缩小到1.9:1。

3.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选择

目前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还不能完全由公共财政来保障，而且这种情况可能还要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苏南“新集体经济”发展好的地方，租金收入、分红收入及经营收入增加了集体财力，农民收入、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及农民幸福指数也都相应得到提高。

4.实现农村能人治理、民主管理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村集体才能有能力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解决农民切身利益问题，获得群众拥护和支持。如华西村、蒋巷村、长江村、永联村、梦兰村和山泉村等集体经济发展的明星村，几乎都有若干带头的能人，同时实施民主管理。建设新农村，既要靠党员干部和企业家等能人带头，也必须广泛依靠民主管理机制，把经营管理企业的才能和村民自治制度运用到发展“新集体经济”中，依靠村民自治，实现“民主促民生”。

改革开放至今，苏南集体经济实现了从产业经营向物业经营，从分散经营到集中经营，从村内发展向村外发展，从资金增量向资产增量四大转变，走出了一条农村地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江苏道路。这是我们在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值得深入研究和总结的实践案例。

以动态比较优势培育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

刘志彪[※]

基于中美贸易关系摩擦背景，本文对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的性质和特征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要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培育中国自己的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政策建议。

中美贸易战中美方对以中兴通讯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饱和攻击，试图用包括技术出口限制、留学限制等多种手段重点抑制“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实施。从产业链角度看，美方发起贸易战的标的大都是中国不具备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中间投入品。显然这些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断供”在关键时刻对中国产业安全发出了可置信的威胁。中国过去长期处在全球价值链（GVC）的底部，承担加工、制造、装配等生产的最终环节，基本可归结为是高技术产业的低端环节。虽然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很多规模领先的产业往往大而不强，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材料大都垄断在国外厂商手中，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发动机，小到圆珠笔头的球珠、高铁列车上的螺丝钉、电子产业高档芯片、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等，都是我们在GVC上的产业软肋。实践再次证明，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中间投入品产业不强，长期依赖国外技术和产品进口，与此有技术经济关联的中下游中国产业则都可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发生时的攻击对象和牺牲品。

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的性质和特征

GVC上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型特征的中间投入品产业是指在GVC链条上一些企业的产出是该链条下游生产企业的中间投入，它们销售收入就是下游生产企业的投入成本。由于这些企业生产活动需要投入巨大人类脑力劳动，因此其产出含有丰富密集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该部门也被称作是把知识、技术、技能和人力资本带入最终商品部门生产的“飞轮”，对社会技术进步有决定性作用。其特性是：

一是显示度低。它们在某个产品细分市场上往往处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但鲜为人知。中间投入品生产不直接与终端消费者发生联系，不能成为著名消费类品牌，但却因掌握行业关键知识技能，享有其他企业无法替代优势地位，也被称为“隐形冠军”，它们的具体产业命运的

[※]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原载《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07期。

真正控制者。

二是报酬递增性强。这些企业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投入性质，属于报酬递增的产业部门。最典型的是芯片生产，第一张芯片生产成本可能是前期投入的全部固定成本，但是后续批量化生产芯片的边际成本几乎趋向于零。

三是产品差异性大。生产同一类产品同类厂商中，其品质因知识资本、技术资本投入水平差异，相互间都会表现出巨大差异。这种产出品之间的差异不是最终消费者可以用心理感知的，也不是可以主观准确评价的，而需要由专业技术人员用精密的检测设备按严格的技术标准进行参数测试。

四是进入门槛高。对知识技术的投入差异构成这类中间投入产业最大的门槛。中国企业若无长期持续不断且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没有耐心和坚守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没有GVC上进行国际代工的经验 and 深刻理解，要在GVC上使这些产业“走上去”，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产业升级任务。

因此，培育更多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中间投入品企业是中国突破发展瓶颈迈向GVC的中高端、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根据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性和紧迫性，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依靠国家力量逐步向上延伸产业链，专注于链上技术知识密集环节，把技术一层层地往上做，做大做强后往上提升，掌握链上某一部分不易被取代的重要价值环节。要争取把这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我国制造强国战略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多次强调的，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实施扬长补短战略：从比较优势走向动态竞争优势

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GVC上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企业，就不能根据过去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继续实施“扬长避短”策略，不能以条件不具备为借口放弃对GVC上游某些高知识技术密集环节的追赶，而应根据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实施“扬长补短”策略，全力拓宽制造强国中瓶颈部门和关键环节。过去我们长期定位于GVC上的低成本生产环节，专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但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当开放战略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初级要素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会使其产出增加，使其出口具有竞争力。这有重要缺陷：

一是当我们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产品时，并不能够排斥其他初级要素密集的经济体也作为竞争者加入竞争。当具有更强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进入全球化市场，而我们自身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产业升级却出现滞后时，再继续把竞争优势集聚于原来的初级要素，可能非但难以实现出口收入的持续增加，反而会陷入滞胀的被动格局。二是当我们定位于

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很容易在全球价值链中被走“高端道路”的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俘获，容易在市场势力非对称、非均衡的网络中被迫长期锁定在GVC上的低端，产业升级的任何实质性的努力都会遭到来自GVC上高端企业的阻击，只能长期维持粗放型增长模式。三是这种定位在当今逆全球化大背景下有重要缺陷，中国企业容易在不安全和不稳定的GVC中成为被上游企业讹诈的对象，从而影响国家产业安全。这已经为本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践所证明。

因此，培育更多的GVC上的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企业对中国塑造现代化强国来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制造业是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如果小国经济可通过嵌入全球经济实现专业化分工和合作建立起依赖外部关系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那么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主要依据不断增长的、规模巨大的内需优势建设独立自主、开放的工业经济体系是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因为小国经济受国内需求规模限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建设门类齐全的具有规模经济特性的现代工业，必须放弃许多产业领域，较大规模地利用外部市场，否则就很难生存。而中国是大国经济，产业发展所需的核心关键技术和知识是市场换不来的，必须独立自主研发，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基础厚实的制造业和强大的军事工业。当然，强调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独立自主研发，并不是主张闭关锁国关门研发，而是要在GVC链条上大胆吸收发达国家先进要素，学习先进经验技术。

扶持和保护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的建议和政策

第一，从幼稚产业开始进行扶持和保护。根据后起的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可以对幼稚产业进行扶持，具体可设置阶段性成长保护期以隔开外来竞争。中国是大国经济，知识技术密集的中间投入品产业属于需要政府扶持和保护幼稚产业。在开放的国际竞争中，因为这类产业的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显著的差距，如果没有一定的保护和扶持，它们就会被强大的竞争者消灭在襁褓之中。

第二，选择影响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少数最重要的中间投入品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实施扬长补短策略，需要集中力量补最短边的那些板，由此边际收益更高。考虑到国际分工，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没有可能在诸如芯片、精密仪器、飞机发动机、传感器等所有领域和环节都取得绝对优势和控制地位。中国应选择为数甚少若干最重要的知识密集中间投入品产业，发挥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进行重点突破。

第三，建设GVC上的制造强国要充分发挥本土民营企业作用。中国目前欠缺的技术不可能都由国家不惜代价地组织追赶。原则应是：让大型国有企业搞连续性累积性创新，而破坏式颠覆式创新则放心地交给民营企业。前者需要长期积累，有时必须忍受一定时期甚至较大亏损，如大飞机项目、大型船舶、大型电机工程等。后者在残酷市场竞争中，竞争最高境界是颠覆产业产品界限和定义，民营企业当之无愧成为主力军。

战后日本的汽车、家用电器及电脑等产业就是在政府的保护政策框架内，由企业抓住需求

急速扩大的机遇成长起来的。因此中国如何按动态比较优势扶持知识密集的中间投入品产业，也应根据国际经验。根据日本经验，这种扶持政策实施时要考虑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一是该类产业内企业的行为及目标；二是产业扶持和保护政策对这些行为的影响。

一般来说，随着市场需求扩大，受扶持保护的幼稚产业内企业应主要以大规模扩充设备和生产能力作为这一时期主要行为方式，不应单纯以最大利润为目标，而以追求最大成长率和拥有产业内高市场份额为目标，且企业必须制定长期的竞争战略。在政府各种扶持和保护政策下，企业虽然暂时排除了外国竞争对手威胁，但要让企业认识到这种保护政策终究将会取消，从而促使企业在保护期内迅速扩张设备和生产能力，以准备在市场开放之后能与外国同类企业激烈竞争。考虑到国有体制适应竞争能力较差，建议中国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对国内民营企业开放。加大对内开放有利于民营企业把这些产业的竞争力迅速提高，以防止对外开放的急促性使这些产业丧失竞争力。

从产业政策的目标看，政府的扶持和保护政策也需要设法在产业保护期内形成国内市场的寡头垄断竞争格局。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开放之后外国企业必定会趁国内企业“小而散、小而乱、小而差”的空虚之际，凭借其雄厚实力和全球化经营战略迅速击败本土企业，形成不利于本国的市场势力。因此对幼稚型成长产业的保护，其保护政策的力度、范围、期限等因素的决定应以有助于形成国内寡头垄断市场为目标，同时要不断“对标”国外同类企业的竞争力，找出发展差距。保护期长短选择必须考虑既有利于企业进行设备投资和扩张生产能力，又有利于本国企业建立领导者地位。保护期内企业行为应主要采取增强竞争能力策略。政府的保护政策应以形成这种有利的企业行为为主要工作内容。

培育本国企业对外国垄断企业的竞争力，还可给本国消费者带来巨大国民福利。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美贸易战时进行彩色胶卷的进口自由化谈判，日本发现，占世界市场很大份额的美国柯达公司所产柯达彩卷，在澳大利亚因无竞争对手而其售价比在德国和日本高出许多。日本及德国消费者因为有本国抗衡企业支撑，对本国国民福利提高具有很大意义。

造就边界清晰的“双强体制”

刘志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世界奇迹，就是沿着这个逻辑全面深化改革的结果，就是正确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结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结果，也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结果。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

在过去四十年中，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个阶段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中国加入WTO之前。在这个时期，我国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大幅度改革，改革从此进入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计划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样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第三个阶段，就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到现在这段时间，我国对经济体制改革有了新的提法，即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无疑，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也要看到仍然有一些缺点和不足。这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不够好有直接关系，有的表现为市场取向的改革不足，有的则表现为市场取向的改革过度。前者如过去我们的改革，虽然多次涉及政府机构调整，但是始终是在政府机构内部进行剪裁撤并，没有真正向企业、市场、民间、个人和社会横向放权，这种市场化改革不足是政府经常越位、错位、不到位现象发生的直接原因。后者如某些主要应该由政府承担、不应该主要推向市场的领域和活动，如一些基础教育、基本居住、医疗卫生养老等的过度市场化。

当前中国经济中急需攻坚克难的风险和问题，也是主要由市场取向的改革不足，或政府功能不到位引起的。前者如我们在商品市场化配置改革方面进步迅速，但是在关键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方面，却长期迟缓和推进不足。后者如本应该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市场监管、扶贫、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

根据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把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机制，改造为“为高质量而竞争”的机制。建设这种竞争模式和机制，是为了贯彻落实新发展

[※]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原载《经济参考报》2018年12月19日第005版。

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行动。在新一轮扩大地方政府自主权的背景下，矫正过去地方政府竞争的目标函数、为中国经济重塑新动力，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选择。为此要通过对统计体系、标准体系、绩效评价、政策体系等创新，以新发展理念修正地方政府竞争的目标函数及其构成。

新阶段市场和政府应充分发挥各自作用

实践真知、理论逻辑和历史视野的分析都告诉我们，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处理，总体上必须服从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在收入较低的贫困阶段，经济体系处于赶超发展阶段，增长速度压倒一切，这时市场功能残缺，政府的作用可以大一些；在进入小康阶段，小康型需求对应的大多是重化工业产品，具有较大的规模经济性，这时集聚资源的要求推动着政府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在形成战略性的支柱和主导产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进入对发达国家的基本现代化的追赶中，因创新发展、民生福祉、生态环境等均衡发展的需要，纠正产业政策长期运行所造成的失衡，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时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也需要政府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发挥更好的作用。

在现阶段，全面小康的目标即将实现，中国由速度经济追赶，开始进入了在发展质量上全面追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阶段。在这个新时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选择和处理，市场和政府都弱的体制模式必然导致丢失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机遇；同时市场弱、政府强的体制模式，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复杂要求，也是不可行的；而政府弱、市场强的体制模式，不利于实施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的均衡战略，不利于纠正市场的缺陷，最终也不利于现代化发展。最理想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模式，应该是它们都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中形成强势特征的运行机制，即市场在营利性的经济活动领域强，而政府则在非营利性的监管、社会、文化、民生、环境等领域强。这种双强的格局，在领域上是不能有交叉的，否则强势的政府必然会替代市场。具体来说就是：

“强政府”，不是指干预经济多、干预力度大、干预手段多的政府，而是坚守自己的公共调节职能，坚定不移地控制住自己不干预微观企业经营和投资冲动的政府，是坚守政府理性边界、只做适合于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的政府。就政府行为动机来说，相对于干预经济，“控制住自己不干预”是更加困难的行为，是更强势的政府。通过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的内容，政府可以从繁杂的微观事务中退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强化宏观管理上，为市场和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外部经济性。

“强市场”，不是市场调节覆盖一切，也不是过度推进市场化，而是在不出现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中，利用价格机制和供求规律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企业和民众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鼓励公平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底线范围内放宽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

区间，充分调动经济体的自我修复能力，遵循经济基本规律，强化竞争机制和减少垄断领域，重点在金融领域大力推进价格体系改革，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在投资规模较大的重点领域，例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房建设等方面，多运用价格调节杠杆，放宽市场准入吸纳更多社会主体参与，政府退出部分市场空间，让社会提供服务，公平处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市场重点进退关系，预留市场盈利空间，鼓励创新商业模式。

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要处理好三方面关系

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在“强政府+强市场”的双强体制模式下，需要处理好一系列的关系问题。主要包括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国内与国外的关系。

第一，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发展到当前水平之后，应如何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在过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在新时代的共享性发展理念下，可以通过“双强体制模式”来逐步纠偏。其中，提低限高的分配和再分配策略，需要强大的政府职能来支撑。提低，不仅仅是要适当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要完善和提升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居民在公共设施上平均享有的福利，在医疗、教育、基本住宅、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减少，就等于增加了他们的收入，等于平均地提升了他们的富裕程度。限高，则需要在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基础上，堵住少数高收入者的漏税渠道，对其进行有效的再分配调节。另外一个就是要大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这除了要用国家税收制度调整外，关键是靠市场、民间、企业的功能发挥。我们应该提倡、鼓励发展那些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进行内部分配改革，如鼓励员工持股、采取首席技工制度、鼓励技术作价入股等等，鼓励这些企业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做贡献。

第二，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如何厘清三者的边界、界定好各自的功能，是未来推进实质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传统改革的发力点是重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央向地方的纵向分权。在纵向改革取得突破性成就之后，没有紧接着由纵向改革路径转向横向改革路径，没有实现从纵向分权逐步向横向放权过渡，没有使改革真正涉及政府与社会、市场、企业、公民个人的关系，没有逻辑地让后者担负起应尽的发展责任，因而这些受压抑的主体的活力不可能充分发挥，既缺少来自这些主体的发展动力支持，也使政府规模在改革中越做越大。这是过去纵向改革中集权与分权问题无解的本质原因，也为我们破解这个难题指明了正确方向。发展权向社会、民间、市场、企业、个人不断下放，才能塑造出独立的有能力承担发展责任的主体，才能说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性的成就。改革的这种道理并不深奥。过去在民间、市场、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功能残缺的条件下，政府难以放手实施这种实质性改革，无法让其承担资源配置和各种治理的功能，最后只能再次由政府承担起它自身不应该、不能够和不足以承担的各种社会经济职能。为了促使纵向改革尽快转向横向改革，基本对策是要改革政府职能和机构、放松市场和社会管制、培育替代政府配置资源功能的各种横向组织等。推进这些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是一致的。

第三，国内与国外的关系。中国未来的全球开放体系如何建设？这也需要我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总的原则是要把过去由政府创造非均衡竞争优势的政策取向，转向以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政策取向。这是中国顺应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在开放条件下建立大国间关系、促进高水平开放所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过去中国在短缺经济的背景下，为了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经常利用产业政策手段扭曲资源配置，把资源集中到特定的重要部门使用，造成国内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政策环境不均等，还使同一经济主体在不同的区域处于不同的政策环境。过去的这种产业政策适应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的总体特征，总体上看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40年来，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因此非均衡发展的赶超型产业政策，对于建设新型的国内与国外的关系来说，可能不再适用，应该做出较大的调整。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驱动下，过去那种相对封闭的以培育新兴产业、增加生产能力为导向的赶超型产业政策，急需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高水平开放格局。这是中国坚定走市场取向改革道路的重要体现，是扩大对外开放、创造内外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重大举措。第一，当前急需要由市场准入限制，逐步转向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管制，增加经济的竞争性，为民众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为消费者增加更多的选择性。第二，当前急需要由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投资，逐步转向为企业投资创造更有吸引力的环境。第三，当前急需要由模仿创新发展，逐步转向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的自主创新发展。第四，当前急需要从鼓励出口导向，逐步走向主动利用内需来扩大进口，吸收全球最先进的生产要素为我所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经济不怕放开，不怕竞争，但是怕封闭。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价值与动力机制

刘志彪 陈柳[※]

内容提要：更高质量地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关键是要在体制机制上构建一体化建设的动力机制。这要求发挥政府和市场次序有别的“双强”作用。发挥政府强力推动作用的目的，是营造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环境。要在竞争和协商中处理好各自的利益诉求，设计出牵引一体化的动力引擎。当前应重点从如下方面着手：发挥上海作为长三角经济龙头的辐射作用；在长三角范围内复制推广国家试点政策；打造有形“飞地经济”和无形“互联网平台”整合区域资源；鼓励企业在长三角范围内兼并收购；发挥大型企业集团的区域协调作用；逐步构建长三角区域的竞争规则。

关键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区域、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指在一个大经济区域中，各个行政边界清晰的地区之间不断克服和消除区域发展中各种阻碍资源和要素流动的制度、体制、机制、政策等人为障碍，实现市场的竞相开放和充分竞争的过程。从实践来看，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存在着非一体化发展现象和倾向，且降低这种分割的程度、实现一体化发展往往不见得比国家之间的一体化来得更加容易^[1]。其中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过去把国民经济分割为各种“条条”和“块块”，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还要依靠它们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和作用，如地方性产业政策仍然要发挥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因此在替代性机制即市场中间组织和机制发育并发展成熟之前，各种“条条”和“块块”的行政机制就会阻碍区域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发挥作用；二是受发展阶段的限制，在经济转型中，除中央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外，地方政府和部门由于保留甚至发展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因而也能广泛深入地直接干预市场活动。这就必然产生行政利益边界。这是我国目前分割性市场产生、市场难以统一的重要原因，也是地方性和部门化的产业政策

[※]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改革》2018年12期。

盛行、经济体系被“条块”分割的主因。

从1982年率先建立上海经济区，到1992年自发形成长三角15市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并于1997年升级为市长峰会，再到2005年建立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的定期会晤机制，长三角地区一直在现行的体制机制下不断地摸索如何协作、协调、协同发展的路径。由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使政府介入市场活动过于深入，各地都盘算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难以打破行政割据的藩篱，因而总体上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效果并不显著。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上海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使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至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各界共识，也将成为我国探索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标杆与典范。

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示范价值

近年来，通过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整体发展水平提高，逐渐在我国经济发展政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同志在长期的经济工作实践中坚持的重要方法，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9]。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求“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是落实和落地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具体行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升级为国家战略，有利于长三角区域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辐射的经验做法，更好地发挥长三角区域在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龙头带动作用，同时也有利于长三角区域参与全球竞争，加快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第一，长三角地区将成为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和典型。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可以用树标杆和典型的办法来推进。如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最具活力、开放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可以通过丰富的科教资源与基础扎实的现代产业融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路子。再如，长三角地区因走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路子较早、发展水平较高，因而城乡发展差距在全国也是相对较小的，这逐步形成了可以在全国复制和推广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的道路。还有，长三角地区由于过去粗放型工业化推进时间较早，区域内资源环境生态等问题较为突出，如何让新一轮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是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必须探索的重大问题。最后，把长三角地区过去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高水平双向开放模式，在发展中提高民众分享的比例，实现共享发展，都需要有条件的发达地区率先进行探索。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实践将为其他地区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鲜活的经验和启示。

第二，长三角地区将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先导和主力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未来经济建设的总目标，发达地区应该努力率先示范。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

略下，一是可以打造除粤港澳大湾区之外的第二个大湾区，即长三角大湾区，以此驱动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产业升级、科技和金融创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二是通过搭建区域合作制度平台，如共建覆盖三省一市的G60科创走廊，规划建设创新城市圈，建设制造业世界性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等；三是有利于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专注于“五个中心”的建设，主要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降低长三角地区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周边地区主要从事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降低长三角地区的制造成本，从而提升现代经济体系的综合竞争力^[9]。

第三，长三角地区将成为推进更高起点深化改革的先驱和标兵。更高起点深化改革要求大规模的对内开放和进一步对外开放。长期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对内开放不够。这引致了比较严重的内部发展机制僵化的问题，如政府职能转变不够、民营企业进入不足，等等。大规模的对内开放首先要求坚决破除行政壁垒，实现地区间竞相开放，平等无歧视地对待各类市场主体。这就要求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功能、范围、边界和程度，放手让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如长三角地区可以突破以邻为壑的行政壁垒的限制，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复制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浙江金融改革政策等，以此放大改革的叠加效应。

第四，长三角地区将成为推进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示范区和标准制定者。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要求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长三角过去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典型区域。新一轮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需要长三角把向东开放的空间指向转向全方位开放；把以出口商品为主转向输出资本带动商品销售为主；把吸收外资转向主要吸收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把利用别人的市场为主转向利用自己的市场扩大内需为主；把以建设科技园区、利用优惠政策吸收外资转变为向科技人员提供先进的制度平台和硬件载体。

第五，长三角地区将成为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主动力。东部地区的领头羊是长三角。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巨轮。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将与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呼应，共同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二、长三角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众所周知，在转型经济中，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那些自然和技术的因素，如地形地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另一类是制度、体制、机制、政策等人为因素。在这两类因素中，前一类因素影响和决定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成本和效率，只要存在空间区位和技术水平差异，就会有不同的发展成本，从而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差异；后一类泛指体制机制的摩擦成本，也是我们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真正需要花大力气消除的因素。因为，只有制度和政策的差异，才可以系统地、大幅度地影响和扭曲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形成人为的发展差异。也就是说，区域是不是一体化发展，主要要看各个区域是不是充分开放的，是不是存在各种人为的制度和政策障碍；而自然条件和技术因素的限制，不是区域是不是一体化发展的充分

必要条件，它只影响一体化发展的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当然，这两类因素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如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础，有利于制度分割状态的改进和迅速推进市场一体化；制度障碍的消除和分割状态的改进，反过来又有利于推进基础设施跨区域合作，有利于技术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规模化、集约化地有效利用。

经济体制问题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高质量地推进长三角区域发展一体化，构建各个地区投身一体化建设的动力机制，就是要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次序有别的“双强”作用。发挥政府强力推动作用的目的，是营造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环境。要在竞争和协商中处理好各自的利益诉求，设计出牵引一体化的动力引擎。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三省一市的合作发展将进入崭新阶段。在早期各地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保护、产业创新、市场化改革、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如何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方向推进，使在决策层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同时在执行层面设计出各方利益共享的机制，是国家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问题，因为只有参与方都能尝到一体化的甜头，才能实现真正可执行、可持续的一体化。

长三角地区过去的非一体化，无论表现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互联互通的不通畅，还是体制、机制原因形成的市场障碍，直接原因都在于“一亩三分地”的地方保护主义。不论是过去还是当前，地方政府出于各自短期利益的“各自为政”都是正常现象，关键是要通过制度设计形成各地竞相开放的动力机制。构建这一动力机制的障碍，可能存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扩散效应与虹吸效应。一个地区是否愿意选择一体化战略，往往会考虑本地与周边地区的“扩散效应”和“虹吸效应”哪个更大。如果周边会更多虹吸本地要素，或者本地要素更多会扩散到周边地区，就会表现为区域之间竞争大于合作。过去搞外向型经济，上海与周边江浙地区都把吸引跨国公司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战略，大家都要吸引加工贸易型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通过与周边地区互联互通降低整个区域制造业交易成本的动力就减弱了。当前，上海紧抓“五个中心”核心功能，致力于打造体现国际高端水平的新功能，这种与周边错位发展的战略就为一体化提供了基础^[4]。

第二，产业协调与产业同构。当今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信息产业、生物医药、装备仪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等方面，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也主要依赖于这几个产业。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地区就这些产业领域进行竞争，采取各类优惠政策支持这些产业本地化发展。地方集中资源发展少数热门产业带动区域转型升级，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趋向，在此情境下，要求各地放弃以政策洼地进行产业竞争存在较大的难度。

第三，市场保护与本地发展。政府扶持本地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对本地市场进入进行限制以及在政府采购方面进行倾斜，比如规定出租车市场只能使用本地生产的汽车，限制外地啤酒产品进入本地市场等，有的还以特种行业为由限制外地企业进入。利用本地市场保

护扶持少数企业发展，虽然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仍有地区信奉市场保护能够快速见效，这种短视的地方政府可能不会有动力加入统一大市场。

第四，公共产品辐射与竞争。各个区域在机场、港口、重大科技仪器和实验室等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的选址和落地方面存在竞争，地方政府在一种利益边界明晰的制度结构下的竞争，必然是寻求地方行政区域边界内的垄断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表现为公共产品尽量在本地实现“外溢”，而建设成本最好是由中央政府或其他地区承担。这就导致公共产品除了盲目竞争和重复建设之外，在选址和建设方式等方面也是为了本区域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从长三角一体的整体角度配置公共资源。

在构建长三角区域发展一体化的动力机制上，“强政府”和“强市场”的作用都要发挥，但位次有别。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目的，是要营造发挥市场作用的环境，这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只有首先发挥政府的强力推动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地方保护的市场壁垒只有政府才能形成，也唯有政府才能打破。也就是说，从阻碍统一市场建立的因素来看，在几乎所有影响市场运行格局和效率的因素中，不论互联互通的有形壁垒还是体制机制壁垒，只有政府才有可能长期地、有力地、大幅度地扭曲、分割和限制市场。因此，就通过区域一体化形成统一市场、清除市场壁垒、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来说，首先需要政府自身的改革，尤其是要协调和平衡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第二，地方追求自身利益所进行的独立决策，难以避免社会成本的发生，因此中央政府和长三角层面上的干预是必需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在全国统一的法律和政策体系的规范下，逐步修正和统一各地区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废除与一体化有冲突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现阶段，表现为要减少相互之间负外部性的干扰，协调各地既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从而适应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在政府建立初步竞争规则之后，应当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当交通基础设施等公认的一体化领域达成共识之后，政府为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外在环境的任务就初步完成了。在更深层次利益调整过程中，唯有市场机制才能自动产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生效应。当前一体化过程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确保微观主体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的利益诉求。创造各类平台和氛围，让基层政府、广大企业等利益攸关方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问题上充分发声，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从而保证一体化的思路 and 方案从最初设计开始就是符合市场内在规律的，这将有利于政策的推进执行。第二，以市场化的原则协调和处理一体化进程中的地方利益冲突。包括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地点选择和差异化定位、重大科研平台的落地方式、创新载体合作模式等深层次一体化合作中的问题，均涉及各个地区重大利益调整乃至矛盾冲突。解决这些问题依靠行政命令即使暂时能够达成平衡，也无法得到微观层面的持续执行。只有让相关主体按照市场的原则、以价格机制作为主要调节手段充分地讨价

还价和动态调整，形成的方案才具有生命力^[5]。第三，充分发挥企业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在各地政府对企业跨区域行为限制进一步减少的过程中，行政区划形成的天然障碍能够由企业的一体化来克服。随着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影响区域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会被打破，企业会敏锐地捕捉到长三角区域内的商业机会，整合区域内的资源。当企业都根据长三角各地比较优势进行企业层面的资源配置时，一体化的格局就将自然形成。

三、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推进路径

（一）发挥上海作为长三角经济龙头的辐射作用

充分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形成苏浙皖各扬所长的区域合作格局。当前，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协调各地制造业发展等方面。区域内部需要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对低的合理分布，在长三角区域内部，上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苏浙皖等地可以很好地控制制造成本，因而长三角地区交易成本和制造业成本综合较低的区域，可以很好地促进区域协调。世界级城市和城市群的衡量标准应该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应该分别达到50%和70%，这样才能很好地支撑区域的高质量发展。苏浙皖各扬所长的路径，就是要进一步嵌入全球价值链，增加对价值链高端、高附加值环节的控制。过去是依靠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加工的方式嵌入全球化价值链，主要是被动嵌入，附加值较低。当前，苏浙皖地区需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主动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体系。基于长三角发展的现有区域格局，如果上海不能发挥对长三角的龙头带动作用，如果其他成员不能从上海的转型发展中受益，整个一体化的格局将无法较快形成。

在长三角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上海的龙头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上海从大局出发为辐射周边创造条件。比如，周边地区都在积极协调打通断头路接受上海辐射，但不少道路对上海来说受益可能并不高，这时上海就要算好长远账、整体账。二是上海从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的目标出发，聚焦彰显功能优势，聚焦“五个中心”定位，突出服务经济，主动在产业方向上逐步退出一一般性的、劳动密集型、能耗高的制造业，逐步取消吸引代工型FDI的优惠政策。让这些产业和FDI转移到长三角更具有承载能力的地区，这也有利于解决长三角内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三是上海的科技平台、金融平台、人力资源平台向长三角地区开放，为长三角地区嫁接和配置全球资源创造条件。

（二）进一步明确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内容

长三角高质量发展需要推动重大改革举措的集成联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实质上是区域内部各地的高水平的竞相开放，一体化的核心含义是破除行政壁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尤其是政府对各地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封锁。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能在抽象层面上空谈，而应先就一些关键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业发展合作等）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和合作，这样会快速推动区域内相关体制的整体创新。浙江和江苏的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点，需要加快构建“一圈、两带、一廊”。“一圈”是环太湖地区，重点开展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解决太湖污染等的负外部性问题；“两带”一是指宁杭生态经济带，要探索生态保护和高科技园区协同发展的路径，二是运河文化经济带；“一廊”是指科技走廊，要发挥上海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创新，政府可以探索设立高科技产业基金，重点投资有成长性的项目^[6]。浙江和安徽的一体化重点是解决新安江生态环境问题，推动旅游资源的协同开发。江苏和安徽的一体化重点是制造业产能转移，要将江苏部分过剩产能向皖江地区转移，打造以南京为中心的都市圈和商圈，这也会影响到合肥、蚌埠和徐州等地区。

（三）在长三角范围内复制推广国家试点政策

目前国家层面已经在长三角区域试点不少重要政策，已涵盖贸易、金融、科技创新等多个重要方面，很多非试点地区具有很强的动力学习、引进和落地这些政策，尤其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政策、浙江金融改革政策等。可以从长三角层面向中央争取一定的行政授权，长三角地区各地政府的决策机构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有秩序地复制推广国家已经在长三角试点的政策；或者由长三角决策机构统一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在部分地区复制推广某些具有共性的试点政策，让这些重要改革试点、改革举措的成果率先在长三角区域内复制推广，以放大改革叠加效应。

（四）打造有形“飞地经济”和无形“互联网平台”整合区域资源

可以试图将过去各地行之有效的“飞地经济”的模式和经验，扩展到更广范围、更多主体，让更多地区和企业受益。随着最严格的环保政策在长三角全区域的实施，现阶段“飞地经济”不能再是产业梯度转移跟随者，而应成为产业价值链和创新链分工的试验区。

除了“飞地经济”这样的有形载体外，还要打造互联网平台载体以整合教育、医疗、产业供应链等资源，让参与者真正受益^[7]。比如，进一步推进长三角高水平医院的医疗和跨省结算；长三角地区的大型科研设备，可以通过构建整体平台实现有偿共享等等。

（五）鼓励企业在长三角范围内兼并收购

各地在集中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时，不可能完全排斥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更何况市场经济下，企业投资者是根据不完全、不可预测的信息进行决策的。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一定会有重复投资和重复布局，就会有产业结构的趋同。协调长三角各个地区形成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定位，并不是要去协调哪个省市发展什么、不发展什么。产业重复和趋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市场不存在自动结清机制，即如果不存在收购兼并、破产倒闭机制，就一定会出现严重

的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冲突。一般来说，只要在统一大市场下存在兼并收购机制，能够突破人为的市场壁垒，就能自动将产能重复和过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差异化的产业定位会通过区域内充分的兼并、收购、合作自动形成。

（六）发挥大型企业集团的区域协调作用

长三角拥有众多国内外著名的大型企业集团，涵盖了先进制造、互联网经济等多个领域，这些企业是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链主”。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跨区域投资，按照市场化原则在长三角范围内配置资源，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分工就演变为大型企业集团内部的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分工，这种企业集团内部的协调难度将大大小于政府之间的协调难度。可以设想，企业集团从产业配置上将服务环节放在上海，将制造环节放在苏浙皖，将会降低长三角商品和服务生产的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在区域对外开放方面，长三角三省一市还可以协调本地企业组团到长江中上游、“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以办开发区的形式投资建设制造基地，本地企业则在长三角发展以总部经济为主。

（七）逐步构建长三角区域的竞争规则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中长期目标是形成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则。长三角区域通过致力于建立以市场竞争为基础、非行政扭曲的竞争体系，推进经济从“发展竞争”逐步转向“平等竞争”，逐步限制地方政府参与市场运作的市场主体功能，使竞争政策替代产业政策并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先地位。当各个成员充分享受到一体化效益时，遵守竞争规则就会成为一种自觉动力和行为。现阶段，可以在交通、环保、公共服务等部分外部性较强的领域，从易到难逐步签订某些具体的协议，达成对各地区竞争规则的协调。在法律层面逐步构建区域竞争规则，将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为全国作出的最大示范。

（八）与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有机衔接

长期以来，我国及长三角地区以向东开放为主，长三角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发展较快。当前，我国需要构建东西双向开放的新格局，尤其要突出向西开放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我国及长三角面向全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以我为主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上海等中心城市可能成为企业总部集聚地区，将传统制造加工职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转移。长三角地区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企业家抱团投资在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工业园区。另一方面，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充分结合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将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转移，避免相关产业过度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实现真正的产业“溢出效应”，而不是产业退出的“外移效应”。

参考文献

[1]刘志彪：《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再思考——兼论促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与手

段》，《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37～46页

[2]洪银兴王振曾刚等：《长三角一体化新趋势》，《上海经济》2018年第3期，第122～148页

[3]刘志彪：《长三角区域合作建设国际制造中心的制度设计》，《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47～55页

[4]权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发挥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上海城市管理》2018年第4期，第2～3页

[5]徐琴：《多中心格局下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现代经济探讨》2018年第9期，第36～40页

[6]江南：《G60科创走廊：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重要引擎》，《江南论坛》2018年第6期，第21页

[7]高长春：《长三角区域创新网络协同治理思路和对策》，《科学发展》2018年第9期，第35～46页

长三角一体化离不开区域市场一体化

张月友[※]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战略之一。从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和参与全球竞合需要出发，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打造创新包容、开放合作、领先全球的超级经济圈，把长三角建设成为全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无论对长三角自身还是对国家而言，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长三角一体化意味着长三角发展进入了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服务和治理等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时代，经济一体化仍然是基础，是最快和最容易看到区域一体化效果的领域。区域市场一体化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更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可以说，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离不开共同市场建设。没有区域市场一体化，就没有长三角一体化。

长三角市场一体化是指长三角地区市场发育达到该区域各地经济在社会大分工基础上能融为一体市场，包括关联商品的市场一体化和关联要素的市场一体化。随着我国推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一体化政策部署突破了行政区划限制，地区间各自为政的状态得到改善，总体上实行了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地区也开始从竞争走向竞合道路。特别是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所在地的长三角地区，很早就建立了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今年初，长三角三省一市更是联合组建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并在上海正式挂牌成立，在推动解决长三角一体化瓶颈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

但是，在市场一体化方面，长三角地区仍然没有改变程度尚浅、水平不高的局面。在消费市场，区域内对一些烟酒、汽车、家用电器等高税率商品设置市场壁垒和制定歧视性规定的做法还没有根除，不同城市的交通卡和银行卡还只能在狭小范围通行通用，教育养老和医疗的封闭过度管制问题尚未破冰，出入境签证、车辆出入境、边防通关检验等也尚未实现就地解决，等等；在生产市场，区域内省（市）际间重要运输通道上不准外地车通行或对外地车设置收费关卡问题依然严重，外地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想要进入本地销售并享受本地政府的补贴政策非常困难，企业间兼并收购受制于地方政府干扰和阻碍，各地金融业结构构成存在较大差异、发展不平衡，各地营商环境等软环境差异对高级人才流动和区域内产业梯度转移具有约束力等等。探究背后原因，寻找解决方法，加快推进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努力。

[※] 张月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本文原载安徽日报 2018 年 12 月 18 日第 011 版。

第一，长短结合，共享发展。长三角不同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给市场一体化造成阻碍。总体来说，上海率先进入了经济服务化社会，浙江和江苏步入工业化后期，安徽还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其直观结果表现为，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不同区域间的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占有财富等重要指标继续分化，人民生活水平的区域差距明显，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破除这类梗阻，应从顶层设计入手，坚持共享发展，在中长期解决好长三角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问题。短期内可以紧扣长三角区域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大体均衡目标，从公共服务供给切入，去除城乡和区域间资源配置不均衡、硬件软件不协调、服务水平差异较大等短板。

第二，互通互联，突破短板。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还存在一些阻碍市场一体化的自然和技术因素，比如地形地貌、交通运输欠发达、标准不统一等。破解这类梗阻，应在流通设施互联、建设信息共享平台和共同研究制定适应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要求的准入制度，健全市场化退出机制上下功夫。前者要求健全长三角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完善长三角综合运输通道和区际交通骨干网络，形成互联式、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体系。后者要求长三角三省一市建设好协同监管的信息共享平台，促进政府行业技术管理和监管执法信息的归集、交换和共享，加快探索建立统一的区域市场规则体系，推进区域标准化合作和标准化体系建设。

第三，创新体制，保驾护航。当前，长三角区域内向沿海发达地区倾斜的政策和各地主导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仍然存在，各地对市场一体化发挥重要作用的城市化水平、人口素质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依旧存在差距。各地政策目标差异导致地区规划方向不一致，加剧了区域内的产业同质化竞争、地方保护和市场化进程不一致，不利于长三角统一大市场建成。破除体制机制所致的长三角市场一体化梗阻，要求突破地方保护，继续清理市场经济活动中含有地区封锁内容、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及各类优惠政策，促进区域内规则透明、竞争有序，并建立三省一市基于利益联结分享机制上的区域协调机制，努力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赢发展。

在同城化基础上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洪银兴[※]

一、上海与毗邻城市同城化的必要性

提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问题，大家通常的思路就是扩容，由原来的16个市扩大到了两省一市。但是扩容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基本条件就是扩大核心区的经济实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要解决区域内的联动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要彰显经济优势，只有优势增强了，才有条件扩容。因此，长三角不仅要成为全国的增长极，内部也应形成增长极，以长三角的内部增长极带动整个长三角的增长极。

长三角地区的内部增长极应以核心区的同城化为基础，先推进毗邻城市的同城化，培育形成增长极，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推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而这一核心区应以上海为中心，推进毗邻城市同城化，其范围应该包括浙江的杭绍甬，江苏的苏锡常通。毗邻城市推进区域一体化，其逻辑是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相互促进的经济板块，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二、上海与毗邻城市同城化的可能性

上海与毗邻城市同城化的可能性就是两者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以上海和苏锡常通的同城化为例，2017年苏锡常的GDP总额超过上海，苏锡常的人均GDP达到14万元左右，超过上海，苏州市工业总产值也已超过上海。因此，上海与毗邻城市的同城化并非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的关系，而是双方的优势互补。

产业结构方面，上海有服务业优势，苏锡常通有制造业优势；科技创新方面，上海作为科创中心，有科技创新成果，但受土地等要素的限制，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缺乏足够的场地。苏锡常通不仅有空间，而且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强，对科技创新成果的需求旺；社会要素方面，上海以文化、医疗为代表的社会发展水准是全国最高的，这些都为苏锡常通地区的现代化所需要；城市化和人口方面，上海明确提出要建设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的瓶颈在于产业和人口的拥挤，迫切需要像北京搞雄安新区一样在毗邻城市进行疏解。苏锡常通的城市现代化需要上海提供现代城市要素，上海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对苏锡常通来说也是迫切需要的现代城市要素，两者能够互补。因此，通过同城化能够增强上海的扩散能力，毗邻城市有土地空间，有较低的房地

[※] 洪银兴，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本文原载《上海经济》2018年第3期。

产价格，有较低的劳动成本，这些正是上海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

三、上海与毗邻城市同城化的对策建议

同城化的实质不是成为一个城市，而是要共享发展资源、发展成果。同城化是在不同空间同城规划基础上的基础设施的互通、共享，以及公共服务和基本生活标准的趋同，包括产业布局的同城化、交通出行的同城化、通勤就业的同城化、人口居住的同城化、公共服务水准的同城化、环境保护的同城化等等。以上海为中心的核心区同城化，其抓手主要有制度合作、基础设施共享、功能分区等等。

所谓同城化的制度安排，就是要减少分割，实现制度和政策的对接。首先，通过区域共同市场，建立统一、公平、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第二要实现资本、人力、科技、信息等各类生产要素的跨市优化配置，降低区域商务成本；第三是构建合理的税收转移机制和同城共享创新收益机制。南通在启东大桥建设以后，和张江靠得很近。张江是国家的科技中心，成果在上海转化或者在南通转化，牵扯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收益和税收问题。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税收的转移机制、同城共享创新的收益来解决；此外，要建立柔性的人才流动机制，能够使高端的创新创业人才在整个同城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

基础设施共享是区域一体化的战略先导。推进各个大桥连接的跨江城市同城化，长江上一座座大桥建起来，苏南和苏中已经连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完全有条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同城化需要有同城规划，最关键的是解决基础设施的互通、共享，以及公共服务和基本生活水准的趋同。

同城化需遵循功能分区原则。首先是要解决生态的融合，由产城融合扩大到产城生态融合。上海与周边城市的规划中都应该有生态功能区。其次是产业的协同，实现区域内城市的横向错位发展和纵向分工协作，整体推进上海和毗邻城市的科技和产业创新的一体化。通过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化能够解决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问题。上海是国家的科创中心，苏锡常通是国家的科技产业基地，两者相结合将会产生巨大的作用。所以在上海与毗邻城市同城化过程中，高科技产业的协同发展能够真正成为国家示范。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轨迹、逻辑与战略转变

凌永辉 刘志彪[※]

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总量规模还是在内部行业结构上，中国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仍相当滞后。这种现象发生的背后逻辑在于出口导向战略下的国际代工模式在供给层面对国内本地化的服务业企业产生了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同时也在需求层面上造成了负向的市场挤出效应，而且随着全球化分工的深入，这种市场挤出效应正在逐渐超越技术溢出效应。据此，本文提出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服务业发展亟须转向内需主导型战略的重要命题，主张依靠国内市场主体的有效需求为主导，虹吸国内外优质生产要素为我所用，在差异化的垄断竞争中，促进当前及未来服务业的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服务业；出口导向；内需主导

过去40年来，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了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当中，服务业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最末产业一跃成为第一大产业，逐渐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典型事实似乎也符合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段由中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转换过程中，国民经济必然出现服务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规律。但是，这一客观规律在中国情境下的具体表征是什么？符合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吗？在当前的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这些问题亟需得到科学回答。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事实，概括总结其历史轨迹、内在逻辑，描述改革和开放在中国服务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服务业发展必须加快转向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命题，并对这一战略的基本内涵、作用机制、实施前提以及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规模

1. 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总量十分可观

改革开放以来，受惠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一些所谓的“寄生性”服务业部门也得以“平反”，开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905

[※] 凌永辉，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培育建设单位）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首批特聘教授。本文原载《经济学家》2018年07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协调发展研究”（16JJD79002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学科共建项目“逆全球化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驱动力研究”（GD17XYJ01）

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427032亿元^①，年均增长率达到18.1%，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24.6%增加到2015年的50.2%，这是继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之后，首次跨越50%大关，2017年这一比重继续升至51.6%，中国的“服务经济”时代由此开启^②。这一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每年增加1.9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其比重呈现不断加速上升趋势^③。

2. 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要渠道^[1]。自1978年以来，随着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先上升后趋稳，服务业就业比重也表现出相对较快的上升趋势，然而，中国服务业在吸纳劳动方面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潜力。权威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高达33757万人，相较于1978年的4890万人，整整增长了5.9倍。但2016年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比重也只有43.5%，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统计，2016年属于发达国家的美国和日本，其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高达81.3%和69.6%；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巴西和保加利亚，其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63.3%和63.6%。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就业的增长率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服务业发展的行业结构

1. 专业化发展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行优先发展物质生产部门（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国家战略，因而服务业部门发展极其落后，门类也很不健全，而且常常是内嵌于物质生产部门当中，比如很多国有企业往往都设有食堂、幼儿园等等。但在1978年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大量为生产活动进行服务的各种辅助性部门逐渐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服务部门，这样一来，服务业从无到有，规模逐渐扩大，在专业化和规模化效应的作用下，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快速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从1978年的0.1851亿元/万人稳步提升至2016年的11.3819亿元/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1.4%。而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明显加速上升的趋势。

2. 行业异质性导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服务业作为一个庞大的部门，它所包含的行业是十分芜杂的，各行业生产技术也呈现很大差异^[3]。这就决定了服务业具有很强的行业异质性。譬如，有些服务业部门的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生产过程能够脱离消费过程独立实现，在达到一定的标准化水平之后，服务劳动的机械化替代也成为可能，因而其生产率的提升就比较快速；而有些服务业部门的可标准化程度较低，所要求的个性化程度高，甚至生产过程本身也需要消费者参与，因而其生产率提高就十分缓慢。表1描述了1991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二者在2011—2015年间的均值分别高达102.5亿元/万人和129.0亿元/万人，在2006—2010年间的

①本文采用国内产业划分标准来进行界定服务业，即基于GDP核算体系中的第三产业。

②根据Fuchs（1968）的研究，服务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服务业产出超过总产出的一半以上^[1]。

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限于篇幅，本文未呈现1978—2017年的数据列表，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如无特别说明，后文均同。

均值也达到了85.4亿元/万人和81.0亿元/万人，均远远超过其他服务业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其中，教育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是最低的，2006—2010年、2011—2015年两个时期的均值分别只有5.8亿元/万人和11.3亿元/万人。进一步观察表1可以发现，劳动生产率最低的行业除了教育以外，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表 1 1991—2015 年中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单位：亿元 / 万人

行业名称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2	2.1	9.8	25.4	65.0
批发零售业	0.9	1.4	12.3	39.9	40.1
住宿和餐饮业	—	—	21.9	32.8	38.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35.4	44.5	48.4
金融业	8.5	14.8	17.0	35.4	74.1
房地产业	10.4	15.3	33.0	85.4	102.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	0.0	13.4	19.2	34.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0	2.7	6.0	14.9	28.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4.5	6.5	11.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51.9	81.0	129.0
教育	0.5	1.2	3.5	7.9	14.3
卫生和社会工作	0.7	1.4	3.5	7.9	14.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9.1	14.9	27.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0	1.8	3.7	9.1	14.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一些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十分低下，这或许与Baumol（1967）所说的服务业“成本病”有关^[4]，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改革

1. 从严格管制到逐渐放松

建国以来，中国基本上沿用了苏联的政治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主要是重工业和轻工业“两大部类”，服务业基本上是被排除在外的。随着 1978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序幕的拉开，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开始逐渐回归到中国的主流经济研究中来。许多学者认为，服务业的相关问题研究应当和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部门研究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5][6]}。在服务经济理论取得了一定

进展之后,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服务业改革正式展开。但中国服务业改革走的也是一条“渐进式”变革之路,即按照先易后难的基本原则,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化转轨。在《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实施之后,国务院又在2007年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而且近年来还陆续出台了家庭、养老、健康、文化创意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指导意见,2014年又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等等。对这些正式文件进行概括总结,可以看到:首先是开始建立和完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相关指标,为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其次是在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对外贸易、教育、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逐步放宽对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再次是有步骤地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最后是通过试点负面清单制度,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来加快推进服务业发展。

2. 市场化改革任重道远

尽管上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使得服务业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中的第一大产业。但是,从过去40年来的发展实践来看,改革的成效还尚未充分显示出来。究其原因,体制机制束缚仍然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以银行业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业不仅存在着非常高的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进入障碍,而且还存在严重的市场垄断问题^[7]。自2003年启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资产总额中的比重,从55.5%下降到2016年的40.3%,但是几大国有银行的市场地位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改变^①。而且,即使是在2015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后,各地主要商业银行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并通过该机制就存贷款利率浮动上、下限达成一致意见。显然,此举涉嫌价格合谋,违反《反垄断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依靠成立具有垄断嫌疑的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实际上使利率市场化又回到原先的双轨制中去了,而这也导致商业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成效大打折扣。因此,如果不能真正地做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不能说服务业的体制机制束缚得到有效破除。中国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四) 服务业发展的对外开放

1. 服务贸易和FDI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获得了蓬勃发展。图1描绘了1982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金额及其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情况。从图1可以发现,中国的服务贸易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1982年至1991年为第一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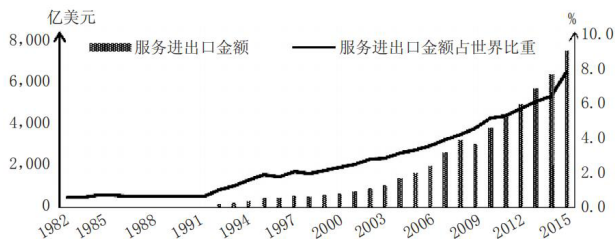


图1 1982—2015年服务进出口金额及其占世界比重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数据库。

①数据来源:利用历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段，这一时期的服务贸易刚刚起步，其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44亿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108亿美元；1992年至2000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服务贸易稳步持续增长，其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从1992年的1%增加到2000年的2.3%；2001年至今为第三阶段，随着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入了一个增长的快车道，其进出口总额从2001 年的 719 亿美元快速增加至2015年的7130亿美元，15年间增长了近10倍。而且，近些年来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在利用外资的结构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制造业呈现小幅下降趋势，服务业则表现出迅猛上升的特征，中国的服务业正在成为吸引外资的新热点，有利于优化宏观经济结构^[2]。

2.服务业开放结构需进一步优化

然而，在服务业对外开放中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从1992年起，中国服务贸易表现为持续逆差，而且近年来呈现持续扩大趋势，2014年达到历史最高的1971亿美元（见图2）。这一事实说明，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在国际竞争中没有优势。如果进一步剖析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对外开放情况，我们发现造成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开放结构较为粗放。表 2 列示了 2004 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FDI实际利用金额情况。从表2可以看到，房地产业一直是利用外资金额最高的服务行业，2013—2015 年的均值达到了 308.1 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 批 发 零 售 业，2013—2015 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平均达到了81.6亿美元。然而，像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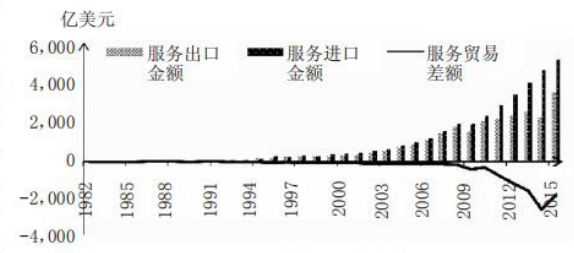


图2 1982—2015年中国服务进出口差额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库。

表 2 2004—2015 年中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 FDI 实际利用金额 单位：亿美元

行业名称	2004—2006	2007—2009	2010—2012	2013—201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6.900	24.618	29.694	42.863
批发零售业	11.892	41.664	81.607	109.992
住宿和餐饮业	7.449	9.414	8.265	6.18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004	21.690	28.480	31.571
金融业	2.553	4.287	17.175	71.605
房地产业	65.326	174.916	249.973	308.06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5.973	50.519	79.079	109.65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811	13.653	25.068	35.11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878	3.897	8.744	6.80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073	9.595	17.003	6.988
教育	0.285	0.275	0.155	0.227
卫生和社会工作	0.473	0.244	0.773	0.95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315	3.423	5.357	8.11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0.042	0.002	0.004	0.04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ind 资讯的相关数据整理。

服务业，吸引外资的比例仍然十分有限。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因此，从直观上讲，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

二、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在总体规模、行业结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多个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是相当滞后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因素在于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从供给视角来看，以国际代工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国内本地化的服务业企业带来了可供模仿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从需求视角来看，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引入的外商企业基本上是纵向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其所需的配套服务也大多由外商提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对本地化的服务业企业造成了负向的挤出效应。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服务业就是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艰难成长起来的。

（一）出口导向中的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是指技术在跨国公司技术源与东道国技术接受企业之间的非自愿扩散，其实质是一种经济外部效应。通过这种技术扩散，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或生产力能够取得跨越式进步。随着全球化分工的深入演变，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上的比较优势迅速融入到了全球价值链当中，形成了以国际代工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应该说，由于中国本土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之间客观存在的巨大技术鸿沟，这种先选择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进行国际代工的企业战略，不失为一种避开发达国家阻断中国企业融入国际产业分工的次优路径。在这一过程当中，外商企业将会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对本土服务业企业产生技术溢出。从直接途径来看，一方面，外商企业的高技术效率会对本地企业产生示范效应，其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将被本土企业直接进行复制或模仿，包括企业的研发能力、品牌运作能力、产业链的管理能力等。譬如美国沃尔玛公司在墨西哥子公司发展冷链（Cold Chain）技术，引发墨西哥本土零售商也先后发展这个技术，即示范效应产生技术溢出^[8]。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对本地化的劳动者进行专业化培训，而这些劳动者可能会在学习到专业技能、市场营销网络或管理能力后，“跳槽”到本土服务业企业担任重要职位，此即所谓的人才流动效应。可见，不论是示范效应还是人才流动效应，都将使得本土服务业企业从外商企业引进过程中获益良多。但除此之外，外商企业也还会通过一些间接途径对本土服务业企业产生技术溢出。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大而全”或“小而全”的组织结构，服务和生产环节是一体的，这种企业组织方式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效率损失。而改革开放后实施了较为全面的出口导向政策，外商企业在高度专业化分工机制的作用下，通过服务外包方式向东道国进行服务产业转移，从而刺激本土服务业企业大量地从制造企业中专业化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产业部门。外商企业对本土服务业企业的这种技术溢出往往是比较隐性的，对

本土服务业企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二）出口导向中的市场挤出效应

然而，在出口导向的国际代工模式下，中国的本土产业也陷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陷阱中了，加上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本土设立研发中心，利用其技术、资金等优势形成了对国内本土生产性服务市场的供给垄断，在很大程度上挤出了本土服务企业^[9]。正如江静和刘志彪（2010）所指出的，国际代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封闭的网络生产体系，制造业的繁荣并没有形成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反而对生产性服务业造成了严重的市场挤压^[10]。而且，这种由于出口导向战略所导致的本土服务市场挤出效应，还具有产业层面上的双重叠加性质。具体而言，一方面是从制造业角度来看，外商大量投资制造业，将其处于衰退期的或者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环节转移至东道国，必然会在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等领域与本地服务企业形成全方位竞争^①。特别是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源，往往偏好进入所谓的“外企”工作，这将导致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缺乏足够的人才支撑，服务外包也被锁定在一些低附加值环节。另一方面，从服务业角度来看，由于不同国家间政府管制、文化壁垒的存在，外商生产性服务企业进入东道国可能面临着信息障碍，因此，生产性服务企业就倾向于跟随母国的下游制造业企业进入东道国^[11]。这样一来，外商服务企业将在地域上形成联动效应进而满足外商制造业企业的服务需求^[12]。国家权威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高达838.9亿美元，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66.6%，而这一数字在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只有20.3%（2002年），14年来年均增长率达到8.9个百分点^②。这表明，日益扩大的服务业外商投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出口导向战略下的国际代工对本地服务企业产生的市场挤出效应。

三、新时代背景下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转变

上述经验分析表明，出口导向型战略是中国过去服务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分工不断深化的作用下，它所引致的市场挤出效应正在逐渐超越技术溢出效应。因此，这一战略断然不可持续，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战略必须从出口导向型战略加快转向内需主导型战略，促进服务业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可以说，实行基于内需经济的服务业发展战略无疑是中国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向后工业阶段实现过渡的主要路径。这当中主要有三个问题需要分析：一是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基本内涵是什么；二是内需主导型战略对服务业发展有着怎样的作用机制；三是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实施前提有哪些。本文接下来将对这些关键问题进行剖析。

（一）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基本内涵

内需的概念，从狭义上理解是指“对国内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它涉及的是国内产出品与进口品的竞争替代问题；从广义上理解则是指“来自国内的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涉及的是

①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处于衰退期的制造环节之所以能够进行国际转移，而且还能够在发展中国家虹吸大量的高级生产要素，主要是因为按照经典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技术落差，在发达国家处于衰退期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正处于成长或成熟期。

②这里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是实际使用金额，数据来源于2003年和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

有效需求来源于国内还是国外的问题^[13]。内需的这种狭义和广义之分，其实是来自于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的差异。就本文而言，内需更强调宏观视角下的广义理解。为此，我们认为，内需主导型战略的本质内涵就是依靠国内市场主体的有效需求为主导，虹吸国内外优质生产要素为我所用，以促进产业创新和发展。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国内人口规模、城市化进程等都无一不显示出巨量的市场潜能。当国内市场主体的这种潜能被激活并形成有效需求时，中国经济完全能够以内需为主导实现质量型增长。一方面，大国经济的内需市场具有“规模效应”，能够虹吸全球创新要素在国内形成集聚，既服务于传统制造业升级，也促进现代服务业加速发育；另一方面，大国经济的内需市场还具有“竞争效应”，能够促进产品或服务的多样化和差异化，既有利于契合当前的个性化定制潮流，也有利于避开发达国家的同质竞争，从而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实际上，美国在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的崛起，走的就是一条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道路，其特点表现为宏观层面的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微观层面的企业存在强烈的内向倾向（先在国内发展，后向海外发展）^[14]。从美国内战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在人口增长伴随着人均收入增长的条件下，购买力不断提高，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得市场更为集中，运输成本和沟通成本不断下降，导致市场进一步扩大^[15]。在这期间，美国公司均是在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国内营销网络之后，才走上对国外市场的商务和资本扩张之路的。迈克尔·波特（2007）在分析国家竞争优势的时候也指出，产业竞争优势的创造与持续应该说都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16]。

但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提出的内需主导型战略并非等同于所谓的“闭关锁国”，内需主导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并不矛盾。从学理上说，内需主导型战略既能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如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并在国外销售；也能以封闭的方式进行，如在国内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殖过程，不与国际经济发生任何联系^[17]。事实上，美国经济崛起所走的内需主导型发展道路，选择的就高关税保护下的封闭方式^①。但是，当前时代的全球化市场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产品、服务、要素等国际间流动极其频繁，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的。从这一点来看，实行保护主义并不现实。因此，中国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不仅不会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动相冲突，反而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实施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18]。（二）内需主导型战略的作用机制众所周知，在出口导向型的国际代工模式中，外商牢牢控制着以现代服务为代表的中间需求，本土服务业发育的土壤被抽离了。不同于出口导向型战略对中国服务业产生巨大的市场挤出效应，在内需主导型战略下，服务业的发展不会受到这种市场挤出的影响。此中缘由在于：（1）从服务业发展的供给推动来看，内需主导型战略是以国内市场主体的需求为导向，在内需驱动的国内经济大循环中促进差异化的垄断竞争，实现价值链“链主”的培育。对于异质性较强的服务业而言，这种内需驱动作用更为显著。这是由于在整条价值链条中，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均代表了“微笑曲线”高附加值的两端，两者都属于服务业范畴，而且这些环节尤其强调差异化竞争。因此，内需导向将刺激国内本土的服务业企业向这些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集聚。而且，在大国经济中，这些本土服务业企业可以凭借规模效应，有效地降低

①美国自内战发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长期保持在40%到50%之间。参见贾根良（2011）^[14]。

向价值链高端环节集聚的成本。(2)从服务业发展的需求拉动来看,出口导向战略下的国际代

工模式虽然促进了制造的全球化,但无法为服务业全球化提供动力,从而导致中国服务业发展具有典型的本地化特征。与此相反,如果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则有利于利用我国庞大制造业的“市场需求”优势,在发展先进制造、智能制造的基础上,通过产业间的互动协调效应,拉动中国服务业的质量型发展。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主导型,是要在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之外,另行构建中国本土企业主导的价值链,其形式既可以是国内(区域)价值链,也可以是全球价值链。但不论何种形式,本土服务业企业有了可以发展的市场基础。实际上,由于母市场效益(Home-Market Effects),极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让大国成为差异化产品的净出口国^{[19][20]}。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贸易形式的出口也将会大幅增加,本土服务业也就获得了一个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加速器”。

(三) 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实施前提

内需主导型战略要取得成功的前提是作为大国经济的内需潜能被有效激活,其中的关键是真正建立起国内统一市场。尤其是对于价格普遍较高的服务业而言,形成以收入均等化为特征的大规模国内市场至关重要。这当中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投资需求的“有形之手”问题。长期以来,投资需求是驱动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但由于受到过去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这种投资驱动带有强烈的行政干预色彩。譬如,地方政府在GDP考核之下往往会利用“有形之手”干预投资偏向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在短期内刺激GDP增长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而对服务业投资比重偏低,即使在服务业中又偏重房地产业;甚至在一些新兴产业中,地方政府也常常“一哄而上”,最终导致严重的产业同构和产能过剩问题。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主要原因还在于行政分割,具体表现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的双重壁垒。在产品市场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限制外地商品和服务进入本地市场,在烟酒、食盐等财政支柱产业表现尤为明显。甚至在一些品牌连锁经营中,由于总店和门店不在同一个本地市场,于是就要按照地方政府要求进行双层缴税,这样一来,就加重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极其不利于实体经济振兴。在要素市场上,劳动力受到户籍、公共福利等影响难以在地区间实现自由流动,基础设施建设在不同地区间经常出现互不配套、不衔接、不畅通等问题,从而造成中国国内市场的严重“碎片化”。因此,实施内需主导型战略必须明晰地界定政府权力边界,防止“有形之手”过度干预和扭曲市场投资配置效率。二是消费需求的“消失之谜”问题。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固然有统计分类差异的原因^①,但根本上还是由城乡二元化的经济结构所导致。一方面,人口城市化的滞后拖累了消费需求增长。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总收入在8000—10000美元时,其人口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5%左右。2016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8620美元,但人口城市化水平只有41.2%,其损失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规模预计达31609亿元之巨,高达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9.51%^[21]。另一方面,城乡土地产权的二元

体制，不利于农民消费需求增长。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个体对土地是没有所有权的，而只有使用权，这就决定了其无权出售和抵押土地，而且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又容易造成土地权属关系不明晰。因此，这些资产是无法转化为财富的“死”资产，农民无法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发展成果，其消费力也就被大大地限制了。

四、服务业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的政策取向

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内在逻辑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从出口导向型战略转向内需主导型战略对未来实现服务业的质量型发展极其重要。为此，本文提出服务业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的几点政策取向：

第一，加快推进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切实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在宏观上，政府应该积极完善有利于市场统一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等，通过司法体系改革、交通运输、互联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地区间互联互通；在微观上，政府应该大力拆除中小服务业企业进入的“旋转门”、“玻璃门”等，鼓励企业间组建大规模联合组织，通过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积极整合农村市场初级产品与城镇市场高附加值产品的产业链。

第二，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来优化投资结构，提升国内需求质量。过去，中国实行的投资政策是以正面清单为主的混合清单管理模式，即通过实行严格的审批制，政府规定哪些领域可以做，但这种审批制对服务业存在很多垄断和管制，也严重干预个人、企业 and 市场等微观主体的投资决策，抑制微观主体创新^[22]。因此，要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除了负面清单上列明不能投资的领域外，尤其对于农林水利、公共社会服务类、研发技改等支持类的投资项目，要全面放开市场准入、打破行政垄断，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

第三，加快建设新型城镇化，释放国内需求潜能。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提升城市的市民幸福、公共福利等内涵层面，内在地要求了户籍、土地和财政制度必须进行联动改革：一是建立和完善全民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剥离与户籍挂钩的利益分配功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全面落实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尽快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探索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互换机制；三是主动改革财税体制机制，考虑试点实施全面的财产税，积极研究针对所有财产及其保有、获得、转让等各个环节应该征收的合适税率，从而拓宽税基、稳定税收。

第四，注重发挥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互动作用，在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的服务业经济体系。世界各国的发展事实表明，在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过渡的阶段，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互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忽视这种产业互动，一味地推崇经济服务化必然导致“产业空心化”，陷入拉美国家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如果能够在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过程中，充分发挥产业互动作用，也就能够为服务业的质量型发展奠定坚实的产业支撑。

第五,积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历史机遇,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促进服务业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互利合作平台,在运输服务、旅游服务、通信服务、金融服务等开展全方位的国际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化的工业化阶段形成了典型的产业梯度,有利于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促进中国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参考文献:

- [1]FUCHS V R. The Service Economy[M]. New York: UMI Publishing, 1968.
- [2]夏杰长. 中国服务业三十年: 发展历程、经验总结与改革措施[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6):42-51.
- [3]黄少军. 服务业与经济增长[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 [4]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3): 415-426.
- [5]李江帆. 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1984,(3):53-68.
- [6]刘 伟,杨云龙.工业化与市场化:中国第三次产业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J].经济研究,1992,(12):3-11.
- [7]刘志彪,凌永辉. 对商业银行反垄断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基于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考[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1):1-6.
- [8]IACOVONE L, JAVORCIK B, KELLER W, TYBOUT J. Walmart in Mexico: The Impact of FDI on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Productivity[R]. Working Paper in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09.
- [9]凌永辉,张月友,沈凯玲. 中国的产业互动发展被低估了吗?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1):23-41.
- [10]江 静,刘志彪. 世界工厂的定位能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吗[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3):62-68.
- [11]RAFF H, VON DER RUHR 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roducer Services: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R].Working Paper in CESifo, 2001.
- [12]江 静.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产业发展[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3]刘志彪. 战略理念与实现机制:中国的第二波经济全球化[J].学术月刊,2013,(1):88-96.
- [14]贾根良. 美国经济崛起时期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J].教学与研究,2011,(8):53-60.
- [15]斯坦利·L·恩格尔曼, 罗伯特·高尔曼.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M].高德步、王珏、李淑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16]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
- [17]刘志彪.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2):51-59+159.
- [18]戴翔,张二震.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发展道路再思考[J].经济学家,2018,(1):70-78.
- [19]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 70(5): 950-959.
- [20]HELPMAN E, KRUGMAN P R.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 [21]周天勇. 经济不振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EB/OL].(2017-08-04)[2018-02-04].
<http://finance.sina.com.cn/zl/stock/2017-08-04/zl-ifyitamv5131456.shtml>,2017.
- [22]凌永辉,张月友,徐从才.负面清单制度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吗?——来自中国《行政许可法》自然实验的间接证据[J].当代财经,2017,(5):89-102.

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逻辑、精神和向—— 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而作

刘志彪[※]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逻辑，是正确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取向改革不足抑制全社会活力和生产率，市场取向改革过度则会造成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混乱。迄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出现过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大规模地从贫困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先例，因而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经验具有推动世界发展的巨大价值。过去我们一直侧重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纵向治理体系改革，现在需要高度重视其中的横向治理体系改革。让市场造市场从而形成强市场，让政府在社会发展和民生发展方面形成强政府，这种双强格局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政府与市场，市场取向改革，改革开放精神，强市场与强政府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由此产生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它是一个亟待破解的有着重要经济学意义和现实政策价值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世界奇迹，是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胜利。改革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和困难，是市场取向改革推进不足或市场取向改革推进过度的综合产物。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局面和新思考，仍然要在市场取向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塑造政府和市场在各自领域中“双强”的经济体制。

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主要阶段和特点

我们大体上可以从三个视角对中国改革的阶段和特点进行梳理、归纳和整理。

(一)改革阶段划分视角之一，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讲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逻辑是正确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第一个阶段是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个阶段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计划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里引入市场调节。很显然，体制中的主体仍然是计划，辅助的东西才是市场。比如工业企业产出的主要部分交给国家安排，按照计划定价进行调拨；超过计划安排的部分允许放到市场上进行销售。这就出现了价格的双轨制，一个是计划内的价格非常低，经常发生短缺；另一个是

市场上的价格非常高。由此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大家都有积极性做市场，而对完成计划任务得过且过。于是就产生了另外一个现象，即一些有权的人会想办法把计划内的实物、指标拿到市场上倒卖，以获取高额的差价和利润，这也就是所谓的“倒爷”。计划与市场的摩擦在这种经济体制中是必然的，1988年后摩擦达到顶峰，引起了整个国家广泛的通货膨胀。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中国加入WTO之前。在这个时期中我国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以市场取向的大幅度改革。早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就是说主体已经是商品经济了，但这个商品经济是有计划的。这种有计划，并不意味着它是计划经济，因而这种提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应该说，改革从此进入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计划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样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实际上，这种经济体制其实就是政府放开大部分计划控制的部分，但是在重要领域当中，中央计划还占据主导性的位置。不过，从总体上看，绝大部分的生产销售活动已经全部放开了，其本体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在这一阶段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革，最主要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同时随着外资的大量进入和竞争，大量的地方国有企业、集体经济被改制为民营企业。因为市场经济作为本体，商品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国有企业、集体经济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所以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微观基础的变革。

第三个阶段，就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到现在这段时间，我国对经济体制改革有了新的提法，即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邓小平的理论，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一段时期中有了大踏步的前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坚持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其实就是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这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到十九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个表述上又做了两次微调。一次微调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成了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另一次微调，就是改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现在把这个市场和政府用逗号分开，意味着市场做市场该做的，政府做政府该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仍然是市场取向，而且是非常彻底的，既要纠正市场取向改革过度的地方，又要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不足的地方，重点是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配置的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过去两年，中共中央下发了两个文件，分别是《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两个文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和灵魂。同时，2018年在宪法修正案提出了给地方政府赋予一定的立法权。显然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规范竞争的坚实的微观基础。首先，没有企业家，市场怎么能够运行呢？没有企业家，这个国家的财富怎么会大量地创造呢？其次，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如甄别和纠正一些冤假错案，是中央近期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它给予人以发展的信念和信心，这是市场经济不能动摇的基础。最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都是靠地方政府竞争。过去，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在法律上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因此宪法修正

案对于地方政府给予了很多的立法权，这是一个强化竞争取向的重要信号。所以十九大之后，我国市场改革取向的方向仍然是坚定不移的，而且比过去更加强调竞争对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是高质量竞争。

（二）改革阶段划分的视角之二，就是从政府和市场的改革方法来考虑中国改革的阶段

在这种视角的考虑下，第一个阶段就是政府造市场，或者说叫政府放开市场。因为以前是没有市场的，是政府放开控制后才逐步形成了市场。这是1978年之后逐步放开到八十年代末的情况。因为这个阶段市场的主体、机制、门类、功能都不具备，所以放开之后出现混乱就是必然的，比如1988年、1992年出现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市场秩序的混乱现象。第二个阶段，就是市场冲击政府。在这个阶段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混乱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腐败现象。过去政府官员的权力没有变现市场，现在不规范的混乱市场可以浑水摸鱼，批批条子、弄一些计划指标，就可以把权力货币化，这就是腐败。第三个阶段，政府矫正市场。也就是政府制定规则，规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市场取向改革过度的地方，把它收回来；市场取向改革不足的地方，就进一步推进改革。这个过程也是治理整顿的阶段。第四阶段，政府调节市场。此时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了，其功能也开始代替行政计划。但是市场是不完善的，有很多的缺陷，需要政府去发挥弥补市场失败的调节功能，如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最后一个阶段，其实我们还没有彻底完成，但是现在正在不断地往前推进，这就是通过市场来造市场，市场活动的日益泛化，内生地起到了深化市场的作用。

（三）改革阶段划分的视角之三，可以按照经济学套利理论来划分

第一个阶段是城乡套利阶段。表现为农村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往城市流动。尤其是乡镇工业的不断发展，农村社队企业变成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变成中小企业，不断进军原来被城市计划经济控制的领域，从而打开了市场经济的大门，冲破了计划经济的禁锢。农村的要素往城市大规模地流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伟大的、最激奋人心的重大事件，从江苏、广东、浙江大量的乡镇企业进入到城市工业为基本标志。

第二个阶段，就是国内外市场套利阶段。表现为1988年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浦东开发开放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三个时期。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经济利用国内外两种生产要素，两种资源，发展出口导向的经济，贸易的爆炸性增长赋予了中国经济增长巨大的动能。进出口贸易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曾经达到三分之二。我们现在仍然在进行的这个模式，已经遇到逆全球化趋势的巨大挑战，可能需要逐步更新为基于内需的新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这些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国内外市场套利。

第三个阶段，实际上已经跨越到要素套利的特征。就是要从过去利用低价格的生产要素来获取世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转向利用高级生产要素进行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这种要素套利才刚刚开始，还远没有完成。如果这个套利过程没法完成，那么中国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为这个阶段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各种要素的价格都在上升，这就很容易导致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上升。如果这种生产成本的上升，不能被随之而来的生产率上升、技术进步所消化掉，就会导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过去为什么中国的产品可以在世界上所向披靡，攻城略地，取得巨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所谓的“中国价格”，极大地降低了国外生产商采购成本。为什么会有这种中国价格，其实就是中国的要素竞争力强。中国的生产要素成本现在正在逐渐上升，我们的竞争力也在削弱，而竞争对手的竞争力，如中南美国家、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都正在往前赶。所以，如果你的要素价格在上涨过程中，没法通过技术进步来抵消的话，那么意味着你的产业国际竞争将逐步变得毫无竞争力可言。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增速下降，生产力下降，整个国家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这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国际上可以用一个指标来进行对比，即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中等收入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伴随研发投入、人均专利拥有量的迅速提高，一般来说，这个国家就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国家现在正在面对着这样一个套利阶段的转换，这是跨入到现代化国家前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门槛。

二、对 40 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精神内涵的提炼

提炼中国改革开放精神的内涵，有助于我们精简地知晓中国过去所取得的世界经济奇迹的有效经验，并在新时代继续保持和发扬这些精神，为早日实现基本现代化注入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另外，这些精神也是全世界人类发展史上的宝贵的知识性财富。毕竟，全球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大规模地从贫困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先例。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经验具有推动世界发展的巨大价值。

提炼、归纳中国改革开放精神内涵的方向和途径很多，不同途径和方向的归纳，都会有不同的特点和观察。如我们可以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角度，把40年来的发展概括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觉醒与奋斗、学习与创新、勤劳与勤奋等，也可以根据经济学原理，把这种精神概括为从利用比较优势，到创造动态竞争优势的学习能力。这里，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还是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联系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工作作风，来切合实际地进行大众容易认可的概括。

(一)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民间、市场、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全体中国人民投身发展的积极性和创新创业的热情

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体制的实质，是不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靠的是少数人的智慧，发挥的是少数人的积极性。坚定市场取向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集中决策变为分散决策，纵向命令协调变为横向市场协调，行政动力变为利益动力，由少数人推动的发展努力和积极性，变成全部社会成员的自觉的整体行动，变成全社会的自发的积极性。这就是在发展问题上走群众路线。市场取向的改革把进程建立在民众个人努力的基础上，鼓励大家都来投身

发展，这就使全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增加，使得中国人民的财富不断增加，使经济运行的效率不断上升。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制度下，个体无经济选择权，群体中成员个人无法获取与自己投入努力有关的成果，这势必助长群体成员的分配性努力，降低生产性努力。如此制度安排，社会生产力怎么得到激励而迸发出来，怎么不长期表现为短缺经济和供不应求呢？因此，当市场取向的改革纠偏了这种制度安排，就不难想象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活力的涌动，开始出现全民追求发展和财富增长的巨大浪潮。

（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去解决发展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改革显然是艰难的、有波折的，但是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不是退却，不是恢复旧体制旧做法，而是勇于面对矛盾和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和态度去解决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精神和态度，才有了前面所讲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前进。例如，过去中国改革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既有利利益者的问题。西方人推荐的激进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本质上是急速地、彻底地否定旧体制下形成的既有利益。实践证明，这种所谓的大刀阔斧地推进一揽子改革的办法，非但得不到广大社会成员的大力支持，反而会把许多本来赞成改革的人推到改革的对立面去，陡增改革的反对力量和社会成本。与休克疗法不同，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智慧地、聪明地采取了“增量改革”或“边际改革”，也称为“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改革，从而通过以时间换空间，有效地稳住了部分重要的社会成员，顺利地推进了新旧体制的交替和转换。

（三）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否定自己，纠正改革开放中的偏差，不断给自己加压

这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的否定自己的过程中进步，在给自己不断加压的过程中前进。在广东、江苏、浙江这些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都有这样一种不断给自己加压然后奋勇前进的精神。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之前，“农转工”是这些地区发展的初始阶段，浙江发展的是私营经济，广东发展的是“三来一补”的外资经济，而江苏走的则是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道路。九十年代初中期以后，一直到加入WTO之后，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是它们选择的主要发展道路。为适应这样发展模式，江苏在九十年代后期曾经对集体经济体制做过重大的修正，学习浙江和广东的经验，大力推进民营化取向的微观基础改革。广东和浙江在本世纪初，则对其产业结构进行了痛苦的大规模的调整，由此奠定了如今这两个省份经济的强大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之后，这些地区都在反思自己过去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自加压力，纷纷提出投资驱动转向建设创新型省份的目标，争取早日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三、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局面、新思考

未来的改革，坚持的仍然应该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过去我们一直侧重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纵向治理体系改革，现在需要高度重视和转向

其中的横向治理体系改革。

以放权让利为标志，纵向治理体系的改革是我国全部改革的起点。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财税改革是纵向治理中首选的改革突破口。我国过去的改革，往往局限于政府垂直封闭系统中的内部权力配置调整，或者局限于横向政府职能部门的分工或撤并，一个是条条放权，一个是块块放权。条条放权表现在中央各个部门向所属的底下部门放权，一直放权到基层部门；块块放权是中央给地方放权，一直延伸到基层政权。这些改革都是必须的，但是缺陷是并不真正涉及政府与社会、民间、市场、企业、家庭个人等层面的改革。这是中国社会、市场、民间和个人缺乏活力和创新力量的主要原因，也导致了民间、市场、社会组织形式趋于消失，功能不断弱化，无法承担起资源配置和各种社会经济治理的功能。

下一步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仍然要坚持过去的一些正确做法，这就是要在坚持纵向改革的同时，为了推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形成，需要重点转向横向治理的改革。横向治理体系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和难点，主要应在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前提下，努力发育社会组织、民间机构、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群体，把大量的集中在政府的权利，分散到市场、企业、企业家、家庭、个人这些主体上去。比如说企业行业协会功能要增加，企业家功能要增加，个人决策功能要增加，从而给企业真正的放权，增加个人的权责利对等性。因此未来改革的方向，其实就是要坚持以横向放权为主的市场改革方向。与此同时，政府应该从过去的盈利性部门中逐步退出，专职社会发展、民生发展，尤其是民生发展应成为政府的主要责任。这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一般来说，纵向治理改革尤其是作为突破口的财税关系改革，相对比较容易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因为这类改革是在政府部门内部进行的，改革表现为财权、事权和调控权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重新配置和调整，所涉利益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外溢，而且在统一政体下，官员工作岗位频繁变动，其特定位置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之间，并不存在那种固定的、长期的紧密联系。同时，考虑到政府内部具有令行禁止的科层特征，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可以用行政命令方式顺利推动，抵制和摩擦成本都比较小。这已被过去的改革实践所证明。

回顾分析中国历史上几次重要的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政府之间财权事权的重新配置和调整、集权抑或分权问题，一直是过去的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过去很多人对政府纵向权力配置的动态变迁特征，有过精彩的概括，即“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果回顾中国当代历次改革，则可以发现没有一次真正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死”的恶性循环的陷阱和巢穴。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走不出集权与分权问题的恶性循环的陷阱和巢穴，不在于强调中央权力大一些还是地方权力大一些的替代选择，而在于改革的主要措施和方针，局限于重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所谓“放权让利”。这种分权化改革的主要形式，一是中央向地方主动放权，另一是地方向中央主

动要权。在纵向改革取得突破性成就之后，都没有及时由纵向改革路径转向横向改革路径，没有使改革的主要措施转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个人的关系的调整，没有把发展权力柔性地下放给社会、民间、市场、企业和个人，因而受到严重行政压制的主体不可能有充分的活力和创造力，既缺少来自社会、民间、市场、企业的发展动力支持，也使政府规模在若干次非实质性改革中越做越大。这是过去纵向改革中集权与分权问题无解的本质原因，也为我们破解这个难题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实质性措施。

为什么我们难以顺利地进入横向分权改革？应该说，这种道理我们不是不知道，而是在实际的运行中，可能由于政府力量长期过于强大，使民间、市场、社会组织形式趋于消失，功能不断弱化，因而在其发育不足、功能残缺的条件下，中央集权体制难以放手实施这种本质性的调整和改革，无法让其承担资源配置和各种治理的功能，最后只能再次由政府承担起它自身不应该、不能够和不足以承担的各种社会经济职能。这大概是现在的政府“越位、错位、不到位”现象普遍盛行、难以克服的真正原因。

如果上述分析是对的，那么促使纵向改革转向横向改革的基本对策，就应该是选择改革政府职能和机构、放松市场和社会管制、培育替代政府配置资源功能的各种横向组织和机制等。即我们亚奥在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前提下，斩断政府与其千丝万缕的包办型联系，努力发育社会组织、民间机构、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群体。显然，这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是一致的。因为，与过去强调“政府管理”等完全纵向的控制关系不同，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要从政府单方面支配社会，转变到政府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与互相制衡。这需要重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利等等各种治理关系。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和建设的任务。

放松纵向控制的范围和程度，一个可能引起担心的主要问题是可能引起社会动乱。确实，在社会和民间的自组织机制匮乏的情况下，横向放权的过程可能就是混乱的过程。因人类社会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大范围的试验，因此这就制约了纵向改革转向横向改革的现实可行性。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必须把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摆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线中来。只有在法治框架下培育和发展市场和民间的自组织功能，才能够使整个国家和社会具有健康的微观基础，也才能够反过来促进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法制观念和法治实践的成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的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单是对收入和物质的需求，还有对就业、医疗、教育、安全、环境等一系列方面的现实和增长的需求。从需求的这些方面的内容看，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社会发展问题和民生发展问题。这就意味着，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它在这些领域和活动中是失灵的，是难以起正常的调节作用的，需要政府的强力干预和作为。政府其实是应该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也就是政

府要帮助国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好的教育、更安全的社会、更美好的环境等。只有在这一系列领域当中变成强政府，跟经济与市场领域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强市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所谓市场、政府双强的格局。否则，政府和市场的“双强”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可以预料到的逻辑是：政府代替市场，此功能增，而彼功能减。界定政府和市场各自的领域，在各自的领域中成为“双强”，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

中美贸易战将走向何方？

张月友[※]

受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的影响，金融投资者避险情绪急剧上升，资金纷纷撤出股市，全球证券市场全线收跌。由于股市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晴雨表，而且贸易战对外向型发展国家伤害更大，并可能推动全球经济基本面由复苏转向滞胀，中美贸易战后续走向受到万众瞩目。

根据法律依据的不同，国际贸易救济措施分多边措施和单边措施。依据国际法，在WTO框架下实施的贸易救济措施为多边措施，包括常见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除了使用多边措施限制他国产品出口外，还往往以其国内法为依据，对贸易伙伴实施贸易救济和制裁措施，这种措施则为单边措施。相对于单边措施的“傲慢自大”和“漠视他人”，多边措施通常被认为是解决贸易纠纷的较好方式。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贸易关税法，宣布美国可以单方面认定其它国家的贸易行为是不公平、不公正或不合理的，并由此展开贸易报复，这就是著名的号称美国贸易保护核武器的“301条款”。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后，由于多边主义压倒了单边主义，美国很少再使用“301条款”措施，使得这项具有威慑效应大、惩罚时间长、单边主义凸显特点的“301条款”实际上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但这一状态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得以改变。2017年8月14日，美国决定对中国发起“301条款”调查，主要针对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有关的法律、政策、做法或行为，重点调查中国企业是否“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美国企业做技术转让，以及美国企业是否被迫与中方合作伙伴分享现今技术”等议题，意味着“301条款”的复活。

美对华发起“301调查”有其特定的国际贸易和宏观经济背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对抗经济衰退、提振本国就业，很多原本崇尚自由贸易的发达国家纷纷转向贸易保护，尤其是逆全球化思潮在欧美国家大面积快速蔓延和流行。特朗普上任以来，实施了“宽财政”和“紧货币”的经济政策组合，推动了税改政策出台和货币政策加速正常化。虽然美国经济表面上还在继续上行，但由于减税增支将导致美国财政赤字继续增加，而美国2018年1月份的贸易赤字又进一步扩大至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从而，美国双赤字恶化成为特朗普任期的主要经济问题。这给美元造成伤害，使得自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正式就职以来，美元及其对人民币汇率一直呈现下跌趋势。更重要的，美元贬值并没有改善美国的出口继续恶化形势，这令特朗普宣布缩减贸易逆差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迫于多重压力，考虑启用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官员作为其贸易代表，对外采取贸易战策略，通过强势谈判为美国争取更大的对外贸易市场份额成为其现实的备选项。

[※]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原载《新华日报》2018年3月28日第013版。

可以说，美国此次挑起的贸易摩擦从一开始就应是有备而来，而且是对中国有恃无恐地赤裸裸地挑衅、恐吓和敲诈，不尝甜头，势必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充足的预案准备，必要时要对相关企业做好贸易预警工作。要洞悉美方具体诉求，摆事实说道理，阐明中国近5年特别是近一年来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所做的诸多努力，并重申中国不怕贸易战，贸易战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要避免将两国贸易矛盾扩大化，进而延伸到其他领域。对于国内立法和执法与涉及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标准不一致的地方，可以和美方协商达成一致。对其他由于美方依据单方面法律提出的无理要求，要坚决果断予以拒绝和回击，避免无原则地让步，以免致使美方后续继续使用“301大棒”对我国进行无节制地敲诈和勒索。立足贸易战影响，要关注下半年我国出口下降可能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困难，适当下修今年经济展望，并适时将国内防范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转移到预防房地产泡沫破裂上来。继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扩大内需。继续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积极拓展其他国际市场。

理清六大关系，建立四位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

刘志彪[※]

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讲的是实体经济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句话是要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要素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讲的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内容和应达到的水准；第三句话是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讲的是用什么办法去实现。其中，建立四位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必须理清六大关系。

一是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江苏科技研究水平比较高，但实体产业水平跟别人差距大。我们的科学研究、科技创新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而是陷入自我循环，就跟现在的金融一样，资金不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科技成果也不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科研的产业化。科研的产业化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把钱变成知识，二是把知识变成钱。在第一个阶段不应该强调科研产业化，但第二个阶段没有实现产业化就会造成两者之间的不均衡。

二是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关系。江苏最大的问题是实体经济非常发达，但是现代金融不发达。对我国来说，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实，资金在自己体系内运转，不进到实体经济里面，实体经济创造不了社会所需要的满意回报，吸收不到足够的资金。一方面虚拟经济太火，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挣不到足够的利润，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其实针对的都是实体经济，中国最大的泡沫是在实体经济领域。虚拟经济领域不能用行政手段去打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包括理财追求，理财追求得不到满足，就会想到房地产领域，这就是房地产泡沫不断积累的原因之一。虚拟经济领域中资产荒，导致房地产价格不断拉高，进而使实体经济开始衰退。

三是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之间的关系。这里面的主要问题是实体经济得不到足够保障的利润，因此人才不愿留在实体经济领域。大家所在的学校、所培养的学生，特别是985高校，有几个毕业生愿意到实体经济去当工匠？从家长的教育来看，哪一个学生的家长希望孩子上了大学后到实体经济里面去当工匠？接收不到最优质的人力资源，实体经济怎么发达？

四是科技创新与现代金融的关系。一般来说科技的早期阶段，比较适合直接金融进行支持，比如风险基金。而大规模产出阶段，比较适合间接金融来进行支持，比如银行融资。很多地方成立科技金融，让信贷去支持科技创新，难度很大。风险很大的科技创新领域，一定要用直接融资的方式、资本市场的方式来进行融资，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五是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的关系。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的要求非常高，但是我们人力资本供给不足。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向西方输出了大量的留学生，这帮人成长起来后，成为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基础。建议建立内需平台，形成一个强大的吸收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机制，中国内需起来之后，一定会吸引全世界最先进的资源往中国流动，这是未来很重要的战略。

六是现代金融与人力资源的关系。江苏有发展现代金融业的强烈要求，但金融人才比较少，人才都跑到上海、北京去了。建设强大的现代金融没有人才不行，现在大学里招生分数最高的是金融系，最聪明的学生都在金融系，毕业后都跑出去了。要建设一个四位协同的产业体系，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体系，得把最优秀的金融人才想办法引进来、留下来、留得住。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分工结构的调整与重塑

刘志彪[※]

内容提要：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被俘获”和“打工仔”的地位，不符合全球经济结构再平衡的基本要求和方向。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的调整与重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个是要努力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具体可以利用中国企业既嵌入全球价值链又嵌入产业集群的优势，通过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多种办法来实现；另一个就是要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契机，基于内需主动构建以我为主的、包容性的、崭新的全球价值链，重塑全球经济增长新机制。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产品内分工；产业集群；“一带一路”倡议

参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GVC)^①分工是中国全面、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从而实现发展与进步的重要表现形式。过去我国嵌入的是西方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GVC，在“被俘获”的低端环节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加工和装配活动。这一以“打工仔”为特征的产品内分工的格局，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收益和经济发展红利，但是也付出了包括资源环境过度消耗、产能严重过剩等在内的重大代价。

众所周知，过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消费国和高技术工业国，在其主导的GVC分工结构中，获得了大量的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其生产的技术和设备等则获得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的巨大支持，因而取得了具体的、巨大的实际利益。但是，这一分工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存在着巨大的不稳定性。一是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价值链的高端，获取巨大的附加值，而发展中国家依靠低端要素被长期俘获在GVC的低端环节，严重影响产业升级。二是这一分工秩序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以中国的情况来说，这种经济全球化模式在刺激中国大量生产的同时，也变相鼓励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过度消费，因而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作为体量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重要的经济体，如果长期面向西方国家出口导向，不主要面向不断成长中的巨大的国内需求，必然会使全球经济结构发生失衡。三是中国廉价的产品大量输入发达国家，会使这些国家的中低端产业逐步失去竞争优势，被迫向国外转移，造成其产业出现所谓的“空心化”趋势；也会使以传统农业和一般制造业为代表的“旧经济部门”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出现利润下滑、失业率增加和社会不稳定。

182 [※] 刘志彪，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18年01期。

从根本上说,中国在GVC中长期处于“被俘获”和“打工仔”的地位,不符合全球经济结构再平衡的基本要求和方向。加快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可持续发展和进行产业升级,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再塑造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为我国未来参与GVC分工指出了新方向,其中的几个关键点:一是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二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三是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四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中国参与GVC分工结构的调整与重塑,一个重要的方向是要争当GVC上具有治理能力的“新链主”。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就是一个基本的路径和机制。当然,这还涉及对一系列体制机制、发展战略、开放策略、政策取向的调整和改革。本文将对这些重要问题做一些经济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方式的特点以及效应

中国作为参与GVC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相比,虽然两国融入GVC的深度很接近,但嵌入GVC的位置和参与国际分工的角色却有着天壤之别。这是我们基于KWW模型,对两国总出口价值模块结构的差异做出分析后得出的基本判断。^②

KWW模型将一国总出口分解为四部分:(1)被国外吸收的增加值出口(VAX);(2)回流国内的增加值出口(RDV);(3)来自国外的增加值出口(FVA);(4)不属于任何国家GDP的增加值出口(PDC)。其中,VAX和RDV属于我国GDP统计范畴;FVA是其他国家创造的GDP,属于他国的出口收入;PDC是不属于任何国家GDP的“增加值剩余”。因此,只有VAX才是带来我国出口收入的出口净值。

通过分解中美两国出口数据可以发现,2011年中国VAX比重为75%,美国VAX比重为79%,说明两国融入GVC深度很接近,但美国总出口中FVA比重为11.38%、RDV比重为5.36%,而中国总出口中FVA比重高达17.05%、RDV比重仅1.95%。这一结构性差异,其实反映的是中美两国嵌入GVC的不同位置,以及两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方面的不同角色。这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对于美国而言,美国跨国公司根据国内消费者偏好、政府质量规制等标准,在母国完成“微笑曲线”两端的产品设计、工艺要求、质量标准和品牌运营等环节后,将生产、加工、装配等低附加值制造环节,通过GVC机制外包给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其最终产品被加工、制造、装配或者组装后,又被美国进口到国内用于消费。因此,美国的FVA比重低,同时RDV比重高。这反映了美国跨国公司是国际生产分工规则的制定者,美国国内市场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能够虹吸全球资源,从而使得美国成为GVC中的“链主”“老板”或“大

买家”，拥有市场垄断的能力，具有强话语权，获取高附加值，成为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大赢家。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在GVC分工中，中国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订单、生产工艺技术和质量标准，不得不从发达国家进口机器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完成贴牌生产后，再返销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因此，中国的FVA比重高，而RDV比重低。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代工企业在GVC中的“被俘获”和“打工仔”的地位，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锁定在价值链底部，从事微利的装配制造活动。同时，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国市场的依赖以及内需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扩张缓慢的状态。

总体来看，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上述传统的GVC分工模式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中美两国都面临中国参与GVC分工结构的调整与重塑：

对于美国而言，虽然GVC中的“链主”地位，使美国跨国公司攫取了大部分贸易剩余，但是也应看到，大量的制造业跨国外包活动导致美国制造业基础地位逐步削弱，相关产业的工作岗位丢失，中下层利益受损。这种“产业空心化”表现为美国服务业高度发达，同时制造业全面萎缩，实体经济循环体系出现运转失调和不畅。这也是当前美国推出制造业回归复兴、“制造业出口倍增计划”等“再工业化”目标的基本背景。

对于中国而言，“被俘获”在GVC底部的全球分工与发展模式，也是难以为继的。2010年以来，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环境约束收紧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很多代工企业一方面面临着外包订单下降的压力，另一方面又面对着成本、价格的双重挤压。在中短期，中国企业无法通过提价或提高生产率的方式，来消化这些压力，由此导致很多企业经营惨淡甚至大面积破产倒闭。从地区发展差异看，融入“被俘获”的GVC，弱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国内产业关联体系出现了断裂和循环不畅，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带发展差距日益扩大。

当前的国际经济迫切需要结构再平衡。结构再平衡的基本方向是中国要加快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进行产业升级。这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再塑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可以从改变我国参与GVC的分工方式开始，为此，需要抓紧制定对外发展新战略、新举措、新路径。当务之急是要在扩大内需背景下，加快建立国内地区间多层次的产业体系，通过构建国家价值链，部分地替代GVC的循环体系。这是我国应对国际分工新形势的内在要求。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只有根植于内需市场，我国企业才能赢得培育品牌的空间、激发按需研发的创新活力、获得市场反馈的补偿机制，才能在供应链、价值链中获得主动权和话语权，才有可能培育出走向世界的巨型跨国公司。

2.建立良性互动的多层次的国内产业分工体系,是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攀升价值链的关键突破口。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只有加快发展研发、金融和营销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让它们跟上并超前于我国制造业升级的步伐,才能让制造业“插上起飞的翅膀”“安上智慧的脑袋”,才能从“汗水经济”升级为“智慧经济”。

3.构建区域间产业协作的国家价值链,是我国产业空间配置升级的重要方向。以“长江经济带”为纽带的东中西部国家价值链体系,将使得东中西地区产业配置各司其职、各有所长。东部地区是从外向型经济战略中先富起来的地区,有条件优先发展以研发、设计、金融、物流、营销、品牌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聚集跨国公司的“总部经济”,中西部地区则可以成为承接制造业转移的国际制造中心,实现我国国家价值链在空间结构上的合理配置。

内在构建国内价值链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必须在不断扩张的内需中诞生和成长。一个大国经济的内生需求足以培养出立足于本国的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我们不可能把本国产业升级和发展创新型经济的目标,都寄希望于外需和出口导向战略的持续。这是不现实的,也不合乎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崛起的逻辑。

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与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中国参与GVC分工结构的调整与重塑的一个重要方面的问题,就是要努力促进国内若干重要产业逐步迈向GVC中高端,具体可通过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多种办法来逐步实现。

从国内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来看,促进若干重要产业迈向GVC中高端,是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根本要求。因为,当今和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是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如果经济系统中不能内生地消化掉这些不断递增的成本,不能生产出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和服务,或不能从事附加值更高的财富创造活动,产业在面对新进入市场的低成本的竞争者时,就会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因此,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和各类创新不断提升产业的生产率,才能克服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才能降低产业产出的单位成本,才能使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才能奠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完成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促进产业迈向GVC中高端的任务任重道远。例如,即使是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其工业增加值率也只有22.3%,不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一半;居民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仅为33.7%,低于美国、日本70%左右的水平。这反映了产业仍处于中低端这个不争的事实,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则是核心技术的缺失。因此,未来无论是发展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要以提高技术含量、延长产业价值链、增加附加值、培育核心竞争力为重点,使若干有竞争力的产业向GVC的中高端攀升。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宏伟目标和设想,其中产业现代化是物质基础。产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若干产业中的我方企业能够进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核心环节,掌握相

关的产业核心技术，能够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或更有效率地生产出来，或转向从事更具技能性的活动。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的中高端，总的原则应突出产业特色，集聚高端要素，打造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特色产业集群。对于全球制造大国来说，就是要打造若干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在产业发展实践中，中国的企业往往既嵌入本地化的产业集群，同时又嵌入GVC。有时往往一个巨大的产业集群都整体上嵌入由不同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GVC。这种组织形式会对于分工、竞争和产业升级等产生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建设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优势所在。迈向GVC中高端与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在这种状态下就不是孤立的任务，而是天然地、有机地糅合在一起。

其一，企业嵌入本地产业集群同时又被嵌入GVC，其经济活动处于纵横交错的、多维的、开放的立体空间。企业所嵌入的本地产业集群，往往是产业内的同类企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或者是在技术经济上有上下游关系的产业链在特定地理位置上的集聚。而企业嵌入GVC，呈现的是跨越国家边界的产品的国际分工，是一种垂直一体化或垂直非一体化的产业链的国际分工。这种纵向的跨越国家边界的产品内分工，与国内特定地理空间的集聚性企业交叉在一起，形成多元力量推动的产业升级浪潮。

其二，企业嵌入本地产业集群同时又被嵌入GVC，其最初的动机虽然并不相同，但是最终可以利用不同的路径和机制进行产业升级。企业嵌入本地产业集群的动机，是为了通过企业间的互动以及与那些致力于产业升级的本地机构(政府组织、生产性服务企业等)之间的互动，吸取各种有利于产业升级的外部经济性因素，如互补性溢出、竞争性溢出、信息交流平台溢出等。而企业嵌入GVC，获取的是GVC中发包方或者大买家通过价值链的治理溢出的关于技术、市场和管理的知识和技能。那些接受国际订单进行加工生产的企业，在与发包方的频繁密切的互动中，可以有效地实现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

其三，企业嵌入本地产业集群同时又被嵌入GVC，竞争形态也由初期的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或作为发包方的总部企业与作为供应商的代工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演变成产业集群与非集群之间的竞争、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以及本国集群与国外集群之间的竞争，从而使竞争的空间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程度越来越激烈，效率越来越高。中国商品之所以可以在全球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在全球形成“中国价格”，与这种产业集群的竞争形态和竞争方式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其四，企业嵌入本地产业集群同时又被嵌入GVC，会导致整个集群加入GVC的宏大态势，从而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一般来说，同一集群内不同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之间的治理方式差异，以及同一条价值链下，面对多地区产业集群(作为若干供应商)的治理，不同形式和性质的GVC下的治理(如公平市场交易型、网络型、被俘获型、纵向一体化型等)，对以攀升GVC中

高端为目标的产业升级活动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同一集群内，可能就会有作为价值链的治理者(发包方)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它们的文化、习惯、交易方式和行为等差异，往往使价值链的治理方式存在重要而又细微的差异。

迈向GVC中高端与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必须研究这种企业嵌入本地产业集群同时又被嵌入GVC的客观条件，以及这种现实所提供的优越条件和制约因素。其中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长期在被俘获的GVC下从事国际代工的中国企业，如何突破来自GVC“链主”的阻碍，在来自产业集群的内在的升级力量的支持下，奋力攀升GVC中高端？

当前在实践中，本土低附加值的贴牌生产的企业(OEM)在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中，得到了来自GVC中链主的指导、帮助和鼓励，产业升级迅速，但是当它们试图进行功能升级，即向GVC的研发设计和品牌网络营销等两端进行攀升时，受到了来自这些大买家的奋力抵制，往往被阻击在GVC的代工环节。因此，这些企业是痛苦转型发展自有品牌，还是安于现状继续做世界著名品牌光环下的幕后英雄，成为规模取胜的“隐形冠军”，往往成为两难选择。

发展自主品牌特别是国际著名品牌是每个OEM企业的梦。问题是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得通？撇开世界著名品牌的市场空间过于拥挤、创品牌的成本过高的现实不说，其实，从OEM转型为品牌企业，其发展道路是非常艰难的。

首先，处于发包方的品牌厂商，就是横在OEM企业面前的难以跨越的坎。OEM企业的转型，必然会与之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OEM企业的战略转型会使原先的合作者变成现实竞争者。发包商认为，我指导你代工，可你学会了技术就会做自有品牌来和我竞争，而且你的产品没有品牌的前期投入，价格一定比我更有竞争优势。你如果转型做品牌，不就抢我的市场吗？发包商会对你施加各种压力，会威胁你说，如果你不退回去，这个订单我就交给别人去做。在品牌厂商的这种可置信的威胁下，很少有中国的OEM企业能够跨越这一步。

其次，OEM企业要从原来的生产制造企业，顺利完成品牌的转型，技术开发、品牌建设、渠道建立与售后服务等，都会成为其难以跨越的几道坎。原先的生产制造的一种本领，要转变为研发和品牌运作等几种本领，并且彻底地玩转它们，对于相对落后的OEM企业来说，不仅经验缺乏，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储备人才，因此是十分困难的。

第三，OEM企业能不能撇开眼前利益、避开短期盈利和市场压力，抛开原先的品牌商去独立地运作，往往也是有疑问的。比如做OEM时，企业可能有10亿元订单，而其在发展自有品牌的初始阶段，它可能只有1000万元订单。如此巨大的利益差距，中国的OEM企业往往很难拒绝做OEM订单。

第四，很多OEM企业认为，每个企业有它自己的核心资源和发展基础，OEM企业的未来，也不一定非要朝一个方向发展。有时，就做一个代工厂商，也是很好的竞争分工。如著名

的台积电，从成立之初，就定义为专业的芯片代工厂。代工厂因为不去运营自有品牌，仅在生产制造环节投入资金，因此与品牌商相比其回报率并不低，甚至比某些企业品牌投入的回报率还要高。

因此，OEM企业是否一定要发展自有品牌这个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如果竞争的市场空间和容量依然存在，而且如果某一特定企业具备发展自有品牌的各种资源和条件，那它就应该大胆地进行创新。这个时候，来自于产业集群中的致力于产业升级努力的本地机构(政府组织、生产性服务企业)，就可以为它们创造一些品牌成长的条件，发挥它们在推动或促进产业升级上的巨大作用，如举办品牌展销会、建设服务网络、培训企业人才、提供相关企业咨询和法律服务等。具体来说可能有三条路径：第一是帮助OEM企业直接进入市场，独立地发展自有品牌。如果该OEM企业制造的产品所占据的份额足够大，它的制造能力在产品领域中有足够的话语权，那么它的制造能力和资金积累能力，就能够支持它直接进入品牌经营领域。第二是OEM企业抓住市场变化中的新空间，避开原品牌商的竞争锋芒，发展新的适合自身的新品牌。第三条可能的路径是通过改变技术，在既有的市场中挖掘新市场。OEM企业走这条道路的关键在于进行技术创新，实行差异化竞争。在既有市场中寻找到一个新的市场，关键是要贴近消费者和市场进行技术创新。

不过，现实中擅长生产制造的中国OEM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距离往往太过遥远，它们对市场的感知能力并不敏感，要达到上述悟性，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毕竟许多企业只会OEM，一旦它选择了转型自有品牌的战略，也绝对不是多了一个品牌的问题，而是多了一个复杂的经营管理体系。中国OEM企业真正缺乏的是如何将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并且关联起来的能力。现在它们要做的最基本一点，就是应该把企业实力做大，把技术水准做上来，把工人素质做上来，把产品质量做上来，把国际口碑做上来，把企业的知名度做上来，企业品牌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③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制造业通过创建原创性成果和品牌来实现整体的产业升级，这个阶段还没有全面到来。但这并不排斥某些产业领域中的先进企业在做OEM订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OEM向自主品牌企业的转化。实现这种转化，不仅需要企业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累积组织能力，而且需要社会和政府为某些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创造品牌经营的市场基础和需求条件，培植品牌企业所需要的文化自信心和制度条件等。

三、建设包容性 GVC: 构建全球经济增长新机制

中国参与GVC分工结构的调整与重塑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的问题，就是要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契机，基于内需主动构建以我为主的GVC，重塑全球经济增长新机制。

如果说过去基于出口导向嵌入GVC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话，那么重构基于内需的GVC，就是中国参与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应有之义。以“一带一路”建设为

契机和基点，构建以我为主的包容性GVC的治理体系，以此促进全球经济的结构均衡，促进我国经济内生化发展，加快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我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竞争的新的动态竞争优势。^④

中国要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形成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新体系和新格局。这一目标如何加速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为此，我们可以用GVC的思维，来全面审视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战略的实施。过去40年，我国主要是通过加入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GVC来实现向西开放。而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运用GVC思维方式构建我国全方位开放新体系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提升开放质量、增强发展的内外联动性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一种全新的空间开放观，是开放视野、角度和区域的新跃迁、大转变。

我们应该客观地、清晰地看到，向西南开放与向东开放虽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它们之间存在着十分显著和极其重要的差别，但是，两者共同构成了我国未来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系的内在联动关系和基本格局，将为未来我国迈向GVC中高端提供强大的战略支撑。

1. 向东开放的基础，依靠的是我国低廉的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维持我国实现了外资外贸外经的高速成长。向西南开放，我国依靠的是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开放中积累起来的、具有重要竞争优势的丰富产能，将巨大的资本输出能力、业已形成的生产优势运用在这一条新的GVC的构建上。

2. 向东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在发展阶段处于人均收入低、陷入投资积累陷阱时突破发展瓶颈，需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和行动措施，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技能。在向西南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向世界输出我们的资本和产能；另一方面，需要利用自身庞大的内需优势平台，面向世界各国虹吸我们急需的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迈向产业中高端。

3. 向东开放的产业，是做GVC的中低端，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装配生产环节，形成“世界工厂”或“世界车间”，而价值链高端是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它们控制着价值链中市场和技术两头的主要资源。在向西南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要通过加大技术研发和对市场营销网络的投入，做GVC的“链主”，实现产业升级。

4. 向东开放的文化，应该主要是西风渐进，强势的欧美文化在国际经贸过程中，对我进行各种直接的、隐形的灌输和侵入。在向西南开放的过程中，虽然我们并不需要侵蚀别国的文化，但是却必须首先要学习、认识和接受别人的文化，寻求文化的广泛包容和协调的基础。应该看到，向西南的“一带一路”开放，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于经济金融，而可能是国家间在地缘政治和内在的文化协调等方面的冲突。为了降低开放中的风险，经济战略需要同时启动文化

先行、文化搭台和经贸唱戏的行动战略。^⑤

综上所述，与向东开放加入美欧日为主导的GVC根本不同的是，向西南方向开放的“一带一路”战略，建立的是以我为主的GVC。在这条GVC上，中国将处于龙头、高端、“链主”或发包者的地位，它背靠的是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丰富的产能以及巨额的资本形成能力，从事的主要是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网络品牌、物流金融等非实体性高端服务业活动。

以推进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点，构建以我为主的GVC体系。这是我国应对国际分工新形势的对外战略。与这种开放观有机配合的，是要有意识地去构建牢固的GVC连接，使不同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形成相应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这是全面呼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微观经济基础。这条崭新的GVC是中国高水平全方位开放的新空间、新纽带和新载体，是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中高速、产业发展迈上中高端的基础。

与过去全球化中向东开放的空间指向特征不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以我为主的GVC，在发展上具有下列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要鼓励中国企业抱团走出去，到相关条件成熟的国家举办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出口加工园区，中国企业自身要努力从事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网络品牌、物流金融等非实体性的高端服务业活动，把一般加工制造放在投资的东道国。

二是要通过对GVC中的高端环节的掌控以及微观治理机制，向世界输出中国丰富的、具有竞争力的资本和产能。同时也要通过GVC，大力引进世界的能源及资源。

三是我们可以背靠巨大的内需市场，利用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张的优势，形成制度化的“虹吸”全球高级、先进生产要素的平台，为产业迈向中高端服务。即一方面可以走出去收购和兼并优质资源和技术为国内市场竞争服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设世界级城市形成要素的虹吸功能，从世界各国引进我们急需的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

四是我们可以用“逆向发包”原理和机制，在相关业务发包中，使一些先进国家的知识、技术和人才有目的地为我所用，让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跨越地理障碍，优先进入中国经济的运行轨道，并为中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服务。

四、结语

最后，作为本文的结束部分，我们来回忆一下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夏季在金砖厦门峰会上的主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三次提到了构建、培育、重塑GVC的问题。在这个并不长的讲话中，为什么如此强调这么一个经济学范畴？其实，这可能与金砖厦门峰会的使命任务有关，也与GVC这一概念契合金砖国家发展、合作、共赢的主旨有直接的关系，更与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的调整与重塑有关。

习近平同志讲话的主基调，是强调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过去那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发展的基本逻辑，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各国人民真正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和要求，在当今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浪潮的态势下，金砖国家就要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新构建，重塑全球分工体系，依靠和利用GVC这一工具和途径，实现全球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世界经济的调整和发展会有曲折性，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改变。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目前至少已经出现了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1)出口商品为主可能变为输出资本带动商品就地销售；(2)吸收外资可能变为主要吸收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3)利用别人的市场扩张经济可能变为利用自己的市场扩张经济；(4)以科技园区优惠政策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变为向技术人员提供先进的制度平台和硬件载体。因此，可以预言，崛起的中国将会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GVC，用自己对全球化的理解，形成自己独到的全球化战略体系，包括一套完整的战略理念、模式、体制和举措等。

未来随着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重振，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将会建立。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各成员国所倡导的建设包容的GVC，就是为了构建这种新型的GVC治理体系。对于有担当、负责任的中国来说，包容的GVC就是要主动构建全球经济增长结构均衡的新机制，就是要构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在金砖厦门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在以下三种具体的意义上，使用GVC这一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很完美地诠释了未来金砖国家甚至全球的经济增长新机制：

1.作为共同探索经济创新增长之道、实现联动发展的工具和途径。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应该共同探索经济创新增长之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发挥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互补优势，培育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和大市场，形成联动发展格局。”这至少说明，未来金砖国家的发展格局，一是可以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和发展战略的对接，如《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强调的那样，要通过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来释放金砖国家经济潜力；二是可以以各自的比较优势切入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发挥各自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的互补性，扩展贸易投资合作机制和范围，加强金砖国家经济互补性和多样性；三是可以共同探索经济创新增长之道，逐步提升各国在GVC中的地位。

2.作为进一步开放发展、实现全球再平衡的工具和途径。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应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合力打造新的GVC，实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使之惠及各国人民。”如上文所说，过去的GVC是发展中国家生产、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这会导致是全球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失衡。未来新的GVC的构建，要有利于这一扭曲结构的纠偏。一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立中国主导的GVC，输出我国丰富的资本和产能；二是

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利用自己庞大内需建立内需主导的GVC，吸收全球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人才和技术，为我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服务；三是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全球治理，重点是通过进一步的国内开放和相互开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成本。

3.作为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工具和途径。习近平同志提出：“我们要合力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提供更多先进理念和公共产品，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促进国际分工体系和GVC优化重塑。”GVC的培育和重构，表面上看起来是产业活动环节在全球的重新配置，其实是新的全球化理念、战略的实施，是全球跨国企业的重新布局。为了顺利地实现这一进程，需要我们为新的全球化提供更多的先进理念和公共产品，建立更能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版图、更加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以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注释：

①GVC是指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或用户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要求，通过全球性企业的网络组织，把分散于全球各个价值环节的活动进行有效的链接和整合，即用某种治理机制对位于各个国家的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进行机制化连接，并把所实现的价值对其中的所有参与者按一定原则进行分配。如iPhone手机的GVC，研发设计的龙头是苹果公司，零部件中基带芯片处理器、RF收发器、基带芯片电源IC由美国高通公司提供，WIFI套片、GPS、触控芯片则由美国博通公司提供，影像传感芯片CCD则由日本SONY提供，显示面板由日本夏普公司提供，韩国三星则为苹果提供了内存DRAM，而我国的富士康为苹果设备提供了组装代工业务，台积电则为苹果提供了晶圆制造、封测服务。显然，GVC可以用来描述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分工、经济合作、企业联系、关系治理和价值分配等一系列现象和行为。

②刘志彪、董也琳：《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变革：以中美经济为例》，《清华金融评论》2017年第9期。

③刘志彪：《中国制造何时不再贴牌生产？》，《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1月3日。

④刘志彪：《“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制造业振兴》，《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

⑤刘志彪：《“一带一路”是全新开放观》，《人民日报》2016年1月13日。

攀升全球价值链与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刘志彪[※]

摘要：全球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打造出若干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国制造业成长的事实和特征是，它们在产业组织形态上既嵌入本地产业集群，同时又嵌入全球价值链。这种产业双重嵌入、企业被俘获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现实，对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来说，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阻碍和约束。企业在“双重嵌入”条件下的动态学习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是决定价值链攀升和产业集群升级的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以提供公共或半公共品为特征的集体行动，对于提升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生产者服务业；集体行动

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其中，“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讲的是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看，我们要不断地进行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争取在全球价值链中取得更多的话语权，获得更高的附加价值；“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则是从中国与世界的比较看，我们要基于产业组织结构的空间布局调整，提升产业集聚的水平和高度，推进高质量经济的发展。

上述两个目标和要求，至少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我国产业过去加入的是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简称GVC)的中低端环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鼓励产业升级，就是要鼓励企业向GVC的高端攀升；二是目前中国供给体系质量不高的一个表现，是我们还缺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现有的制造业集群可能在先进性和规模化两个方面，与发达经济体还有不小的差距；三是未来中国参与GVC分工结构的调整的重要方向，就是要通过在GVC上的不断升级，来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是一个可靠的途径和方法；四是可以借助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建设，支持企业攀升GVC的创新活动；五是我们不可能要求中国所有产业都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们只能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经过不懈的努力，才能培育出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从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来看，促进若干重要产业迈向GVC中高端，是为了克服中等收

[※] 刘志彪，教育部长江学者文科首批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入陷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是在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各种要素成本也相应地不断上升。如收入的增长、消费水平的提升、社会福利水平、资产的增值、环境保护的加强等，一方面是我们经济工作和政策必须努力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企业不断增长的要素成本。这一趋势是不可能停滞的。但是如果经济系统不能内生地消化掉这些不断递增的要素成本，不能生产出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和服务，或不能从事附加值更高的财富创造活动，那么中国的企业在面对新进入市场的低成本竞争者时，就会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从而给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留下巨大的障碍。因此，只有不断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各类创新，不断地提升产业的生产率，才能克服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才能降低产业产出的单位成本，才能使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才能奠定高质量发展 and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完成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这一促进产业迈向GVC中高端的任务任重道远。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算，中国出口总值中国内增加值为67.8%，而同时期的日本、美国等成熟的制造业发达国家分别达到了85.3%、85%，以色列、印度也达到了74.7%、75.9%的高位。^①即使是制造业发达、产业集群密集分布的江苏省，目前其工业增加值率也只有20%多一些，不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一半；居民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仅为30%多一些，低于美国、日本70%左右的水平。这两个客观指标反映了我国产业链的地位仍处于中低端这个不争的事实。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则是创新驱动的不足以及核心技术的缺失。因此，未来无论是发展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要以提高技术含量、延长产业价值链、增加附加值、培育核心竞争力为重点，使若干有竞争力的产业向GVC的中高端攀升。

一、双重嵌入：中国产业高速成长的特征和事实

十九大报告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语境下，提出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和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相互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要求。高质量经济和现代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国若干产业能够进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核心环节，掌握相关的产业核心技术，能够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或更有效率地生产出来，或转向从事更具技能性和高附加值的活动。对于全球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战略来说，就是要打造若干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攀升全球价值链，如何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需要从实践出发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创造优良的产业升级环境。在过去的产业发展实践中，中国企业的高速成长一直被两个因素所推动，它们是中国企业开放发展、抱团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和事实：它们在空间上嵌入本地化的产业集群，同时又在与世界的联系中被嵌入GVC。有时，往往一个巨大的产业集群都从整体上嵌入由不同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GVC。例如，我国的纺织、服装、皮革、鞋类、五金工具等传统产业，在空间上大都呈现为集聚化、模块化发展态势；那些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也往往以政府打造的高技术园区的组织形态发

展。前一类集聚区中的企业，往往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纳入采购者或市场驱动的GVC进行国际代工；而后者则被跨国公司纳入技术或者生产者驱动的GVC，专注于GVC中某个相对低端的分工环节，专门从事生产制造加工业务。这种双重嵌入的产业组织形式的特点有哪些？它们对于分工、竞争和产业升级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一，双重嵌入的中国企业，其经济活动处于纵横交错的、多维的、开放的立体空间。企业所嵌入的本地产业集群，是产业内的同类企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或者是有上下游关系的产业链在特定地理位置上的集聚。而企业嵌入GVC，呈现的是跨越国家边界的产品内分工，是一种垂直一体化或垂直非一体化产业链分工。这种纵向的跨越国家边界产品内分工，与国内特定地理空间的集聚企业交叉在一起，形成了推动产业升级的巨大力量。

其二，双重嵌入的中国企业，其最初的动机虽然并不相同，但是最终可以利用不同的路径和机制进行产业升级。企业嵌入本地产业集群的动机，是为了通过企业间的互动以及那些致力于产业升级努力的本地机构(政府组织、行业协会、生产性服务企业等)之间的互动，吸取各种有利于产业升级的外部经济性因素，如互补性溢出、竞争性溢出、信息交流平台溢出等。它们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完成升级所必需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等条件。企业嵌入GVC，获取的是GVC中发包方或者大买家通过价值链的治理机制所溢出的关于技术、市场和管理的技能。那些接受国际订单进行加工生产的企业，在与发包方的频繁密切的互动中，可以得到发包者的切实有效的支持，从而有利于其实现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

其三，双重嵌入的中国企业，其相互之间的竞争形态也由初期的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或作为发包方的寡头垄断企业与作为供应商的竞争性代工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演变成为产业集群与非集群之间的竞争、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以及本国集群与国外集群之间的竞争，从而使竞争的空间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程度越来越激烈和充分，竞争效率越来越高。中国商品之所以可以在全球竞争中攻城掠地所向披靡，形成所谓的“中国价格”的旋风，与这种产业集群形态的竞争和竞争方式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其四，双重嵌入的中国企业，会导致整个集群加入GVC的宏大态势，从而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一般来说，同一集群内不同跨国公司主导的GVC之间的治理方式差异，以及同一条GVC下，面对多地区产业集群(作为若干供应商)的治理，不同形式和性质的GVC下的治理(如公平市场交易型、网络型、被俘获型、纵向一体化型等)，对攀升GVC中高端活动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同一集群内，可能就会有作为GVC治理者(发包方)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它们在文化、习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而采购者的行为、偏好以及认知也不同，这往往使GVC的治理方式存在重要而又细微的差异。如美国跨国公司主导的GVC偏向于公平市场交易或网络型交易，而欧洲、日本跨国公司主导的GVC则偏向于对供应商进行较多的控制。

迈向GVC中高端与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在这种状态下就不是孤立的任务，而是天然

地、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根据我国产业集群加入GVC的实践，我们发现，中国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加入的GVC往往有这么几类：^②

1.公平市场交易型或者网络型的GVC。这类企业相对于跨国公司大买家，可能因掌握某些特殊的资源，如专利、技术、品牌、垄断渠道等，在GVC的分工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在具体的交易中具有特殊的竞争优势。这类企业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凤毛麟角。但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具有一定市场势力的独立生产商和出口企业越来越多。

2.纵向一体化型的GVC。这类企业绝大多数是跨国公司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设立的代工厂。它们的功能很简单，基本不承担研发、设计和营销品牌的功能，就是听从总部的命令进行加工制造生产，成为跨国公司的海外供应商，也可以称为“外资代工企业”，是全球产品内、公司内分工的一种形式。在江苏南部地区和广东省，这类企业遍地都是。

3.被俘获性的GVC。在这种价值链中，交易者之间不存在纵向一体化型的GVC中那种所有权关系，但是它却可以通过GVC中的治理机制，使广大的供应商被处于“链主”地位的跨国公司所控制。这种价值链也可以看成是纵向非一体化型的GVC。中国企业在嵌入GVC的初始阶段，普遍地属于这样一种性质的GVC。其中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利用的是西方的技术和市场，我们做的只是生产、制造、加工、装配环节。在生产者驱动的GVC中，我们不掌握核心技术，做的不是技术创新链的主要环节，而主要是生产环节；在市场驱动的GVC中，我们既缺乏管理、营销、品牌、网络，也缺乏内需支撑的现实市场容量，我们只能为国际大买家进行生产代工。这种交易网络和治理方式在发展的初期，高度缺乏平等对话的基础，价值分配也极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这种双重嵌入、企业被俘获于GVC低端的现实，是我国在建设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必须面临的最大约束条件。

二、双重嵌入条件下的产业升级：优势与困境

客观地说，中国企业双重嵌入、被俘获于GVC低端的现状，对于我国建设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任务来说，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因素。

有利的方面是，在被俘获关系的GVC中，处于治理机制顶端的国际大买家的规范性管理和对价格、产品质量、交货期、甚至环保等的苛刻要求，为不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中国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因而为后者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提供了一条快速的路径。从近年来关于GVC中企业升级的案例研究中发现，被全球大买家“抓住”的中国代工企业，经常会在得到上游大买家的巨额订单的同时，也会受到其具体的人员培训、技术服务和市场训练，在价值链的低端经过快速的学习，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周期不断降低。GVC中低端企业的工艺升级和

产品升级，与拥有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核心能力的企业，在国际产品内的分工的利益上，相互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相反，鼓励、督促、帮助和支持低端企业进行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还有利于高端买家或者发包者强化产品差别化的能力，有效地预防供应商市场的失灵，因而有利于处于GVC顶端的发包企业。目前，这些代工企业早已越过进口零部件的装配生产的阶段，处于大规模的整机生产能力提升，甚至已经可以反向出口发达国家的阶段。下一步的产业升级，就是要瞄准功能升级的目标，逐步形成自己的研发设计能力乃至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

另一方面，中国代工企业走功能升级的高端道路，目前还只有少部分企业成功的证据，大部分企业的能力仍然局限于生产功能的投资与建设，以大规模、低成本、低价格取胜。GVC中的国际代工企业实现功能升级的障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买方市场势力的阻扰，二是功能升级对资源的需求。GVC中买方势力的来源，主要表现为对各种技能型、知识性非实体生产活动的掌控能力，即对品牌、营销、产品开发、设计和对从属企业关系的掌控能力。这些都是GVC中的领导性企业投资的重点，是其核心能力。毋庸置疑，这些领导性企业不仅不会与其供应商分享这种能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阻止供应商获得这种能力。而实现功能升级对资源的需求障碍，则主要表现为当中国企业试图独立研发核心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或者试图在建立自己的营销管道时，由于受到资金积累能力和运作能力的限制，往往很难持续地坚持下去。

从实践上看，中国代工企业在被俘获的GVC下走功能升级的高端道路，有时并不能行得通。首先，GVC中的处于发包方的品牌厂商，就不是任何代工企业可以跨越的坎。因为代工企业的转型升级，必然会对其产生替代关系，从而可能与之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代工企业的战略转型，会使原先的合作者变成现实竞争者。发包商担心今天指导你代工，明天你学会了技术就会做自有品牌来和我竞争，而且你的产品没有品牌的前期投入，价格一定比我更有竞争优势。这样它们会对你施加各种压力，会威胁你退回去，威胁订单交给别人去做。在品牌厂商的这种可信的威胁下，很少有中国代工企业可以跨越这一步。

其次，代工企业要从原来的生产制造企业，顺利完成向自主品牌企业的转型，其研发设计、品牌建设、金融物流、营销网络等，都会成为它难以跨越的坎。原先的生产制造的一种本领，要转变为运作价值链高端活动的若干种本领，并且彻底地玩转它们，对于代工企业来说，不仅缺乏经验，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储备人才，因此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第三，代工企业能不能不顾短期盈利和市场压力，撇开原先的发包商去独立地运作，也是有疑问的。比如做国际代工业务时，企业可能有10亿元的订单，而其在发展自有品牌的初始阶段，它可能只有1000万元订单。如此巨大的利益差距和可能失败的风险，使中国的代工企业很难坚持转型升级。

第四，很多代工企业认为，代工企业也具有专业化的优势，不是每个企业都要朝着一个自主品牌企业的方向发展。有时就简单地做一个代工厂商，也是很好的选择，也是一种竞争和分工。如著名的台积电，从成立之初起，就定义为专业的芯片代工厂。虽然后来也有做品牌厂商的设想和行动，但是最终也是失败了。代工厂商因为不去运营自有品牌，仅在生产制造环节投入资金，因此与品牌商相比，其投资回报率并不见得会很低，甚至比某些企业品牌的回报率还要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体制机制下，因为转型为品牌企业的早期，企业规模可能会剧烈下跌，风险加大，所以地方政府可能也不会全力地支持代工企业转型。^③

上述种种现象说明一个道理，虽然加入GVC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产业升级平台，但是目前这种升级主要还是局限于工艺和产品方面的，并没有深入到功能升级这个高端领域。相反，实践提供的案例证明，处于GVC低端的企业，为了紧紧地追随发达国家新出现的政府规制和企业推出的各种标准，为了适应这些国家消费者的偏好，需要通过工艺和产品的不断升级来增强出口市场的竞争力，因此被迫采取“动态引进技术”战略，其设备更新频繁，沉淀成本和引进设备的成本都十分高昂。

三、以提升产业集群的集体行动能力支持企业攀升 GVC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振兴中国制造的战略取向下，本文的主题就转化为：长期在被俘获的GVC下从事国际代工的中国企业，如何突破来自GVC“链主”的阻碍，在来自产业集群的内在升级力量的支持下，奋力攀升GVC中高端？或者说，中国如何在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同时，实施自主创新和自创国际品牌的战略，实现制造业的整体升级？这种产业升级的基本路径和政策又是什么？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问题，理论界有一种悲观主义的“宿命论”，^④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嵌入GVC从事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长期锁定在发展的“低端道路”上，并在收益分配方面受到严重的剥削。更严重的是，嵌入GVC专注于初级要素专业化的生产，虽然能够取得早期的竞争优势，但是在全球竞争的前提下，潜在对手大量进入市场，或者本国生产要素的升级赶不上成本提高的速度，或者升级过程中遭遇到GVC中高端企业的阻击，其产业可能就会大规模衰退。^⑤在全球市场有限增长的情况下，就会与出口目的地国家发生严重的贸易摩擦，或者当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竞争者大规模急速进入时，将会导致某些单个经济体的贸易量迅速下降，生产者就会遭受报酬持续下降的损失。^⑥

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在产业升级问题上的悲观主义并不可取。开放过程中的产业升级是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如果在发展中通过艰苦的学习和努力，突破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传统做法，改为按照动态竞争优势的原则不断投入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那么改变路径依赖、改变锁定格局、改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是完全有可能的。从中国的出口结构来

看,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纺织制品、鞋、伞、帽等劳动型密集产品、贱金属等资源性密集产品的出口占比均出现了巨大的回落,相反,体现高技术的机械、电子、电音像设备、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比,则成长十分迅速。^⑦

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加对现有制造业的生产者服务的投入,这是出现Gereffi所说的产业升级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次序自动传递的关键所在。^⑧其实,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占据GVC的顶端,主要从事非实体性活动从而取得高附加价值,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不断地投入内含丰富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使其产业结构不断地“软化”。Reeve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几乎所有制造业都严重依赖于资本和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另一方面,高水平教育的劳动力导致了制造产业的产品成本下降。^⑨因此发展高水平的教育,尤其是高水准的职业技术教育,是中国具有出口导向特征的产业升级的基础。

我过去曾经多次研究过作为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的生产者服务业投入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和功能问题。^⑩生产者服务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以其强大的支撑功能成为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推进器,是制造业起飞的“翅膀”和“聪明的脑袋”琢磨。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中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 dproducer services, APS)的发展,是奠定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竞争力的基础。APS是由那些与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使用密切相关的行业所组成的,如金融保险、信息通讯技术、商务服务(包括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创意服务、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它对于制造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APS所体现的各种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隐含性知识,通过软件嵌入硬件,特别是嵌入机器设备这类工作母机,提高了装备制造业产品以及用其所制造的产品市场竞争力。二是APS所围绕的各种产品研究与开发服务,如产前的市场和定位调研服务等,研发中的设计服务、创意服务、模具服务等,生产中的工程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服务等,营销中的物流服务、网络品牌服务、出口服务等,都具有增强产品差别化和区分竞争对手的作用,从而强化企业的定价能力和控制市场能力。三是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中的各类生产者服务,如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法律和知识产权服务等,对于提高企业的战略清晰度、增加市场份额、收购兼并成长等,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APS的具体作用,是在产业集群中通过制造企业、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生产者服务企业的集体行动来实现的。这种集体行动对于提升我国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的理论,在市场竞争中,只要存在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合作问题,就会存在集体行动的现象。单个企业的产业升级,既需要以知识、技术为基础的生产者服务供给,也需要那种由政府 and 公共机构所提供的不可分割的公共服务供给。差别是前者主要通过市场交易完成,后者具有非市场交易特性。这些服务产出的供给,对

于企业升级行动来说，经常具有公共或半公共属性。如科技、技术服务，某些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生产者服务业，如物流、金融服务等，虽然不是公共服务供给，而主要必须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但是很显然的是，在产业集群的早期成长阶段，为集群内企业提供这类生产性服务，可能需要仰仗政府的支持。

产业集群内部广泛存在的对公共品的“搭便车”现象，使个别企业不付出成本也能坐享公共服务的收益。因而集群中理性的单个企业，是不会主动提供公共服务品的行动的。为了克服这种“搭便车”困境，需要政府或公共机构出手，如监管部门、生产力提升委员会、行业协会等设计强制机制，或实施“选择性激励”的组织策略。前者指依靠政府权威强制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参与产业升级的集体行动，而后者指用正面的激励与反面的惩罚相结合，对参与产业升级集体行动的企业实施奖励，而对不参与者进行一定的惩罚。

为提升产业集群的集体行动能力和效果，支持企业攀升GVC，按照“制度—技术—市场”这种促进产业升级的分析框架，在此提出目前中国产业集群最需要提供的几种公共和准公共服务产品：

1.制度类公共服务供给。这是促进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集体行动的最重要内容。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发展中不缺作为“硬件”的生产要素，但是缺乏有效的“软件”，尤其是有效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加强产业集群中政府和公共机构层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能力，就是要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新机构、新法规、新政策和新工作载体等，引入原有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中，实现新的发展组合，重点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和素质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

一是要重点强化刺激企业产业升级的制度供给。要从环境、外在压力和引力、内在动力等方面，引导或者倒逼企业加大对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的投资和努力。

二是要重点强化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制度供给。要把建设美丽中国、加强环境保护的压力，转化为对企业产业升级的动力。为此，在制度创新和供给上，要把目前限于工作层面的倒逼机制，提升到政策层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实践证明，环境友好型的产品和生产技术工艺，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是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重要内容。

三是要重点提供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相关的制度供给。这方面的制度供给，要有利于处理好：(1)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围绕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这个目标，围绕产业链组织创新链，科技创新要紧密服务于实体经济。(2)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关系。要围绕产业链来安排资金链，金融创新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运用，不能脱离服务业实体经济这个根本目标。(3)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的关系。既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又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

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搞好实体经济，尤其是建立先进制造集群，核心在职业技术教育。提高职业技术学院地位、教师待遇，让职业技术工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就是制造业强大的标志。

(4)科技创新与现代金融的关系。把研发作为独立产业来发展，与金融业发展互联互通，否则投入就没有产出，就无法正常循环。(5)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的关系。科技开发园区的规划与发展，首先要考虑人力资本的供给可能。(6)现代金融与人力资源的关系。要利用制造业集群的优势，大力吸引各类投资基金、私募股权、风险资本等来产业集群或临近城市搞金融集聚区。

2.技术类公共服务供给。这是提升产业集群集体行动能力的基础和核心。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主要标准在于集群的质量，在于技术领先性和先发性。为此，要增强集群内的公共和准公共服务品的供给：

一是要推动产业集群内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发展智能制造。

二是需要制定严格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用实实在在的压力倒逼企业加大对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等的自主开发力度。

三是要在集群中投资建设具有共性的科技研发平台和通用设备使用机制，为集群内企业提供便利优质的公共技术服务。

四是要为科技人才创业、创新建立各种软性的生产者服务平台，如法律服务、创业服务、技术管理培训服务等，造就高水准的创业、创新机制和环境。

五是要加强产业集群内外部基础设施网络的互联互通建设，如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为集群整体升级提供优良的环境。

3.市场类公共服务供给。这是培育和扶植产业集群中原创性成果大量涌现的市场基础。中国具有庞大的市场潜力和现实市场容量，未来必然会培育出自己的原创性创新成果和世界品牌。这是基于内需建设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从过去的经验看，我们依据内需成功地发展了5G、国产芯片、高铁、量子通讯等世界性领先技术和若干著名公司。未来，政府应该站到前台带头支持中国企业实施原创性成果战略，培育更多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企业。(1)政府的大宗采购项目，应该对国内民营企业所生产的优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按国际惯例实行倾斜支持政策。(2)要努力建立国内统一市场，拆除市场壁垒和进入障碍，塑造培育和扶植本国原创性成果的市场基础。(3)要鼓励有条件的国际代工企业利用国内市场需求，及时转换为具有原创技术和自有品牌的企业。(4)全社会要创造中国企业原创性成果形成的市场基础和舆论条件，政府高官和社会名流可以不惜为中国优秀企业“做广告”。从微观方面来看，比国内市场规模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国内需求的特质，就是要培养国内客户的挑剔度。当国内客户对产品或服务的要求是全球最挑剔、也最精致时，企业会因此获得竞争优势。精致需求型的客户，

他们对厂商施加高标准的压力,激励厂商改善、创新、自我提升以进入更高级的市场区域。

注:

①资料来源于微信公众号lixunlei722,李迅雷:《从出口竞争力看我国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问题》,2017年12月4日。

②GVC中的交易形式具体区分详见Humphrey, J and Schmitz, H(2002). *Developing country Firms in the World Economy: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NEF Report, No.61. <http://www.ids.ac.uk/ids/global/vwpap.html>. 文将论述:当它们沿着价值链试图上升到功能升级阶段时,经历却各不相同,其中绝大部分企业升级的战略不能算成功。

③刘志彪:《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发展:国际代工模式与创新》,《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④如Cramer, C. (1999). *Can Africa industrialize by processing primary commodities? The case of Mozambique cashew nuts* World Development, 27(7), pp. 1247—1266.

⑤波特(1990)说过一句名言:“当一个国家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时,它通常是浮动不稳的,一旦新的国家踏上发展相同的阶梯,也就是该国竞争优势结束之时。”这一国家竞争理论被世界经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产品出口,而不注重在生产能力迅速增长和积累能力得到加强的同时,大力推进以高级先进生产要素嵌入价值链为中心的产业升级政策,在今后很难保证不被其他国家赶超,并因此重蹈历史的老路。

⑥Raphael Kaplinsky, Mike Morris(2006). *A 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 prepared for the IDRC, [http://www. ids. ac. uk/global](http://www.ids.ac.uk/global).

⑦反过来看,基础研究支出占比不高,也可能是制约我国目前出口产品的增加值难以继续提升的主因。中国研发投入强度,尤其是基础研究金额的投入占比,与美日等制造国家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应用型学科研发投入较多,相反,基础性学科研发投入较少。

⑧参见Gereffi G. (1999).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48, pp.37—70. 另外,企业升级中的OEM→ODM→OBM的转换,也是产业升级的主要路径。

⑨Trevor A. Reeve(2006). *Factor Endowment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4(1), pp.30—53.

⑩刘志彪:《生产者服务业及其集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关键要素与实现机制》,《中国经济问题》2008年第1期;《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与调整优化制造业结构》,《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路径与品牌战略》,《财经问题研究》2005年第5期;等等。琞珈【加】H. G. 格鲁伯、M. A. 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琞琒【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产业体系

刘志彪[※]

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以下简称“四位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显然，在四位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中，实体经济是纲，是目标，是导向，任何脱离发展实体经济轨道、使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资源配置状态，都会影响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都需要大力纠偏。科技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驱动力。现代金融业不仅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成长的血液系统，也是知识经济时代支撑科技创新的风险资本来源。至于人力资源，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各行各业都需要的第一生产力。

从要素投入角度定义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目标

过去我们讲建立现代产业体系，都是从各个产业自身重要性和特性上来定义的，如在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语境下，现代产业体系在我国是指全面构建比较稳固的现代农业基础，比较发达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等级的装备制造业，以及门类齐全、迅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总体要求是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十九大报告独辟蹊径，创造性地在三次产业之外，从要素投入的角度，定义了下一步发展我们所需要的产业体系目标。这是一个重要且具有建设性的概念创新。

可以清晰地看出，建设四位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愿景及其基本特点如下：

吸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精华，强调增长要更多地发挥高级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而不是孤军奋战。过去我们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拼的是要素成本低，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现在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基本消失，各种要素成本上升迅速，因此产业发展就要更多地依靠生产率提高，依靠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源，把“汗水经济”转变为人力资源驱动型的“智慧经济”。

强调国民经济中的投入要素最终必须落在强壮实体经济上，注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均衡关系。这是建设四位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真正含义。过去的发展，资源较多地流入

虚拟经济领域，脱离、违背了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和原则。对产业发展的结构进行纠偏，就是要想方设法把资源重新引导和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

不仅要鼓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而且要用现代金融机制支撑科技创新，用风险资本等直接融资机制支撑现代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旨演讲中，多次提及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强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将深刻地改变增长动能。抢抓机遇，加大创新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靠现代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

把壮大实体经济作为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

只有准确辨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之间的关系，才能完整地理解、把握四位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和要求，才能有助于我们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矛盾，目前主要表现在我国科技研究水平与世界的差距，要小于我国实体产业水平与世界的差距。产生这个矛盾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们的科研指向与实体经济脱节，也可能是我们鼓励科研成果转化的制度还不够完善，如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对科学家从事科研成果产业化缺少支持等。科研与实体经济脱节是科研体制的老问题，主要表现在科研陷入自我循环，论文写完了、成果出来了、专利申请了，就完事大吉了，科技成果进不到实体经济。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让科研成果产业化，从而使科研成果按照市场规律服务于实体经济。但科研活动并非所有环节都能产业化，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钱变成知识，这是科学家的事情。第二个阶段是把知识变成钱，这是企业家的事情。这两者不能混淆，混淆了就没有办法制定清晰的鼓励政策。在第一个阶段，应该强调的是科研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但在第二个阶段，如果科研活动不能围绕产业化进行，那么经济的自我循环过程就会阻塞，就会出现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之间严重的不均衡。

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失衡，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制造业“空洞化”，即金融发展过度而制造业逐步衰退。现阶段我国的这个矛盾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运转，进不到实体经济，同时实体经济本身产能过剩、杠杆太高、生产率低，不能创造出投资者满意的回报率，因而吸收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实际上主要针对的就是有泡沫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企业的严重过剩产能以及沉重的负债水平，是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中央在实体经济领域坚决地去产能、去杠杆，使很多企业甩掉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经济正恢复生机和活力。虚拟经济领域出现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自我循环的现象，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资产荒”问题有直接关系。“资产荒”表现为居民巨大的投资理财需求对应着有限的资产供应，由此不断拉高资产价格，恶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追求财富的保值增值是生活水平提高后人民群众的基本需

求。不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投资理财需求，是我国房地产领域货币流入过多、泡沫不断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均衡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关系，一个重要的选择是不能打压金融，而是要积极发展现代金融，使其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可供投资理财的优质资产。

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我们要振兴壮大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又难以获得足够多的优秀人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名牌高校毕业生都不太愿意去实体经济领域就业，他们往往更愿意去证券、基金、银行等虚拟经济领域，或者去政府机构。这从个人选择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看，一个年轻人不愿就业或不看好的行业，是没有光明前途的。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错配，是我国振兴壮大实体经济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为吸引年轻人就业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年轻的技术工人是我国制造业的顶梁柱，是中国制造的未来，必须大幅度提高制造业中技术工人的待遇，实施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励其持有企业股份，与企业共命运、同成长。要真正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能让工匠过上有社会尊严、体面的生活，年轻人就自然会争学技术、争当工匠，实体经济就一定能振兴壮大。

把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引导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

科技创新与现代金融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矛盾是，过去我们没有区分科技的发展阶段以及金融的性质，导致资源错配。一般来说，在科技创新的早期阶段，比较适合用直接金融的方式如风险基金来支持，而在创新的大规模产出阶段，则比较适合用间接金融的方式即银行融资来支持。这两个关系必须匹配。现在一些地方搞科技创新，不区分科技发展的阶段，不区分哪种性质的金融适用于什么阶段的创新，都让银行信贷去支持，名曰“科技金融”。其实这是违反科技和金融相结合规律的。商业银行的资金有安全性要求，绝对不能把它放到风险很大的科技创新领域当中去，而只能放在批量生产之后。风险大的科技创新，一定要以直接融资的方式，由资本市场来解决。科技是决定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因素，但科技特别依赖于直接金融的发展。实际上，没有直接金融的支持，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科技可以很顺利地发展，也难以成为科技强国。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的要求非常高，但是我们的人力资本供给不足。我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输出了一大批留学生，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壮大、科技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未来怎么进一步吸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所需的各种人才？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建立以城市群落为主的内需平台，形成强大的虹吸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机制。因为人才必然往机会多的地方流动，中国的内需起来之后，一定会出现全世界最优秀的先进生产要素争先恐后往中国流动的壮观景象。人才往什么地方跑，除发展机会外，生活生态环境、城市化水平等因素也起作用。未来怎样通过内需吸收科技创新的主要资源以发展实体经济和创新经济？这是我国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课题。

现代金融与人力资源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发展现代金融业的强烈要求，遭遇金融人才尤其是高级金融人才短缺的瓶颈。这是经济结构上的一个矛盾：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制造强国，我们的产业结构以“重资本”的制造业为主，但经济却长期处于金融抑制状态，融资难、融资贵成为长期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尤其是因资本市场制度不够健全，我国创新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要求在强壮实体经济的目标下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具体措施就是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这为全球顶尖金融人才创造了施展身手的高地和平台，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建设四位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就必须把全球最优秀的金融人才想办法引进来、留下来、留得住。

总之，在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过程中，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坚决把壮大实体经济作为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在具体工作中，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

在全球分工演进中创造中国经济奇迹

王修志[※]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心地位。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指引。过去40年，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有机互动，中国经济成功融入和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由此驱动国内专业化分工演进，推动资源在结构和规模两个维度的市场化配置，从而获取分工红利，创造了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跃升的中国经济奇迹。从学理逻辑看，可以概括为专业化分工演进中的经济结构性增长效应。

中国既是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红利分享者，更是红利贡献者。但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参与全球分工传统模式下的经济效应日趋递减，专业化分工演进中累积的结构性矛盾也日趋显现，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这是近年来尤应关注的两大难题，需要从国际与国内两个空间视野予以观察。

从国际视野看，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动能渐趋衰竭，结构性增长红利明显下降。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累积的技术创新，以及战后以美欧为主导者提供的全球经贸规则等制度创新，是驱动分工演进的主要动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扩散，其创新效应已近消失，其驱动分工演进的价值增值动力明显弱化。近年来出现的所谓逆全球化倾向，除了财富分配不均、就业机会受冲击等原因之外，分工动能弱化、整体红利水平下降，是更深层次和更为根本的原因。这对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

从国内视野看，专业化分工长期锁定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并导致分工固化，结构失衡矛盾突出，结构性增长被抑制，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凸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的整体分工地位被锁定于微笑曲线的底部，由此决定了国内分工特定的资源配置和要素投入格局，从而决定了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此时，各地政府基于GDP追赶目标的资源配置干预模式，则凸显其制度弊端，地区产业同构、区域发展不协调等现象正是分工固化和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结果。

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看，传统动能日趋衰减有其必然性。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中长期的中高速增长过程中，为何还未能培育出足够的新动能，为何还未能实现新旧动能的柔性更替？这有赖于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对我国分工经济理论做深刻而系统的反思。

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精髓在于分工演进过程中实现内生的结构性增长。前瞻新一轮经济全球

化及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大势，并针对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大目标，中国分工经济需要在两个维度实现突破：一是塑造有高度自主特征的专业化分工新动能；二是构建基于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地位的自主内生专业化分工演进机制。前者主要目的在于化解当前驱动分工演进的动能不足矛盾，以及国内分工由于过度依赖外部动能而造成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和分工固化问题；后者的意义则在于尽量减少政府之手对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从而在内生分工演进中尽可能地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下一步深化改革开放需基于分工经济从数量型增长到质量型发展、从跟随参与型到主动引领型这两大转型背景，重点关注以下着力点：（1）以重构全球价值链为契机，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全方位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从制度、技术、市场和新型要素等维度，为国际分工提供新动能。（2）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契机，在优化政府宏观调控、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市场主体权益保障、企业家才能发挥、建设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大做强市场微观主体，做精做优政府分工服务，真正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3）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契机，加强民生投入、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推动民众消费升级，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为构建新型分工体系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市场需求保障。（4）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制度壁垒，在自主内生分工演进中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真正促进区域协调、产业协同发展，有效化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难题。

面对全球分工动能不足的严峻形势，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在高质量发展中，中国要实现从参与分工到引领分工的转型，即通过高质量市场需求、高水平技术和制度创新、高品质要素资源等新型动能推动国际分工演进。我们充分相信，中国更好地发展，能促进世界更好发展；世界经济更具活力，中国发展会更好。

中国奇迹是市场取向改革的胜利

刘志彪[※]

今天我们谈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自然要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最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最成功的经验，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不断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不断进步。

可以这样说，40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就是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始终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目标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实践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与产权的明晰界定和财产保护制度的强化有直接的关系，都与市场主体的逐步发育成长有直接的关系，都与市场体系的逐步健全、市场调节机制的逐步有效以及市场工具和手段的逐步深度运用有直接的关系；都与政府职能的逐步到位，政府宏观管理的法制化，以及政府范围和规模的合理化有直接的关系。总的来看，在产权、市场与宏观管理三个层次，40年来的改革开放都是以市场取向为基调和标尺的，即什么样的体系、体制和制度适合于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就按照这个要求去逐步改变。

市场取向的改革为什么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成就？其中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只有政府一家。计划体制假设政府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这在实践中遭遇失败是必然的。市场取向的改革确立了人们的财产权利和劳动权利，界定了投入的收益边界，广泛地调动和刺激了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动能和发展潜力，激励了他们投身于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和空前的积极性。同时，政府对市场秩序的建立和守护，使这一发展进程更加平衡和稳定。这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力量来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很有底气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市场取向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奇迹，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巨大胜利。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但是它必须仍然坚持市场取向的总原则。因为市场取向的改革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真正的基础条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存在着“重大结构性失衡”。为此重点就需要运用结构性政策进行供给侧调整，促使资源通

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更多地流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要用关键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千方百计地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显然这种破和立的具体政策行动，离不开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否则就无法使政策要求通过市场传导机制来实现，而只能借助于低效的行政指令。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新时代我们仍需逐步解决的老问题。过去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都与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推进不足、遇到强大的阻力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在某些方面推进过度，即过度的市场化有关。界定和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路径。具体来说，一是要“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要通过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投资清单等改革和管理，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干预，把政府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做最有效、最能做的事情上；“更好”的标准是“三个位”，即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二是要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放手”，就是要对权力多做减法，对市场多做加法，充分相信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当“抓手”，就要把市场调节机制当作工具，当成完成我们国家伟大复兴的工具，不要纠缠于市场的姓资姓社问题。三是要“放手”，而不是“甩手”。不当甩手掌柜，不放任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政府要市场活动制定规范，并充当监控者和仲裁者，在非盈利性活动中发挥主体作用，为市场发展提供充足的外部经济性。

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

刘志彪[※]

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局面和新思考，仍然要在市场取向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塑造政府和市场在各自领域中“双强”的经济体制。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由此产生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它是一个亟待破解的有着重要经济学意义和现实政策价值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世界奇迹，是市场取向改革的胜利。改革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和困难，是市场取向改革推进不足或市场取向的改革推进过度的综合产物。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局面和新思考，仍然要在市场取向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塑造政府和市场在各自领域中“双强”的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逻辑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坚持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其实就是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这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仍然是市场取向，而且是非常彻底的，既要纠正市场取向改革过度的地方，又要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不足的地方。过去两年，中共中央下发过两个文件，分别是《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都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和灵魂。对于财产权的保护，例如甄别和纠正一些冤假错案，给予人发展的信念。同时，今年在宪法修正案中提出了给地方政府赋予一定的立法权。笔者认为，十九大之后，我国市场改革取向的方向仍然是坚定不移的，而且比过去更加强调竞争对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是高质量竞争。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精神的提炼，可以归纳的方向和途径很多，笔者简要概括说三点。

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民间、市场、企业家、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全体中国人民投身发展的积极性和创新创业的热情。实际上就是把计划经济下，由少数人推动的发展积极性，变成整个社会的自觉的积极性。从而使全社会的生产性努力不断增加，分配性努力不断降低，把发展与民众个人的努力结合起来，大家都来投身发展，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的效率不断上升。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发展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改革显然是艰难的、有波

折的，但是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和态度。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精神和态度，才有了前面所讲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前进。

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否定自己，纠正改革开放的偏差，不断地给自己加压。这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的过程中前进，在给自己不断加压的过程中前进。在广东、江苏、浙江这些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种精神尤为可贵。

未来的改革，坚持的仍然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未来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过去我们一直侧重于纵向治理体系改革，现在需要高度重视横向治理体系改革。

横向的协调体系，在中国仍没有真正形成。过去改革的放权让利，都是沿着中央给下属部门放权，沿着中央部门给地方部门放权，一个是条条放权，一个是块块放权。条条放权就是表现在中央各个部门向底下放权，一直放权到基层政府。块块放权就是中央给地方放权，一直延伸到基层政权。这些改革都是必须的，但是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真正延伸到社会主体和民间，如何彻底激活民间市场和个人。

下一步进行的改革，仍然要坚持过去的一些正确做法，这就是在坚持这两种改革的同时，要增加横向放权。所谓增加横向放权，就是横向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就是把大量的社会权利分散到市场、企业、企业家、家庭、个人这些主体上去。比如说企业行业协会功能要增加，企业家功能要增加，个人决策功能要增加，从而给企业真正的放权，增加个人的权责利对等性。因此未来改革的方向，其实就是要坚持以横向放权为主的市场改革方向。与此同时，政府应该从过去的盈利性部门中退出，专司社会发展、民生发展，尤其是民生发展应成为政府的主要责任。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光是对物质的需求，还有对社会就业、医疗教育、安全、环境等一系列方面的需求。这些方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社会发展和民生发展问题。这就意味着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应主要在经济领域当中发生作用，应该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包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好的教育、更安全的社会、更美好的环境等。只有在这一系列领域当中变成强政府，跟经济领域当中的强市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所谓市场、政府双强的格局，这应该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取向。

高质量发展更是一个实践课题

刘志彪[※]

关于高质量发展，与其说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命题，倒不如说更是一个实践意义更大的发展课题。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根据顶层设计，各个地方拿出具体的落地落实措施。同时，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自主创新原创性成果的涌现培育一个好的环境。

推进高质量发展要靠扎实有力的具体行动

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有具体的措施和行动。从全国范围来看，根据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根本性判断，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们的结构性政策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重点要在“破”“立”“降”三个字上下功夫。“破”，需要运用结构性政策进行供给侧调整，促使存量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更多地流向现代高技术产业中的创新型企业，同时要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千方百计地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立”，一是通过加大增量的资源投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增加高质量部门的增量供给；二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其改造传统部门，提高存量资产的技术水平和效率；三是以优质的技术创新类资产为基础，通过金融部门的资产证券化，为社会提供更多质量更高、收益更稳的可投资资产，以此降低资产价格，平衡虚实经济之间的矛盾。“降”，是为了以此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提高实体经济投资的回报率，增加其投资吸引力和竞争力。当前，要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央提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这一要求紧密结合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总体要求，非常明确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地方政府就GDP增长的绩效竞争，一直是与不断深化的市场力量有效地融合在一起的。这一竞争格局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地区片面追求数量、粗放发展的不良倾向。现在中央要求把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体制，改为“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新体制，这个“指挥棒”指向哪里，将成为各个地方和广大干部的努力方向。如何建立指标体系，制定政策体系，确立标准体系，组织统计体系，进行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直接关系到能否找准方

向、促进科学决策、凝聚发展共识，这是引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探索并解决的重大问题。

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明确的发展底线。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是未来几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经济工作中，“三大攻坚战”是化复杂为简单的重要内容，是纲举目张的重要工作。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是为了实现稳定协调发展；抓好精准脱贫工作，是为了实现公平共享发展；开展好污染防治工作，是为了实现生态绿色发展。因此，“三大攻坚战”践行了新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推进高质量发展，未来应适当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增加其民生、文化、生态和社会职能。为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我们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众所周知的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决策者必须受到硬预算的强烈约束。只有如此才能做出理性的、追求经济效益的决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松弛，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也是粗放式发展、高负债发展、可能发生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适当减少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有利于其把精力集中在缓解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上，也有利于减税降费、推进扩大内需，更有利于确立企业的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

适当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并不是说政府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要减少，相反，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推动，只是作用的范围、方式、手段具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一个关键命题，就是要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更充分地发挥地方政府和部门的作用，发挥广大干部的作用。所以中央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绩效评价、政绩考核等，就是要通过对干部晋升和奖惩等管理，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推动地方实现高质量发展。

地方党委、政府在经济战略的制定上，尤其要注重实施相对均衡协调的追赶型战略，要重新审视过去忽略的东西，重新在资源配置上把过去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的短板拉长，把过去暂时搁置和未支付的社会成本重新补偿回来。做不到这一点，“短板效应”将会引起社会边际成本急速上升，从而制约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于实现全面小康来说，有些短板是避不开的，如农村贫困人口、科技进步水平和生态环境、金融安全的制度短板等。因此，补短板就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就要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扬长补短”的关键，是要补制度创新的“短”，从而释放制度性红利。如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在于城市化的制度设计，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在于实施绿色产业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在于融资体制的完善，导致金融潜在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法治基础薄弱，等等。

推进高质量发展要追求自主创新原创性成果

自主创新原创性成果，既可以提高竞争的平台和门槛，又能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提高产业的附加价值。不过既然是原创性，就提高了创新的标准，就会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因此需要付出更高、更多的探索性成本。

追求原创性的创新成果，对制度的依赖更加强烈。缺少制度创新的支撑，不可能有原创性创新成果大量涌现。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营商环境，是驱动创新实现原创性的主动力。一是在企业治理结构中，要有真正代表长远利益的决策支持体系，急功近利的短期眼界，不可能孵化和衍生出需要长期打磨才能成功的原创性成果；二是要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才能使企业既有竞争压力又有竞争实力去长期从事艰苦的研究开发活动；三是要以法治保护去鼓励创新活动，如实施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等。

要积极培育和扶植本地区原创性成果大量涌现的市场基础。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原创性知识产权和品牌，最初都是首先依靠国内市场的不断成长，然后通过不断打开别人的市场而慢慢发育成长起来的。当今中国市场已对外资高度开放，但对本土企业却仍然存在一些行政性的进入障碍。具有庞大市场潜力和现实市场容量的中国，如果不能大量培育出中国企业的原创性创新成果和品牌，于理于情都是说不过去的。从宏观方面看，政府应该站到前台带头支持中国企业实施原创性成果战略。对政府的大宗采购项目，应该对国内优质企业所生产的优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按国际惯例实施倾斜支持政策。政府要努力建立国内统一市场，拆除市场壁垒、打破进入障碍。同时，社会要创造有利于中国企业原创性成果形成的市场基础和舆论条件。从微观方面看，比国内市场规模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国内需求的特质，用经济学家波特的话来说就是要培养国内客户的挑剔度。当国内客户对产品或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挑剔”、越来越精致时，企业会因此加大创新力度，从而获得竞争性优势。精致需求型的客户，他们对企业施加高标准的压力，激励企业改善创新、自我提升，由此进入更高级的市场区域。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论

宋文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这是党的代表大会首次关注企业家精神，自然也引起了人们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思考。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特质是什么？如何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讨论并给予回答。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特质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国有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民营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共同的特质是什么？

关于什么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目前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企业家这一概念由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在18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即企业家使经济资源的效率由低转高，企业家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企业家精神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能力的表述方式，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是一个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彼得·德鲁克说。彼得·德鲁克承继并发扬了熊彼特的观点，提出企业家精神中最主要的是创新，进而把企业家的领导能力与管理等同起来，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家在经济上的冒险行为，企业就是企业家工作的组织”。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曾在26个国家和地区与几十万名企业家交谈，其中79%的企业领导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的成功非常重要。全球最大科技顾问公司Accenture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在全球高管心目中，企业家精神是组织健康长寿的基因。一致认为：企业家精神首先是冒险精神，冒险的驱动力是组织利润。敬业是企业家精神动力，专注是企业家精神底蕴，诚信是企业家精神基石。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企业家精神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永远不变，即企业家精神是各种优秀元素的综合体，是优秀企业家群体精神的展现。企业家精神更多体现在创新和社会责任，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主要靠市场。

企业家精神具有共同的规律：企业家的认知能力。企业家在决策过程中使用的是基于直观推断的逻辑，而不是大企业经理阶层利用的程序化的计划决策。在不完全和不确定信息的复杂世界中进行战略决策，使用直观推断方法可以简化决策过程，使企业家的思考出现显著的跳

[※] 宋文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教授，管理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企业文明》2018年第06期。

跃，由此产生各种创新成果。企业家的发现能力。这种抓住稍纵即逝机会的洞察能力主要取决于与市场贴近的程度、过去积累的经验和对学习机制的自我强化效应，甚至可能与某人的先天禀赋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这说明了企业家发现能力是一种难以模仿的异质性资源，是某些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根源。企业家的实现机遇能力。一般的技术知识专家不具备企业家所拥有的那种专业化的投资能力。企业家思想给予的方式是通过企业组织的方式来运作所发现的知识，或者是直接把所发现的知识在市场上出售。企业家的协调知识能力。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新的资源组合”的形式，生产新资源有这么几种情形：由企业家利用发明改革或革新生产模式，或运用一种未尝试过的技术生产新商品，或用一种新的方法生产老商品，通过开发一种新的原材料的来源，或新的产品渠道，或通过重组形成一个产业。

党的政策文件说。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央首次出台文件聚焦企业家精神。《意见》提出“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即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勇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这“三个弘扬”，实质上也是中国优秀企业家精神。

显然，现有西方的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学说与中央对于企业家精神的概括有诸多的不同。一是，《意见》对国有企业家和党员企业家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要求国有企业家“要自觉做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的模范”，要有“服务党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担当精神”。党员企业家“要自觉做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模范”。这样的表述在以往企业家精神研究中未曾出现过。二是，《意见》对民营企业企业家特别是年轻一代民营企业企业家提出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开展优良革命传统、形势政策、守法诚信教育培训，培养企业家国家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引导企业家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员工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三是，《意见》提出，企业家要积极投身国家重大战略。例如，鼓励企业家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

“三个弘扬”提出了一些中国优秀企业家精神与一般企业家精神不同的特点，但对于创新的认识，两者还是非常一致，都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最主要的特征。《意见》明确提出，要激励企业家“将创新创业作为终身追求”。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正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这就要求中国的优秀企业家一定要具有勇于改革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企业家精神有着一系列重要论述，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多次论断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

2001年3月24日，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参加省企业家活动日暨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

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面对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工商界代表，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提及企业家精神，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2016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说：“要注重对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培养，引导他们继承发扬老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广大民营企业要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致富思源，义利兼顾，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大势，提振发展信心，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完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激发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才能，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推动企业不断取得更新更好发展。

2016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要实现更好发展，必须更好分析形势和环境，更好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更好把握宏观经济大势，更好应对挑战。为此，要加快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

2016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指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既要从严管理，又要关心爱护，树立正向激励的鲜明导向，让他们放开手脚干事、甩开膀子创业。要大力宣传优秀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营造尊重企业家价值、鼓励企业家创新、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浓厚社会氛围。”

2017年4月1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

综上，我们认为：企业家精神表明企业家这个特殊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的抽象表达，是对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逻辑结构的一种超越、升华。企业家群体独有的显著的精神特征就和其他群体特征区别开来，人们日常也把它看作是成功的企业家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并以此标尺可以识别、挑选和任用企业家。

可见，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除了《意见》提出的一些特殊要求，最主要的精神特征应该是创新精神、改革精神与开放精神，而这三个主要精神正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新时代如何培育企业家精神

扩大改革开放，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生成提供思想保障。

一是要认识培养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重要性。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认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培养的重要性，把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企业家是决策者、领导者、指挥者，更是创新者，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发展的带头人。二是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生成文化环境。建立鼓励创新、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全面提升中国企业家的综合素质。三是要加强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宣传。大力宣传新时代企业家创新精神，鼓励企业家不断创新、不断进取、不断贡献。

强化制度创新，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生成提供制度保障

一是要明晰企业家个人持股比例，提高企业家对企业的关切度，调动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使企业家参与企业剩余利润分配。二是要进一步优化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家形成合理的、稳定的报酬预期和任职预期，推动企业创新升级。三是改革国有企业家管理体制，取消董、监、高的行政级别，大力推进职业经理人建设。四是企业家精神是在充分自由竞争的 market 环境中天然产生的，需要创造法治、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国企与民企责任均等必须与权利均等相对应，为民企创造应有的社会、市场、舆论、法治环境，提供企业家精神发扬光大的土壤。

加强教育培训，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提供持续的创新动力

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要从改革培训教育入手。一是加强国有企业负责人教育培训，拓展国有企业企业家成长空间；二是改善营商环境，创立民营企业大学，营造民营企业家平等成长空间；三是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企业知识产权，企业家应当有雄才大略，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战略眼光；四是高等学校要为培养新一代的企业家做贡献，既要在企业机遇期果断出手，也要能在企业发展中不断创新，同时还必须要有自觉为人类社会发展尽责出力的意识和行动。

完善选拔激励淘汰机制，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生成提供机制保障

一是立建企业家选拔机制，使真正有创新精神的人走上企业领导岗位，要在全社会公开招聘职业经理人。二是完善企业家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家创新活动。创新是以企业家冒险精神、承担风险的能力为前提的，高风险才能得到高回报。三是强化动力机制，大力推进以混改为核心的国企改革，转变国企内在机制。四是建立容错机制，在法治范围内给予更多宽松环境。五是建立保护机制，政府在市场公平、产权保护、经营环境方面给予更多的保护，严格区分企业家违规与合法经营之间的界限。六是建立社会培育机制，建立社会宽容和多元价值体系，鼓励体制内具备企业家素质的人才积极向体制外双向流动，形成长氛围。七是建立竞争淘汰机制，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对于企业家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创新不是无原则冒险，通过市场的检验，使富有创新精神的人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而不适应者则被淘汰，这样有利于企业家创新能力的提高。

加强国企改革容错机制的顶层设计，为国有企业家打气兜底。

如中国石化集团原董事长傅成玉在2017年“两会”发言中提到：“干得好的没认可，干得不好有考核；有了争议没保护，出了问题要追责；干得多的毛病多，不干事的最快活。”国企内部滋生了“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提意见的”不良风气。国企改革推进面临的巨大困难，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国企改革缺乏容错机制的顶层设计。2017年5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指出，建立必要的改革容错纠错机制。对国企而言，到了不改革创新就不能发展的关口，然而国企改革过程中，还面临国有资产流失风险、“求稳怕错”心理等因素的阻碍，因此建立容错机制迫在眉睫。从这一角度出发，国企改革容错机制实质上就是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一方面允许国企改革过程中的试错，建立起合理免责机制，另一方面要警惕个人英雄主义“瞎折腾”，建立犯错之后的及时纠偏机制。其一，通过容错机制激励改革当事人克服“求稳怕错”心理。当前，一些改革面临“中梗阻”“落地难”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求稳怕错”心理作祟，担心“做得多错得多”，而改革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会有失误，对所有的错误一律惩罚会磨灭甚至摧毁改革者的积极性与创新性，而一律放任不管则会滋长腐败之风，致使国有资产流失，因此需要一个完善的容错机制来把握这个度。其二，利用容错机制保护国企经营者正当权利，用市场化手段推进国企改革。过去评价国企经营者绩效过度依赖报表所体现的公司经营与资产财务状况，缺乏长远的考核机制，容错机制可以有效缓解这种弊端，在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大前提下，放开政府对国企的过度管制，让国企立足于长远的改革与发展，激发出活力和创新力。第三，借助容错机制及时纠正改革过程中的失误。容错机制不但可以激发地方政府官员和国企经营者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一种预警和反馈机制，在出现改革失误之前及时提供预警信号，在失误一旦发生时及时给予反馈、及时纠偏。

建立国企改革容错机制，首先需要顶层设计支持，建立起完善的决策监督机制。国资委要转变国企监管职能，建立容错机制的细则，明确容忍免责的范围。确定免责的范围要基于改革的出发点，对于有所作为、有所担当、有所创新的改革，在不以牺牲国有资产为代价的前提下，要理解其实施过程中的意外因素，不予追究责任；对出于私心进行利益输送、违法违纪扰乱市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要予以严厉追究。同时，在容错机制实施过程中挖掘并提拔一批敢为敢当的改革者，通过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建立起职业经理人的良好成长环境以及科学评价机制，培育出有能力实现国企改革的职业经理人。

加强党对企业家队伍建设的领导，为壮大企业家队伍奠定组织基础。

坚持党管企业家，是党管人才的具体体现。壮大企业家队伍，加强对企业家的党性教育、宗旨教育、警示教育，加强企业党建工作，使国有企业家发扬创新精神、守法律己精神，这不仅是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所必需的，也会对民营企业发挥示范作用，将众多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引导到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道路上来。

40年的改革开放激活了最初的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有了释放才能、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与自由，让这些人变成了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创新活动的实践者。中国复兴需要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但不能把资本家混同于企业家。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转变经济结构，振兴实体经济，企业家应勇担使命、主动作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论述，卸除思想负担，发扬企业家精神，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投身市场竞争，用其所打造的优质产品和服务，去为中国复兴开疆拓土，为中国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活力、贡献新力量、体现新作为。

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与关键环节

刘志彪[※]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指导未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总纲领。党中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一、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五大着力点

高质量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要着力解决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用五大新发展理念来理顺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使其构成一个具有内在功能性联系的有机整体。具体来说，就是这个经济体系要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够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在哪里？这是建设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思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除要抓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高质量的开放体系建设外，主要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着力。

第一，要抓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和核心部件。传统意义上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就是指要建设农业基础比较稳固、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比较发达、第三产业门类齐全和发展迅速的产业体系，尤其要突出工业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其实这种产业体系，是把产业各部门分割开来看的，是为了制定和运用产业政策调节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它的优点是符合发展中大国经济结构非均衡的现实国情，缺陷是产业政策容易进一步割裂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导致更加非均衡发展的不良后果。党的十九大报告突破了这一表述的限制，从产业增长投入要素的角度，提出要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一崭新的表述，除强调了科技引领、协同发展的总要求外，也着重体现了产业均衡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要求。各投入要素都要为壮大实体经济这一终极目标服务，即要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

[※] 刘志彪，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原载《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4期。

第二，要抓高质量的市场体系建设。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机制。建立和完善准入通畅、门类齐全、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的市场体系，才能够给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自主经营、公平竞争优良的环境，才能给消费者创造自由选择、自主消费的空间，才能实现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微观经济基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40年，国民经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失衡现象，其主要表现：一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失衡，二是实体经济与房地产之间的失衡，三是实体经济内部的失衡。这是导致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和运转不灵的根本原因。究其原因，是我们仍处于转轨经济体制，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完全做到，或做得还不够好。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商品市场和某些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问题，但是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深层次的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功能不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还没有真正形成企业资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软预算约束现象，决策的责任主体模糊、财务纪律松弛；同时，劳动力流动呈刚性状态，市场难以彻底出清。这样，当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结构时，企业或要素并不能正常地退出市场，往往会变成各种消耗资源、不提供财富的僵尸企业。二是还没有真正形成功能完善的股票市场。中国的股票市场因制度缺陷，财富增值功能比较弱，不能给社会主体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资产。结果，除限制了股票市场在激励高科技企业发展、调节产业结构动态变化中的巨大作用外，也迫使全社会成员纷纷把原本用来居住的房地产作为资产增值的工具和手段。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巨大的房地产库存和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这些问题必将严重地影响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因而要素市场化配置成为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点问题之一。

第三，要抓高质量的分配体系建设。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激励机制，也是促进或推动产业体系走向供需均衡的动力机制。经济体系的建设必须把激励搞对。只有搞对了激励，才能发挥经济主体的自我发展、收缩和纠偏作用。同时，在追求效率的基础上，用分配和再分配工具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合理，逐步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化解产能过剩、促进内需扩大和消费现代化的主要办法。在追求高速增长阶段，我们利用廉价生产要素渗入全球价值链底部环节进行国际代工，一部分资本所有者和外国资本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但是广大的百姓收入提升的速度，与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总体上并不成比例，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也有加大的趋势。这种不良现象除会引起社会分化和不稳定外，最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效应是影响消费扩大，影响内需崛起，导致产能严重过剩，不能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及时地转向基于扩大内需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因此，未来发展政策调整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要利用分配体系的再造，提高GDP中劳动者收入的比重。这是衡量真实发展水平的“黄金标准”。

第四，要抓高质量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结构。城乡区域发展总的要求是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国土资源利用效率较高、要素密集程度较大、生态容量适度、城市群落连绵、区域发展差距较小的生产力布局目标。按照“时空压缩、增加密

度、减少分割”的经济地理重组原则，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系的建设，关键抓三个方面：一是逐步放开对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这是振兴乡村的前提；二是积极推进城市化尤其是城市群战略，吸收农村人口；三是不断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公共福利水平。区域发展体系的建设，要分区域制定分门别类的战略，如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要以公平原则动用国家力量大力扶持加快发展；对有条件可以创新引领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东部地区，可以为其创造条件优化发展。一般来说，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绝大多数地区都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取向。空间生产力优化布局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在空间上加快若干个先进制造业的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设，以此均衡地区发展差异和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第五，要抓高质量的经济体制建设。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基础，并不是西方当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主要特征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市场机制有效率、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尺度。推进高质量发展，未来要适当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增加其民生、文化、生态和社会职能。众所周知，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决策者必须受到硬预算的强烈约束。只有如此才能做出理性的、追求经济效益的决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松弛，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老大难问题，也是粗放发展、债台高筑、可能发生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因。适当减少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有利于把精力集中在缓解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上，也有利于减税降费、推进扩大内需，更有利于确立企业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

二、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环节

高质量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当前的内外部环境下，经济工作、经济政策的关键环节是什么？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另外一个核心问题。

第一，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这一要求紧密结合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总体要求，非常明确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运行中地方政府就GDP增长的绩效竞争，一直是与不断深化的市场力量有效地融合在一起的。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展开地方政府之间的增长竞争，是中国经济有别于其他转轨国家的重要特征。这一竞争格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也显示出了一些地区片面追求数量、粗放发展的不良倾向。现在中央要求把这种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锦标赛，改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体制，这种“指挥棒”怎么指、往哪里指，将成为引领地方和部门干部们努力的方向。如何建立指标体系，制定政策体系，确立标准体系，组织统计体系，进行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直接关系到找准方向、促进科学决策、凝聚发展共识，是引领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要探索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二，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要有发展底线。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这是未来几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千头万绪、纷纭复杂的经济工作中，这“三大攻坚战”是化复杂为简单，是纲举目张的工作。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是为了实现稳定协调发展；抓精准脱贫工作，是为了实现公平共享发展；污染防治工作，是为了实现生态绿色发展。因此，“三大攻坚战”贯彻的是五大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例如，防范重大的金融风险，需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方面，需要我们在实体经济内部大力鼓励技术创新，同时以这些创新类资产为基础，通过金融部门的资产证券化，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收益更稳的可投资资产；另一方面，要强化金融部门的制度创新，利用现代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活动，让更多的科技型企业与资本市场一起成长。这种实体经济、现代金融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协同发展，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建立的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体系。

第三，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使精准化的结构性政策有更大的作用空间，重点要在“破”“立”“降”三个字上下功夫。“破”“立”“降”三个方面，是建设高质量供给体系的具体行动。“破”，需要运用结构性政策进行供给侧调整，促使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更多地流向现代高技术产业中的创新企业，同时要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千方百计地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立”，一是通过人力资源和科技投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增加高质量部门的供给；二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其改造传统部门，降低对过剩部门的资源投入；三是以优质的技术创新类资产为基础，通过金融部门的资产证券化，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收益更稳可投资资产。“降”，是为了以此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提高实体经济投资的回报率，增加其投资吸引力和竞争力。当前要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和物流成本。

参考文献

- [1] 刘世锦.如何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J].中国品牌, 2018, (1).
- [2] 王昌林.扎实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J].中国经贸导刊, 2018, (1).
- [3] 黄群慧.浅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J].经济与管理, 2018, (1).
- [4] 简新华.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几个关键问题[J].学术前沿, 2018, (1).

扼住无效投资的“咽喉”

汪德华[※]

杠杆支撑的投资活动效率不高，就像水坑里耗水却不长水稻，是“去杠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类似情况其实也有发生。如上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乡镇企业投资高潮，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成为无效投资。今天的高杠杆，只不过是换种形式历史重演。与历史类似，当前的“去杠杆”，要处理好已经发生的无效投资等遗留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逐步从体制上扼住无效投资之“咽喉”。

一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破解隐性担保和预算软约束。这包括界定好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处理好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让国企回归正常市场主体。

二是优化预算管理制度，以透明化约束地方政府投资活动。如果地方政府债务支撑的投资活动社会效率较高，举债并非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债务应与投资活动关联起来。可考虑建立债务与资本性支出预算制度，要求各级政府将所有政府债务和资本性支出综合起来，编制在一本预算中。债务与资本性支出预算是与四本预算并行的体系，应独立编制并公开透明，便于从整体上控制各级政府的资本性支出和对应政府债务的规模和结构，分析其必要性、效益和风险。

三是继续加快金融监管等领域的改革，提升金融体系支撑实体经济高效发展的能力。金融体系是最重要的市场资源配置部门，其核心能力是挑选出高效率的投资项目并予以资金支持。从过去的情况看，金融部门自身耗费的资源很多，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但其挑选优质投资的功能并没有显现出来。甚至可以说，稻田里大大小小的水坑的形成，金融体系难辞其咎。当前的强化金融监管，应围绕提升金融体系挑选优质投资项目能力这一根本目标。

[※] 汪德华，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新华日报 2018 年 7 月 24 日第 013 版。

弘扬企业家精神 促进高质量发展

吴跃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讲话中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

创新是企业家的“内在因素”，是民营企业家的灵魂，是创造更多财富贡献社会的强烈冲动和社会责任。

民营企业家与企业创新生命同在，可以说，创新主体是企业家。如深圳的经验是，90%的研发机构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90%的发明专利出自企业。

科技成果要变成生产力，必须通过企业家实现。企业家依据自己的判断，预测、洞悉社会预期，洞察市场和产业发展方向，进而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开拓市场、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一，企业是市场资源配置主体，应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

促进民营企业家增强配置生产要素能力，必须充分尊重保护民营企业家主体性创造力，并为之提供更好更周详的服务。

一是鼓励民营企业培育自身核心竞争能力，为企业注入持续动力和发展动能。

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引领，从而突破发展瓶颈。

三是企业的创新，不是单一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而是管理创新、业态创新、机制模式创新，更是系统创新、集成创新。

企业家精神与工匠精神是一致的，“质量之魂，存于匠心”。要促进企业全力打造工厂智能化、管理信息化、制造精益化的“三化企业”，通过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集成，把产品定制化、制造柔性化、质量标准化融为一体，打造中国制造的世界品质、全球品牌。

第二，民营企业家是风险承担者，应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有效化解各类风险。

经济学家韦伯斯特曾这样说过，企业家就是“一个经营冒险事业的组织者，特别是组织、

[※] 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国商业史学会苏商史专委会副会长、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安徽工业大学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本文原载人民政协报2018年7月27日第005版。

拥有、管理并承担这一事业全部风险的人”。

企业家的工作是总体性的、决定性的，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么营销，这些都是产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把控这些因素、承受这些因素结果的只能是企业家本人。但是，企业家面对的风险，并不都是来自内部。从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角度看，降低企业外部运营成本，可以有效提高企业内部抗风险能力。

一是要为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实体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出实招。一方面，企业要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特别是经营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尽快完善证券法的修订，通过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的股权融资，从而促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二是要降低基础设施服务费用。我国的基础设施是最完备的，包括高速公路、高铁、电信的覆盖、高速互联网的覆盖，以及电量稳定的供应，这都是构成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但目前有些收费标准还偏高。

第三，民营企业是绿色环保责任者，应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采用环保的生产方式。“不要污染的GDP”，这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导向，需要政商同力解决。因此，必须在环保问题上严苛问责，绝不松懈。

同时，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娘家——工商联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采取措施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宣传好环保先进典型、实现典型引路。谋在长远、功在日常。在此方面，各级工商联可以大有作为。比如，工商联可以充分发挥协调地方政府、企业和商会以及科研机构等力量的优势，针对一些优秀企业依然存在的突出环保问题进行专项调研，学习国有企业的环保长处和做法，对症下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用再生资源和可循环的生产方式解决污染和发展的矛盾。最终，通过化废为宝，解决环保公益性和企业谋求利润的矛盾，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符合绿色环保、循环再利用要求的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科学发展新路。

第四，优化环境，保护、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

一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根本在于以法律为底线确立政商关系框架，“政商”关系要“清”而“亲”，为政者必须要弘扬、严守契约精神，依法办事、依法相处。创新发展的主体环境构建者是“政”，涉及制度建设、方针政策、反腐力度、金融支持、地产供给、产权保护、财税减让、人事招引培育、招商与投资及对民营企业家的真正尊重惜护，保护企业家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因此，扫除“清”而不“亲”的庸政怠政懈政之态，构建好“清”而“亲”的政商关系，需要各级政府做推动和助力民营企业发展的“店小二”，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认真分析经济和企业发展的优势和短板，下好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先手棋”。

二是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公正法治环境。

这既需要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契约精神主导市场交易，充分体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同时，也需要加大惩治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等各类产权、背信损害企业利益以及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切实维护企业家财产权、创新权益及经营自主权等合法权益。最终，形成法律的预期性理解、宽容机制，给予民营企业敢为人先的一些创新作为、风险出错的足够宽容理解。

三是营造全社会尊重民营企业家的文化氛围。

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企业家、尊重企业家创新创造的文化环境，激励民营企业家创新发展，并通过企业家精神影响社会各界继续努力拼搏，使创业创新创富成为全社会推崇的价值导向，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目前，从中央到省、市两年一次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评选和表彰，仅限于统战、工商联系统之内，并没有面向全社会进行表彰和肯定，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和面向全社会。建议参照全国科技大会的规格，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定期召开全国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大会，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表彰优秀民营企业家，明确民营企业家在科技创新、市场竞争的先锋作用和重大贡献。给予民营企业家群体以认同、肯定和荣誉，由此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号，切实提高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加快沿江化工产业 转型升级

吴福象[※]

江苏沿江是化工产业的主要集聚区，有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各类化工产业园。当前，江苏沿江化工产业亟待转型升级。首先，江苏沿江化工企业数量南多北少，南岸分布密集且发展较快，北岸分布散乱且发展滞后。其次，江苏中小化工企业半数以上都散布在化工园区之外。这些零散布局的化工企业普遍面临能源、用地和公用工程等要素供应方面的刚性约束，面临环境容量指标日益收紧、安全生产措施要求日益提升的压力，面临企业技术更新改造及新增和扩建产能需求受到政策制约的窘境。再次，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普遍较低，技术和设备工艺简单，使得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安全和环保隐患突出，部分企业违规排放，威胁水体环境和饮用水安全，生态环境压力巨大。

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不仅与长期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认知误区有关，也与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属性有关。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消费当中，有70%以上的消费品与大类化工产品有关。正是由于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消费，很少有人愿意将化工与高技术产业联系起来。

在世界产业发展史当中，现代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的创建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围绕化学和医药这两个产业的大化学工业的技术能力、功能能力、管理能力在科学和工程的交叠中艰难而曲折地演进。其中，技术能力以知识为基础，是在研发中满足研究所需要的能力；功能能力以产品为导向，包括开发能力、生产能力、营销和分配能力等；管理能力则是以管理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组织能力。

在工艺成熟度和模块化程度二分之下的产业创新图谱中，无限细分的化学工业对于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有着十分苛刻的要求。比如，先进材料和专业化学药品行业，属于典型的工艺嵌入式创新，虽然工艺技术成熟度可能不高，但模块化程度要求很高，工艺发生的细微变化都将不可预测地改变产品的特性，其设计与制造工序不能分离。再比如，生物制药和纳米材料行业，则属于工艺驱动式创新，这些行业的研发与制造的结合度非常高，将研发与制造分离的风险非常大。然而，现实当中沿江的不少化工企业，从其建厂之初就是粗放式开发和经营，甚至不少是小作坊式的企业。

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指引下，着力解决“化工围江”问题，全力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共同打造有机融合的绿色高效经济体，探索沿江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 吴福象，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群众》2018年15期。

级的模式与路径迫在眉睫。

一是优化园区和产业规划布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有道，车有轨，产业要进园”。实现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一步，就是要依据工艺成熟度和模块化程度，让不同的细分行业分类入园。在同一行政单元或同一经济板块，可以考虑按照产业的相似性原理，让主导产业和辅助产业之间有更多的互动与协作，实行“一中心+多园区”的协作模式。此外，化工产业具有产业链条长、产品门类多的特点。在每一个环节或工序上，依照工艺成熟度和模块化程度划分，都有着无数的专利。如何以专利分布整合前后向产业链，将这些专利成果转化为有效的产出和价值，十分关键。

二是加大技术研发和改造力度。化工产业是进入壁垒非常高的行业，无论是基于科学原理的产品开发，还是基于工程方案的工艺过程开发，都需要大量的基础投入。尤其是那些基于大型运算和配对的测试平台，不仅投入的资金量巨大，而且运行的技术复杂程度特别高。对于这样一些高标准、高投入的项目和平台的建设，必须实行政产学研用的高度协调，发挥风险投资和金融资本的纽带作用。化学工业不仅在工艺和流程方面特别复杂，而且对于物流、储运和水资源循环利用方面的要求特别高。沿江化学工业的转型升级，从根本上来讲主要是结合其生命周期的特点，加大设备和工艺技术改造的投入和升级改造的力度。

三是围绕技术链实现产业动态双迁。无论是基础化学还是应用化学，真正的生命力在于产业创新，而创新的动力来源是人力资源。在江苏沿江城市群，不同等级的城市对各类人群的吸纳能力是有差异的。化工产业的空间布局和转型升级，应当充分考虑到不同技能人力资源梯度分布的特点，实现人才和产业的动态双迁。对于那些等级较高、要素市场发达的城市，可以考虑优先发展综合性总部+区域性总部，而对于那些产业基础较好的县级市或专业化工乡镇，则可以考虑集中发展专业性总部经济。要根据各城市化工产业发展的区域层级分布特点，利用区域和城市间的产业和人才双迁优势，将基础性化工产业的总部经济向层级较高的城市迁移，而将应用性的化工制造工厂留在广阔的城镇和乡村，实现要素和资源在空间上的动态配置。

四是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转型升级全过程。江苏沿江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要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依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次序，将重工业和重化工业的关停并转与技术改造结合起来，与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结合起来。要广泛倡导绿色生态和环保优先的开发理念，规划和改造各类化工园区，加快环保设施升级，解决废水、废气、固废排放问题，推进污染综合治理。按照绿色GDP核算的原理和要求，推行卫星账户法的核算方法，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全过程。

五是实现“七化”的齐头并进。江苏沿江化工产业的转型升级，要做到“科学技术化、技术工程化、工程产业化、产业价值化、价值规模化、规模资本化、资本科学化”等“七化”的齐头并进。科学技术化，就是要实时捕捉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前沿性产业，强化基础

研究的指引作用和支撑功能，鼓励并资助研发基础性产业和前沿性技术。技术工程化，就是要推动技术政策和指导技术变革的双管齐下，实现产品标准化、工艺流程化、技术模块化。工程产业化，就是要推广工程技术在化工产业的广泛应用，重点培育若干先进化工制造业集群。产业价值化，就是要依赖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的支撑，强化市场的快速获取和响应能力。价值规模化，就是要寻找和把握市场成长开始呈现加速趋势的先机，通过适度的规模效应获得高质量的发展。规模资本化，就是要充分利用资本的现代化运营手段和资产化运作来实现盈利。资本科学化，就是要整合各阶段所积累的资本，为未来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更好的科学研究资本。

尽快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要素

刘志彪[※]

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八大要素：

- 一、非均衡战略逐步转向均衡战略；
- 二、片面工业化转向四化协同发展；
- 三、要素市场化配置成为进一步市场取向的重点；
- 四、在效率基础上实现共享分配；
- 五、找准产业优先与地区优先平衡点；
- 六、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经济发展财富；
- 七、建设基于内需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 八、高质量的制度供给能力。

高质量发展是国民经济系统从量到质的本质性演变，是由系统中的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综合推动的发展结果。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通过顶层设计、上下结合，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基础要素。

支撑要素一：非均衡战略逐步转向均衡战略

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特征，是通过把有限的资源倾斜用于重点战略部门的发展，试图用产业关联效应拉动其他部门发展。这虽然可以人为地快速推动重点部门的扩张，但是长期实施的消极后果：一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容易出现“重大结构失衡”，如未列入战略和重点部门的产业和地区，会出现长期的发展瓶颈现象，而各地政府都支持重点发展的部门，会成为产能过剩的部门；二是过度强化了政府和产业政策的作用，抑制了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

转向均衡发展战略意味着我们必须扬弃过去用行政手段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转而通过利用市场机制决定资源的配置。这里“均衡”的意义在于：市场主体在利益驱动下，按照供求信号进行竞争性资源配置，就能使各产业部门获取大致平均的利润率。而偏离这一平均利润率的任何信号，都意味着产业供求结构的失衡，都会造成资源的再配置即结构纠偏。显然这就是社

[※] 刘志彪，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原载经济参考报 2018 年 8 月 8 日第 005 版。

会福利损失最小的高质量发展。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态更多表现为生态环境、关键技术、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要素市场发育等领域短板或瓶颈。这与这些领域市场容易发生失败有关，也与政府过去把资源过于集中在经济市场领域、忽视对市场失败现象进行大力度纠偏有关。因为，未来实施均衡发展战略，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非市场调节的上述领域要加大政府的投入力度。

支撑要素二：片面工业化转向四化协同发展

为加速推进工业化发展，过去我们实施了农村与城市隔离、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的种种措施。副作用是除了加剧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农村的衰退外，广大农民和城市中的低阶层的低收入和低需求，难以消化制造业的巨大的产能，结果便发生了严重的过剩产能，或者只能通过廉价出口甚至补贴出口去消化，很难有高效率、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四化协同发展”开始，即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开始突破工业片面发展的格局。如，为了消除城镇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的痼疾，开始了以城镇化拉动工业化；用信息网络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增强工业的智能化水平等等。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过去说，要全面构建现代农业基础、发达的制造业以及门类齐全的现代服务业，这其实是分割而不是融合了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缺乏等量资本在部门间获取等量收益的均衡协调发展理念，很容易在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片面突出发展某个产业部门，形成产业间的结构撕裂。建设四位协同的产业体系，从要素投入角度而不是部门分割的角度，明确了未来创新引领、产业协同发展的总要求。

支撑要素三：要素市场化配置成为进一步市场取向的重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经济转轨的重任并没有彻底完成，主要体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

在要素市场配置中，发展得比较彻底和充分的主要是货币市场、技术、信息等市场，而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还不够完善。这样结构调整便会遇到一些困难。如劳动力市场的刚性，会使国有企业在产能过剩时成为僵尸企业。资本市场中的收购兼并功能不充分，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调整就会比较困难。结构调整的困难是高质量发展的天敌，会造成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调整产业结构是化解产能过剩、消灭“僵尸企业”的主要途径，是纠正资源在产业内配置失误、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的主要措施，即通过产业内企业间关系的重组，以及资源在企业内的重组，使资源在产业内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加速移动和有效配置，从而提高供给结构、需求结构的水平和能力。

清除“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需要尽量避免直接破产，避免运用激进的手段制造人

为的社会冲突。为此，要素市场化配置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内在功能，通过两类机制来实现：一是主动性调整机制，即通过鼓励企业间的收购兼并，消灭低效率、产能过剩的企业；二是被动性调整机制，即由市场倒逼、企业为主体，放任市场机制自动和自我调节，让产能过剩企业自生自灭，由此实现市场自动出清。

支撑要素四：在效率基础上实现共享分配

在高速度发展阶段，初次分配讲效率优先，再分配适度考虑公平。但是这一分配原则长期实施，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拥有结构的严重失衡。据统计，1979年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只有0.16，1988年是0.382，1997年是0.458。到了21世纪，这个数值一般认为在0.5—0.6，贫富差距非常大了。这种状态不改变，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初次分配也要讲公平，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财富在国内居民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分配。GDP中外资拿得多，自然本国居民就会拿得少。依靠吸收外资来发展经济的地方，普遍都存在这一分配失衡的问题。二是财富在资本所有者与打工者之间的比例。创业的人多，居民富裕程度就高，如在收入和财富拥有上，浙江与江苏的差距就在此。再分配更要讲公平。如，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政府和企业从财富总盘子中拿多了，居民就不可能很富裕。如，江苏过去一直上交国家财政比较多，藏富于民不足，这是江苏聚焦富民战略的软肋。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弱，虚拟经济就会过火，善于和敢于利用金融杠杆、敢于炒作资产的地方，往往要比单纯做制造业的地方富裕。这造成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之间不成比例。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分配和再分配怎么进行调节，一个正常的社会都需要鼓励生产性努力，这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提高GDP中的含金量。

支撑要素五：找准产业优先与地区优先平衡点

产业政策优先意味着资源配置主要取决于效率导向。但这在空间上会产生歧视效应。那些区位条件较差、运输成本相对较高的地区，就不容易被纳入产业政策的发展眼界中。长期实施这一政策虽然有助于加快发展，但是会累积越来越严重的区域发展非均衡问题，从而导致极大的社会甚至政治压力。地区政策优先的主要基准是地区间发展的公平主义取向，一些发展条件较差的边远地区、资源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在实施这一优先原则时将得到优先发展。显然，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地区优先的政策取向是损害静态效率的，但是在动态、全局意义上并不一定。高质量发展是一种综合多元的评价标准，因此，对应它的最适当的状态是找准产业政策优先与地区政策优先的平衡点。

主要的平衡措施有：一、主要以发展城市群落的政策来促进乡村振兴。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尤其是城市群落发育比较成熟的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其乡村现代化步伐也快，地区间均衡发展程度也高。二、可以通过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办法来均衡区域和产业的关系。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按照经济区域来自布局的。它的一个直接效应是可以模糊

行政区的界限，拉动产业集群内所涉及的若干行政区的共同协调成长。三、有意识地加速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各行政区拆除行政壁垒，制定统一协调的竞争规则，相互之间竞相开放，这种一体化机制将产生从极化到收敛的“非均衡—均衡”发展效应。

支撑要素六：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经济发展财富

高速度发展阶段把对环境的整治和保护支出作为成本因素考虑，而高质量增长阶段把环境当成发展追求的目标，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环保支出是实现财富增长的手段。在绿色GDP的核算上，就要从国民生产总值转向国民生态产值，即把环境的损害作为国民财富的减少来对待，把对环境的投资和支出当成国民财富的一个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在地区之间要建立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可探索实施两类交易制度：一是建立和健全以单位GDP能耗为基础的节能交易制度。在这样一种以省一级为节能的交易平台上，单位GDP能耗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可以卖出相应的节能量；而单位GDP能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则必须买进相应的额度。显然，实行这一交易制度有利于促进各地区能耗量的持续下降。二是建立和健全某流域以水环境质量为基础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具体是对水质达到一类水标准的地区，达到程度越高、比例越高则奖励越多，而对三类尤其是四类水质比例高的地区，实施惩罚性倒扣。

这种制度安排尤其适用于具有上下游关系的区域生态补偿关系。建设美丽中国需要这种把环境保护的倒逼压力，转化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制度，必须把目前限于工作层面的倒逼机制提升到政策层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

支撑要素七：建设基于内需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过去开放型经济道路走的是出口导向的全球化。1992年之后，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国际贸易额呈现暴发式增长。2008年之后，世界金融危机显示了这种性质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中国需要与世界进行再平衡。

这个再平衡就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及时主动地启动“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战略。“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它的最终需求规模一直处于全球最大的地位，强势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上其他非经济因素，塑造了长期的强势美元地位，诱使全球生产要素向美国流动，导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对其进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国可以成为吸收全球高级要素力度最大的国家。因此，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在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基础上，强调利用全球的优质要素发展自己。中国尽早启动这一战略，也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以不断增大的内需来扩大进口，也能起到促进中国经常项目收支平衡的主要作用。国家领导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即将相当幅度地降低过去对某些产品的关税税率，努力增加

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期望能够用中国的内需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生产要素，因此，也希望发达国家对中国放松正常的高技术产品贸易的人为设限，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

支撑要素八：高质量的制度供给能力

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核心问题，原因在于相关制度的失败或者失效。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要重点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和素质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硬化所有权的约束，即预算约束硬化。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效率基础。二是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地方政府机制。要求把为增长而竞争的旧式地方政府运作体制，通过输入新的高质量目标函数，改造为适应新时代、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服务的新体制。三是产业政策要让位于竞争政策。旧式的产业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制造所有制歧视、产业歧视、内外经济主体歧视、地域歧视等，实现非均衡的快速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化，需要把它逐步过渡到公平竞争取向的竞争政策。四是法治化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竞争政策为导向，还要求实施自由进出市场的反垄断政策，这对鼓励高质量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市场竞争中企业自由进入，是打破已有企业的市场垄断的最锐利武器，因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政策工具。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管，是规范市场运行的主要手段，也是保护各方利益主体正当利益和市场运行的基本要求。

黄金经济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新定位

刘志彪[※]

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黄金经济带

今年4月及之前的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主持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都强调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黄金经济带，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新定位。长江经济带具有怎样的发展特征，才能称为高质量发展、才能成为黄金经济带呢？我理解总书记提出的标准，一是长江及其沿线的生态环境能得到更多的修复和保护，沿江地区生态环境更加优美；二是交通运输设施更加发达，生产要素流动更加顺畅；三是沿江各地经济发展要更加协调，东中西地区发展差距日益缩小；四是坚决地撤除地方行政壁垒，市场体系更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资源配置具有更高的效率；五是体制机制的设计科学合理，激励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不断增强。总之，长江经济带必须成为我国新时代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样板，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成为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试验田，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引擎。

过去我们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实践中，往往简单地将之看成是一个运输功能带，以利用长江具有“大运输量、大用水量、大耗电量、大消耗量”优势的名义，搞了许多污染性的重化工业项目。这虽然有受制于过去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局限性，但是也跟我们对长江经济带的功能认识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其实，交通运输只是长江的一个最基本的自然功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最需要的是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资源集中、人口集中、市场集中、产业集中、城市集中等发展优势，在沿江城市基础设施超前一体化的基础上，通过地区间的竞相开放、撤除政策壁垒和统一市场的建设，实现合理的产业竞争和分工格局，发挥长江经济带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使之成为中国经济的黄金经济带。这就是说，建设黄金运输带，只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一个基础功能而已。如果战略上我们仅仅把经济带看成运输带，在

[※] 刘志彪，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原载文汇报2018年8月13日第002版。

产业配置上，必然倾向于那些大耗水、大用电、大消耗的，且对运输成本敏感的可能影响环境保护的重化工业大项目，由此根本无法解决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就不会主动去配置那些环境友好型的现代产业体系。这就贬低了长江经济带的真正价值，也会毁了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协调重化工发展与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的关系

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黄金经济带，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转换战略，积极主动调整长江经济带沿线的重化工业。目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主持召开的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十分尖锐地指出，“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43%、37%、43%……干线港口危险化学品年吞吐量达1.7亿吨、超过250种，运输量仍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同时，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固体危废品跨区域违法倾倒呈多发态势，污染产业向中上游转移风险隐患加剧，等等”。目前长江沿线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地贯彻党中央关于坚决整治长江经济带污染问题的指示，增量上坚决不批准新的有可能带来新污染的重化工项目，存量上主动关停并转那些有污染的企业。仅仅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就关停规模以上企业近3000家、限产1000多家。

由我国大国经济特征和工业化发展阶段决定，重化工产品在我国有广阔的市场需求，我们不可能都寄希望于进口来满足，因此建设独立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离不开发达的重化工业。这就需要很好地协调重化工发展与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一律关闭了事。为此重化工在长江经济带的空间布局政策应该有重大调整。从世界各国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生产力优化布局看，目前急需贯彻集聚发展、集中环保的政策取向，即要把沿长江流域密集配置的那些“大运输量、大用水量、大耗电量、大消耗量”的重化工业项目，通过适当的机制集中到沿海地区集中布局。

目前中国钢铁、石化等所需基本原材料，如石油、铁矿石等，大多数要从海外进口。按现在的消耗速度，一般认为到2020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将增至5亿吨，其中3亿吨需要进口，即对外依存度高达60%。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把与石化工业以及与此直接关联的化工类产业，基本上集聚在沿海地区，就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最根本的还在于，这种产业布局有利于形成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通过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中集中建设环保处理设施，对这些产业固有的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不仅可以提高处理效率、获取环保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而且可以彻底改变目前长江经济带中各地分散发展重化工项目、处处冒烟、处处污染的不良发展格局。

解决这一问题的困难，在于能否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重新考虑针对地区产业转移的利益激励机制。具体来说，就是要设计出一种沿江各地区与沿海重化工产业集群区就产值和税收的分享机制，让那些主动调整产业空间结构的沿江地区，不仅不会在经济利益上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在发展中享受到适当的利益。这是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新定位最重要的机制保障。

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失衡纠偏机制

刘志彪[※]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失衡，主要有三类：一是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表现为资源进入房地产领域过多，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二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表现为资本不仅蜂拥而入金融领域，而且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为实体经济服务不到位。三是实体经济内部的失衡。表现为高技术、高质量的产品供给不足，而一般性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跨越关口。对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些基础问题进行分析，不但有利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利于推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的实践。

高质量与高速度发展的特征差异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与高速度发展的基本特征比较得出来的。这两个发展阶段的差异很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评价标准：单维与多维。高速度发展的评价标准很简单，就是单维的评价，数量有无和多少是评价的主要标准。但是对高质量发展来说，评价标准就是多维的，标准中加上了许多主观的因素，因此就显得非常复杂。过去对高速度发展，只需要从一些总量增长的指标去评估就可以了，如GDP、财政收入、利用外资等增长情况。但是对高质量发展，就要从新发展理念的角度去综合评价，一般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由于质量具有多维性和主观性，如何把无数的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偏好，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提示我们，由于评价的困难性，诸如要建设为高质量而竞争的经济体制等努力，需要有与过去不同的方法。

第二，历史背景：短缺与过剩。在高速度发展阶段，中国处于人均几百美元的贫困发展阶段，因而赶超战略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经济战略的主要选择。这时，好坏不是主要矛盾，有无和多少才是问题的核心。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地增加生产能力、提供更多的产出，就是最优的办法，就会成为政策追求的目标。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过剩经济成为常态。从需求结构的变化看，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

[※] 刘志彪，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原载文汇报2018年8月13日第002版。

的需要变成了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需求层次迅速上升，除了对物质的需要体现为更好而不是更多外，对服务的需求上升速度更快。从供给侧的变化看，落后的社会生产变成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供给的总量问题转化为供给的结构问题，宏观经济管理不再是为了解决有无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好坏的问题，解决满意不满意问题，解决结构的不均衡问题，解决质量的高低问题。

第三，实现手段：计划和市场。高速度发展阶段，生产力的低水平和消费的低层次，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标的均质性和单一性，企业产出间的差异度。市场范围、市场门类和经济规模都比较小，相对来说，决策者掌握这些信息容易，成本较低，这时计划手段是效率较高的方式。因此在高速度发展阶段，政府作用的范围和领域可以比较大，政府替代民众选择、实现集中的非均衡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美好生活需要对应着的市场和非市场的范围和规模都在扩大，另一方面需求结构也呈现为多样性、多元化、差异性和多变性。这时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获取信息的成本都很高。对于政府来说，集中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成本更高。实施信息分散收集和处理，让市场主体自己决策、责任自负的内生调节方式，仍将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也应该看到，迅速增长的非市场调节领域的扩大，会使经济生活中出现更多的市场失败现象，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转移作用领域和改变基本职能，从干预市场主体决策和干预市场活动，转向进入非市场领域发挥基本的调节作用，为市场活动提供更多的外部经济性。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失衡与纠偏

从高速度发展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这不仅是因为发展有惯性力量的作用，而且是因为当前的政策决策系统面临着一系列急需处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是过去的发展方式下累积的，是绕不过去的坎，拖延它们的解决只会导致出现更大的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失衡，主要有三类：一是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表现为资源进入房地产领域过多，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二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表现为资本不仅蜂拥而入金融领域，而且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为实体经济服务不到位。三是实体经济内部的失衡。表现为高技术、高质量的产品供给不足，而一般性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解决上述第一个问题的思路是：一方面要抑制以房地产炒作、金融体系自我循环为特征的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另一方面也要想方设法提升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增加其对资本投入的吸引力。其中，对前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不是说要用简单的行政命令去限制虚拟经济活动，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用增加优质资产供给的办法来抑制虚拟经济的泡沫化。

从商品短缺走向资产短缺，是我们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不能提供大量的优质资产供民众和社会选择，资产短缺状态会进一步加剧，从而使资产价格不断上升，形成更加剧烈的结构失衡现象。如，我们需要通过建设更多的城市群落的战略，平抑城市化中的住宅需求，从供给侧抑制房地产泡沫；我们应该通过加快劣质企业退出市场的办法，让更多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给投资者更大的选择；我们要发展更多的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提供更多的理财产品和工具，满足民众的理财需要。纠正实体经济内部结构的失衡，主要是要用竞争政策公平竞争环境，加速新动能企业的进入和竞争失败企业的退出，使资源能够按市场供求信号进行顺畅流动。

面对经济体系的重大结构失衡，当务之急是要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

一是防止金融风险。高速度发展阶段地方政府较多地把国有企业作为投融资平台，发挥国有经济对稳增长的调节作用，因此必然导致其债务较多、杠杆率水平较高的问题。目前中国企业负债占GDP比率约在150%—160%左右，在全球主要大国中位居第一。其中，国有企业的负债占非金融企业总负债的70%左右。为了防止出现可能的、系统性的、重大的金融风险，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坚决消灭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必将导致高杠杆，从而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现在的很多僵尸企业如果不能被及时处理掉，越积越多，那么一方面它们要继续消耗和占用国民经济中宝贵的信贷资源、物质资源和市场资源，继续加大信贷投放从而进一步提高实体经济杠杆率；另一方面，从动态看也会通过复杂的传导机制，进一步加大杠杆率水平：即僵尸企业增多—行业供求总量和结构关系进一步失衡—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全行业企业业绩变得更差—无法弥补历史欠账（拖欠的工资、社保、应付账款、设备减值等），无法更新改造技术设备，无法归还银行欠账—企业负债率进一步上升—银行不良率进一步上升、政府财政收入降低、员工工资收入无法改善—金融风险概率上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去产能、去杠杆，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去僵尸企业。

二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也是为了兑现2020年全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承诺。我们不能说一方面中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又存在很多的绝对贫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不能随意拔高或者降低贫困的标准。精准扶贫的形式有多种，如，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等。其中，产业扶贫是最重要的。

三是生态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也是我们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之一。重点是结构性政策要发力。要做到：调整产业结构，即减少过剩和落后产业，增加新的增长动能；调整能源结构，即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调整运输结构，即减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量；调整农业投入结构，即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加有机肥使用量。

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破立降

面对经济体系的重大结构失衡，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思路已经很明显：要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这个龙头，重点在破、立、降三个方面下功夫。所谓破，即要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严重的过剩产能；所谓立，即要大力培育经济增

长的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新动能，发挥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对实体经济振兴的作用，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所谓降，即要以提升实体经济企业竞争力为目标，降低企业的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如减税降费，深化金融、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垄断部门行业改革，降低融资、用能、物流成本。

在实施破立降的行动中，要注意充分发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龙头作用，具体来看主要有：

一是要对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与财富增值功能进行对称化改革。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重企业融资轻投资者财富增值功能，不仅难以使居民得到财产性收入，而且反过来也影响了企业的上市和融资。振兴中国股市，要把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放在第一位，以此启动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革，如建立IPO与退市之间的挂钩制度，加大对侵犯投资者利益的上市公司的监管和惩罚力度，出台保护中小投资者条例。

二是房地产市场要弱化投资功能。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炒的”的原则，用政策手段突出其耐用消费品的功能，抑制其资产泡沫。随着资本市场的振兴，这样必然会促使一部分滞留在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流入到股市，从而可以自动平稳地化解房地产泡沫的危险，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同时也可以激活长期低迷的中国股市，使中国股市彻底地活跃起来，增加对新动能企业的技术创新的支持。

三是在资本市场活跃度上升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政策鼓励上市公司兼并收购，消灭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和提高企业集中度，提高企业对价格的控制能力。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资本市场是进行产业结构和组织结构调整的最有效的工具，也是实施破、立行动的最灵敏的微观机制。有时，产业内或产业间复杂的结构重组，往往只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增发、一个反向收购就能完成，因此它作用要比行政命令的效率 high 得多，摩擦小得多。

四是金融市场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它们在不同的发展演化阶段需要有不同的金融市场支持。在新技术应用的早期阶段，需要由风险资本来扶持，不适合由商业银行的稳健货币资金投入。后者只适合成熟阶段的技术创新活动。金融部门通过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资产证券化，可以让更多的科技型企业与资本市场一起成长，同时也能鼓励技术创新活动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收益更高的可投资资产。

五是打破要素市场的垄断，通过竞争降低企业要素成本。要素市场存在各种垄断，是中国实体经济企业盈利能力弱的重要原因。以商业银行为例，在中国3300余家A股上市公司中，大小银行虽然只有25家，占比不足1%，但2016年这些银行的利润总额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的30%以上。这一现象除了说明中国融资结构的传统性外，更多地反映了商业银行业的垄断地位，以及银行利用自身的市场地位对实体经济日益严重的挤压。因此，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不应该成为反垄断的法外之地。只有抓住反垄断这个“牛鼻子”，才能把银行业的改革引向深入，才能使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吴跃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讲话中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他引用恩格斯的话：“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主力军，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使民营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要充分认识“优秀企业家精神”中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特质。

创新应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动能

有位民营企业家说过，“一个没有创新的企业是没有灵魂的企业”，“创新会给企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创造永无止境的竞争力。只有创造性的技术才具有竞争力，只有创造性的技术才能改变世界”。创新既是对既存产品持续不断加以改良的连续型创新，更重要的是以颠覆既存产品价值为前提的创造全新价值的创新。创新，主要是要突破核心技术，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并且获得技术的话语权。特别是对于涉及当代生产的产品，创新是制造业发展的最重要手段。

创新是企业家的“内在因素”，是民营企业家的灵魂，是创造更多财富贡献社会的强烈冲动和社会责任。民营企业家创新是独特的“这一个”，是无可替代的。优秀企业家看到的产业前景是大部分人不能看到的，企业家的创新不是可以靠统计数据或者过去经验推算、估摸出来的，更不是能推理运算的，如果是这样，社会就不需要一个个独具个性和创造力的民营企业企业家了，只需要政府把企业当工厂来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指挥各个行业生产就行了。民营企业企业家与企业创新生命同在，创新主体是企业家，如深圳的经验是，90%的研发机构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90%的发明专利出自企业。

促进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要充分尊重珍惜民营企业家创新精神并给予全方位政策支持。要更好促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充分

[※] 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国商业史学会苏商史专委会副会长、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安徽工业大学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社科联理事、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本文原载《企业文明》2018年10期。

发挥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作用；要促进企业谋划长期发展，对基础研究加以重视，改变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的问题，使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变。要发掘、宣传好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领军民营企业典型，促进全面开发各种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为企业注入持续动力和发展动能。要鼓励、协助企业牵头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引导各种技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教资源技术创新成效更快更好落地转化见效。

“优秀企业家精神”配置社会生产要素

科技成果要变成生产力，必须通过民营企业实现，而民营企业要通盘谋划、紧紧掌握统筹科技、资金、资源、购和销、供应链、服务等一个又一个环环相扣的环节。企业家依据自己的判断，预测、洞悉社会预期，洞察市场和产业发展方向，进而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开拓市场、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营企业家是出资人，是资本所有者、资源组织者、创新实践者、生产领导者、研发主导者、科技转化者、财富创造者和责任担当者，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供给体系适应能力的主导力量，是市场经济的活力之源，企业家也是新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创造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民营企业增强配置生产要素能力，要充分尊重保护民营企业主体性创造力，并为之提供更好更周详服务。鼓励民营企业培育自身核心竞争能力，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支撑发展，全面开发智能经济等各种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为企业注入持续动力和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突破发展瓶颈。企业的创新，不是单一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而是管理创新、业态创新、机制模式创新，更是系统创新、集成创新等，优秀企业家精神与工匠精神是一致的，“质量之魂，存于匠心”，要促进全力打造工厂智能化、管理信息化、制造精益化的“三化企业”，通过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集成，把产品定制化、制造柔性化、质量标准化融为一体，打造中国制造的世界品质、全球品牌。

优秀民营企业一定要“走出去”成为全球化企业

优秀民营企业一定是具备全球视野的，如果李彦宏的人工智能研究仅限于国内的人工智能研究，那怎么可能跟世界接轨呢？华为的手机只局限于国内市场，那又怎么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现在的高科技就是谁能引领一项新技术，谁就能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企业，全球市场为之洞开，不可阻挡。

不管企业坐落在哪个角落，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思考企业发展。民营企业全球化发展，最能了解和把握全球经济的危机，也最清楚全球化的机遇。在“逆全球化”的态势面前，要以更

深层的全球化进行产业链和资源整合融合，实现我国“头部产业”对全球的产业链控制。通过全产业链的国际化布局，利用海外资源巩固行业优势。

民营企业的生存之道在于产品必须面向全球市场，参与国际市场贸易，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市场竞争倒逼创新，如果闭关于国内一地一城的市场，很可能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宠爱”下丧失生命力、市场征服力，沦为小摊贩。对于企业而言，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抢占制高点，必须“走出去”融入全球市场发展。优秀民营企业的实践表明，企业今天不国际化，明天就会成为别人国际化的一部分。只有全球定位，整合国际国内的市场、资源、资本，才能实现企业生产要素的最优化配置，实现企业运营质量和效率的全面提升；只有参与全球技术与市场的同台竞技，才能不断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只有拥有引领世界的技术，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赢得主动。华为的战略目标就是以海外市场为“重头”，它必须与外国竞争者短兵相接，必须研发出好的产品和好的技术，使他人难以企及。以中国民营企业为主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也已经形成全球最完备、规模最大的经济体。

促进民营企业“走出去”全球化发展，要珍惜爱护民营企业对外开拓的成果，并为之提供后勤保障、企业保险和外事保护等支持。鼓励国内企业对国际投资保险机构和保险规范的认识，用好用足国际投资保险额度；强化并规范公共保险机构政策性功能，鼓励强化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业务，设立多样化、针对性强的险种，实现与海外投资需求相匹配的保险范围；鼓励更多中介机构为国内企业提供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服务。达到企业境外投资行为有法可依，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协调性和权威性，从而保证中国“走出去”战略健康发展。

民营企业家应是风险的积极承担者

经济学家韦伯斯特曾说过，企业家是“一个经营冒险事业的组织者，是组织、拥有、管理并承担这一事业全部风险的人”。企业家的工作是总体性的、决定性的，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么营销，这些是产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把控这些因素、承受这些因素结果的是企业家。

企业家只要投入生产，面向市场，就是有风险的，就不会是包盈不赔的事，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全球化发展的政治、文化，其风险尤甚，区别只是风险的大小，风险到来的快慢，风险的可测可控和不可测不可控。用刘鹤副总理的话说，“做生意是要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前三项也是所有遵纪守法民营企业家必须面对、回避不了的日常功课。

促进民营企业化解各类风险，必须承认民营企业家与风险同在的属性并营造宽容、容错纠错的良好鼓励机制。同时，要为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实体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出实招，实体经济普遍负债率比较高。要降低负债率，一方面，企业要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特别是经营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要增加企业的资本金，资本金的获得主要靠股权融资，尽快完善、完成证券法

的修订，通过资本市场来增加企业的股权融资，从而促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此外要降低基础设施服务费用。我国的基础设施是最完备的，包括高速公路、高铁、电信的覆盖、高速互联网的覆盖，以及电量稳定的供应，这些都是构成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但目前收费标准还偏高。

民营企业要做绿色环保责任者

地方政府竞争使其具有“泛企业家精神”，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许多环保问题一定是出在民营企业身上，根子在地方政府。协调好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是十分艰巨的工作。

“不要污染的GDP”，这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导向，需要政商同力正方向解决，这也是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的第一社会责任，关停并转“一刀切”简单粗暴办法不是根本性的解决之道，环保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必须协调化解发展和环保的尖锐矛盾，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一闭了之，政府开出“精准帮扶+强化督查”的“药方”整治，企业则应积极主动调整转型、加大环保自我治理力度，为企业创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腾出较大空间。

促进民营企业的绿色环保，要用再生环保生产方式。必须在环保问题上严苛问责，绝不松懈，工商联要充分发挥作用，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宣传好环保先进典型，让典型引路。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选人用人上要加重环保考核，以避免代表性人士的社会副作用。同时要谋在长远、功在日常，要协调地方、企业和商会以及科研机构的环保力量，针对一些优秀企业依然存在的突出环保问题，进行专项调研，学习国有企业的环保经验和做法，对症下药，用科学技术的办法，用再生资源 and 可循环的企业生产方式解决污染矛盾，化废为宝，解决环保公益性和企业利润性的问题，走出一条转型升级、科技含量高的绿色环保、循环再利用的民营企业发展新路。

因此，在落实和细化配套科技部、全国工商联《关于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民营企业创新合适的、针对性强的支持措施，完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励保障、服务监管等长效机制，必须全社会更好、更积极地认识、接纳民营企业家，甘苦与共、精神同在，更有力地保护、促进民营企业家创新发展——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根本在于以法律为底线确立政商关系框架，“政商”关系要“清”而“亲”，为政者必须要弘扬、严守契约精神，依法办事、依法相处。创新发展的主体环境构建者是“政”，涉及制度建设、方针政策、反腐力度、金融支持、地产供给、产权保护、财税减让、人事招引培育、招商与投资及对民营企业家的真正尊重惜护，保护企业家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已经刻不容缓。扫除“清”而不“亲”的庸政怠政懈政之态，构建好“清”而“亲”的政商关系，要做推动和助力民营企业发展的“店小二”，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认真分析经济和企业发展的优势和短板，下好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先手棋”。

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公正法治环境。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及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契约精神主导市场交易，要把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让他们充分体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加大惩治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等各类产权、背信损害企业利益以及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切实维护企业家财产权、创新权益及经营自主权等合法权益。对创新发展促进改革进程最终宏观层面证明是突破制度机制束缚的先行先试之事，不得纠缠企业微观行为秋后算账以“原罪”论处。要形成法律的预期性理解、宽容机制，必须给予民营企业家敢为人先的一些创新作为、风险出错的足够宽容理解，留出预期空间。

营造全社会尊重民营企业家的文化氛围。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企业家、尊重企业家创新创造的文化环境，激励民营企业家创新发展并通过优秀企业家精神影响社会各界继续努力拼搏，使创业创新创富成为全社会推崇的价值导向，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目前，从中央到省、市两年一次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评选和表彰，仅限于统战、工商联系统之内，并没有面向全社会进行表彰和肯定，表彰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贡献还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和面向全社会，应推进全社会对民营企业家、优秀企业家精神的认可和尊重。建议参照全国科技大会的规格，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定期召开全国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大会，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表彰优秀民营企业家，明确民营企业家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市场竞争中的先锋作用和重大贡献，肯定他们引领经济与社会发展，是先进生产力的真正代表。给予民营企业家群体以认同、肯定和荣誉，由此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号，切实提高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提升服务业全球市场配置能力

吴福象[※]

从学理上讲，服务业分三类，即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直接与制造业相配套，本身并不向消费者提供直接的、独立的服务，但它依附于制造业而存在，贯穿制造过程的上中下游各环节。生产性服务业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主要投入品，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过程，是二三产业融合的关键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商贸、科技研发、商务、信息服务等，属于制造业及服务业的中间投入性服务，是将现代最新的科技进步、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生产过程的“加速器”。

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伴，服务业中的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也需要同步发展。其中，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优良的人居环境和消费休闲再教育环境，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相关从业人员择业、创业时考虑的重要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生产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公共服务仅仅是对服务业的一种功能上的分类。事实上，统计分类中的某项服务业，在具体的产业功能上，可能既为生产性企业服务，同时也面向消费者服务。比如，像金融业，它包括公司金融和私人金融。还有，像交通运输仓储业，既包括大众交通，也包括现代物流业。在习惯上，人们一般将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信息计算机软件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商务服务、科研技术服务、房地产业视为生产性服务业。

近年来，江苏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规模总体呈平稳增长态势。其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业的产值，在服务业中的占比都呈下降趋势，而金融业则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目前江苏多层次资本市场利用的成效日渐显著，保险业规模也呈显著的壮大趋势，金融对经济的贡献度在不断提升。尤其是在科技金融服务领域，江苏金融机构市场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专营金融机构业务也在显著增长，科技创新创业企业支持覆盖面不断拓展。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国际视角

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比重大多在70%以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在60%以上，发展中国家超过50%。发达国家服务业增长主要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占发达国家服务业总量的50%以上。而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最终消费性服务，如餐饮、百货零售、文化娱乐业，其

[※] 吴福象，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群众》2018年20期。

发展往往受制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消费习惯，因而增长比较缓慢。公共服务业是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医疗、社会公益活动、义务教育等，长期内基本上保持稳定态势。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具有典型的互动性，因为生产性服务本来就是制造业服务职能环节的外化，之后才走上了独立的规模化扩张。因此，生产性服务属于中间投入，制造业的发达为生产性服务提供了大量需求。江苏有现代化的制造业基础，有可能派生出大量的生产性服务需求，为江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依照制造能力与服务能力互动与耦合的行业标准，将制造能力细分为基础制造能力、复杂的生产和流水线技术、科学和研发能力三种类型。同时，根据出口增加值在不同行业的分布情况，可以将不同的国家划分为科技与服务能力型国家、精密制造和流水线生产国家以及工业原材料出口型国家等三种类型。

其中，科技与服务能力型国家，以美国、英国、法国和瑞士等为代表，服务业占出口增加值的比重超过30%。发展中国家除了印度之外，其他服务能力型国家的材料工业与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占比也超过30%，表明科技能力与服务能力型国家普遍具备较高的复杂的生产和流水线技术。除此之外，科技与服务能力型国家普遍属于全球化中价值标准的制定者，如美国美元体系与好莱坞文化、英国的服务业、法国的设计标准等。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指出“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江苏作为全国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良好的省份，依托综合性国家服务中心的建设，有助于汇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突破一批重大科学难题和前沿科技瓶颈。攀升全球价值链，特别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实施科教人才战略，是江苏提升全球市场配置能力、提升服务业结构和水平的重要途径。

服务业提升全球市场配置能力的机制

江苏有强大的现代化制造业基础，由此带来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需求。从理论上讲，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基础具有协同集聚的需要，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由于附加价值较高，对交通等日常运营成本不是非常敏感。不过，它对制度环境、知识环境却极为敏感，一般倾向于集聚在大型城市中心。这里的一般，是指法律、咨询、研发设计、金融、房地产等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此外，物流、中间品批发、软件基地等用地较多，物质资本、技术人员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大多集聚在城市郊区。

在外资占较大比重的江苏，第二产业有相当部分属于外资工业，配套的生产性服务需求指令往往并不是由当地企业发出，而是由跨国公司总部或区域性总部发出。因此，在总部经济和工厂经济在空间上可分离的制造体系中，大多数服务需求，主要是被跨国服务公司或毗邻的大

型城市上海所承接，只有部分服务需求会落地制造业工厂区域。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分工的深化，服务业的生产流程也日趋国际化，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业外包两种形式。前者是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商业存在，后者是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承接国际订单的服务贸易。虽然服务业的前端环节需要与服务提供商和客户更直接地接触，但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消费性服务业，均有可能将后台服务环节及中台服务环节转移，或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江苏发展服务业可以与上海错位吸引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承接上海服务业延伸出来的服务需求和外包。比如，苏州花桥国际商务城的发展就体现了这种产业定位，还有一些地方的呼叫中心也是如此。

在世界范围内，借助服务业提升全球市场配置能力，兴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主要原因有：其一，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队伍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技能人才的比重迅速上升；其二，国际贸易迅速发展，使得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逐步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而利用简单劳动力密集型投入的产品生产，则逐步让位于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

发达国家由于技能型人才和简单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迅速拉大，使得简单劳动力会逐步转移到服务业部门。结果是技能型人才的高收益主要来自于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贸易或服务业贸易，比如数控机床行业。

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互动，就表现为产品价值链和产业生命周期上的更替和追随。发达国家始终位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和产品生命周期的前端，专注于开发、生产和贸易蕴含新技术、新知识的新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和产品生命周期后端，被动投资于生产和贸易技术成熟或标准化的产品。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达国家技能人才密集投入驱动的产业结构，又进一步转变成产品价值链分工环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配置，发达国家定位于价值链高端，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倾向于对研发密集型人才的需求。这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互动，就从产品生命周期上的更替和追随日益转变为产品价值链上高端环节对低端环节的控制。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服务环节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增加技能型人才的投入也产生了定向需求。在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互动上，发达国家处于价值链高端，始终牵动着低端的技术要求和技术供给，使得发展中国家对技能人才的投入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品研发状况。发达国家出于保护产品专利技术或技术诀窍，或出于维护其市场地位，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工生产的产品，所需的大都是辅助性的、外围性的、普及性的或成熟的编码化的技术。与此同时，加工生产中的技术和工艺要求，很大程度上又是从发达国家出口的技术密集型装备来实现。因而，大大压缩了发展中国家对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寄希望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进一步更新，开始新一轮的加工贸易生产；二是增加研发密集型技能人才的投入，替代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装备进口和价值链中研发密集型的地位，或是当原有产业技术完全成熟、标准化或可编码化，抑或原有产品的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充分，导致利润空间日趋稀薄时，开始自主地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新专利，实施商业化、产业化。

从江苏现在的实际情况看，讨论江苏服务业如何提升全球市场配置能力时，前提就是制造业如何发展。目前，江苏的制造业由外资经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三部分构成，在外资牵引下滑大背景下，本土的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将是江苏未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首要依靠。

提升服务业全球市场配置能力的路径

江苏要提升服务业全球市场配置能力，首要的是形成若干以高端商务服务为主导产业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其次是要做大做强以高端服务为重点的区域性总部经济，再次是打造智能制造和智慧创造的城市群生态体系。

江苏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叠加位置，应积极实施企业和园区“走出去”战略。对于产业结构中处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运用对外投资和园区合作等形式，让服务业“走出去”，通过跨区域产能合作，打造区域性总部技术示范基地。

在战略定位上，一是要坚持国际化视野并突出现代化品位，坚持以高端产业为导向，实现产业、人才、就业与创新的互动，强化功能配套并注入创新和智慧的新元素，打造江苏产业新亮点。二是要突出高端定位、高端合作、高品质宜居环境的“三高联动”区域整体发展战略，切实做到以引进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的“三高”产业项目作为规划建设的重点。三是壮大互动、融合、新业态的现代服务业。四是激发外资外贸活力，塑造外贸新业态。通过打造全球供应链，开拓“互联网+”外贸生态圈。借助外贸新业态发展平台，推动内外服务贸易融合发展。

在具体操作上，主要是依托江苏制造业优势和服务业发展基础，发挥互联网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突出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贸流通、旅游会展、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科技服务、文化创意、服务外包、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提升服务业发展的整体实力，打造现代服务业增长新高地。比如，南京将建设“中国现代服务业名城”作为战略目标，以打造金融服务中心、商贸物流中心、文创旅游中心、健康医疗中心为抓手，整合全球服务业资源，提升全球市场配置能力。

用现代化产业链理念认识国有和民营经济

刘志彪[※]

“社会上所谓‘国进民退’的议论，既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当前经济金融热点问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国有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上游，在基础产业和重型制造业等领域发挥作用，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提供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最终消费品，两者是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未来中国经济将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提高，走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从传统固化的观念，转向用全新的现代化产业链理念来认识国有和民营经济。

笔者认为，这是新时代的一种有效地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的全新所有制依存结构理论。

现代产业链是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关系而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形态，它包含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等四个维度。从原材料生产一直到终端产品制造乃至流通和消费，各产业部门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产业链向上游延伸，经济活动就进入到基础产业环节和技术研发环节；向下游拓展，则进入到市场拓展环节。产业链的实质就是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的关联，而这种产业关联的实质则是各产业中的企业之间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以现代产业链理念来认识所有制结构的互存性和依赖性，可以深化我们对当代中国特色经济制度的理解：

在产业层次上，经过多年来的改革和重组，我国当前国有企业主要处于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它们往往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资金密集性、技术密集性明显，掌握着经济命脉；而民营企业则往往分布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加工类产业，其资源加工性、劳动密集性明显。因此民营企业在价值链上与国有企业并不处于同一层面的竞争环节。

在产业关联程度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当前条件下离开了谁，都不利于国民经济正常循环，因此要坚决地贯彻执行“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政策。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在资源加工深度上，可以清晰看到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的产业“迂回化发展”趋势和倾向，看到产业链被不断拉长的进程，看到产业附加值不断地提高的过程，看到工业化过程中的

[※] 刘志彪，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原载人民政协报2018年10月25日第003版。

“高加工度化”趋势。

在满足需求程度上，相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处于基础产业阶段和环节的国有企业，其实其距离消费者和市场是比较远的，对市场的变化和反应也是不够敏感和及时的。

上述以现代产业链理念来认识所有制结构的互存性和依赖性，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和分布是固定不变的。恰恰相反的是，在复杂的市场运行中，它们之间可以形成互助关系，如近期一些通过高负债扩张较快的民企，由于偏离主业，在流动性上遇到困难，国有银行或者国有企业对其进行了帮助甚至重组，体现的是国企和民企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因而这是好事，不存在故意纵容“国进民退”的问题。正如刘鹤副总理所说，如果“民营企业经营状况好了，国有资本就可以退出。反过来，如果国有企业遇到困难，也可以通过民企积极参与提高效率。我们还鼓励具备条件的、比较好的民营企业在产业重组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同行业的一些有竞争潜力但目前面临困难的中小企业进行兼并重组”。

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原则与实践方向

吴福象[※]

一、国际产能合作的合作基础与实现条件

国际产能合作，是指一个经济体在其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基于其现有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和资源等禀赋要素的现状和特点，同时结合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现实基础和产业现状，并基于各国之间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工作岗位技术复杂度的匹配性原理和要求，在母国的优势产业与东道国的特色产业之间建立起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实现国与国之间在基础设施、园区开发、产业发展、制造技术、管理经验等领域的分工与协作，发挥各方的比较优势，推动基础设施共建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战略行为。

国际产能合作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普遍处于中低端，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对基础设施和装备制造的需求十分强劲。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发达国家而言，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的发展，基础设施老化程度相对而言比较严重，需要通过国际产能合作来改善基础设施，从而拉动投资、促进增长。由此看来，国际产能合作，就是要将各方力量汇聚到一起，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激发新的生产潜能。

国际产能合作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不仅包括资本跨国流动的合作，也包括人员流动的跨国合作，还包括共建项目的跨国合作，等等。比如，就资本角度而言，国际产能合作不仅对外投资，还包括母国将资本创造和技术转让给东道国，通过产业链整体搬迁，帮助东道国积累并创造一定量的产业资本，实现本土工业化的产能合作。在此路径下，参与合作的两国，虽然资本创造先由母国的资本创造部门主导，但最终两国将收敛于相同的资本创造速度。

从理论上讲，国际产能合作要求参与合作各方的能力禀赋与产业基础能够大致匹配。当国际间技术溢出水平较高、本国资本拥挤效应较大时，国际产能合作能够降低本国的产能集聚程度，提高长期资本增长率和福利水平。同时，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能够稀释资本所有者的财富优势，使得本国资本所有者的福利改进小于普通劳动力的福利改进，最终缩小两类消费者的福利差距。

二、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产能合作能够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市场一体化与要素共享。同时，通过技术溢出，能够

[※] 吴福象，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国家治理》2018年40期。

实现国家之间的协同发展和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之间的再配置，从而化解过剩产能、提升国家能力禀赋、释放经济增长潜能。

当前，我国沿“一带一路”的国际产能合作，充分体现了基础设施先行的合作原则。同时，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合作承包工程的规模，要远大于非金融形式对外投资。这带动了以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为重点的产业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产能合作，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开始由单一东向开放全面转向东西双向开放，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也开始由引进国外资本、技术等要素转变为向国外转移有竞争力的富余优质产能。自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以来，国际产能合作的总体任务，也开始向与我国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良好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倾斜，同时兼顾开拓发达国家市场，以点带面逐步扩展。

在党中央提出国际产能合作之后，吉林、河北、辽宁等地纷纷出台国际产能合作的具体方案。其中，吉林省制定了装备制造和国际产能合作重点项目推进工作方案，推进60个重点项目建设，圈定俄、蒙等东北亚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等为重点区域。河北省制定了支持优势产能国际合作的若干实施意见，将钢铁、水泥、玻璃、光伏，以及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确定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辽宁省则制定了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实施方案，提出了重点行业、企业、产品及项目清单。从目前各地的推进路径和时序来看，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优选的合作载体。总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既是遵循国际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国际需求与国内经济发展动力紧密结合的重要战略部署，又是应对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举措。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企业融入当地经济循环、实现跨区域产能合作有多种形式。一是进入资源品初级加工和深加工行业，并基于东道国收入较低、内需较小的特点，直接把支撑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拉动力转向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市场。如一些中资企业进入中亚和非洲的资源品市场，先从事简单的资源品开采和加工，再将加工产品销往发达国家。二是进入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利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尤其是物美价廉的劳动禀赋资源，结合自身所掌握的现代技术进行产品加工和贴牌生产。如一些中资企业为了应对国内原材料和要素成本日益上涨的压力，将一些代工厂转移到越南、埃塞俄比亚、波兰等国家从事贴牌生产和转口贸易。三是参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即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一些中资企业，利用东道国引资的环境，营造优惠政策的“洼地”效应，形成局部优化的投资环境，通过与当地政府共建各类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直接参与当地政府招商和加工贸易活动。

三、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的方式与案例

在国际产能合作实践中，依照合作双方的地理和空间属性、空间边界逐层拓展。应结合特定的区位和贸易条件，构筑国际产能合作的贸易廊道。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产能合作的特征，可以形象概括为：资源丰富的“高地”、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工地”、市场需求旺盛的“平地”、工资成本的“洼地”、黄金旅游的“胜地”。这些巨大的优势，为我国企业、产业、资本走出去，提供了众多的发展机遇。

以制造业高度发达的苏州市为例，在国务院发布国际产能合作指导意见伊始，苏州市就开始全面布局，极力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产业投资合作，并且以富余优质产能的输出为目标、“飞地”产业园区合作共建为平台，有效提高本土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扩展企业发展的空间。

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进程中，苏州市无论是新增境外企业数量，还是新批境外投资额度都在逐年增加。同时，综合竞争力强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了苏州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宏观政策环境的持续改善，苏州民营企业“走出去”开展产能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已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力量。

遵循由近及远、从国内到国外的原则，苏州企业通过“走出去”方式实现国际产能合作的目标区域，已经形成了多个维度布局的圈层和廊道。由内向外的第一圈层为高铁或汽车的2—4小时通勤半径；第二圈层为高铁动车的客运6—15小时通勤半径，普通列车的货运19—35小时通勤半径；第三圈层为海运时间3—6日的国际物流运输航程；第四圈层为列车单程运行12—15日运距。

根据产业发展特征和企业“走出去”的经验，苏州市依托产业走出去的国际产能合作的路径，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种模式：一是优质资源整合模式。通过创建自主品牌、整合优质资源，逐渐走上创新链的顶端。从一定程度上讲，通过这种模式实现品牌价值的提升，是我国企业走出去、走上去的可行路径。二是贴牌生产的代工模式。对于没有自主品牌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可以先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进行贴牌生产，借助知名品牌的影响力来打开国际市场。当企业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市场影响力之后，即可进一步塑造自己的品牌，实现“OEM→ODM→OBM”路径的转换升级。三是供应链整合模式。通过供应链整合，能够使企业在上下游之间更加充分地利用资金，也可以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物流成本，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四是园区平台模式。以丰富的园区开发经验为支撑，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共建园区“飞地”，是实现当地经济发展和“腾笼换鸟”式产业升级的双赢举措。其中，苏州产业园区“走出去”，大致包括理念走出去、制度走出去、模式走出去三个阶段。园区共建的模式，则包括援建模式、托管模式、股份合作模式三种主流模式。

在全球价值链路径上建设制造强国

刘志彪[※]

摘要：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建设制造强国要在高水平的开放经济体系下进行。高质量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我们在开放条件下进一步深入思考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主攻方向和根本路径。我们提出在GVC上建设制造强国的政策主张：一是中国企业完全可以依托庞大的内需，建设需求或技术驱动的GVC，把全球供应商纳入自己主导的分工网络中；二是现阶段应该扬弃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加强对GVC上游的某些高知识技术密集环节的追赶，实施扬长补短策略，拓宽瓶颈部门；三是为了挣脱在GVC上“被俘获”的命运，必须鼓励企业坚持不懈地进行功能升级，重点发展制造型服务业；四是制造强国需要有良好的竞争政策为基础，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要区分GVC上两类不同的供应商，主要运用竞争政策坚决去掉过剩严重的周期性产业的产能；五是把价值链攀升与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两大任务结合起来，实施战略互动。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制造强国；开放型经济；技术创新；现代化经济体系

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建设制造强国当然要在高水平的开放经济体系下进行。过去中国的制造业就是在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简称GVC)形态的产品内分工体系下，利用低成本优势进行国际代工，使制造业的规模、体量得到了迅速增加。未来中国将起重要作用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全球先进的、高级的生产要素的转移和移动，从而会有效提升中国技术创新的能力，驱动中国创新经济发展，提升中国制造的品质和水平。

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出现了中国制造企业被GVC的“链主”俘获和锁定在低知识、低技能环节，只能获取低附加值的现象，甚至某些领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依赖经济迹象。高质量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我们在开放条件下进一步深入思考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主攻方向和根本路径。从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GVC分工这一事实出发，我们提出在GVC上建设制造强国的政策主张。

一、在 GVC 上培育具有“链主”地位的跨国公司

在GVC的治理结构中，具有主导性地位的“链主”是跨国公司。它们要么背靠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形成市场驱动型GVC，利用品牌、设计、市场、营销、网络等优势，向全球供应商发出巨额的采购订单；要么依靠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工业化水平和综合国力，形成生产者驱

[※] 刘志彪，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原载《学习与探索》2018年11期。

动的GVC，制定和监督规则、标准的实施，并最终获取价值创造的绝大部分收益。

显然，在GVC上建设制造强国，首先要依据产业性质，构建或培育具有这种治理地位的跨国公司。如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产业，就适合于培育生产者驱动的GVC“链主”^[1]。如果未来我国没有这一大批驰骋全球市场的有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尤其是以产业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链主”，何来中国制造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都指出了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其实就是提出了在GVC上培育“链主”的战略要求。

根据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银行有10家。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居于全球上榜银行前四名。2016年中国10家上榜银行利润达到1738亿美元，占全部109家上榜企业利润总额的55%。进入世界500强排行榜的美国银行共有8家，这8家银行的利润为1025亿美元，占全部132家上榜企业总利润的16%。银行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实际上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从而影响了中国实体经济企业的赢利能力，进而影响了中国实体经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持续扩大内需与调结构相结合的政策导向下，中国市场不但给全球企业和人才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也完全可以依托庞大的内需，建设市场驱动型GVC，把全球供应商纳入自己主导的分工网络。基于此，主要对策建议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消费终端推进以电子信息网络支持的零售企业的大型化，通过资产的兼并重组构建若干拥有一定市场势力、又相互竞争的大型商业巨头，这种商业巨头可以与制造业巨头之间产生市场势力的对冲效应。

第二，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收入增长和公平分配支持内需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结构优化。当前制约内需扩大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富人缺乏消费的动力，而边际消费倾向大的低收入群体又无力消费。这与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过大有直接关系。

第三，鼓励中国制造企业沿着“制造—零售”产业链进行前向的纵向一体化投资活动，或者鼓励制造企业收购兼并国外的品牌、网络、广告、营销系统。这些活动将产生价值链上的“链主”效应。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依据中国的内需去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研发项目，发展创新经济，建设生产者驱动的GVC。由于这类价值链的动力根源是产业资本，其核心能力主要体现在研发、生产能力上，所以像高通、ARM等公司可以通过授权或者掌握芯片的核心技术，站在产业链的最高端成为“链主”。因此制造强国应该强在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上，通过拥有核心技术占据GVC上“链主”的治理地位^[2]。主要的对策性建议是：

一是把扩大内需、新一轮全球化、建设创新驱动国家等战略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建设制造强国的目标。扩大内需不是为了自力更生，更不是闭关锁国，而是为了更深层次的开放，为了给全球先进技术和人才提供市场机遇。在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新一轮开放战略下，通过开放的包容性生态社会环境的建设，千方百计推进全球优秀人才向中国流动，这是利用大国经济优势推进制造强国的首要政策目标。

二是鼓励中国企业从加入全球生产分工转向加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全球创新分工中占据一席之地。嵌入生产分工虽然与嵌入创新分工有联系，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必经阶段，但是后者的等级要大大高于前者。向这个地位升级的企业必须专注于知识的投入，必须对创新系统有边际贡献。嵌入全球创新网络，首先要讲规则，尊重和严厉保护知识产权。其次要充分发挥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的互动作用。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大学是这种创新分工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如硅谷周边区域，就拥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等近20所名牌大学。波士顿区域内，则分布着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大学，它们所提供的大量高素质人才，以及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是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值得强调的是，在培育“链主”的战略实施过程中，我们始终可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通过新的投资、逆向外包、收购兼并等市场经济手段，广泛吸纳全球知识、技术和人才为我所用，同时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

二、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 GVC 上的“隐形冠军”

中美经贸摩擦美方欲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痛下狠手，其实打乱的是GVC的分工循环体系。事实说明，在GVC上建设制造强国，必须高度警惕那些拥有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中间投入品供应商，在关键时刻对我国产业安全所发出的可置信的威胁。具有这类性质和能力的供应商，一般我们也把它们称为“隐形冠军”，指在某个细分市场绝对世界领先但却鲜为人知的企业。这些“隐形冠军”不直接与终端消费者发生联系，但却因掌握行业的关键知识和技能，享有其他企业无法替代的优势地位，因而往往是具体产业命运的真正控制者^[3]。

中国企业过去处在GVC上的加工装配等生产环节，是高技术产业的低端环节。目前全世界处于这个价值链上游的“隐形冠军”有3000多家，其中德国数量最多，拥有1300多家，而中国虽然是世界制造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产业规模也处于世界前茅，但这些产业往往大而不强，高度缺乏像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那样的行业“隐形冠军”，其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材料大都垄断在境外“隐形冠军”企业手中。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发动机，小到圆珠笔的球珠、高铁的螺丝钉、电子产业的芯片、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等，都是我们在产业链上的软肋和痛点。中国的主导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可能都通过依赖投资或收购兼并下游的加工工厂和零售店获得发展，而是需要培育更多的“隐形冠军”，才能突破发展的瓶颈迈向GVC的中高端。“隐形冠军”决定着中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点。

未来根据战略性和紧迫性，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逐步向上延伸产业链，专注于链上的技术知识密集环节，把技术一层一层地往上做，做大做强后往上提升，掌握链的某一部分的不易被取代的重要价值环节。这些产业不一定非要做成“链主”，也不太可能都是“链主”。总之，要争取把这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发展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否则我国的制造强国战略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多次强调的，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GVC上的“隐形冠军”，说明我们过去认可的某些经济理论已经过时，尤其是不能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实施所谓的扬长避短策略，放弃对GVC上游的某些高知识技术密集环节的追赶，而应该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实施扬长补短策略，全力拓宽瓶颈部门^[4]。过去在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我们长期定位于GVC上的低成本环节，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其实，这种定位，一方面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提升和要素成本的提高，我们将会不断地遇到其他要素更为低廉的后发国家的竞争，从而容易陷入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的境地；另一方面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能力，容易被具有非对称权力的“链主”长期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导致贫困化增长；三是容易在不安全和不稳定的GVC中，成为被上游企业讹诈的对象，从而影响国家产业安全。根据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对战略性瓶颈部门的拓宽，可以从幼稚产业开始。根据后起的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可以对幼稚产业设置阶段的成长保护期，以隔开外来竞争。在保护期内，除了可以补贴消费者、使用者，鼓励国内消费者优先购买外，还可以鼓励产业内的优势企业进行资产兼并迅速做大。

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GVC上的“隐形冠军”，对于我国塑造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制造业是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如果说，小国经济可以通过嵌入全球经济实现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从而建立起依赖外部关系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来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主要依赖于不断增长的、规模巨大的内需优势，去建设独立自主的、开放的工业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战略目标的最重要选择。小国经济因国内需求规模的限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建设很多门类齐全的具有规模经济特性要求的现代工业，必须放弃许多产业领域，同时也需要较大规模地利用外部市场，否则就很难生存。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我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的、关键的技术和知识，是市场换不来的，也是金钱买不到的，必须独立自主研发，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基础雄厚的制造业和强大的军事工业。国家的长治久安要求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中国人的手中，中国重要的、关键的产业技术，必须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当然，考虑到国际分工，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既没有可能也没必要在诸如芯片、精密仪器、飞机发动机、传感器等等所有领域和环节都取得绝对优势和控制地位，中国目前欠缺的技术，也不可能都由国家出面来不惜代价地组织追赶。因此，一是实施扬长补短策略中，最需要

的是集中力量补最短边的那些板，由此边际收益更高；二是更需要充分发挥民间、市场和中小企业的主体作用。

三、摆脱“被俘获”命运，坚持功能升级，重点发展制造型服务业

做GVC上的制造强国，久久见功的是日积月累的产业升级。但是考虑到我国企业嵌入的GVC，在治理结构的性质上属于被俘获性，因此产业升级过程具有特殊性。这是我国在建设制造强国中必须面对的最大约束条件之一。

被俘获性的GVC，指的是价值链上的交易者之间，虽然不存在纵向一体化的所有权关系，但是它却可以通过价值链中的治理机制，使广大的供应商被具有“链主”地位的跨国公司所控制。这种交易网络和治理方式，相对于能力分享型的GVC，或基于市场公平交易的GVC来说，由于参与方之间高度缺乏平等对话的市场势力和技术的基础，因此在价值分配上，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但是嵌入被俘获性的GVC，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有受益的一方面。研究发现，中国代工企业嵌入“被俘获”的GVC后，在得到来自大买家巨额订单的同时，也会受到其具体的人员培训、技术服务和市场训练等。中国代工企业在价值链的低端经过快速的学习，其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周期不断缩短。大买家之所以愿意帮助代工企业进行产品和工业升级，主要原因是这种性质的升级，有利于品牌产品在最终市场上的销售，其利益与代工企业是一致的。目前这些中国代工企业早已走过进口零部件的装配生产的阶段，处于大规模的整机生产能力提升、甚至达到可以反向出口发达国家的阶段。下一步的产业升级，就是要瞄准功能升级的目标，逐步形成自己的研发设计能力乃至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大部分代工企业的能力仍然局限于生产功能的投资与建设，以大规模、低成本、低价格取胜。代工企业的功能升级即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升级过程，受到了资源能力的限制，以及价值链中买方市场势力的阻挠。这些掌控GVC两端的品牌、营销、研发、设计等生产型服务技能和知识的“链主”，因为担心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和可能的替代，往往会用一切手段压制中国企业的功能升级。采取的围追堵截手段很多，比如威胁取消订单、打价格战、以知识产权名义起诉等。

未来根据专业化分工原则，大部分企业做精致的、专业的代工厂家，把代工业务做大做强，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鼓励一部分优秀的中国代工企业逐步实施功能升级，也是产业政策的必然趋势。只有在某些战略性产业方面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和自主技术，才能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5]。因此鼓励企业立足于中国制造业的已有基础，加大知识技能投入，逐步发展“制造型服务业”，是当前条件下激励企业摆脱“被俘获”命运的最重要的有效措施。

中国企业在现阶段大规模转向服务业既不现实也不可行，毕竟全面走向金融科技为主的服

务业，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符合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的国情。比较合理的路径，是首先发展制造型服务业^[6]。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制造服务业就是要将信息网络化作为提供服务的平台和工具，把服务向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延伸，扩大服务范围、拓展服务群体，能快速获得客户的反馈，优化服务内容和持续改进服务质量。其中，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是制造业服务化的大方向。

中国企业从纯粹的生产型制造逐步向服务型制造发展，是加快制造业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中国实施这一具体的战略调整具有非常好的条件和基础。一方面，我国庞大的制造业规模和体量，将会对智能化发展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是支持智能化按市场规律正常快速发展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用智能化改造中国制造业，必将大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技术素质和产品质量，这也为制造强国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四、以竞争政策重整价值链上公平竞争环境

在GVC上建设制造强国的问题上，还有一个调整和优化产业组织方面的问题，这是制造强国的市场结构基础。在这方面，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大中小企业之间怎么协调配合？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如何公平竞争？如何破除政府的行政垄断，以及反对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行使垄断力量，等等。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扩大开放将采取四个重大举措。这表面上似乎是对某些逆全球化趋势的回应，其实是要在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把过去那种由产业政策导向的非均衡发展阶段，逐步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高水平开放阶段。

第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管制，增加经济的竞争性，为民众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为消费者增加更多的选择性。在生产能力短缺时代，国家对市场准入进行严厉的限制，目的是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随着国内经济力量的崛起，现在很多产业已经开始成熟，没有继续增加保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长此以往，反而会进一步增加消费者的消费成本，降低产品质量和减少多样性选择，增加生产者的垄断利润。这是典型的社会福利损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绝大部分制造业已对外开放，目前保留限制的主要是汽车、船舶、飞机等少数行业。这些行业现在大多已经具备开放的基础，下一步大幅度放松市场准入限制的举措，就是要尽快放宽对这些行业的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对汽车行业的外资限制。另一个重要的有标志意义的举措，就是在高端服务业的金融、旅游、建筑设计、医疗、电信、互联网等领域(目前特别是对金融业)加快开放的步伐。这方面比较好的开放方案，就是建议这些产业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对民营企业开放，加大对内开放有利于提高这些产业的竞争力，以防止对外开放的急促性使这些产业丧失竞争力。

第二，由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投资，转向为企业投资创造更有吸引力的环境。过去中国

政府吸引外来投资，主要依靠制定优惠政策创造“洼地”效应。“洼地”形成之后，确实具有吸引资源流动的强大的“虹吸效应”，但是它只能在某个局部的空间上发挥作用，除了具有影响力有限的天生缺陷外，主要问题是容易导致空间上的地域歧视，人为拉大区域间发展条件的差距，同时造成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所有资源的人为的、过度的流动。进入新时代，实现发展权的公平和减少优惠政策过多过滥的格局，需要更多地依靠改善投资环境，也就是要加强同全球经贸规则的对接，增强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强化对民营企业 and 外资的产权保护，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为企业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第三，由模仿创新发展，逐步转向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的自主创新发展。早期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中国沿海发达地区走的都是“技术模仿创新”的道路，避开了国内因研发和技能差距所导致的技术陷阱，从而凭借其要素成本优势实现迅速成长。当前实施创新驱动国家战略，要求我们执行最严厉的产权保护制度。这是竞争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因素。据日本经济学家的观察和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日美贸易争霸战中，美国也是利用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限制日本企业进行模仿和反求美国的技术。但是结果却出乎意料，它倒逼了企业开始重视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日本企业从此开始艰苦的自主创新，也推动日本经济全面进入了自主创新轨道。

第四，主动利用内需来扩大进口，吸收全球最先进的生产要素为我所用。过去的出口导向利用的是别国的市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市场。2008年之后，世界金融危机显示了这种性质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中国需要与世界进行再平衡。其实就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主动地启动“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战略。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在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基础上，强调利用全球的优质要素发展自己。中国尽早启动这一战略，也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不断增大的内需来扩大进口，也能起到促进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平衡的主要作用。这一新型的全球化战略期望能够用中国的内需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生产要素，因此也希望发达国家对中国放松正常的高技术产品贸易的人为设限，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

在以竞争政策重整价值链上的竞争环境中，还有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以竞争政策重整价值链上的中低端供应商。目前我国有众多的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国际代工企业。需要坚决贯彻中央去产能方针政策的中低端供应商，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属于资源能源开采加工方面的，如煤炭、建材、铝业、电力、钢铁等，这些产业产出均质性强、投资规模大，受供求和价格影响大，具有周期性；另一类是那些进入门槛低，全球涌入的企业过多，市场低价竞争激烈，因而产能容易过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鞋帽服装、玩具、消费类电子、家具，等等。

为了防止这两类产业残酷的价格竞争不断地驱使行业走向衰退，需要坚决地进行产能调整。但是调整过程的手段和工具的选择应该有不同的把握。对于上述第二产业，市场机制是

最佳的手段，但是也需要政府在税收信贷政策、劳动力转移和培训、资产调整等方面给予配合。而比较难以操作的是上述第一类产业，主要是这些产业进入后比较难以退出。原因是市场需求循环变动，产业未来前景不容易看透；同时资本规模大、转换成本高、沉淀成本大。更重要的是，这些产业往往也同时云集着大量的低技能型劳动者，他们退出产业寻找新工作的机会少、可能性低。对这些产业的调整，最佳手段是政府在做好劳动者社会保障和失业再培训再就业的前提下，通过提高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准入门槛来完成淘汰目标。要尽量不利用行政的强制手段和计划指令，防止“一刀切”损害产业中真正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加强规则完善法治，减少行政指令，实现良性能治理。

五、战略互动：价值链攀升与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结合

在GVC上建设制造强国，也需要落实在具体的空间结构上，产业升级需要重整制造业的经济地理条件。这主要包括制造业发展的时间空间条件压缩、投资密度的增加、经济市场分割程度降低等三个方面。

大力发展高水平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是实现上述三个要求的关键措施。制造业集群所依赖的运输条件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集群内部有技术经济关联的企业之间较短的物理距离，都是压缩时间空间的具体形式，也是集群存在的基本理由；产业集群的投资密度，要大大高于原子式竞争时分散布局的企业投资密度，也是产业集群取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基本来源；产业集群打破了行政区域的界限，按照经济功能布局，群内企业的相互学习和由此引出的知识溢出，是减少市场分割、增加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力量。因此，优化产业的空间配置，大力发展制造业产业集群，是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GVC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其实就是已经考虑了要结合产业升级与集群升级实施互动战略。从学理上看，一方面，可以通过促进集群升级，有力地支撑产业攀升GVC。产业集群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大量的相关产业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这些企业因处于同一产业，所以相互之间既有激烈的市场竞争，又会有多种形式的合作，如信息共享、股权合作、联合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建立新的供应链，等等。这种合作机制的根本特征是互动互助、集体行动。通过集体行动方式，中小企业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溢出，如在培训、金融、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出口、分配等方面，可以弥补市场缺陷，克服其内部规模经济的劣势，既可与外部强大的竞争对手相抗衡，又能对冲掉一些大买家压制下游供应商进行产业升级的市场势力。

另一方面，在GVC上的产业升级，尤其是选择不同形式和性质的GVC的行动，将促进产业集群向世界级水平的跃迁。首先，在GVC上的升级，尤其是实现功能升级，意味着集群在向知识技术密集方向和环节延伸，这种延伸通过群内的竞争和学习效应，技术和知识将得到不断地溢出，最终推动整个集群的产出水平与世界标杆的缩小。其次，一个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所嵌

入的GVC性质往往不同，由此决定在不同性质的GVC中，产业升级的具体路径和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政策取向也不同。例如，嵌入能力分享型的GVC网络或公平市场交易型的GVC，与加入被俘获型的GVC相比，后者需要政府为产业集群提供更多的外部资源和外部性，也需要集群中的领头企业发起更多的集体行动，如合作建设品牌、合作研发等，才可能突破封锁艰难地推动集群升级。最后，企业可以在不同的“链主”所控制的GVC中学习，并把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用于带动集群整体升级的活动。在实践中，一个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往往加入欧美日等不同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GVC。这些不同的“链主”因文化、管理等差异，对所嵌入的企业升级的态度和政策也有所不同。如长三角地区有很多企业，它们既嵌入美国大买家主导的以“被俘获”为特征的GVC，也加入欧洲大买家主导的松散型的GVC，有的还同时自主地对南美洲和非洲出口独立品牌，它们在国内市场也有大量并不依赖中介代理的直接的销售业务。这样，在不同类型和性质的GVC中，集群中的企业可以发挥“杠杆能力”(leveraging competences)，即把在某条GVC中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另外一条GVC的某种升级活动中，从而实现低成本的产业升级。

加入WTO以来，我国企业嵌入GVC的方式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突出的表现就是，伴随着各个地方所规划的高新区和产业园的日渐成熟，企业首先在园区内扎堆，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性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又以集合形式抱团嵌入GVC。与早期单个企业嵌入GVC的形态相对应，竞争形态也由公司总部与制造业工厂之间单一的链式竞争，逐渐演变为集群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原子式竞争、集群与集群平台之间的竞争、集群与非集群之间的混合竞争，以及本国集群与国外集群之间的全球竞争。产业集群之间竞争的结果，使得价值链获取业务的空间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复杂，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和充分，竞争效率越来越高。中国商品过去在全球竞争中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形成所谓“中国价格”的旋风，与这种产业集群的竞争形态和方式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我国未来的产业政策，应该鼓励和支持这些产业集群成为GVC的“链主”。这个集群内部就是一段世界的产业链，要让这一段产业链成为全球该产业的核心，不仅在要素技术的创新能力上要过硬，更要在系统技术方面有足够的能力。在这里，系统技术是指在这一段产业链中，各个企业如何协调互相促进的技术，当然它包括集群内部的组织能力与战略协调能力。它们产业链攀升和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基本条件和现实基础。

六、结语

本文描述了在新一轮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设中，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方向、基本路径和基本政策。在GVC上建设制造强国而不是闭关锁国，是本文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本文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1)中国企业完全可以依托庞大的内需，建设需求或技术驱动的GVC，把全球供应商纳入自己主导的分工网络中。(2)现阶段应该扬弃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加强对GVC上游的某些高知识技术密集环节的追赶，实施扬长补短策略，拓宽

瓶颈部门。(3)为了挣脱在GVC上“被俘获”的命运,必须鼓励企业坚持不懈地进行功能升级,重点发展制造型服务业。(4)制造强国需要有良好的竞争政策为基础,以公平市场竞争条件。要区分GVC上两类不同的供应商,主要运用竞争政策坚决去掉过剩严重的周期性产业的产能。(5)把价值链攀升与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两大任务结合起来,实施战略互动。

关于鼓励中国企业在GVC上提升制造能力的途径和渠道,除了可以继续承接国际代工订单,向掌握核心技术的上游公司学习之外,我们提出至少还有:(1)积极鼓励企业并购处于GVC上游的产业技术类公司。(2)与GVC上游的核心企业合作。例如,华为要向芯片这种高技术产业进军,可考虑请IBM等公司进行前端设计,同时让台积电代工。(3)采取逆向发包策略,通过OFDI形式利用外国当地的科技研发资源。如华为目前已经在十多个发达国家建立了相关实验室。(4)在国内大力建设产学研合作体系。比如武汉、西安、南京等科教资源丰富的城市,华为、中兴等实力雄厚的企业,都可以采取国家、地方和企业共同合作投资的方式,建设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部门。(5)培育人才与挖人才相结合,既要投入巨资资助培养国内研发人员,也可以大量录用跨国企业在华的研发人员,等等。

参考文献:

[1] 苏明、刘志彪:《全球价值链视野下的中国产业发展——刘志彪教授访谈》,《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2] 洪银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3] 许惠龙、康荣平:《隐形冠军:全球最优秀的公司》,《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

[4] 干春晖、余典范:《中国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战略研究》,《学术月刊》2013年第4期。

[5] 罗斌、黄昭昭:《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产业功能升级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6期。

[6] 齐二石、石学刚、李晓梅:《现代制造服务业研究综述》,《工业工程》2010年第5期。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增强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能力

吴跃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讲话中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期以来，广大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主力军，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使民营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要充分认识“优秀企业家精神”中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特质，要勇于扫清一些似是而非的糊涂认识，要在民营企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高质量发展方面旗帜鲜明地给予更多鼓励、更强支持和更好服务。

一、承认优秀企业家是风险承担者，配置社会生产要素

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通过民营企业家来实现。转化过程中，民营企业家要通盘谋划、紧紧掌握统筹科技、资金、资源、购和销、供应链、服务等环节；依据自己的判断，预测、洞悉社会预期，洞察市场和产业发展方向，进而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开拓市场、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民营企业家是出资人，也是资本所有者、资源组织者、创新实践者、生产领导者、研发主导者、科技转化者、财富创造者和责任担当者，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供给体系适应能力的主导力量，也是市场经济的活力之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优秀民营企业家的领导力、创造力、创新力、冒险精神、永不满足精神、人才意识、抢拼意识、速度意识、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危机意识、学习意识、合作意识、共赢意识等自身内功和综合素质，明显有别于其他社会各阶层人士，值得全社会珍惜、尊重和学习。

促进民营企业家增强配置生产要素能力，要充分尊重保护民营企业家主体性创造力，并为

[※] 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本文原载《国家治理》2018年41期。

之提供更好更周详的服务。鼓励民营企业培育自身核心竞争能力，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支撑发展，全面开发智能经济等各种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为企业注入持续动力和发展动能。另外，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突破发展瓶颈。优秀企业家精神与工匠精神是一致的，“质量之魂，存于匠心”，要全力打造工厂智能化、管理信息化、制造精益化的“三化企业”，通过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集成，把产品定制化、制造柔性化、质量标准化融为一体，打造中国制造的世界品质、全球品牌。

由此，要理解和宽容民营企业家是风险承担者。企业家的工作是总体性的、决定性的，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么营销，都是产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把控这些因素、承受这些因素结果的是企业家。企业家只要做事，投入生产，面向市场，就是有风险，就不会是包盈不赔的。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全球化发展的政治、文化风险尤甚，区别只在于风险的大小、风险到来的快慢、风险的可测可控和不可测不可控。

促进民营企业化解各类风险，必须承认民营企业家与风险同在的属性并营造宽容、容错纠错的良好鼓励机制。实体经济普遍负债率比较高，要为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实体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出实招。要降低负债率，一方面，企业要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特别是提升经营效率；另一方面，要增加企业的资本金，而资本金的获得主要靠股权融资。要尽快完善、完成证券法的修订，通过资本市场来增加企业的股权融资，从而促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要降低基础设施服务费用。我国的基础设施是最完备的，包括高速公路、高铁、电信和高速互联网的覆盖，以及电量稳定的供应。这是构成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但目前收费标准还偏高，应酌情逐步降低相关生产成本。

二、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高质量发展

倡导创新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动能

2016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理念是方向、是钥匙，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

创新既是对既存产品持续不断加以改良的连续型创新，也是对以颠覆既存产品价值为前提的创造全新价值的创新。创新，主要是要突破核心技术，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并且获得技术的话语权。特别是对于涉及当代生产的产品而言，创新是制造业发展的最重要手段。

创新是企业家的“内在因素”，是民营企业家的灵魂，是创造更多财富贡献社会的强烈冲动和社会责任。民营企业创新是独特的“这一个”，是无可替代的。优秀企业家看到的产业前景是大部分人所不能看到的，因为企业家的创新不是可以靠统计数据或者经验推算、估摸出来的，更不是推理运算得来的。如果是这样，社会就不需要一个个独具个性和创造力的民营企

业家了，而只需要政府把企业当工厂来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指挥各个行业生产就行了。

民营企业家与企业创新生命同在，创新主体是企业家。促进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要充分尊重珍惜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并给予全方位政策支持。要更好促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作用；要促进企业科学谋划长期发展路径，对基础研究加以重视，改变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的问题，使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变；要发掘、宣传好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较强的创新型领军民营企业典型，促进全面开发各种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为企业注入持续动力和发展动能；要鼓励、协助企业牵头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引导各种技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教资源技术创新成效更快更好落地见效。

倡导民营企业成为协调发展主动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在要素”，是携手共进的兄弟关系，而不是水火不容的排斥关系。因此，未来更要用全新的现代化产业链理念来认识国有和民营经济，从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产业链的完整性来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协调发展的主动作用。

促进民营企业发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协调国有企业发展的主动作用。振兴东北，关键是要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重振雄风，使其成为新动能而不是负资产，以优秀民营企业为主体重组亏损国有企业是有效办法；进一步促进军民整合发展，促进先进材料、先进制造、航空航天、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大步进入武器装备建设领域，并成为军民融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形式；促进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民营企业抓住数字经济重大机遇并继续成为引领者，使传统的制造业、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更大规模经济优势、更大范围经济优势、更快速度经济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和进一步巩固中国经济的新经济领先优势；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引领新商业模式，不断启动、撬动消费新市场的开拓性作用，更好地协调我国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的良性促进关系。

促进民营企业做绿色环保责任者

习近平总书记以绿色为基调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为以人民为本、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的生态理念和以绿色环境友好为导向的生态发展观。

一方面，地方政府竞争使其具有“泛企业家精神”，引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

地方竞争的压力使许多环保问题出在民营企业身上，根子在地方政府。协调好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关系，确实是十分艰巨的工作。“不要污染的GDP”，这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导向，需要政商同力正方向解决，绿色环保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必须协调化解发展和环保的尖锐矛盾，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一闭了之。政府开出“精准帮扶+强化督查”的“药方”整治，企业则应积极主动调整转型、加大环保自我治理力度，为企业创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腾出较大空间。

促进民营企业的绿色环保，要用积极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再生环保生产方式。首先，必须在环保问题上严苛问责，绝不松懈。环保部门及工商联要充分发挥作用，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宣传好环保先进典型、典型引路。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选人用人上要加大环保考核权重，以避免代表性人士产生社会负作用。同时，要谋在长远、功在日常，要协调地方、企业和商会以及科研机构的环保力量，针对一些优秀企业依然存在的突出环保问题，进行专项调研，学习国有企业的环保长处和做法，对症下药，用科学技术的办法、再生资源 and 可循环的企业生产方式解决污染矛盾，化废为宝，解决环保公益性和企业利润性的问题，走出一条转型升级、科技含量高的绿色环保、循环再利用的民营企业发展新路。

鼓励优秀民营企业“走出去”成为全球化企业

优秀民营企业一定是具备全球视野的，如果百度的人工智能研究仅限于国内的人工智能研究，那怎么可能跟世界接轨呢？如果华为的手机只局限于国内市场，那又怎么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现在高科技带来的结果是，谁能引领一项新技术，谁就能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企业。

不管企业坐落在哪个角落，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思考企业发展。民营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最能了解和把握全球经济的危机，也最清楚全球化的机遇。在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的势态面前，要以更深层的全球化进行产业链和资源整合融合，实现我国“头部产业”对全球的产业链控制，通过全产业链的国际化布局，利用海外资源巩固行业优势。

民营企业的生存之道在于产品必须面向全球市场，参与国际贸易。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市场竞争倒逼创新。如果企业闭关于国内一地一城的市场，很可能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宠爱”下丧失生命力、市场征服力，沦落为小摊贩。因此，对于企业而言，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抢占制高点，必须“走出去”融入全球市场发展。

优秀民营企业的实践表明，企业今天不国际化、全球化，明天就会成为别人国际化、全球化的一部分。只有全球定位，整合国际国内的市场、资源、资本，才能实现企业生产要素的最优化配置，实现企业运营质量和效率的全面提升；只有参与全球技术与市场的同台竞技，才能不断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只有拥有引领世界的技术，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赢得主动。

促进民营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全球化发展，要珍惜爱护民营企业对外开拓的成果，并为之提供后勤保障、企业保险和外事保护等多方面支持。鼓励国内企业加深对国际投资保险机构和保险规范的认知，用好用足国际投资保险额度；强化并规范公共保险机构政策性功能，鼓励强化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业务，设立多样化、针对性强的险种，实现与海外投资需求相匹配的保险范围；鼓励更多中介机构为国内企业提供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服务；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协调性和权威性，使企业境外投资行为有法可依，从而保证中国“走出去”战略健康发展。

支持民营企业承担责任做“共同富裕”构建者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做强做优企业，做大蛋糕、促进就业、承担企业责任，为企业管理团队、专家人才、员工及产业链、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全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形成“八方共赢”“先富带后富”的“共富”拉动力量。民营企业参与扶贫事业及社会慈善事业，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消灭“绝对贫困”的重要力量，是“共同富裕”社会财富结构的重要主体。民营经济越发展壮大，就越能彻底消灭贫困，越能创造财富促进我国中等收入人群不断扩大。

丰富民营企业落实相关政策的“共享”内涵，进一步促进“先富带后富”的经济社会发展本义。通过政策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形成企业群体间的财富共享；通过进一步推动“双关爱”企业文化建设及建立员工购买股票、持股及其它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实现员工与企业成长的同步共享；通过企业家后代继承和遗产税平衡财富，使社会合理“分得”企业家本身的资本收入；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发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主体积极作用；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和“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扶贫济困、共同富裕”光彩精神，积极投身全国工商联“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活动和光彩事业，通过产业扶贫、造血扶贫，对低收入人群、“后富”群体、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乡村“扶贫”“扶志”“扶智”并举，实现“先富带后富”、真正脱贫。

三、全社会都要保护、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高质量发展

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出台对民营企业创新合适的、针对性强的支持措施，完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励保障、服务监管等长效机制，全社会必须更好、更积极地认识、接纳民营企业家，甘苦与共、精神同在，更有力地保护、促进民营企业家创新高质量发展。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根本在于以法律为底线确立政商关系框架，“政商”关系要“清”而“亲”，为政者必须要弘扬、严守契约精神，依法办事、依法相处。创新发展的主体

环境构建者是“政”，涉及保护企业家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也涉及制度建设、方针政策、反腐力度、金融支持、地产供给、产权保护、财税减让、人事招引培育、招商与投资及对民营企业家的真正尊重惜护。扫除“清”而不“亲”的庸政怠政懈政之态，构建好“清”而“亲”的政商关系，就要做推动和助力民营企业发展的“店小二”，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认真分析经济和企业发展的优势和短板，下好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先手棋”。

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公正法治环境

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及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契约精神主导市场交易，同时要把民营企业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让他们充分体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加大惩治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等各类产权、背信损害企业利益以及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的力度，切实维护企业家财产权、创新权益及经营自主权等合法权益，另外对创新发展促进改革进程最终宏观层面证明是突破体制机制束缚的先行先试之事，不得纠缠企业微观行为秋后算账以“原罪”论处。此外，要形成法律的预期性理解、宽容机制，必须对民营企业企业家敢为人先的一些创新行为给予足够的宽容理解，留出预期空间。

营造全社会尊重民营企业家的文化氛围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当前形势下，既反对“国退民进”的私有化邪论，也反对“国进民退”的民营经济“离场论”，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企业家、尊重企业家创新创造的文化环境，激励民营企业企业家创新发展并通过优秀企业家精神影响社会各界继续努力拼搏，使创新创业创富成为全社会推崇的价值导向，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目前，从中央到省、市两年一次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评选和表彰，仅限于统战、工商联系统之内，并没有面向全社会进行表彰和肯定，表彰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贡献还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应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定位落在实处，使民营企业家、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内在要素”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为此，建议参照全国科技大会的规格，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定期召开全国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大会，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表彰优秀民营企业家，肯定民营企业家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市场竞争的先锋作用和重大贡献，肯定他们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给予民营企业企业家群体以认同、肯定和荣誉，由此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号，切实提高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使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更大贡献。

民营经济：迈向现代化新征程

唐龙[※]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为民营企业提振信心、增强定力、认识困难、定位谋略、谋划支持、激发活力注入的强心剂。理解讲话精神，适应新形势，共克时艰，促进民营经济迈向现代化新征程，对于实现“中国梦”，最终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民营经济迈向现代化新征程面临重要机遇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的方针政策，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由少变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在税收、国内生产总值、技术创新成果、就业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近期受国际与国内因素、主观与客观矛盾交织影响，民营经济在市场、融资、转型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甚至出现一些悲观主义情绪，以及“民营经济离场”“新公私合营”“以党建与工会加强对民营企业控制”等错误看法。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在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前约40天内，习近平总书记至少有5次讲话谈到民营企业，向全社会释放了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号。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提出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具体举措，并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没有变！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预示着民营经济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讲话中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作为“自己人”，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正视困难与问题，看到累积的有利条件，增强必胜信心，牢固树立主人翁的责任与意识，聚精会神做强与做优企业，使民营经济迈向现代化的新征程。

在变革与发展中找到民营经济的新定位和新方向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针对的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适应了中国经

[※] 唐龙，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重庆科技学院教授。本文原载北京日报2018年11月12日第017版。

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发展动能和全面均衡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新时代经济建设的总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新时代要求和发展条件变化既给民营经济带来压力，同时也为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基于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造成的市场空间挤压，快速加杠杆的发展模式使产能过剩没有得到缓解并集聚新的债务风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结构快速调整双向加大转型升级压力，持续创新能力欠缺与粗放生产方式难以为继，诱致发展动能衰竭，加之问题调研不充分、政策落实不到位、操作简单化使民营经济的获得感降低。因不适应新发展势态，或生产经营不规范、不稳健甚至不合规与不合法，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生存或是死亡、倒退还是升级的选择。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激发微观经济活力的主阵地，民营经济要把握时代脉搏，立足于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去谋求高质量的发展，在变革与发展中找到自己的新定位和新方向。

民营经济不仅需要解决突出问题，更需要制定恰当方略，在去杠杆、稳增长与防风险间保持平衡以解决好结构优化、空间布局、动力转换、产品创新和推进节奏问题，增强应对风险能力，抑制过大波动，提升整体竞争力，稳健地迈向新征程。在产业结构优化上，要有序关、停、并、转产能过剩、能耗高、污染大、效率低的民营企业，培育“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和“以技术为基础的科学”引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设备与工艺升级、资源或能源替代、产品开发与市场拓展、管理手段改进带动整体质量跃升。在生产空间布局上，重视资源节约、生产集聚、产城互动、城乡协调，通过差异发展与空间协同优化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使高质量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相得益彰。在动力转换上，以产业链—科技链—金融链—人才链的延伸与优化为主线，以创新引领、产业融合、区域协同、开放合作在提质增效、优化规模、深化分工、拓展市场中谋求动力转换。在产品创新上，平衡好现有产品制造能力、新产品开发能力、品牌创建能力，增强市场弹性供给和价值提升能力。在推进方式上，以提高技术水平、改进生产流程、提升产品质量、节约资源、降低生产与物流成本为重点实施“示范提升工程”；以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实体产业与虚拟产业、金融产业与工业产业、加工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为重点实施“结构优化工程”。

制度精准发力应对民营经济的“三座大山”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分析了“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的多方面成因，在发展关键时期为民营经济把脉定向。迈向现代化新征程，需制度精准发力应对民营经济的“三座大山”。

增强信心与定力，供求双向协同发力融化“市场的冰山”。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能力，提升供给质量，增强供给弹性，开拓市场空间是关键。精准设计民营企业改善组织管理方式、整合生产要素、畅通物流链、促进信息技术运用、促进创新的扶持政策。

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将减轻税费负担的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使民营企业摆脱“丛林法则”对精力与能力的干扰。制定激励措施鼓励民营企业抓住“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等机会“走出去”寻求新市场，或着眼于国内消费理念、需求重点、消费模式、支付方式的新变化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为解决民营经济融资困难，精准提供财政与金融管理与服务。财政方面，将财政支持民营经济的引导资金在模式创新、投资方向和使用效率上纳入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督检查、绩效评价和奖惩制度，避免地方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金融方面，进一步探索适合民营经济的票据抵押、项目融资、专利担保等新型融资工具，加强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提升金融机构的专业服务水平。

精准发力体制改革，加强能力提升和产权保护，支撑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发挥市场对技术研究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完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废除创新资金与资源支持、研发平台、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政策身份歧视，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争取国家创新基金、建立研发机构和创新平台。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联合创新能力，畅通产学研交流合作渠道、聚集优势创新资源，为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确保制度落实到位，避免因调研不充分、考虑不周、预判不足、执行方式不当等所引起的实施负面效果。进一步完善政府“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工商联和商会、协会的作用，健全领导与决策机制，加强整体谋划、提高决策能力，增强措施配套和执行力，加强监督考核。

为民营经济迈向现代化新征程注入持久的精神动力

激发民营经济活力，还需要文化积淀的嬗变为经济行为和制度安排提供合理的道德支持，并使克服困难、应对风险、维护变革秩序、谋求长远发展获得持久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民营企业家要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要弘扬企业家精神。要以“企业家精神”培育为重心，使民营经济从业人员在信仰、信心和实际行动上都能勇担使命、主动作为。民营企业家要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创新理念、调整模式，集中精力分析面临的困难，坚守实业，做精企业，承担起更大的国家使命和责任，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民营经济迈向现代化新征程保驾护航。优秀传统文化能帮助缓解或消除现代经济的负面影响，降低运行成本，维系社会秩序稳定。要继续发挥包容、和谐、亲缘主义、尊长爱幼、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群体协调的价值观对共克时艰的积极作用。扬弃传统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使市场追求效率的行为符合道德原则，如树立新型义利观、职责观和财富观等，避免运用欺上压下、坑蒙拐骗等违背“游戏规则”的手段

导致的市场失序和社会失范。

要引导民营经济从业人员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良好价值观。坚持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做到求利而不损他人和社会。鼓励民营经济从业者崇尚劳动，勤勉于世俗职业，精打细算，重视个人成就，积极投身于创新创业。鼓励民营经济从业者不满足于现状、不沉溺于奢侈和享乐，以更大责任感与使命感投入共克时艰、保持定力、增强信心中去，为民营经济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中国梦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要以主人翁精神主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进一步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守住环境底线；以“先富带动后富”“万企带万村”的方式参与精准扶贫；用科学和务实的态度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

民营经济是人民经济强国经济

吴跃农[※]

民营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两个毫不动摇”是我们党的重要方针，对于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一样，党的重大决策、国家政权、国家体制全力鼓励和保护民营经济，向全社会提出和倡导尊重企业家、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民营经济的基础在于人民性

人是最可宝贵的，人民劳动创造积极性得到越来越充分发挥——市场根基是人丁，财源广大力量大，最大红利和动力是人口。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巨大的人口红利支撑，劳动年龄人口的这种红利，15到64岁的人口在新千年之始迅速增加，从9.2亿增长到超过10亿，净增加劳动力人口超过德国的总人口，这是中国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人口红利基础。2012年之后，人口红利开始减退，劳动力年龄人口开始净减少。人口质量红利开始得到重视和培育——中国依然有最庞大的、最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最完善的产业基础，有庞大的工程师数量、熟练工数量，技术工人红利被强调起来，形成新的工程师红利、工匠精神的比较优势竞争力。

这使企业家精神得以充分发扬，使企业家能够有充分的劳动力资源可以运用。而工人、农民、小职员、待业青年，那些身份卑微的、以前生活在贫困之中的普通人们，通过艰苦创业，勇闯市场，纷纷成为了企业家、搏击世界风云的企业家，焕发出巨大的创造潜能和聪明才智。因此，劳动力的红利也是企业家的红利，两者是交相提升的。

至2018年3月，我国市场主体破亿户，达1.0024亿户，其中超过九成为本土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更为可贵的是，自主创业、从事个体工商和私营企工作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价值认同和基本力量，民营经济呈现出基础厚实、新鲜血液充沛的蔚为壮观景象——大批有更高海内外学历的年轻创业者积极主动投身民营经济大潮，成为新一代勇敢的弄潮儿，他们创业的生命力健旺、思维敏捷。进入新时代，蓬勃、昂扬、澎湃的民间创业大潮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

民营经济有着“56789”的重要贡献——截至2017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达6579.4万户，私

[※] 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本文原载《中华工商时报》2018年11月15日第003版。

营企业2726.3万户，是2013年1000万家的1.7倍，私营企业注册资本超过150万亿元，从业人员合计3.41亿人，全国城镇就业数是4.25亿人，在民营经济中就业的人数占城镇就业比从1978年几乎为零上升到2017年超过了80%；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超过50%，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了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达到了90%以上。

企业家的创新奋进、劳动者的勤劳敬业是民营经济强大生命活力，企业家来自劳动者，企业家的源泉是汪洋大海的劳动者，劳动者成为企业家，企业家与劳动者的相通兼有合一，这种极其光辉灿烂的身份展现、自我命运掌控和生命价值的昂然实现，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速发展的最根本的人的决定因素、价值尊严体现。

企业家精神健旺则国家强大

在和平建设年代，国家的强盛，主要是由一群又一群企业造就的，而实业、制造业、新经济形态为主干的企业群的强大是国强民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只有拥有一大批国际大型一流制造业企业、新经济企业和世界性500强跨国企业，中华民族才有实现复兴的源源不竭的实力、才能昂然屹立于世界经济和科技发达、制造业强国之列。

从“站起来”到“强起来”，就一定要强企业，一定要强化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发展、强大企业和推动科技创新生产力的主导力，是主角，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企业家群体的持续崛起和发展壮大，在于企业家力量的始终凝聚和充沛增长，在于企业家精神的充分自由发挥和发扬光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历史性的重大论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关键制约因素，促进文明富裕健康发展，企业和企业家能够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总书记还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传之久远，此之谓不朽。”十分清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中，需要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需要具有开拓精神，能发现机会、整合资源、勇于创新、敢于拼搏、爱国敬业、创造不朽业绩的优秀企业家，需要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了一大批不畏艰难、敢于拼搏、勇于创新、坚韧不拔、勇担社会责任的民营企业家以及创二代企业家群体。

进入新时代，优秀民营企业家的演讲和行止在网络视频和自媒体受到大众追捧。其社会人格熠熠生辉，颇有“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的神采，民营企业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创

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表达者和践行者。

企业家得到热烈欢迎和充分尊重的社会一定创造力勃发、创富之源流喷涌，企业家辈出的时代必定经济繁荣昌盛，企业家辈出的国家一定会是富裕强大的国家。充分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对于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为内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提高我国与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搞活微观经济，增强企业竞争力，相比于资金、劳动力等一般性生产要素，优秀企业家精神及创业创新动力对当前的中国经济来说是一种更为稀缺的特殊要素资源。

爱党爱国是民营企业家的情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富强，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站起来、富起来，追求强起来的中国，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双富强。优秀民营企业家，爱国主义精神更为鲜明突出。民营企业家自觉地把党、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与个人命运、企业发展紧密相连。在创业改变自身命运之时，致力于为改变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命运做出积极贡献。为富乃行善之道，企业家精神从本质上讲就是不断追求创造财富价值的精神，创造财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夯实人们幸福生活的基础。

企业家必须立足自身实际，首先把自己企业的事情做好，通过自身价值的实现，来实现社会价值，回报社会，创利创富是企业家的第一要务。不能创利挣钱的企业，不是好企业，因为不能承担社会责任，而且是不道德的，因为消耗浪费了社会资源；只会创利挣钱的企业而不顾及社会责任，同样道德水准不高，不会成为优秀企业。

判断企业主、出资人算不算“企业家”，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有理想、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和有使命感。严格意义上说，“企业家”不是一种名称，而是一种人生事业的不懈追求，企业家对自己的人格一定有很高的要求，对自己的社会贡献有较高定位、对融入国家的未来发展有较大期许。他们是一群有家国情怀的人，总希望国家能更富更强，人民能更好更幸福，社会能更公平更美好，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能够更加到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社会价值高的民营企业家，用民营企业家自己的话来说，要做企业公民、做社会企业家，企业家必须树立超越金钱之外的目标，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追求企业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因为创办企业的根本目的是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民营企业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不忘担当，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饮水思源、致富思源，把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完全融入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当中去，回报社会是优秀企业家精神的熠熠光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企业的整体创富能力已经比肩美国，或者赶超了美国。“正其谊

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们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春风化雨中滋润成长，将领导企业更大、更好、更持续发展视为使命责任，他们把企业在行业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地位，个人与企业对国家民族利益的一致性看得更重，把企业对社会各方面的贡献等摆到更为重要位置。《华为基本法》“第七条社会责任”把企业家、企业的“爱国主义情怀”表达得十分清晰——“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社区作出贡献。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

十九大之后，我国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改革深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目标要求民营企业群体更有历史担当和世界眼光。深化改革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向纵深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振兴东北战略等对外开放建设和发展面临新的重大任务，我国经济急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由政府直接干预及传统的资源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企业为主体的、市场配置资源及创新驱动发展和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恰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回信中所期望的，广大民营企业家把握时代大势，坚定发展信心，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合力开创民营经济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推动民营企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吴跃农[※]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方针政策，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民营企业努力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聚焦实业主业，努力做强做优企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要聚焦实业、做精主业。全球化产业分工，实业永远是重中之重，是产业链之魂。要鼓励、促进民营企业坚持聚焦实业、秉持工匠精神，专注品质、做精主业不动摇，不被短线一时利益所诱惑，不为眼前暂时困难所干扰，坚定信心、埋头苦干，破关过坎，不断提升实业制造业技术能力，把企业做强做优做久。针对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抓好“实质性降低企业负担”的各项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帮助企业纾困过关。大力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以政务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助力民营经济发展。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练好内功，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遵纪守法经营，推进诚信建设，锻造品质品牌。

专注创新创造，努力增强核心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奋斗，靠自主创新争取。目前，民营企业在关键领域被“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必须以科技创新突破发展瓶颈，促进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要鼓励、促进民营企业培育自身核心竞争能力，心无旁骛，创新创造支撑发展，为企业注入持续动力和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腾飞；要继续鼓励支持军民融合，发挥民营企业在推进国防建设机制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和武器装备建设质量效益等方面的生力军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把落实创新驱动战略放在突出重要位置，要更好促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作用；要为广大民营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供金融、人才等关键性支持，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创优提供充沛动力、创造良好条件。

[※] 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本文原载安徽日报 2018 年 11 月 27 日第 006 版。

深耕数字经济，努力发展新经济。经济结构改革、高质量发展重要任务是转换发展方式，依靠创新动能来支撑经济发展。数字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入融合发展，改变了生产、销售、生活、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促进了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管理等全方位创新。民营经济是数字技术的开拓者，是数字经济的深耕者，要进一步鼓励和促进民营经济全面开发数字经济等各种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积极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领域，从增长动能、发展模式、产业创新等多方面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更好发挥数字经济更大规模、更大范围、更快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社会突出效应。应大力支持民营经济下决心下大力气攻克前瞻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和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难题，不断增强数字经济企业核心竞争力。还要大力扶持科技型、初创型小微数字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加强自主创新，以技术进步塑造竞争新优势，努力成为行业“隐形冠军”和“独角兽”。

融入“一带一路”，努力做全球化企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合作在加快推进。面对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的挑战，只有拥有引领世界的技术，才能赢得主动，以更深层的全球化进行产业链和资源整合融合。要开拓国际视野，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整合国际国内的市场、资源、资本，实现企业生产要素的最优化配置，实现企业运营质量和效率的全面提升。我们要鼓励民营企业用好用足国际投资保险额度，强化并规范公共保险机构政策性功能。鼓励强化企业海外税务法律服务和投资保险业务，鼓励更多中介机构为国内企业提供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服务，达到企业境外投资行为有法可依，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协调性和权威性，从而保证“走出去”战略健康发展。

承担社会责任，努力做“共同富裕”构建者。民营企业应积极主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进一步推动“双关爱”企业文化建设，实现员工与企业成长的同步共享，形成“共同富裕”价值导向：民营经济越发展壮大、越能创造财富，为企业管理团队、专家人才、全体员工及产业链、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全社会创造利润和价值，就越能形成共赢、先富带后富的拉动力量，促进我国中等收入人群不断扩大，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党委与政府要通过政策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形成企业群体的健康成长和财富共享。引导和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讲正气、走正道，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在思想道德上成为社会模范力量。发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人”的主体积极作用，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和“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扶贫济困、共同富裕”光彩精神，积极投身精准扶贫活动和光彩事业，通过产业扶贫、造血扶贫，通过“扶贫”“扶志”“扶智”并举，实现“先富带后富”，迈向“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民营企业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民营经济的力量就在于具有充分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有韧劲、拼劲和适应性，敢于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迎难而

上，决不退缩。如今，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一定能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更好更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民营企业一定会成为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的创新者和贡献者，民营经济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对商业银行反垄断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刘志彪 凌永辉[※]

摘要：我国商业银行既有行政垄断属性又有市场垄断特点。商业银行垄断是我国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微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确立市场竞争在商业银行中的主导地位，在加强对银行业监管的同时，提高商业银行的开放度和其他资本进入速度。中央银行要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基准利率及其调控机制，摆脱通过自律机制对涉嫌违法进行调控的困境。

关键词：十九大报告；商业银行；反垄断；行政垄断；市场垄断；竞争政策；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金融体制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同时又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如果把这两个方面的要求结合起来看，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就必须坚决打破商业银行业的行政垄断，利用反垄断法抑制日益严重的商业银行垄断。这是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最有力措施之一。

众所周知，2015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后，为避免市场恶性竞争，各地主要商业银行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并通过该机制就存贷款利率浮动上、下限达成一致意见。此举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甚至被有关部门提出涉嫌价格合谋，违反《反垄断法》。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人们担心经济运行的“脱实向虚”以及商业银行过度攫取垄断利润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损害。在我国3300余家A股上市公司中，大小银行虽然只有25家，占比不足1%，但2016年这些银行的利润总额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的30%以上。这一现象除了说明我国融资结构具有传统性外，更多地反映了商业银行业的垄断地位，以及银行利用自身的市场地位对实体经济进行挤压。只有通过坚决的反垄断措施，才能落实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维护金融安全，使金融重回本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振兴。

[※]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培育建设单位）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文科首批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凌永辉，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生。本文原载《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一、我国商业银行业存在严重的市场垄断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业不仅存在着非常高的进入行政障碍,具有行政垄断性质,还存在严重市场垄断问题。这一判断可从国际上通用的界定市场垄断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标准来得到。

一是从市场结构的特点看。自2003年启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资产总额中的比重从55.5%下降到2016年的40.3%,但是几大国有银行的市场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以总资产和存贷款余额作为衡量指标,2007—2016年,银行业市场地位处于前四位的商业银行的绝对集中度均处在35%~60%之间。根据国际上比较权威的贝恩市场结构分类,这一市场结构属于寡占Ⅲ型或寡占Ⅳ型。可见,我国银行业在整体上呈现为集中度较高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格局。二是从市场行为的角度看。如果说集中度不足以判断商业银行的垄断性质,那么我们可以从商业银行的市场行为来判断其行使市场势力的特征。21世纪以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银监会和工商总局多次对商业银行价格垄断、收费、折扣禁令等垄断行为进行审查,另外,社会质疑商业银行的捆绑收费、强制收费、违规收费、只收费不服务等行为的声音一直不断。现今商业银行的一些涉嫌垄断的行为虽然有所消除,如小额账户管理费、跨行ATM手续费、账单打印费、密码挂失费等的减少,但是其市场势力的垄断方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如多家商业银行合谋建立的“房贷限折令”,2014年四大行先后下调支付宝用户使用快捷支付的额度,阻碍第三方支付等金融创新发展。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和第18条的规定,这些或者进行不公平限价或者限制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行为,显然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嫌疑。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主要商业银行参与的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以会议纪要形式约定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这明显具有利用合谋协议进行利率定价的垄断动机,使商业银行更容易构成同业之间的横向垄断,涉嫌违反《反垄断法》。

许多人尤其是银行业内人士并不认同我国银行业存在着严重市场垄断的判断。他们认为,银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质,适合搞行政垄断,而且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和贷款者对选择银行服务具有充分的自主权,银行业存在竞争激烈,不存在什么垄断问题。其实这些看法混淆了自然垄断的基本概念。经济学所说的自然垄断,是指单一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的情况,此时由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依然最小。商业银行虽然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它显然并不符合自然垄断行业的基本属性。恰恰相反,无论是从全球哪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来看,银行业都是典型的竞争性行业,当竞争属性不能充分发挥时,市场垄断就会形成,结果就会严重损害行业发展。另外,消费者或用户固然对银行服务供给具有一定的选择权,但并不代表银行就不存在垄断市场的可能,现实中“店大欺客”的现象时常发生。

二、商业银行反垄断滞后是实体经济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受到了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严重挤压^[1],后者挤占了社会主要资源,拉高了市场利率水平,推高了制造业的成本,成为影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一些实体企业在由此导致的高成本挤压下,难以赚取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纷纷被迫退出市场,甚至破产倒闭。

为什么一些制造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对投资金融业趋之如鹜?为什么现阶段资金不肯流入实体经济?直接原因是实体经济挣不到社会平均利润,或者过火的虚拟经济诱导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从而出现所谓的“脱实向虚”倾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与严重的银行投融资垄断行为有关,它是造成实体经济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是从实体经济的投入面来看,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大型商业银行往往更愿意把贷款放给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民营企业一直处于融资难、融资贵的艰难格局,这导致了潜在的且巨大的金融风险。目前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余额已经占到商业银行全部企业贷款总额的50%左右,这与其产出仅占社会总产出不到30%的现状并不匹配。然而,目前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为156%,其中国有企业的负债占非金融企业总负债的70%。显然,国有企业杠杆率高是造成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的主要原因。这也可以看到资本资源主要进入了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严重制约了实体经济效率。作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民营经济在金融信贷方面则处处受到歧视,难以获得资金信贷支持。与国有银行不同的是,民营银行的经营管理权能够避免受到政府部门的过度干预,其特殊的产权结构和经营形式决定了其具有机制活、效率高、专业性强等一系列优点,从而决定了其与数量庞大的小微民营企业形成精确对接。但问题是,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极其滞后,其调动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功能还难于发挥。截至目前,我国仅有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上海华瑞银行、网商银行、温州民商银行、金城银行等11家民营银行获准开业,而且大部分民营银行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有的仍然通过向传统银行进行同业拆借来解决资金问题。这些都严重限制了银行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增加民营银行进入的速度和规模,毫无疑问将促进商业银行业市场结构多元化,激发市场经济主体活力。二是从实体经济的产出面来看,垄断造成行业投资回报严重不均衡,从而产生结构裂痕和诱导资源错配。根据上市公司数据,近5年来金融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2%,而同期的制造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到9%,这种收益率上的差异直接来源于金融业对制造业利润空间的挤压。从某种程度上讲,很多企业其实都在为银行“打工”。根据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银行有10家,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居于全球银行前四名。2016年中国这10家银行利润达到1738亿美元,占中国全部109家上榜企业利润总额的55%。而美国仅有8家银行进入500强排行榜,其利润为1025亿美元,占美国全部132家上榜企业总利润的16%,其余都为现代高科技企业创造的财富。可见,我国银行业从国民经济这块利润“蛋糕”中拿到了分量

最大的这一块，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所能分到的利润寥寥无几。这是中美经济结构的最大差异，也是中国实体经济亏损累累的内在重要原因之一。三是从经济实践的发展阶段来看，过去在资本和商品“双短缺”时期，为了实施赶超发展战略，政府通过金融抑制来人为地压低利率，依赖投资扩张的手段有效弥补了经济建设中的巨额资金缺口^[2]，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然而，当经济发展从“双短缺”进入资本和商品“双过剩”阶段，银行的行政垄断通过金融抑制进一步导致“资产荒”，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空转、自我膨胀，最终形成经济泡沫^[3]。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但银行实际利差仍未明显减少。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银行业反垄断改革不到位，未能跟上实体经济市场化、竞争性改革的步伐，成为越来越明显的垄断者，这就使金融难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那种认为“过去也垄断，甚至更厉害，为何实体经济发展不错？”的观点，其实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忽略了发展阶段转换、市场结构趋于竞争化这些关键性前提。因此，现阶段进行银行业反垄断，推进金融深化改革，重新打造竞争性的金融体系^[4]，是促进“强实抑虚”和风险防范目标实现的重要政策手段。

三、商业银行业不应成为反垄断的法外之地

反垄断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2010年以来，我国走向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加强了反垄断法对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的竞争监管和约束。不仅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商和提供者要遵循竞争法的全面管控，国民经济中一些具有相对特殊性质的行业，如金融业等，也要纳入反垄断法的监管中，以增强经济的竞争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随着银行机构转轨为相对独立的商业主体，以及其政策功能和商业功能的分离，具有商业利益诉求的银行也要坚决地反垄断、增加其竞争约束，而不应成为反垄断的法外之地。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一阶段。

对处于寡头竞争格局的商业银行反垄断，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选择，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如美国早在1890—1914年间，就先后颁布了《谢尔曼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而以此为依据的一系列反垄断判例，如“1963年费城国民银行案”“1998年司法部起诉维萨、万事达案”等，进一步明确了银行业“服务群”和“本地市场”等相关市场界定，从而奠定了美国反垄断法适用于银行业的基本框架。其中，在“费城国民银行案”这一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认定费城地区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商业银行之间的兼并违反了《克莱顿法》第7条，认为“那种导致一个企业控制了过度的相关市场百分比的兼并，同时引起那个市场上的企业显著的集中的兼并，客观上具有从本质上降低竞争程度的效应，在没有清晰的证据显示这种兼并并不具有反竞争效应的情况下，它也必须被禁止”。而且，美国许多反垄断案例都属于私人或民间的诉讼性质，这与美国反垄断法规定的3倍损害赔偿有关，它给市场经济中的个人和公司监督垄断行为以巨大的利益激励。

作为全球反垄断的另一极，《欧盟竞争法》的主体源于1957年的《罗马条约》第85条、第

86条以及欧盟成员国的国内竞争法。《罗马条约》第85条第1款规定了“具有阻碍、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场内部竞争效应的行为,包括所有企业之间的协议、企业集团的决议或企业行为的协调等,要加以禁止”,第86条指出“任何人或更多的企业在共同体市场或其主要部分中滥用主导性地位,都是与共同市场不相容的,它会损害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因而必须加以禁止”,这些都体现了欧盟对联合行使市场势力的反垄断政策。它是1981年欧洲首例银行业反垄断案即欧洲公平法院对Zuechner案的判决依据^[5]。2012年的巴克莱银行“Libor操纵案”也体现了这一点,英国甚至对此案开出了约合9370万美元的金融监管史上的最大罚单^[6]。

此外,在反垄断后起的东亚,日本《反垄断法》的主体内容与美国和欧盟的相关法律具有相似性,但是由于是在战后重建时期颁布的,其中一些规定不仅在法律上允许重要的“共同行为”(卡特尔行为),还允许相互持股、董事兼职,缓和对兼并的种种限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日本提出的修正案强化了《反垄断法》,认为反垄断政策在日本的实施还有很大的余地。如日本增加了对综合商社、城市银行及金融公司股份持有比例的限制,将持股比例由10%降到5%;新设了对主要以价格卡特尔为目标的课征罚金制度,罚金数额一律提高10倍^[5]。

发达国家都把《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政策正常运转的根本大法。我国的《反垄断法》也规定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银行业是适用于该法的,但《反垄断法》生效9年以来,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尚未公开被查处过一例。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相关部门认识不一致是重要的原因。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我国金融业都是国企或国企控股,反垄断会使国家的资产流失;另一种有影响观点认为,考虑到我国可能会出现金融风险,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五条,适用在出现防止经济危机时,可以采用“豁免禁止限制竞争协议的条款”,从而认为“房贷利率限折令”“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等具有正当性。其实,这些观点缺乏理论和实证支持,更多地反映了某些业内人士维护自身利益的局限性。

第一,尽管银行业具有不同于一般制造业的行业特殊性,如关系国家金融安全,需要有更多的自律以及社会责任等,但是这并不能使其豁免于反垄断执法。银行业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的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7],使银行更容易利用专业知识优势,通过设计复杂的金融产品来“捕获”信息有限的消费者,用来实施市场控制,从中攫取超额利润。第二,制造业中也有大量国企,制造业反垄断就不需要考虑国有资产的流失吗?显然认为反垄断会导致国资流失的逻辑并不成立。相反,总体上具有竞争特性的商业银行业如果不积极去反垄断,那么由垄断带来的银行内部的效率损失和社会福利损失以及由垄断所导致的银行体系创新不足、资金空转等积累的金融风险危害,要大大地高于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第三,银行业反垄断会导致金融危机的说辞则更不成立。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哪次经济危机是由反垄断造成的。相反,如上所述,如果不对银行进行反垄断,反而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经济金融风险。另外,具有垄断势力的银行,一方面自身存在提升贷款利率的动机,另一方面会造成信贷市场供不应求,也将间接地刺激民间借贷利息上升,进而加剧金融系统性风险。实际上,2017年7月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我国当今的金融形势做了权威的预判，指出我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能力得到了增强，当前要实行严格监管问责和地方举债终身责任制。显然，我国的金融风险主要来源于监管不严和举债责任松弛，与反垄断会加强竞争无关。当前稳定的金融发展形势，并没有出现可以采用“豁免禁止限制竞争协议的条款”的紧急情况。

此外，有人担心反垄断后，银行竞争加剧会导致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上升，不利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实际上，这恰恰只可能发生在银行垄断的情况下，因为银行只有垄断，才有能力维持较高的存贷差^[8]。如果进行反垄断，存贷差只能任由市场决定，倒逼银行创新盈利模式，不仅有利于降低银行自身的经营风险，还将促进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真正解决。

四、加快对金融业实施反垄断的若干建议

当前，银行业反垄断执法关系到了实体经济振兴，关系到了国家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关系到了国民经济整体的长期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只有抓住反垄断这个“牛鼻子”，才能把银行业的改革引向深入，才能使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 国家相关反垄断机构应该理直气壮地出来向大众宣传：银行业(包括国有银行主体)、银行利率的协商定价行为都适用于《反垄断法》的管辖。相关部门要坚决地打响《反垄断法》生效9年以来，对银行、保险业、证券业出现过的违法案例处置的第一枪。在反垄断执法领域，不仅要杜绝不同所有制的违法者的选择性执法现象，还应该杜绝不同行业违法者的选择性执法问题。这是向世界宣告坚定不移地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和意志。

2. 确立竞争政策在商业银行竞争中的优先地位，促进银行业提升效率、防止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管理商业银行的主要政策工具是竞争政策。我国《反垄断法》如何在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商业银行中得到有效的实施：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目前法案规定行政垄断的法律后果，是由违法机关的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反垄断法》执法机关没有管辖权，这将约束反垄断法在具有行政垄断特性的金融业进行反垄断。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国银行反垄断执法案例相对缺乏，既不利于维护《反垄断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权威性，也不利于《案例法》与《成文法》发挥优势互补作用及共同维护银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一方面，我国应该推动《反垄断法》的修订，加强《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管辖，将实施行政垄断的行政主体作为管辖重点；另一方面，应该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主管下，通过整合分散在国家发改委、国家商务部、国家工商局等国家部委中的垄断职能机构，成立专门独立统一的《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由此确立竞争政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优先地位，促进银行业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3. 对负面清单管理在商业银行业中的功能和定位需要进一步明确，促使我国商业银行业

市场准入体系更加契合市场经济主体发展。负面清单管理的本质是通过将禁止或限制企业从事的项目明确列出且平等适用于国有和非国有、内资与外资企业^[9]。全面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有利于民营资本更加公平地参与到中国商业银行业的市场竞争中来,从而打破银行业的垄断局面。比如,支付宝公司与天弘基金合作的余额宝业务不但对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造成了显著冲击,而且打破了传统基金行业的市场规则。更为关键的是,余额宝创新所带来的“蝴蝶效应”十分可观。显然,倘若负面清单管理在我国商业银行业中的功能和定位得到进一步明确,将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业大量引入民营资本,促进金融市场创新。

4. 对一些具体的反垄断措施和中央银行行使宏观调控职能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问题,要仔细研究,拿出有效的办法。例如,放开利率管制之后,央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机制仍不健全,但如果让商业银行牵头协商,就会出现以限制利率、固定利率为目的的垄断行为,这一行为涉嫌价格串谋,违反我国的《反垄断法》,会使央行调控面临两难境地。为此,有关部门必须要多管齐下研究出有效的可以执行的办法。央行应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增强金融机构对市场基准利率的敏感性,加快完善利率调控机制,更多依靠公开市场操作进行调控。只有建立了市场化的基准利率及其调控机制,央行才能摆脱通过自律机制对涉嫌违法进行调控的困境。在建立市场化调控机制之前,商业银行应严格遵守《反垄断法》第十一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挥行业自律在利率调控中的积极作用;在建立市场化调控机制之后,银行竞争加剧,金融管理部门应该加大对银行内部恶性竞争、价格合谋等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避免过度恶性竞争或形成垄断。

参考文献:

- [1] ALLENF, QIANJ, QIANM.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 Working Paper in SSRN, 2007.
- [2] 吕冰洋,毛捷. 金融抑制和政府投资依赖的形成[J]. 世界经济, 2013(7):4867.
- [3] 李扬.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辨[J]. 经济研究, 2017(6):416.
- [4] 张杰. 制度金融理论的新发展:文献述评[J]. 经济研究, 2011(3):145159.
- [5] 刘志彪. 现代产业经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 [6] 李良松. 美元LIBOR操纵案及对中国的启示[J]. 上海金融, 2012(6):6366.
- [7] 邱兆祥,栗勤.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市场竞争研究综述[J]. 金融

研究, 2008(8):192202.

[8] WALTERJR, WESCOTTP. Antitrustanalysisinbanking:goals, methods, andjustificatio
nsinachangedenvironment [J]. EconomicQuarterly, 2008, 94(1):4572.

[9] 凌永辉, 张月友, 徐从才. 负面清单制度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吗? ——来自中国
《行政许可法》自然实验的间接证据 [J]. 当代财经, 2017(5):89102.

逆向外包驱动力的实证研究

张月友 方瑾[※]

摘要：与传统离岸外包不同，逆向外包的兴起，为发展中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带来了新契机。更重要地，逆向外包的出现可能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方向。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中国服务行业的逆向外包度，实证分析驱动中国实施逆向外包战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服务质量和相对用工成本，及其与中国的双边政治关系亲疏等因素对中国开展逆向外包，具有稳健、显著的影响作用。进一步按要素密集度对服务业进行分类回归时发现，除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回归结果表现了与总体样本模型有较大差异外，其他三类服务行业与总体样本回归具有相似的检验结果。

关键词：逆向外包；驱动力；服务质量

一、问题提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创新全球化的新阶段。它以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为特征，核心内容是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与服务外包，在全球范围争夺科技工程人才^{[1][2]}。与发达国家的“创新全球化”战略相对应，“逆向外包”是一种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人才争夺的战略形式^[3]。作为一个新词，“逆向外包”较早由森（Sen）公开报道。Sen^[4]发现，为了解决国内航空业发展所面临的飞行员供给短缺问题，印度和中国通过逆向外包，开始大举从欧洲招募合格飞行员。

逆向外包有三种方式，分别为：直接雇佣(Direct Hire)、内涵式(Organic)和外延式(Inorganic)。其中，直接雇佣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直接聘用发达国家人员到本国工作；内涵式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采取在发达国家设立基地并就地雇佣工人开展业务；外延式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采取并购发达国家企业并开展工作。Sen^[4]报道的中国航空公司从欧洲招聘飞行员的案例即属于以上三种中的第一种，也即为“直接雇佣”的逆向外包方式。但实际上，尽管相关数据显示，中国于2008年启动“千人计划”工程，截至2016年，已经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6074人，但这种逆向外包方式在中国发生并不多。而其他两种，诸如“内涵式”和“外延式”的逆向外包策略，在中国已经很普遍。¹尤其是最近几年，伴随中国“走出去”战略进入加快实施阶段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和金额逐年增长。据普华永道“交易服务”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海外并购活动自2013年开始整体

复苏,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更是双双呈逐年大幅增长趋势,到2017年,其并购数量和金额大于2014年和2015年的总和。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主要青睐于美国和欧洲等技术、知识产权及品牌都较为成熟的市场。通过“外延式”逆向外包策略,中国寻求将这些发达国家领先的技术、专利和品牌引入国内市场^[5]。那么,具体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中国越来越多地开展逆向外包实践?或者说,中国企业通过逆向外包在全球选址及进行生产和服务网络布局时,着重看重的是什么?

作为一种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新现象,逆向外包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相关研究还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当前的主要学者也集中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直到2008年6月,在索伦斯公司对印度的离岸服务外包发生地理逆转现象发布正式研究报告以后,逆向外包这种新潮流才开始引发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如果大致将相关研究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类,很容易发现,规范研究方面的主要文献涉及到对逆向外包的定义与分类和开展逆向外包的条件、作用与意义等的论证。比如,张月友和刘丹鹭^[3]率先对逆向外包概念进行了定义,并在模型化发展中国家开展逆向外包的合理性方面,做了初步尝试。江小娟等和刘志彪把逆向外包上升到企业/国家战略层面,呼吁中国应抓住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迷这一机会,通过积极实施逆向外包战略,提升本国企业实力和对外开放水平^{[6](P60)}^{[7][8]}。Kedia 和 Mukherjee^[9]讨论了逆向外包的成因。刘丹鹭和岳中刚^[10]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开展逆向外包需要具备的条件。郑飞虎和常磊^[11]区分了在岸逆向外包和离岸逆向外包的不同,等等。近年来,伴随国际服务外包的兴起和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文件的出台和实施,逆向外包作为一个新兴的热点主题,得到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逆向外包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增多。不过,从研究方向上看,大多聚焦于逆向外包对作为发包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比如,陆续有学者实证分析逆向外包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12][13]}、成本节约^[14]、就业结构^[15]、生产率^{[16][17]}、创新绩效^{[18][19]}和技术进步^{[20][21]}等的影响。总体而言,学者们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外包战略的关注仍然不足^[22],尤其是,尚未发现有关逆向外包驱动力的实证研究,而这本该是在实证研究逆向外包的影响之前就要厘清的问题。本文尝试填补这一学术空白。

接下来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指标设计、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说明;第四部分设定模型对驱动中国开展逆向外包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是驱动传统离岸外包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对于逆向外包,张月友和刘丹鹭^[3]认为除了考虑到劳动力成本及服务素质外,企业战略和靠近东道国市场等也是推动离岸服务外包发生地理逆转的重要因素。借鉴以往相关文献思想并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东道国的服务质量和用工成本、外包活动中中外双方可交流情

¹ 近几年,作为一种海外存在,中国企业通过“内涵式”逆向外包,在海外设立研发基地,获取国际先进智力资源的案例也不胜枚举。例如,在汽车行业,长安汽车分别于2003、2008、2010和2011年,分别在意大利都灵、日本横滨、英国诺丁汉和美国底特律设立研发中心;在航空行业,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远赴美国洛杉矶创办研发基地;在通信、ICP和家用电器行业,华为在英、法、加拿大等多国设立研发中心,美国硅谷更是吸引了百度、长虹、苏宁等多家中国企业的海外研发中心落户。具体参见:马丹等. 集智海外,创新共赢——探访中国海外研发基地 [DB/OL].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18/c_1115663358.htm.

况、中外双边政治关系以及与传统离岸外包的联系等五个因素对中国开展逆向外包业务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位置,并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高素质人才和高端科技技术的需求愈加迫切。但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获取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是一道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现实难题,中国也不例外。由于逆向外包的主要发包对象是发达国家,相比传统的离岸服务外包,逆向外包对知识、技术溢出作用更强。非发达国家通过实施逆向外包能够变被动为主动^[20],通过与逆向外包中发达国家的接包企业签订附加协议和合同条款等方式,要求其对本国企业的员工开展技能培训,发展中国家还能更好地获取全球先进技术和创新资源^[1]。因而,作为非发达国家网罗全球创新资源的逆向外包,对承接国本身的技术发展和高级生产要素有较高的要求。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基于创新驱动追求,某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越高,中国企业越有可能向该国进行逆向外包。

在传统的离岸外包关系中,作为发包国的发达国家,为了实现成本套利,经常将一些低技术含量、标准化的制造业业务外包至中国和印度这类拥有优渥的人口资源优势的低用工成本国家^[23]。但正如假设一那样,在标志着离岸外包业务发生了地理逆转的逆向外包关系中,资本禀赋并不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并不在意用工成本的高低。相反,仅从地理位置转换来看,逆向外包中离岸外包承接方的转变似乎正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用工成本的升高。如何理解这种单纯的从绝对工资水平比较视角得出的看似荒谬的结论呢?Hahn^[22]的研究发现,逆向外包中,发达国家的高素质人才及其高科技技术不仅保证了这种离岸外包业务能更高效的完成,且能带来发展中国家企业时间成本的节约,更重要的是,还能为作为发包国的发展中国家带来高素质的服务回报。根据这一思想,如果在价格中纳入质量因素,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同样质量的服务供给,很容易推测,发达国家的绝对用工成本虽然很高,但其相对用工成本很可能是低的。如此,通过逆向外包,发展中国家虽然无法像传统离岸外包中的发达国家那样寻求绝对成本套利,但可以进行相对成本套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进行这种相对成本套利的过程,可以通过考察相对服务质量的劳动用工成本指标的变化观察到。比如,将相对服务质量的劳动用工成本定义为单位服务质量的劳动力用工价格,即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用工成本/服务质量^[3]。可以发现,从该指标的比值看,只要分母的服务质量提升幅度高于分子的工资水平提高幅度,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相对成本套利便成为可能。所谓的“高工资可能是低成本”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一国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越低,中国企业越有动力向该国开展逆向外包。

除了追求高技术服务和进行成本套利之外,语言、文化、政治、法律及教育等差异也是影

响离岸外包发展的主要因素^[24]。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世界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汉语正逐步朝着全球第二语言的目标逼近。同时,汉语的学习也充分渗入到各发达国家,为中国与其发展国际贸易奠定了更为坚实的语言基础。在传统的离岸外包活动中,接包国与发包国之间的语言相通,不仅能减轻因地理距离导致的心理障碍,有助于外包活动的有效进行,而且能降低因沟通障碍导致的贸易成本。比如英语作为国际官方语言,随着英语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普及,英语为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的发包业务提供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际影响力逐步逼近中国,与中国共同作为制造业离岸外包的承接大国,其最大优势之一正是英语是其官方语言^[25]。Doh et al^[26]甚至发现,那些母语为英语的国家更能够吸引同样说英语的国家对其开展FDI。因此,在逆向外包过程中,作为接包方的发达国家能否熟练掌握发展中国家的语言,也理应被认为是推动中国对其成功开展逆向外包活动的另一重要驱动力。鉴于此,本文将各发达国家的汉语水平纳入到可能影响中国对其开展逆向外包的关键因素之中。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三:发达国家掌握汉语水平越高,中国越有可能向该发达国家开展逆向外包。

国际政治关系与经贸互动之间的联系一直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随着时代背景的转变,各国意识到单纯靠军事力量的强大来增强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手段已难以为继,和平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以建立友好的国际政治关系为基础,共同促进以经济为核心及科技创新带来的综合国力的强盛成为各国的制胜之道。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也使得国家间政治关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逐渐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潘镇和金中坤^[27]认为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属于重要的双边制度联系,良好的政治关系增强了经济和贸易活动往来的积极性。一方面,企业可以从中得到信号,预期东道国更愿意接纳关系友好国家企业的进入,从而加强企业未来成功的信心;另一方面,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后,不可避免地需要和当地政府打交道,同时还面临着东道国的制度风险。一般来说,东道国视其与企业母国友好关系的差异,相关政策各不相同。比如在彼此关系友好的国家,东道国可能根据双方协定给予投资企业“安家落户”的优惠政策^[28]。由于逆向外包属于跨国界的贸易活动,同时受到母国及东道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在当下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东道国制度与我国制度的不同,使得我国对其开展逆向外包面临着许多复杂因素和不确定性。而东道国与我国间友好的双边外交关系为这种不确定性降低了风险。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四:与中国政治关系越友好的发达国家,中国更愿意对其开展逆向外包。

逆向外包的形式有多种,其中,有一种只是作为发达国家离岸外包整体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存在,属于发达国家企业充当主导外包角色下的一个子包业务过程^{[31][6][P60][29]}。驱动这种逆向外包的因素,索罗斯认为,为了更好地完成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外包及其交付任务,发展中国家通过在原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建立子公司或离岸交付中心,不仅更靠近目标市场,方便与发包方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还能达到有效规避市场管制和开拓更大客户群的目的^{[31][29]}。因此,

可以认为中国以往承接国际离岸外包活动的情况,有可能深刻影响这类新的逆向外包业务的开展。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五:中国承接发达国家离岸外包业务越多,越有动力对该发达国家开展逆向外包。

综上,如果各用一句话进行总结,五个驱动中国开展逆向外包的假说可以通俗地表达为:“当我们国家做不了时,外包给别国做”、“当别国做比国内做便宜时,外包给别国做”、“如果外包给别国做,倾向于外包给与我国有‘共同语言’的别国做”、“如果外包给别国做,倾向于外包给与我国有良好国际关系的别国做”和“旧的外包历史会影响未来新的外包业务开展”。

三、变量界定与计量模型

(一) 逆向外包度指标设计

自传统离岸外包兴起之后,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定义。其中,以Feenstra和Hanson^{[30][31]}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离岸外包就是从国外的服务供应商处购买用于本国生产的中间投入。同样,Crinò^[32]在有关服务离岸外包对白领阶层就业影响的研究中指出,在离岸外包过程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发包国将一部分业务分离至国外完成之后,会重新购买这些业务/产品来完成国内剩余的服务或生产流程。基于类似观点,国际上涌现出大量有关离岸外包的测度方法。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是Feenstra和Hanson^{[30][31]}创造的FH离岸外移指数,其外包度用公式表示为:

$$OSS_i = \sum_j \frac{X_i^j}{Y_i} \frac{M_j}{C_j}$$

(1) 其中, X_i^j 代表第i行业生产所需第j行业的中间投入; Y_i 代表第i行业生产所需中间产品的总投入; M_j 表示对第j行业的总进口; C_j 表示对第j行业的总消费; $\frac{X_i^j}{Y_i}$ 衡量了生产一单位i行业产品的总投入中来源于第j行业产品的比重; $\frac{M_j}{C_j}$ 衡量了国内对第j行业的总消费来源于进口的比重。因此,两者相乘的经济学含义就是,从国外第j行业进口产品投入到第i行业生产中的数量占第i行业总产出的比例,对j的取值加总求和所得到的 OSS_i ,即为第i行业生产对外国总中间投入产品的利用率,可近似表示为第i行业的外包度。 OSS 的取值范围为0到1,其值越接近于1,说明中间投入品中来自国外的需求较多,其离岸外包度也就越高;反之,说明中间投入品中来自国外的需求越少,其离岸外包度也就越低。

自FH离岸外移指数推出以来,众多国内外学者以此方法为基础,构建出符合自身研究需要的离岸外包测度指标。例如,国内学者孟雪^[16]在研究中国开展逆向外包对本国生产率影响的研

究中便认为,中国第*i*行业的逆向外包度可表示为如下公式:

$$ROSS_i = \sum_j \frac{X_i^j}{Y_i} \frac{K_j^F}{K_j}$$

(2) 其中, X_i^j 代表第*i*行业使用第*j*生产性服务行业的产值; Y_i 代表第*i*行业生产所需中间产品的总投入; K_j^F 表示第*j*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情况; K_j 表示第*j*生产性服务行业的投资总额; $\frac{X_i^j}{Y_i}$ 表示为生产一单位第*i*行业产品, 总投入中来自第*j*生产性服务行业的比重; $\frac{K_j^F}{K_j}$ 表示第*j*生产性服务行业的总投资中来自于外资的比例。两者相乘的经济学含义为, 投入到第*i*行业的来自国外第*j*生产性服务业的数量占*i*行业总产出的比重。对*j*的取值加总求和便得到, 即为本国第*i*行业的生产对外国总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的利用率, 可近似表示为中国第*i*产业的外包度。取值情况同公式(1)的分析。

由于本文以中国为发包方, 讨论作为接包国的发达国家的各要素对于中国开展逆向外包的影响, 且是研究中国的总体服务业而非单个细分服务行业的逆向外包情况, 不能直接套用上述指标, 需要另行设计逆向外包度指标。因此, 借鉴上述各类测度离岸外包的方法, 本文构建中国对某单个接包国家的逆向外包度公式为:

$$ROSS_i = \sum_k \sum_j \frac{X_{ik}^j}{Y_k}$$

(3) 其中, x_{ik}^j 表示第*k*服务业行业生产所用到的第*i*国家第*j*服务业行业的中间投入, Y_k 表示第*k*服务业行业生产所需的全部中间投入, $\frac{x_{ik}^j}{Y_k}$ 则代表第*k*服务业行业利用第*i*国家第*j*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的数量占其总投入的比重。分别对*k*和*j*的取值加总求和便得到公式(3)。其经济学含义为, 中国开展逆向外包时, 利用第*i*国家服务业中间投入的情况, 也即中国企业对第*i*国家开展的逆向外包度, 其取值范围大于等于0, 但不再必须小于等于1。这是因为, 如果中国某服务业细分行业的中间投入服务全部来源于某一发达国家, 则中国该细分服务业行业的逆向外包度就为1, 加总各细分服务业后的中国总服务业逆向外包度必然大于1。例如, 2007年, 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中, 家庭作为雇主的活动及未分化的商品和服务这一大类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全部来自于英国, 因此, 中国这一大类服务行业对英国的外包度就为1, 该年中国总服务业对英国的外包度便达到了1.03, 也即, 该年中国对英国的逆向外包度就为1.03。

(二) 主要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依据上述对逆向外包的测度方法, 将中国作为母国对发达国家开展的逆向外包的外包度 ($ROSS_i = \sum_k \sum_j \frac{x_{ik}^j}{Y_k}$) 作为被解释变量。计算该指标所需要的相关数据全部来源于历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和《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最新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数据更新到2014年, 而逆向外包现象又较早由森(Sen)在2005年发现, 因此, 本

文将考察期定为2005—2014年。再由于逆向外包的接包国主要是发达国家,故本文选择考察期间,综合发展程度较快的16个发达国家作为考察对象,具体包括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德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瑞典、瑞士、英国、韩国、日本、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比利时。

2. 解释变量:工资水平、相对服务质量用工成本、使用汉语水平、双边外交关系和传统外包度。

a)工资水平(Wage):根据假设1,获得服务质量满足或创新资源是发展中国家进行逆向外包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且待接包国家的服务质量和创新资源水平可由该国家工资水平来衡量,即某一国的工资越高,则认为该国家拥有较高的服务质量,或者认为从该国能获得较高的创新资源。因此,本文将分别查找(上述)16个发达国家在2005—2014年间的平均工资水平¹,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同时,根据当年实际平均汇率水平,将16个国家的工资额换算为以人民币表示的工资额。

b)相对服务质量用工成本(cost):根据上文可以知道,本文认为待接包国家低的相对用工成本(质量用工成本=用工成本/服务质量)也是逆向外包的驱动力之一。这里的用工成本同样采用上述各发达国家平均工资水平表示;而对于服务质量的测量,为避免与变量a重复,用一国总人数中接受高等教育水平的人数比例来表示,即一国公民的受教育率越高,则认为该国的服务质量越高^[2]。因此,将收集2005—2014年间,16个发达国家在各年里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数比例来衡量这些国家提供服务的质量水平,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c)汉语水平(Chinese):由于语言为两国之间能否进行有效沟通的工具,又由于本文实施逆向外包的国家是中国,因此,本文将考察16个发达国家使用的汉语情况,该信息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所著的“世界概况”。借鉴Hahn^[22]的研究,某国家使用汉语人数位居这个国家使用各个语言人数的前三名之内,则认为该国家使用汉语的水平非常高。本文将此变量定义为虚拟变量,表达式如下:

$$Chinese_i = \begin{cases} 1 & f \text{ } i \text{ 国家使用汉语人数排名前三之内} \\ 0 & f \text{ 其他} \end{cases}$$

(4)

d)双边外交关系:国家间政治关系涉及到多个领域和层次,资料收集也极其繁杂且难以梳理,因此,学术界目前为止仍未有能全方位准确衡量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方法。本文参考以往文献分别以以下两种方法对双边政治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第一,双边来往:在以往众多文献中,学者们普遍采用大事件分析法度量国家间政治关

¹这里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指从事所有行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根据定义,由于逆向外包特指服务行业,本文利用发达国家服务业平均工资更能准确衡量承接国的服务质量,但在下文中,为避免质量用工成本中用工成本与服务质量指标设计的重复,本文也利用受高等教育率来衡量服务质量,而出于统计上的困难,受高等教育人数中从事服务行业情况难以了解,本文未区分服务行业受教育情况,为相对服务质量用工成本指标(用工成本/服务质量)的合理性,本文选用所有行业在内的平均工资水平来计算。另外,在各样本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服务业占比最大,因而,利用所有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来近似衡量服务业工资水平也是合理地。

系。张建红和蒋建刚^[33]采用高层互访事件赋值法对两国间发生的外交事件进行统计归纳赋值。此外交事件主要是指双边外交访问,包括两国副部级及以上级别的政治领导人互访、在第三国会晤及互相问候。其中,将国家元首级互访、会晤和问候的事件分别赋值为2,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外交事件赋值为1,最后以这些事件所得到的平均值来表示双边政治关系亲厚水平。本文借鉴以上方法衡量2005至2014年间中国与16个发达国家的友好程度,但为了更加客观比较中国与这些发达国家关系的亲密差别,最终以各年事件赋值总值代表两国双边来往程度,其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网站和新华社的相关新闻报道。

第二,外交关系级别:除以上外交事件外,中国还同多个国家以建交的形式达成友好关系。受潘镇和金中坤^[27]利用外交关系级别作为衡量两国间政治关系友好程度指标的启示,本文对国家间是否建立建交、合作和伙伴等关系进行赋值。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除单纯建交外,还形成多种程度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对2005至2014年间,中国分别与16个发达国家建交的实际情况的搜集,将各类关系依等级由低到高分:不建交、单纯建交、合作关系、全面合作关系、全方位合作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九种情况,并且依次赋值为0、1、2、3、4、5、6、7和8。其主要划分等级依据为:首先,国家所有后续外交关系以建交为基础;其次,战略伙伴关系指的不仅是普通的合作关系,其辐射范围更广,涉及到军事等更加核心领域的合作,且彼此之间达到了一定的信任度,在重大问题中不存在根本分歧,而合作关系涉及范围较小,且容忍对重大事件意见分歧的存在,因此,外交关系级别中,战略伙伴级别高于合作关系级别;另外,无论是在合作还是伙伴关系中,“全方位”指的是多维的、立体的,比“全面”涉及范围更广更深。以上外交关系信息来源于中国外交部网站。其中,由于中美、中日间外交关系复杂多变,因此,同样借鉴于潘镇和金中坤^[27]对国家外交关系的划分,将中美与中日间关系定位为建交。

e)传统离岸外包度:由于假设5预计存在部分逆向外包可能属于传统外包下的子包业务过程,因此,将发达国家作为发包方,将业务外包至中国的传统外包开展情况纳入到中国对该发达国家开展逆向外包的影响因素中。同样,借鉴以往文献对外包度的定义^{[30][31]},本文将发达国

$$OSS_i = \sum_m \sum_n \frac{X_{im}^n}{Y_m}$$

家对中国的传统离岸外包度构建为公式(5):

(5)

式(5)中,表示第*i*国家第*m*行业(这里不再局限于服务业)生产所用到的中国第*n*行业的中间投入,表示第*i*国家第*m*行业生产所需的全部中间投入,则代表第*i*国家第*m*行业利用中国第*n*行业产出作为中间投入占其总投入的比重。对*n*和*m*分别加总求和便得到的公式(5),表示为传统离岸外包中发达国家利用中国的产出作为中间投入占其总投入的比重,也即为发达国家对

中国的离岸外包度。本文主要考察2005至2014年间,上述16个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传统离岸外包程度,数据同样来源于历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

(三)控制变量。由于本文关于影响中国逆向外包开展因素的研究主要来源于接包国方,对本国的因素并未考虑,因此,需要考虑将影响逆向外包业务开展的中国因素纳入到控制变量中。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有母国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技术进步发展报告》。首先,一般来说,本国劳动力成本越高,对企业开展逆向外包越有推动作用。且随着本国人均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发达国家企业陆续撤出中国市场,该因素可能对逆向外包的兴起有着潜在的促进作用。因此,研究及控制该变量有其必要性。劳动力成本用平均劳动工资表示。其次,一国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其对外开展逆向外包的重要依托,该指标可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再次,在全球范围对高新技术的寻求是发展中国家开展逆向外包的重要原因之一^[20],而作为逆向外包的发包国,其自身的技术进步情况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逆向外包的开展。最后,一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直接影响该国企业的外包活跃度,很难想象严重封闭的经济国家会有高的逆向外包度。本文的技术进步指标用中国授权专利量来表示。贸易开放程度采用进出口贸易总规模与国内GDP的比值来衡量。另外,为避免上述各控制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为了更合理地体现出中国与各样本发达国家间的差异,本文将中国的平均劳动工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技术进步和贸易开放度调整为相对16个发达国家的相对平均劳动工资(rehomecost)、相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gdp)、相对技术进步(readvance)和相对贸易开放度(reopening),其中各计算指标需要的发达国家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局网站。

四、模型设定与回归分析

(一)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假设,将模型初步设定为:

$$ROSS_{it} = \beta_0 + \beta_1 wage_{it} + \beta_2 cost_{it} + \beta_3 chinese_{it} + \beta_4 relation\_1_{it} + \beta_5 relation\_2_{it} + \beta_6 OSS_{it} + \varepsilon_{it}$$

(6)

其中*i*代表逆向外包的东道国,也即发达国家,*t*代表年份, β_i 是系数。

1.对(6)式函数形式进行检验。通过对模型的linktest和各变量的RESET检验,发现上述模型存在遗漏变量二次项的情况。由于被解释变量的平方项包含了各解释变量二次项的信息,因此,将 $ROSS^2$ 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模型中,并通过了linktest检验。

2.计算方差膨胀因子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最大的vif仅有5.16,远小于10,因

此,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故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影响模型回归的有效性。

3. 处理内生性问题。首先,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本文主要考察东道国方面的因素对母国开展逆向外包的影响,而忽略了母国本身因素。为减弱遗漏重要变量而导致模型误差,主要从母国政治支持程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引入可能对逆向外包产生影响的因素。其次,对各主要解释变量进行DWH检验以确定其内生性,检验发现relation_1的DWH检验P值小于0.05,故进一步通过引入工具变量的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由于国家间经济贸易互动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国间的交往是否密切,因此,将中国分别对16个发达国家的滞后一期货物进出口总额(IE)作为relation_1的工具变量,并通过了该变量的外生性检验和与relation_1的相关性检验,故确定其为relation_1的有效工具变量。

4. 消除异方差问题。利用BP检验的方法检验异方差问题,发现部分变量未通过检验。考虑使用WLS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发现,WLS估计方法虽提高大部分变量的显著性,但主要解释变量wage的系数变为负,与理论预期不符,因此,将利用稳健标准误来解决异方差问题。

5. 考虑到传统离岸外包的存在对当期逆向外包业务的开展有滞后影响,因此,模型将引入其滞后一期的变量加以检验。

6. 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主要有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大类,通过F检验、LM检验和huasman检验分别确定模型应选用个体和时间双向的固定效应模型。

经过以上处理,本文将模型(6)重新构建为:

$$\begin{aligned} ROSS_{it} = & \beta_0 + \beta_1 wage_{it} + \beta_2 cost_{it} + \beta_3 chinese_{it} + \beta_4 relation\_1_{it} + \beta_5 relation\_2_{it} + \beta_6 OSS_{it} + \varepsilon_{it} + \\ & \beta_7 OSS\_L_{it} + \beta_8 ROSS_{it}^2 + \beta_9 rehomecost_{it} + \beta_{10} regdp_{it} + \beta_{10} regdp_{it} + \beta_{11} readvance_{it} + \beta_{12} reopening \\ &_{it}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7)$$

其中, OSS_L为OSS滞后一期变量, $\sum year$ 为考虑模型的时间效应。

(二)描述性统计

表1是对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1,中国对16个发达国家的逆向外包度的最小值为0.0003698,最大值为1.034146,平均值只有0.029,说明中国对各发达国家的逆向外包差异较大。驱动中国开展逆向外包的各因素中,有效工资(Wage)、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Cost)、汉语水平(Chinese)、双边关系(relation_1、relation_2)和传统外包度(oss)的标准差分别为7.885332、0.3632682、0.4413744、7.916126、2.544695和0.0928225,各指标之间差异较大,说明各因素对中国开展逆向外包业务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无法直接观察出各因素对逆向外包业务开展的具体影响程度,需要进一步研究。

¹ 限于文章篇幅,正文中未报告上述各类检验结果。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oss	160	0.0291241	0.0838313	0.0003698	1.034146
wage	160	32.01134	7.885332	14.40658	54.79743
cost	160	0.9743705	0.3632682	0.4308231	1.909641
chinese	160	0.2625	0.4413744	0	1
relation_1	160	8.81875	7.916126	0	38
relation_2	160	3.2	2.544695	1	8
oss	160	0.1634219	0.0928225	0.0157325	0.4337475
oss_L	144	0.15618	0.0881835	0.0157325	0.4337475
recost	160	0.141812	0.0465372	0.0146305	0.2831793
regdp	160	0.100385	0.0514095	0.031753	0.2714955
reopening	160	1.003056	.5651613	0.238921	2.988277
readvance	160	168.0893	339.0593	0.254063	3046.141

资料来源：作者通过stata计算

（三）回归分析

依托（7）式进行回归，得到各模型实证检验结果如表2。其中，作为参照系，模型1为使用稳健标准误的OLS回归，并在有效控制母国相对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变量的情况下对模型进行检验。模型2和模型3为逐步固定个体和时间效应的模型。另外，与其他国家相比，由于国家间的外包活动开展越频繁，就越可能加深两国间的政治来往，这就使得逆向外包度与国家间双边关系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在模型4中引入工具变量“同各东道国滞后一期的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ie_L）”来处理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如下：在各模型检验结果中，以工资衡量的东道国技术水平的系数都为正，其中模型3和模型4分别通过了5%和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假设1的猜想，即发达国家的高服务质量是发展中国家对其开展逆向外包的重要驱动力；同样，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在各模型中的系数为负，且在所有模型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了逆向外包与传统离岸外包类似，同样追求低用工成本，只是，在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这种新型离岸外包中，发展中国家追求的不是低的绝对用工成本，而是低的相对用工成本；另外，受全球学习汉语浪潮的启发，本文将各东道国使用汉语情况纳入到逆向外包驱动力探究的模型中，但实证结果的显著性并不理想，模型1甚至表现出与预期结论相反的情况，基于对该变量数据的统计梳理和实证结果，我们作出猜想：东道国精通汉语对逆向外包业务的开展的确有促进作用，但基于汉语在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普及的现实情况，汉语对逆向外包的驱动作用被极大弱化，也就是说，若汉

语如英语一样在全球普及,则各发达国家的汉语使用程度差异可能才会对逆向外包的开展有不同影响,如同英语的作用已在传统离岸外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一样。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本文还引入了国家间政治关系因素来考察其对逆向外包的驱动作用。其中,国家间双边来往变量relation_1的系数在各模型的系数为正,并且大多模型都通过了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检验,这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假说4。但另一以伙伴关系级数来衡量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变量relation_2的检验结果并不理想,大部分检验结果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在部分模型中的系数为负。通过观察数据发现,出现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为,以伙伴关系定义的国家间外交级别太过单一,没有以国家领导人的实际互动往来情况衡量的双边关系具体,因此,加大了检验结果的误差;最后,对于中国作为接包方的传统外包度及其滞后一期变量对我国开展逆向外包的驱动效果进行研究,检验结果表明,传统离岸外包的确带动了逆向外包活动的开展,但效果并不显著;而且其滞后一期变量的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不相符,大部分模型的系数检验都为负,可见,传统离岸外包并不如预期估计的那样对逆向外包有强烈的正向驱动作用,出现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为:一方面,在逆向外包活动中,的确存在其属于发达国家企业充当主导外包角色下的一个子包业务过程,但目前存在的逆向外包业务中,大部分是新开展的活动;另一方面,近些年来,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升高,外资企业不断撤离中国市场前往其他更低成本的国家,比如东南亚,导致中国作为接包方的外包活动大大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传统离岸外包对逆向外包这种新型外包活动的带动作用。

表2 逆向外包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变量	(1)	(2)	(3)	(4)
wage	0.0000733 (0.63)	0.0001972 (0.50)	0.0006823** (2.06)	0.0009221*** (2.80)
cost	-0.0136451*** (-4.72)	-0.0280319*** (-3.46)	-0.0328766*** (-4.38)	-0.0293619*** (-5.28)
chinese	-0.0041507 (-1.63)	0.001629 (0.37)	0.0035865 (1.09)	0.004521 (1.44)
relation_1	0.0011012*** (7.56)	0.0002866** (2.21)	0.0002779* (1.91)	0.0000182 (0.18)
relation_2	-0.0018657*** (-5.79)	0.0000562 (0.11)	0.0000819 (0.19)	0.0001192 (0.28)
oss	0.0100402 (0.54)	0.0117228 (1.31)	0.010286 (1.03)	0.0138827* (1.73)
oss_L	0.0261792 (1.32)	-0.00206 (-0.15)	-0.0010537 (-0.10)	-0.001315 (-0.15)
_cons	0.0104202 (1.32)	0.0179101 (0.89)	-0.0130839 (-1.14)	-0.0006782 (-0.9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NO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NO	No	Yes	Yes
N	144	144	144	128
R ²	0.9922	0.9822	0.9766	0.9800

注：在面板工具变量法模型5中，回归系数下方为z统计量，在其他固定效应模型中，回归系数下方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四）分行业逆向外包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

根据张月友和刘丹鹭^[9]对逆向外包的定义可以发现，逆向外包的离岸服务对象是服务业而非制造业。考虑到服务业各分行业间具有强异质性特征，本文对逆向外包影响因素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到服务业分行业。为考察各因素对服务业分行业逆向外包的影响情况，参考Rahman和Zhao^[34]和樊茂清^[35]的划分，先按要素密集度将服务业分为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教育和公共服务业四大类（具体见表3）。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了解2005–2014年中国四大类服务业中间投入情况，并分别计算出中国作为发包母国对16个发达国家按服务业行业分类的逆向外包度。

表3 服务业按要素密集度分类

类别	服务行业
资本密集型	房地产业；各类运输业；信息和通讯；电力、煤气和水的供应
劳动密集型	建筑业；各类零售和批发（不含汽车和摩托车）；汽车和摩托车的销售、保养和维修；燃料的零售；家庭物品的修理；私人雇佣的家庭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其他辅助运输活动
知识密集型	金融业；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
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业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国防及社会保障业；其他社区、社会及个人公共服务业

表4汇报了按要素密集度分类的服务业分行业逆向外包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以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逆向外包度为因变量的实证结果显示，相比于表2中总体样本回归的检验结果，工资水平、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和双边来往变量的驱动力效果依然显著。另外，以伙伴关系衡

量的外交关系级别也变得显著为正。总体上,相比于表2的样本回归结果,以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逆向外包度为因变量的实证效果更加理想,可能原因在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外包在整体服务业外包中占主要部分,各主要因素对其影响程度更加明显。

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逆向外包度为因变量的实证结果显示,东道国工资水平和质量用工成本对逆向外包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相比于表2中总体样本回归结果,显著性没有发生改变,但两者的系数方向发生了变化。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类似于制造业的生产,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劳动用工成本和可用劳动力是这类服务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而技术的提高只是辅助作用,因此,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工资变化的强度异常敏感,以工资衡量的服务质量失效,东道国工资水平仅反映该国家的用工成本,同时,将服务质量作为考虑因素纳入到相对用工成本的衡量中,其对逆向外包的影响作用大大降低,甚至出现相反的结果。另外,东道国汉语水平的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相比于表2,结果得到了改善,说明语言作为驱动力的确有其微弱的作用。

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逆向外包度为因变量的实证结果显示,工资水平和质量用工成本分别通过了10%和1%的显著性检验,而其他解释变量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甚至出现与预期相反的效果。由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复杂且先进的高端科技技术,而发达国家的高素质人才及其全球顶尖创新性科学技术为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状况反映了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而逆向外包的溢出效应,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高精尖产品。因此,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将此类服务业外包至发达国家,继而,发达国家所能提供的高服务质量和相对于高服务质量的高用工成本作为此类服务业外包驱动力的检验结果是合理的。

最后,相比于中国其它三种服务类型的逆向外包,以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业的逆向外包作为考察对象,各驱动力对其的影响效果大大降低。其中,以工资平衡量的服务质量高低和相对用工成本变量,虽依然表现出与表2中总体模型回归中一样的系数方向关系,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汉语水平变量的显著性增强,表现出了假设3的预期效果。基于对此大类服务业分行业中间投入数据的整理和实证结果,我们作出大胆猜测,由于此大类服务业外包数在总体外包中仅占较少部分,导致各驱动作用并不明显,同时,这类服务外包受政府干预影响较大,特别是在此类外包中占据绝大比例的教育逆向外包,例如,国内教育机构和学校为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效果,大量聘用外籍教师,因此,汉语的掌握对于这些教师在中国生存和施教有极大的影响作用。

表4 按要素密度分服务行业逆向外包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变量	ross _c	ross _i	ross _k	ross _p
wage	0.0008085*** (2.85)	-0.0001837*** (-3.14)	0.0002799* (1.55)	0.0000162 (0.46)

cost	-0.0361321*** (-5.59)	0.0069152*** (5.20)	-.0103971*** (-3.41)	-0.0005885 (-0.74)
Chinese	-0.0002709 (-0.10)	0.001481*** (2.55)	-0.0001687 (-0.10)	0.0007252** (2.09)
relation_1	0.0002825** (2.27)	3.96e-07 (0.02)	-0.0000256 (-0.47)	0.0000165 (1.07)
relation_2	0.0006793* (1.79)	0.000049 (0.63)	-0.0001807 (-0.78)	0.0000215 (0.46)
oss	0.0079014 (0.92)	0.0017127 (0.97)	0.0025078 (0.57)	0.0010014 (0.94)
oss_L	0.0013962 (0.15)	0.0019549 (1.01)	-0.0006666 (0.14)	-1.17e-06 (-0.00)
_cons	-0.0142942 (-1.52)	0.0022439 (1.11)	0.0003495 (0.88)	-0.001844 (-1.5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144	144	144	144
R ₂	0.7458	0.9993	0.1112	0.1297

注：各模型都为工具变量法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系数下方为z统计量。*、**和***分别表示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重新构建，新的逆向外包度表示如下：

$$ROSS_i = \sum_k \sum_j \frac{X_k^j}{Y_k} \frac{M_i}{M}$$

（8）

其中， X_k^j 表示第k服务行业生产所需第j服务行业的中间投入， $\frac{X_k^j}{Y_k}$ 表示第k服务行业总投入中来自第j服务行业产出所占的比重。基于Feenstra 和 Hanson^{[30][31]}将某行业的总进口占该行业总消费之比近似代替该行业作为中间投入中来源于国外那部分比例的启发，本文将 $\frac{M_i}{M}$ 近似代替中间投入中来自于i国的那部分所占比例，因此 $\frac{X_k^j}{Y_k} \frac{M_i}{M}$ 表示为第k服务业生产中用第j服务业产出作为中间投入中来自i国的那部分，即公式（8）的经济学含义为，中国为生产本国服务业产品对第i国服务业产品的利用率，其可代表中国对第i国的服务业逆向外包程度。

将新设定的逆向外包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次检验模型（7）中各解释变量对逆向外包的驱动作用，结果如表5。其中，总体逆向外包、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及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业的逆向外包的研究结果与上文中各模型检验结果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其中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相较于表4，比模型更接近于总体样本回归。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回归结果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工资水平及质量用工成本对外包的影响依然与表4中模型相同，其他主要解释变量的影响效果与理论假设更相符。因此，可以认为上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有效的。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ross	ross _c	ross _l	ross _k	ross _p
wage	0.0164171*** (3.06)	0.0060866*** (3.15)	-0.0040778 (-0.07)	0.0043725*** (3.11)	0.0022366*** (3.83)
cost	-0.3095477** (-2.27)	-0.0981993** (-2.00)	0.0749502 (0.07)	-0.0731707** (-2.05)	-0.0197137 (-1.33)
Chinese	0.1205875* (1.84)	0.0540867** (2.29)	0.0038926 (0.03)	0.0297686* (1.73)	0.0143013** (2.01)
relation_1	0.0092371*** (3.36)	0.0024585*** (2.48)	-0.0171913 (-0.76)	0.0024165*** (3.34)	0.0009625*** (3.21)
relation_2	0.0003182 (0.04)	0.0002695 (0.08)	0.0061463 (0.60)	0.0010298 (0.44)	0.0012073 (1.25)
oss	0.0003182 (1.19)	0.1406671** (1.93)	0.0900654 (0.07)	0.0564207 (1.06)	0.0362289* (1.64)
oss_L	0.2757364 (1.26)	0.0611726 (0.77)	-0.0423193 (-0.06)	0.0770028 (1.34)	0.0262687 (1.1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144	144	144	144	144
R ₂	0.2219	0.2424	0.1159	0.1467	0.0011

注：各模型都为工具变量法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系数下方为z统计量。*、**和***分别表示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目前，世界经济已进入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全球化转向基于全球创新链的服务业全球化的新阶段。而逆向外包作为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创新链的重要途径，自兴起以来就备受学术界关注。但纵观现有文献，各类研究几乎都是从逆向外包为企业、国家实现效益的角度出发，对逆向外包出现的源头并未作出充分且令人信服的解释。笔者认为只有正确找出逆向外包得以成功开展的驱动因素，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实施高水平、高效率的“走出去”战略，才能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创新性资源优势，跻身于全球创新链中。因此，本文着力于寻找逆向外包得

以成功开展的驱动因素。

文章借鉴相关文献思想并通过分析传统离岸外包驱动力，分别提出逆向外包业务得以开展的五个影响因素的假设，认为高服务质量、相对服务质量用工成本、语言沟通水平、双边政治关系及传统离岸外包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逆向外包的开展，并构建逆向外包度指标和计量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对逆向外包的驱动力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发现：

(1)以平均工资水平衡量的发达国家高服务质量能显著促进发展中国家对其开展逆向外包。通过逆向外包业务的开展，母国企业可以与东道国合作企业签订培训或技术转让等条款，使得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进而大幅度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因此，逆向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发达国家创新性资源的有效途径。按要素密集度分类，进一步实证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逆向外包驱动力，发现除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分行业之外，高服务质量因素对中国其他服务业分行业的逆向外包的开展依然有强烈促进作用。而发达国家工资水平变量对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分行业的逆向外包的开展产生了负向影响，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对劳动成本的高敏感度导致利用工资水平衡量服务质量的效果失效。

(2)以发达国家用工成本与服务质量之比所表示的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因素对中国向其开展逆向外包呈负向关系。这一点与传统离岸外包追求低用工成本类似。但逆向外包中的低质量用工成本与单一的劳动工人工资衡量的成本不同，它更多的是要求服务质量的提高幅度快于劳动成本的上升速度。同样，对于各类服务业分行业的逆向外包，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因素依然对其有负的显著性影响。

(3)在众多模型检验中发现，由于汉语在各发达国家普及率还不高，对中国对其成功开展逆向外包只表现出了弱的驱动作用。

(4)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是中国向各国成功开展逆向外包的主要驱动力。

(5)传统离岸外包对中国逆向外包开展情况有促进作用，但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且其滞后一期变量与预期不符，说明在中国，以子包形式存在的逆向外包业务并不多见。

(二) 建议

虽然通过大量研究都证实了逆向外包有利于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增强国际地位，并为我国带来创新技术和高科技人才，帮助我国实现产业优化和结构升级。但中国能否顺利开展逆向外包，并非纸上谈兵。

首先，在进行逆向外包业务之前，应注重区位选择。实施逆向外包的目的除了要更好地创造出服务产品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业务互动，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网络全

球高科技工程人才,因此,逆向外包对接包国家的人才素质及科技技术要求较高。

其次,政府应发挥推动中国企业向发达国家开展逆向外包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关产业政策,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的有效开展,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加快逆向外包进程,进而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存在着大量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型企业,其发展的滞后严重阻碍了其“走出去”的步伐。因此,着力改善中小企业开展逆向外包业务的环境应成为当务之急。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既应从改善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环境入手,简化海外投资、并购等的审批程序。也可以给予中小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加大对其开展逆向外包的金融支持等。另外,中国如想加快逆向外包步伐,应努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战略政策的实施下,中国不断加深与沿线国家在交通运输、能源工业等领域的合作,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也为我国向沿线国家开展逆向外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Lewin,A.Y.,V.Couto.Next generation offshor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innovation(Duke University CIBER/Booz Allen Hamilton Report)[R].Durham, NC: Duke CIBER,2007.

[2]Lewin,A.Y.,S.Massini,C.Peeters.Why are companies offshoring innovation?The emerging global race for tal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6).

[3]张月友,刘丹鹭.逆向外包: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新战略[J].中国工业经济,2013(5).

[4]Sen,P.India and China start reverse outsourcing of foreign pilots to counter shortages[EB/OL].
<http://www.indiadaily.com/editorial/3997.asp>,2005.

[5]普华永道:《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与展望》, http://www.pwccn.com/home/chi/tslibrary_chi.html,2016-11-4。

[6]江小娟.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M].人民出版社,2008.

[7]刘志彪.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2).

[8]刘志彪.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J].学术月刊,2015(2).

[9]Kedia,B.L.,D.Mukherjee.Understanding offshoring: A research framework based on

disintegration, loc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advantages[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09(3).

[10]刘丹鹭,岳中刚.逆向研发外包与中国企业成长——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自主汽车品牌的案例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1(4).

[11]郑飞虎,常磊.跨国公司研发外包活动的研究:中国的实证与新发现[J].南开经济研究,2016(4).

[12]陈启斐,刘志彪.反向服务外包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3(11).

[13]陈羽,黄晶磊,谭蓉娟.逆向外包、价值链租金与欠发达国家产业升级[J].产业经济研究,2014(4).

[14]Richards,M.,Y.Yang.Determinants of foreign ow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R&D joint ventures: Transaction costs and national cultur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7(2).

[15]孟雪.反向服务外包如何影响中国的就业结构——以中国作为发包国的视角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2(9).

[16]孟雪.反向服务外包对我国生产率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7).

[17]吴凤羽,唐华明.跨国反向服务外包模式对制造业生产率影响的比较研究[J].国际商务研究,2015(5).

[18]岳中刚.逆向研发外包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汽车产业的实证研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6).

[19]陈启斐,王晶晶,岳中刚.研发外包是否会抑制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2).

[20]Modwel,S.,T.Jelassi.Productivity of India's Offshore Outsourcing Sector: Business-based Evidence[J].Policy Brief,2010(2).

[21]沈春苗.逆向外包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J].财经研究,2016(5).

[22]Hahn,ED.Reverse Offshoring of Services:The New Wage of Emerging Offshorers[R].Work paper,2010(8).

[23]Smith,M.A.,S.Mitra,S.Narasimhan,Information systems outsourcing:A study of pre-event firm characteristics.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2015(2).

- [24]Johanson,J.,J.E.Vahlne,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ifrm: 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7(1).
- [25]杨卫东.全球化时代的语言文化帝国主义[J].国际论坛,2013(4).
- [26]Doh,J.P.,K.Bunyaratavej,E.D.Hahn.Separable but not equal: The location determinants of discrete services offshoring activit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6).
- [27]潘镇,金中坤.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J]. 财贸经济,2015(6).
- [28]Kostova,T.,K.Roth,M.T.Dacin.Institutional Theory in the Stud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A Critique and New Direc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8(4).
- [29]Tholons Inc.Reverse Offshoring:Trend or Strategy[R].Tholons Services Globalization Review,2008.
- [30]Feenstra,R.C.,G.H.Hanson.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and the impact of trade and technology on wages[R].Nber Working Papers, 1997.
- [31]Feenstra,R.C.,G.H.Hanson.The Impact of Outsourcing and High-Technology Capital on Wages: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1979 - 1990[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3).
- [32]Crinò,R.The Effects of Offshoring on Post-displacement Wage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J].World Economy,2010(12).
- [33]张建红,姜建刚.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2).
- [34]Rahman,J.T.Zhao.Export Performance in Europe: What Do We Know from Supply Link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J]. IMF Working Paper,2013(13).
- [35]樊茂清,黄薇.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J].世界经济,2014(2).

Empirical Study of Reverse Offshore' s Driving ForceZHANG Yue-you, FANG Jin

Abstract: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ffshore outsourcing, Reverse outsourcing offered developing country a way to climb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enhance their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Based on the world input and output table from 2005 to 2014,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degree of reverse outsourcing in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main factors driving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reverse outsourcing strategy.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relative

labor cost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with China's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 factors such as conducting reverse outsourcing for China, has a steady and significant impact. Further according to the intensity factors of classifying services regression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a labour-intensive services and overall sample model have bigger difference, the other three types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overall sample regression with similar results.

Key Words: the reverse offshoring of services; driving forc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服务业发展与“结构性减速”辨析——兼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张月友 董启昌 倪敏^{*}

内容提要：学界流行用“结构性减速”论解释经济下行，将中国增速放缓的产业原因归咎于经济服务化。我们研究发现：虽然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但导致此轮中国增长动力衰减的产业成因不在服务业，而在工业；当前中国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趋势还不突出，产业结构服务化非但没有阻碍反而显著促进了中国（尤其是东部地区）总经济生产率的提升；服务业的技术性质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经济服务化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率差距将趋于收敛，服务业已成为中国在经济增长换挡期进行调结构和稳就业的重要抓手。因此，因正确认识服务业的行业性质；及时从发展基于全球价值链（GVC）下的制造业全球化，转向嵌入全球创新链（GIC）的服务业全球化；以创新促改革，着力解决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这一难题。

关键词：“结构性减速”；经济服务化；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市场对中国经济运行可能滑出预定区间下限的担忧日益加深^①。对于本轮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理论界有很多解释。其中，“结构性减速”论（袁富华，2012；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等，2012；张平，2012；张平、陆明涛，2013；裴长洪，2013；沈坤荣、滕永乐，2013；李扬，2013；张斌，2014；陆明涛等，2016）尤为引人关注，且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②。“结构性减速”论尝试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服务业发展相结合，认为服务业比重的快速提升是中国经济增速自2011年左右开始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③。其基本逻辑为：中国经济结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制造业比重由2008年危机前的持续提高转变为危机后的趋势性下降，服务业比重则显著上升，由于服务业发展滞后和高技术服务业供给不足等原因，中国服务业生产效率低于制造业，这一变化过程势必导致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

因为“结构性减速”论认为发展服务业与保持经济合理增速相冲突，不少学者开始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背景下继续出台推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表示怀疑与担忧，甚至业界也出现了“如果中国新增劳动力流入服务业的趋势继续，整体劳动率将降低，这是中国经济走向拉

^{*} 张月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董启昌，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倪敏，美国硅谷 NM 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工作室。本文原载《经济动态》2018 年 02 期。

美化的一个信号”的呼声。但是，这些怀疑与担忧忽视了“结构性减速”论的理论背景，即中国发展相对滞后、高技术服务和生产性服务供给不足的服务业现状。其实，“结构性减速”论并不否认在未来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后，中国经济保持理想增速的可能。而是一再呼吁，政府必须保持定力、尊重规律、顺势而为，继续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向结构调整要动力。此外，“结构性减速”论在论证二三产业比重此消彼长导致近年来的经济减速时，并没有对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趋势进行具体量化。也就是说，如果在服务业生产率远远落后制造业的背景下，短短几年的结构变迁已使中国的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大为加深，那么“结构性减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反之，则大可不必对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过于敏感，何况从理论上讲，产业结构服务化的程度也是有阈值的。

关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成因，理论界有不同声音。作为“结构性减速”论的主要争辩方，以林毅夫为主要代表的“周期性减速”论者更强调中国经济放缓的“国际周期性”外因（林毅夫，2016）。另外，国内也有多篇文献对“结构性减速”论的“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这一重大命题提出了正面质疑。杨天宇和曹志楠（2015）构建了一个可分解到产业层面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发现2008——2013年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总体上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速放缓的真正原因在于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下降，从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论证据不足，但指出中国的“结构性减速”在未来某个时段有可能出现。张月友等（2017）虽然也认为决定中国处于“结构性减速”阶段的经济服务化条件尚不具备，但差异在于，张文同时指出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在未来也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因为服务业的技术属性并非一成不变，发展服务业不仅与经济增长不矛盾，反而是中国经济在未来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和发挥结构效应的重要战略变量。但这两篇文章都没有质疑“结构性减速”的理论基础——“服务业成本病”理论本身，而是质疑随着时间推移该理论的适用性。金刚和沈坤荣（2017）更进一步，他们通过对“服务业成本病”理论最新研究进展的介绍，不仅综述了现有文献从中观视角对“服务业成本病”理论随时间推移的适用性的质疑，还特别介绍了Young（2014）如何从微观视角出发，放松劳动力同质假设，发现服务业成本病很可能只是生产率误测的结果，从而从理论基础的角度对“结构性减速”论提出根本质疑。与上述文献不同，本文目的并不在于否定“结构性减速”论，而在论证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减速关系，试图从“对象”“时间”和“关系”三维角度为中国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正名。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力图有所创新：第一，以往质疑“结构性减速”论的相关文献多是定性研究，而且鲜有文献探讨中国服务业发展提升TFP的现实存在性和机制路径问题。本文借助计量模型，就“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试图对服务业发展导致“结构性减速”的现实存在性进行直观的判断。第二，以往有关服务业生产率的文献，涉及到对中国服务业生产率高低的争论（顾乃华、李江帆，2006；王耀中、张阳，2011；庞瑞芝、邓忠奇，2014）、影响中国服务业生产率的因素（杨青青等，2009；胡宗彪，2014；刘丹鹭，2014；王恕立、滕泽伟，2015）和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刘伟、

张辉, 2008; 程大中, 2010; 干春晖等, 2011) 的研究较多, 专门探究产业结构服务化对中国总经济生产率 (TFP) 增长影响的实证文献不多见。第三, 以往有关减速治理的文献, 关注某一个重点或者侧面。比如, 要么关注效率激励模式的完善 (袁富华等, 2015), 要么关注解决减速治理的体制改革和存量调整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等, 2014; 张平, 2015)。本文试图从全局视角, 研究有关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三个递进问题: 首先, 实证研究产业结构服务化对中国总经济生产率的影响, 从对象上说明中国处于“结构性减速”阶段的产业成因不在服务业; 其次, 从时间维度上, 论证中国增长动力发生衰减的直接原因在第二产业, 并提示开启2.0版经济全球化具有紧迫性, 为中国未来发展服务业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提供理论支撑; 最后, 就正确理解与把握新常态下宏观调控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发表看法。

二、“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服务业发展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

中国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趋势是此轮经济减速的重要原因吗? 解答这一问题需要深入考察中国经济服务化对总经济生产率的影响。

(一) 中国经济服务化变化与经济增长率变动关系的统计表现

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历史数据显示, 相对“滞后”的中国服务业名义比重提高并不与总经济增长负相关。例如, 以1978年不变价人均GDP作为衡量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共经历了三个较长时间的明显增长下降阶段: 除此轮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外, 之前的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其实还经历了1984—1989年和1992—1998年两段下降时期。在这两段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时期, 各产业名义比重变化和总经济增长的对应关系为: 在1984—1989年,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中国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 服务业比重呈近似45度仰角显著上升, 同期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在多数年份却强势上升, 并未呈现因“滞后”的服务业名义比重提高而下降的局面, 而是相反, 二者同向发展; 在1992—1998年, 再次发现, 中国实际GDP增长率明显下降, 但与此同时, 中国第二产业的名义比重显著提高, “滞后”的服务业的名义比重却在下降, 中国经济增长再次与服务业名义比重同向变化。因此,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此轮服务业名义比重与经济增长的反向变化关系是一对因果关系。

(二) 重新审视传统服务业生产效率理论

1. 现代技术对传统服务经济理论提出挑战。传统服务经济理论认为服务业中有许多“停滞性个人服务(stagnant personal services)”, 由于它们的本质, 生产率不存在提高的可能, 这类服务的两个特点决定了它们的这个性质: 第一, 这类服务就是劳动过程; 第二, 这类服务要求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消费者物理接触。但是, 实践正充分表明, 服务业的技术性质并非一成不变。伴随现代技术 (尤其是通讯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中国服务业领域的大量运用, 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层出不穷。特别是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 许多传统服务业经过现代技术的改造和提升之后, 开始具备现代服务业的高技术、高智力化和高附加值特征。比如, 通过把

VR（虚拟现实）技术引入建材家居服务市场，传统的建材家居商贸业转型为第四代数字化大家居卖场。在这种新型的家居服务大市场中，过去那种一对一、面对面的劝说型销售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售卖人员既可以在现场也可以通过远程终端进行控制，以设计师和导购员的多重角色带领消费者进行全新的三维场景式销售。消费者也不用再为装修东奔西走，而能像买汽车一样买回一个看得见的“整家”。可以说，现代通讯信息技术在中国的广泛运用正在改变服务业的基本性质，引起广泛的资源重组与聚合，对传统服务经济理论提出根本挑战，传统的有关服务业生产率低的关键假说已不再成立（江小涓，2017）。

2. 服务业分行业生产率的异质性。不同于制造业，服务业是异质性较强的行业：有些服务业增长速度快，有些慢；有些服务业具有聚焦特征，有些生产分散。Singlemann（1978）率先提出将服务业分成四类：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分销服务业（Distributive Services）、个人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Personal Services）和公共服务业/社会服务业（Social Services）。根据这一分类，一些生产性服务业甚至比制造业生产率更高，而跟制造业具有技术偏差的服务业恰恰是分销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其中，分销服务业具有辅助生产属性，其发展高度依赖于制造业规模。随着服务外包兴起，制造业企业将那些适宜外包的分销服务业务和一些生产率滞后的生产性服务业务外部化，在规模上导致制造业的萎缩和服务业的扩张，在生产率上导致制造业与服务业内技术差距进一步扩大。但是，如果将这种服务业纳入外包前的生产链条综合考察，很明显，全部生产链条的生产率在外包前后其实基本保持不变。而对于个人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与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偏差扩大，实际上是由于这些服务业的需求偏好引致，但在中国，这类服务业不仅不存在超额供给，相反存在巨大的供给短缺。

3. 服务业与非服务业的生产率趋同。即使考察整体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生产率差距，Klodt(1995)研究发现，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几乎所有OECD国家的服务业与非服务业之间的生产率偏差都在大幅缩小（挪威的服务业与非服务业间生产率偏差轻微扩大），尤其在美国、意大利和葡萄牙这三个国家，这一偏差甚至消失。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产业生产率偏差之所以会在时序上缩小，主要与其服务业中有70%以上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业结构有关。

4. 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标准差异。自20世纪中叶美国率先步入服务经济社会以来，关于产业服务化与生产率关系的争论就一直未曾停歇，相关实证也不胜枚举。但早期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阐释产业结构服务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Baumol, 1967; Fuchs, 1968; Bell, 1973）。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劳动生产率”作为一种单要素生产率，难以全面反映“总经济生产率”的实质与内涵：服务业产出具有非实物化特征，服务业产出的不可测度性，传统研究对服务产品质量和服务业溢出效应的忽视，导致服务化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被严重低估（Barcet, 1988; Griliches, 1994; Bosworth et al., 2005）。相比之下，“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称TFP）能全面反映影响产出增长的所有非要素投入因

素，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用TFP变化来衡量产业结构服务化对总经济生产率的影响（Last & Wetzel, 2011；Evangelinoset al., 2012）。且纵观当前中国，人口红利日渐消失，开启经济的内生增长已成必然，也就是说，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取决于TFP的提升。在此背景下，将TFP作为总经济生产率的衡量指标更为合理。

综上可知，一方面，现代技术对服务业技术性质的改进，使得中国当前的服务业发展有异于上世纪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刚步入服务经济社会时的状况，传统服务业生产率低的假定在时下中国或许已不再成立；不同于其它服务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高生产率的特征，伴随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的长足发展，服务业与非服务业的生产率趋同或许已在悄然发生；传统研究方法对服务化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存在较为严重的低估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区域不平衡突出，当前中国国家层面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并不明显，现代技术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发展程度上具有地区差异，产业结构服务化对总经济生产率可能存在的促进作用在显著程度上将呈现地域差异。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变化对中国总经济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该促进作用呈现出由西部地区到中部地区再到东部地区渐进增强的态势。

（三）实证检验

本文以中国1987—2014年的省际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对“产业结构服务化对中国总经济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在中国东、中、西不同地区的差异”进行尝试性探索。相对于偏离—份额法等传统实证方法，基于计量模型的分析可以更有效地反映服务业对其它产业部门生产率增长的正外部效应（Peneder, 2003）。

1.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本部分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等。为了便于分析，将重庆并入四川。研究样本涉及1987—2014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并沿袭传统经济地域划分法，将全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④。实证涉及的主要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衡量指标与单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FP 累计变动率——TFP	各省以 1978 年为基期的 TFP 累计变动率，1	1.714	0.657	0.490	3.680
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 1——SRIS1	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之比，%	94.239	45.365	36.800	365.800

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 2——SRIS2	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就业 人数之比，%	138.695	72.610	45.700	520.700
市场化水平—— Market	1- 政府财政收入 /GDP，%	91.351	3.461	69.000	100.200
对外开放水平—— OPEN	FDI/GDP，%	2.765	3.293	0.001	24.254
人口年龄结构——PS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劳动年 龄人口的比重，%	10.581	2.647	4.380	21.890
人力资本——HC	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 人	86.839	78.242	8.000	358.000

注：根据stata14计算

实证所使用的TFP为全要素生产率的累计变动率形式，其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求出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所需要的投入产出数据。其中，产出数据为各省历年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劳动投入数据为各省历年从业人员数，重点在于对资本投入数据——省际资本存量的估算。本文借鉴单豪杰（2008）的做法，计算出了以1978年为基期的省际资本存量，其过程如下：①利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出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继而得出各省1978年以来的实际资本形成总额；②用1979年的实际资本形成总额除以折旧率与1979—1983年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几何平均增长率二者之和，估算出各省的基期资本存量；③利用Goldsmith的永续盘存法对1979—2014年的省际资本存量进行计算。

第二步，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计算各省1979—2014年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该指数代表当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上一年的变化情况——指数大于1表示增长，小于1表示下降。也就是说，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反映的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度变动情况，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实际水平。

最后一步，借鉴Färe et al.（1994）的做法，将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转换成以1978年为基期的累计变动率形式，以反映1987—2014年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实际水平差异。

2. 模型的构建。由于在非平稳面板序列基础上构建的回归分析易造成“伪回归”问题（李子奈、潘文卿，2010），本文在构建模型前，先对对数化处理之后的各个变量进行了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对数化以后的各个面板序列依旧为非平稳的，进一步进行一阶差分后才变平稳。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真实性，本文以各变量的对数差分形式为基础，构建如下两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别从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之比、就业人数之比两个视角出发，来探讨产业结构服务化对中国TFP的整体影响以及该影响在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表现差异：

$$\begin{aligned} \Delta \ln TFP_{it} = & \alpha_0 + \alpha_1 \Delta \ln TFP_{i,t-1} + \alpha_2 \Delta \ln SRIS_{it} + \alpha_3 \Delta \ln SRIS_{i,t-1} + \alpha_4 \Delta \ln SRIS_{i,t-2} + \\ & \alpha_5 \Delta \ln Market_{it} + \alpha_6 \Delta \ln OPEN_{it} + \alpha_7 \Delta \ln PS_{it} + \alpha_8 \Delta \ln HC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end{aligned}$$

(1)式分别从增加值和就业人数两个视角来研究产业结构服务化的TFP增长效应。吴敬琏(2013)指出,服务业的增长率要快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是“经济服务化”过程的重要表现之一;干春晖等(2011)也认为,“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之比”能更好地反映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向,能够明确昭示产业结构是否朝着“服务化”的方向发展。因此,以增加值视角研究的回归结果更能反映产业结构服务化的TFP增长效应。

上式中, Δ 表示一阶差分,为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之所以采用动态面板,是因为TFP的增长存在惯性,即前期的TFP水平及其变化会对后期的TFP水平产生影响。考虑到产业结构服务化对TFP形成实质性影响可能需要一个较为缓慢的作用过程,(1)式中分别引入了核心解释变量SRIS1(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之比)与SRIS2(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之比)的滞后两期作为新的解释变量,以反映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滞后影响。市场化水平Market、对外开放水平OPEN、人口结构PS和人力资本HC均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3. 回归结果分析。由于模型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而且产业结构服务化与TFP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使得模型存在一定的内生性。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表2展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4对应于增加值方程式,即从增加值视角分析产业结构服务化对TFP的影响;模型5~模型7对应于就业人数方程式,即从就业人数视角分析产业结构服务化对TFP的影响。如表2所示,模型1~模型7均通过了模型的有效性检验。而在就业人数方程式中,西部地区的模型由于未通过模型的有效性检验,在表2中未予显示。

从模型1~模型4的回归结果看,产业结构服务化(SRIS1)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呈现出由西部、到中部、再到东部渐进增强的态势。①模型1为我们揭示了产业结构服务化对中国TFP的整体影响。模型1中, $\Delta \ln TFP$ (TFP增长率)的滞后一期的系数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说明TFP的增长存在路径依赖——前一期的TFP增长率提升对后一期的TFP增长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也说明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合理性; $\Delta \ln SRIS1$ 的系数不显著,即SRIS1对TFP的当期影响不明显,说明产业结构服务化对TFP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前者要对后者形成实质影响需要一个较为复杂的传导机制和较为缓慢的作用过程; $\Delta \ln SRIS1$ 的滞后一阶与滞后两阶的系数均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服务化对TFP的增长具有非常显著的推动作用。具体来讲,就全国而言,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的增长率每提升1个单位,滞后1期的TFP增长率将提高0.05个单位,滞后2期的TFP增长率也将提高0.05个单位。其次,从模型2、模型3与模型4三者估计结果的对比中,本文发现:在作用强度上,产业结构服务化对TFP的促进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突出表现为由西部向东部渐进增强的态势。首先,从滞后一期的 $\Delta \ln SRIS1$ 的系数看,东部地区为0.09,且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中部地区虽为0.29,但显著性p值只有0.10,刚刚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

表2 估计结果：产业结构服务化（SRIS）对TFP的影响

	模型 1— 全国	模型 2— 东部	模型 3— 中部	模型 4— 西部	模型 5— 全国	模型 6— 东部	模型 7— 中部
	$\Delta \ln TFP$	$\Delta \ln TFP$	$\Delta \ln TFP$	$\Delta \ln TFP$	$\Delta \ln TFP$	$\Delta \ln TFP$	$\Delta \ln TFP$
L $\Delta \ln TFP$	0.6964***	0.6776***	1.5292*	0.1155	0.6563***	0.7970***	0.9949
	[9.43]	[2.96]	[1.88]	[0.20]	[11.77]	[2.92]	[0.82]
$\Delta \ln SRIS1$	-0.0050	0.1621	-0.0325	-0.0230			
	[-0.18]	[1.34]	[-0.78]	[-0.68]			
L $\Delta \ln SRIS1$	0.0523***	0.0850***	0.2944*	-0.0094			
	[2.73]	[3.19]	[1.64]	[-0.25]			
L2 $\Delta \ln SRIS1$	0.0494***	0.0895*	0.1581	0.0259			
	[3.40]	[1.60]	[1.42]	[0.79]			
$\Delta \ln Market$	0.1417***	0.1560	6.3826	-0.0458	0.1011*	-0.0822	-1.4075
	[3.19]	[1.19]	[1.28]	[-0.38]	[1.84]	[-0.21]	[-0.94]
$\Delta \ln OPEN$	0.0046**	0.0192**	0.0068**	-0.0002	0.0056***	0.0161*	0.0108**
	[2.12]	[2.22]	[2.21]	[-0.08]	[2.63]	[1.63]	[2.46]
$\Delta \ln PS$	-0.0079	-0.0085	-0.0482**	0.0018	-0.0119	-0.0122	-0.0310**
	[-0.91]	[-0.67]	[-2.07]	[0.09]	[-1.03]	[-0.87]	[-2.00]
$\Delta \ln HC$	0.0288	0.0583*	0.1307*	0.0127	0.0258	0.0284	0.1093*
	[1.45]	[1.74]	[1.75]	[0.51]	[1.31]	[1.13]	[1.67]
$\Delta \ln SRIS2$					-0.0150	0.0147	-0.0587
					[-0.87]	[0.23]	[-0.85]
L $\Delta \ln SRIS2$					-0.0145	0.0276	-0.0182
					[-0.77]	[0.59]	[-0.45]
L2 $\Delta \ln SRIS2$					-0.0032	0.0270	-0.0043
					[-0.27]	[0.70]	[-0.12]
常数项	-0.0030	-0.0064	-0.0185*	-0.0014	-0.0002	0.0000	-0.0095
	[-1.38]	[-1.14]	[-1.72]	[-0.29]	[-0.10]	[0.01]	[-1.34]
样本量	750	275	225	250	750	275	225
Wald 卡方值	163.14 (0.000)	133.19 (0.000)	177.99 (0.000)	13.25 (0.066)	158.49 (0.000)	271.07 (0.000)	53.21 (0.000)
AR(1)	0.0014	0.0217	0.3266	0.8404	0.0009	0.0263	0.4369
AR(2)	0.2065	0.4682	0.5097	0.3359	0.1602	0.6916	0.7211
Sargan 检验	22.5681 (1.000)	2.0692 (1.000)	2.24e-24 (1.000)	1.1380 (1.000)	25.0757 (1.000)	3.0274 (1.000)	9.75e-26 (1.000)

注：符号 L_i ($i=1,2,3,\dots$) 表示滞后 i 期； $[\]$ 中为估计系数的 Z 值， $*$ 、 $**$ 、 $***$ 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0%、5%和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 $(\)$ 内为相关检验统计量的显著性 p 值；系数联合显著性Wald检验的原假设为“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0”；AR(2)检验的原假设为“扰动项无自相关”；Sargan检验的原假设为“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Stata/MP 14.0 软件计算所得。

西部地区则为-0.01，其显著性 p 值为0.80。也就是说，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的增长率每提高1个单位，东部地区滞后1期的TFP增长率将提高0.09个单位，中部地区滞后1期的TFP增长率也将提高，但没有东部明显，而西部地区滞后1期的TFP增长率的变化并不受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的影响。②从滞后二期的 $\Delta \ln SRIS1$ 的系数看，东部地区为0.09，其显著性 p 值小于0.11，处于接近10%的显著水平；中部地区为0.16，显著性 p 值为0.16；西部地区为0.03，其显著性 p 值为0.43。可见，即便从促进作用持续时间的长短看，产业结构服务化对TFP的影响期限也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缩短的状况。

从模型5~模型7的回归结果看，基于就业人数视角的产业结构服务化(SRIS2)对中国TFP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与结构性减速论者“劳动力继续流入服务业将使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论断存在一定分歧。这里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对TFP的影响如此不显著呢？本文在实证中发现：在西部地区的样本中，SRIS1与TFP的相关系数仅为0.001，即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服务化与TFP增长表现出了极大的不相关性。由于受资源禀赋的限制，西部的许多省份，如甘肃、青海、新疆等，其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幅度在历史中都曾一度甚至多次超过第二产业，相应年份的TFP在增长；而近十几年来，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其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之比在不断缩小，该时期的TFP仍在增长。西部地区SRIS1与TFP这种暂时性的不相关性，并不能否定未来某个时段之后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对西部地区的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产业结构服务化要发挥对TFP的显著促进作用可能需要一定的门槛，这一门槛就是该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与东部和大多数的中部省份不同，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方兴未艾，服务业发展所依托的工业基础尚未完全建立，服务需求不足导致服务业难以充分发挥对整体经济的“溢出效应”与“润滑剂作用”。

当然，这与研究时段不同有一定关系，但即便仅从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看，该论断也是有待商榷的。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工业产能过剩，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已接近饱和，新增就业人员更多流向了生产率目前相对较低的服务业，甚至第二产业原有的就业人员也出现了向服务业转移的迹象，但并不能就此认为基于就业的产业结构服务化(SRIS2)阻碍了TFP的增长。原因至少有三：一方面，相对于充当闲置劳动力或者滞留于饱和的第二产业可能造成的隐性失业，新增劳动力流向服务业以及原有劳动力由第二产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从服务业新增就业人员的具体行业构成讲，为数不少的新增就业人员流向了生产率相对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或高端服务业，而且这些新增就业人员往

往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与专业素养，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为这些行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智力基础；此外，与第二产业相比，服务业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更高的正外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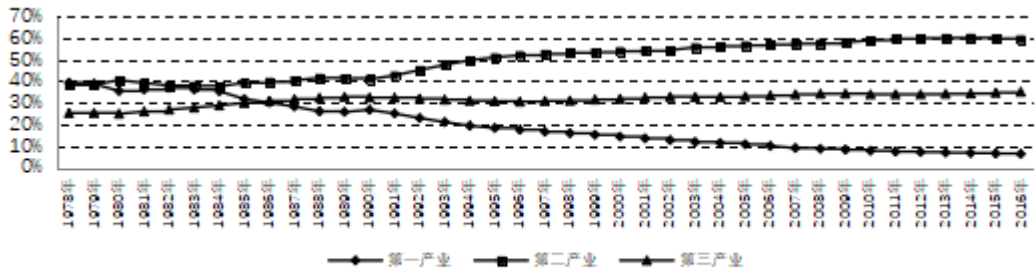
综合来看，基于增加值视角的产业结构服务化对中国TFP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这一门槛效应影响，该促进作用呈现出了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依次减弱的状况；基于就业视角的产业结构服务化对中国TFP的影响不显著。也即，当前决定中国处于“结构性减速”阶段成立的产业成因并不在服务业，相反，产业结构服务化对中国TFP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结构性减速”的产业成因

由于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比衡量“产业结构服务化”，“产业结构服务化”与“产业结构工业化”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又因上述实证的回归结果表明服务业比重上升非但没有阻碍反而显著促进了中国总经济生产率的增长，那么有理由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产业原因是中国式工业化所致（为了行文简洁，实证产业结构工业化对总经济生产率的影响从略）。接下来分析中国式工业化导致“结构性减速”的统计表现和作用机理。

（一）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化程度依然较轻，工业仍然是中国的主要动力产业

诚然，按现价衡量的中国二三产业比重变化与“结构性减速”阶段理论的描述相一致：中国第二产业比重自2008年的46.93%下降到2016年的39.81%，而服务业比重则由2008年的42.82%上升到2016年的51.63%。但是，通常所说的GDP增长率指的是实际增长率，是按不变价或可比价进行衡量的，而中国当前的“结构性减速”思潮忽视了增长率的不变价与现价的计价标准差异。实际情况是，按不变价衡量，中国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的经济服务化趋势并没有出现。图1是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衡量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图。该图显示，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26.72%：40.90%：32.38%变动为2016年的6.29%：59.34%：35.04%。1990—2016年，中国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连续上升，服务业比重呈现小幅震荡波动变化。26年间，中国服务业的实际比重仅微弱上升了2.66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实际比重大幅提高了18.44个百分点。可见，截至2016年，不仅中国服务业的实际增加值比重始终小于第二产业，而且中国二三产业实际产值的GDP比重差不是缩小了，而是继续扩大了。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990年价格）

（二）中国第二产业增长率下降导致经济减速的统计表现

从三次产业增长率变化的统计数据很容易推断，中国自2008年以来的经济趋势性下行，主要由工业增长率下降带来。图2是按不变价衡量的中国1994年以来GDP和三次产业增长率变化关系图。显然，从时序角度看，中国GDP的增长率变化和二、三产业的增长率变化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从横截面上比较，中国第二产业的增长始终快于GDP增长，而服务业增长与GDP增长基本持平。特别地，自2010年后，三者的增长率虽同呈下降趋势，但其中，GDP增长率的下降曲线与第二产业增长率的下降曲线陡峭程度相当，而服务业增长率的下降则较为平缓。结合前文中国第二产业实际增加值占GDP比重更高的分析结论，中国第二产业增长率下降对总体经济增长下行的“贡献率”显然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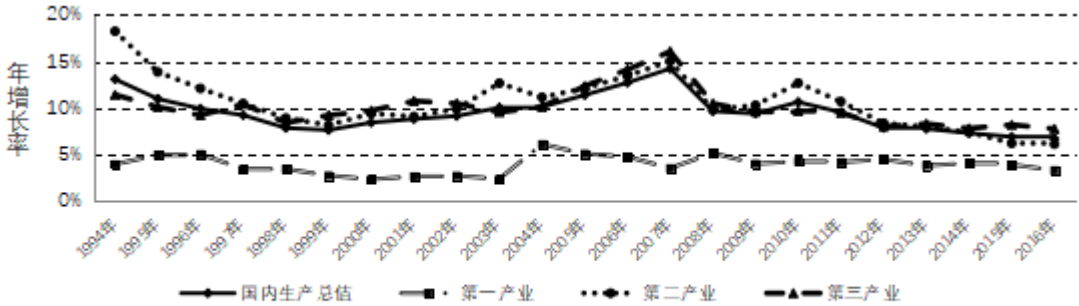


图2 不变价衡量的中国GDP和三次产业增长率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图2 不变价衡量的中国GDP和三次产业增长率变化

（三）中国式工业化导致经济增长动力发生衰减的机理分析

加入全球价值链(GVC)的制造业发展模式曾经造就了中国增长奇迹。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

变动数据显示：1961年至今，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走了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短尾巴“对号”型走势。先是用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在底部弱势波动（1960—1990年，中国经济的世界比重从4.33%逐步下降到1.59%），直到90年代，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重要性开始逐年提升。从时间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主要发生在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和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其中，关键词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而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主要是发生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发生在低端制造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的过程中。其主要特征就是，推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政策，依靠负债式投资发展制造业推进工业化（刘志彪，2015）。

当前，中国式工业化难以为继是导致我国增长动力发生衰减的直接原因。个中原因，可以用总需求下降背景下“生产领域通货紧缩”和投资收益率下降导致工业部门持续去杠杆来解释。

首先，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上升。一方面，考察期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从2010年开始负增长，在2012年第一次绝对数减少，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工业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中国房价指数从2009年2月开始回升，在2009年6月—2010年6月经历了为期长达一年的暴涨）及其部门的资产收益率大幅提高，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杠杆率自2008年开始触底回升，资产负债率从72.35%，直线增长到2015年的77.67%（夏小文，2017）。房价的上涨和房企加杠杆给工业企业带来两个影响：第一，从流动性上对工业部门产生抽血效应；第二，我国工业部门的用房和用地成本快速上升。

其次，工业部门面临的总需求在下降，产能过剩严重，生产领域通货紧缩压力加大。2008年后，全球进入总需求萎缩、结构重构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刘鹤，2012）。中国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商品出口国后，外需持续扩张势头明显受到抑制。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中国的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从2010年的30.5%降到2014年的4.9%，再到2015年，进一步降至-1.8%。受此影响，中国的工业企业产出需求下降，产能过剩严重，产品出厂价格受到冲击。特别是自2012年3月到2016年8月，中国PPI月度上连续54个月负增长，年度上连续5年负增长，物价陷入“生产领域通货紧缩”难以自拔。

最后，工业部门陷入“债务—通缩”循环，工业企业持续被动去杠杆。为了应对此前“四万亿计划”放水导致2010年10月到2012年1月为期一年多的通货膨胀（我国2011年的CPI上涨到5.4%，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值），央行在2010—2011年共上调5次基准利率和12次存款准备金率，实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样，一边是企业生产成本在上升，一边是市场利率在上涨和物价通缩，工业企业面临的真实利率进一步上升，企业利润下降，企业偿本付息发生困难。银行为了保证资金安全，对工业企业开始惜贷，尤其在政府将“三去一降一补”作为年度工作任务的政策背景下，传统落后的工业企业纷纷开启去产能、去杠杆模式，甚至廉价出售资产，民间投资开启了“断崖式”下跌，工业经济运行步入下行模式，整个工业陷入“债务—通缩”恶

性循环。这种新常态下的“债务—通缩”螺旋的实质，其实是过去中国基于GVC的制造业粗放增长模式下产需不匹配造成的。也即，过去中国这种1.0版的经济全球化，正在使经济运行进入持续的下降和衰减通道。宋国青（2015）的一篇文章也证实了这个结论。根据他的数据：第一，2011年以来，我国工业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呈直线下降趋势。第二，大约是在2010年以后，工业企业的净资产开始小于上交完所得税后的利润增量，企业净的投资增量已经降为零或者负数。第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被称为微观杠杆率）的同比年度增长自2010年以后也开始以直线的方式下降，表明工业企业产出增长在下降，投资在萎缩，整个经济步入下行。

四、经济服务化、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

以上分析在产业发展上的战略指导意义在于，中国必须依托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推进以现代服务业嵌入全球创新链（GIC）开放化发展为核心的2.0版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从“供给端”为经济改革发展提出两大根本性任务：一是将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的、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中释放出来；二是为提供中高端消费服务的“朝阳产业”输送更多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这种产业结构大变迁，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正悄然到来。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和化解未来中国服务业比重提升可能导致的所谓“结构性减速”呢？此外，随着服务业继续发展，根据“结构性减速”理论，中国面临稳增长的任务将异常艰巨，应当如何协调当前宏观调控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问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结构优化的主线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数量不足型的供需矛盾已基本解决。但是，长期的追求速度的增长模式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代价高昂，加之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早已发生变化，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已经“做不到、受不了、没必要”。也即，高速增长不再是我国发展的主要约束性目标。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高质量发展接替高速增长成为我国发展新的主要约束性目标。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报告关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优化的主线突出，值得重点关注。其中涉及产业结构优化的领域是规划中国由服务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迈进的行动纲领：其提出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表明推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是我国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主攻方向；其关于创新型国家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的战略部署也规划了我国现代化的服务经济体系框架、建设路径和主要内容；其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判断和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这个新矛盾的工作主线，更决定了中国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转向服务经济社会具有必然性。

（二）服务业比重提升与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不矛盾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应满足人们对不断改善生活质量和提高福利水平的追求。而社会生产由满足人们对物质的需要到满足人们对服务数量和质量提高的需要，正是人们由生存型消费向一定程度享受型消费转变的巨大进步，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因此，纵使“滞后”的服务业比重提升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由于产业结构转换会挤掉经济增长水分，换来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提高，使得老百姓享受到至少与GDP增长率同步提升的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这种下降不仅不可怕，还应受到欢迎（李扬，2013）。

（三）中国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将获得进展

更关键地，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率差距是严重问题吗？随着现代技术的蓬勃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的扩张以及传统管制服务业发展的经济基础的消失，服务业与非服务业的生产率差异将趋于收敛，前文OECD国家产业生产率变化的历程也印证了这一点。就中国情况而言，除了服务产出测量存在问题和二三产业不同的技术结构差异影响两部门技术偏差外，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技术差距主要来源于市场结构差异。相对于制造业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而言，中国服务业的特征是对内对外开放不足和竞争不充分。中国大部分的制造业属于高度市场化部门，而诸多服务业属于行政力量垄断管制部门。在存在垄断力量的市场格局下，中国服务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成本更高，生产率竞争程度不足，高效率的企业赢利可能更小，并且创新需求减少，客观上阻碍了传统服务业改变面貌和新服务业出现等充满生机的动向。可喜的是，十八大后，中央推进市场化改革和简政放权的力度在加大，专门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加快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国产业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可以预期中国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将获得实质性提升。

由此可见，发展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并不矛盾。相反，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能否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取决于结构效应能否发挥，其中，服务经济的发展是最重要的战略变量。

（四）经济服务化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可以概括为“合理区间论”。而从中央高层“保民生”和“保速度”的政策出发点看，“合理区间论”的重要依据为“保就业”。

近十年，中国保就业的核心任务既体现为解决农民工“用工荒”，更体现为急需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考察目前的就业政策动向，从供给端酝酿高等教育格局重构正成为决策层解决中国就业难问题的现实选择。可问题是，有没有更好的从需求侧考虑出路的补充办法呢？

从需求侧思考解决就业的出路，落脚点在产业。1978年以来，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有识之士对经济粗放增长和思考一直伴随左右。如今，中国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亟需转型。根据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真实含义是提

高劳动参与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前者诸如推行城镇化和改革户籍制度以尽快落实农民工市民化,后者诸如提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推动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用信息化改造经济生产等。很明显,这实际上正是一个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过程。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结构服务化的过程会从“用工荒”和“就业难”两端同时解决“保就业”问题。原因很简单:这个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正是一个逐步减少低水平劳动密集型就业需求,同时增加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就业需求的过程。因此,中国新常态中的经济结构服务化变化不仅不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对象,相反,它是新常态下中国宏观调控继续保持定力的最有力保证。

总之,那些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的经济学者们,在中国的产业发展偏好上,与Baumol(1967)的“成本病”理论一脉相承,本质上都表现出热衷于推崇继续工业化而歧视服务业发展的特征。殊不见,一方面,很多发达国家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早已走上自增强通道,相比制造业,其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甚至更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发展事实也雄辩地表明,但凡世界上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服务业比重通常也会越高。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考察了中国服务业发展与此轮经济减速的相关性,并从“结构性减速”的产业成因和其他典型事实、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合意目标间关系、新常态下宏观调控赋予服务业的历史使命,以及服务业与非服务业间的生产率偏差是否是严重问题等方面,多视角尝试化解中国服务业发展与“结构性减速”矛盾。结论和建议如下:

第一,我国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变化趋势还不突出,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产业仍然是第二产业。在产业层面,中国第二产业增长率的大幅下降是导致此轮经济增长放缓和总经济生产率下行的主因。新常态下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长是推动中国2.0版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内容和新力量。因此,有必要呼吁社会各界正确认识服务业行业性质,改变针对服务业的落后看法和偏见,纠正那种不加区别、甚至盲目将服务业统统归入非生产性部门和虚拟产业的错误认识。

第二,产业结构服务化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影响呈现出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递增强态势。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服务化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的TFP提升,中部次之,西部尽管受工业化水平的门槛效应影响,产业结构服务化对其TFP的影响尚不显著。可见,产业结构变迁具有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从中国目前的产业发展情况看,中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已进入服务驱动的经济增长轨道,而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尚未步入成熟阶段,依靠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机制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尚不突出。对此,一方面,应通过构建中、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西部地区一、二产业的跨区域关联,在保障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使西部地区尽快进入成熟的工业化阶段,为实现服务驱动型经济

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可着力发展旅游业等服务业、健全公共服务设施、实施差异化的服务业发展战略。

第三，OECD国家产业生产率变化的历史数据表明，服务业与非服务业的生产率偏差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趋于收敛。当前，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换挡期调整结构和稳定就业的重要抓手，其发展正处在由重视增长速度向质量和速度并重转变的关键节点。中国经济服务化的真实含义并非指服务业比重的简单扩大和提高，服务经济的实质是“质重于量”。这种“质重于量”的最重要表现要体现为新服务业的出现和传统服务业经过技术改造而充满生机等动向。即中国走向服务化有两个关键：一是新兴服务业的涌现；二是发展和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消除产业发展的生产率偏差。因此，建议在服务业发展上，积极推广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消除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政府管制；健全服务业统计制度；充分利用土地、融资和税收优惠等多种偏向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制造业企业进一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分离和外包服务业务；鼓励有实力的服务业企业积极开展逆向外包，并鼓励中国制造业企业将中间服务投入本地化，尽快补足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短板。

第四，现代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有利于改变服务业的基本性质、提升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有鉴于此，政府要加大对现代网络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并通过有力的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中西部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对现代技术的可获得性；发展第三方支付等现代电子支付，降低价格信息的非对称性，提高服务产品的贸易机会；通过有效的制度改革，规避传统垄断性服务行业的技术垄断行为。

第五，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变化符合合意的经济增长目标。发展服务业不仅与经济增长不矛盾，而且，它还是中国经济未来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和发挥结构效应的最重要的战略变量。因此，建议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坚定目前的宏观调控思路不动摇，持续向结构调整要动力，持续向结构调整要高质量发展。

注：

i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可以概括为“合理区间论”，即宏观调控思路与方式的变化主要视经济运行是否处于“防通胀的上限”和“稳增长的下限”而定。2014—2016年，中国政府设定“防通胀的上限”依次为3.5%左右、3%左右和3%，“稳增长的下限”依次为7.5%左右、7%左右和6.5%—7%。

ii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结构性减速的重要作者，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等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对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原因的关注有所下降，转而强调制度结构对于技术创新的阻碍和人力资本配置的扭曲，使得中国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和“干中学”技术进步效

应消减等三重冲击造成的增长减速无法得到生产效率提高的补偿。

iii也有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早从2008年就已开始，2010年的GDP增速只是临时性反弹，是中国政府“4万亿”刺激的结果。

④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9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0个省区。

⑤限于篇幅，关于1979—2014年全国、各省以及东中西不同地区的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文中未予列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⑥变量对数再取一阶差分，反映的是该变量的增长率水平。以TFP为例， $\Delta \ln TFP_{i,t} \approx (TFP_{i,t} - TFP_{i,t-1}) / TFP_{i,t-1}$ ，即 $\Delta \ln TFP_{i,t}$ 可以看作TFP的增长率。

⑦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的世界比重逐年加速上升，其中，1991—1993年，由1.597%上升到1.72%；1994—1996年，由2.03%上升到2.75%；1997—2000年，由3.07%上升到3.62%；2001—2005年，由4.02%上升到4.82%；2006—2015年，这个比重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率加速上升，比重数据逐年分别为5.35%、6.12%、7.23%、8.46%、9.21%、10.31%、11.41%、12.45%、13.30%和15.50%。

⑧2008—2014年，中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同比增速分别为26.29%、19.68%、16.31%、13.30%、16.27%、12.03%、8.41%。

⑨这里说的就业难与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不矛盾。

⑩在2014年2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要求“引导一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2014年3月底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明确释放了“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的信号。不难发现，这不仅反映了中国高层对1999年大学扩招后的高校“专升本”的深刻反思，更可能意味着酝酿高等教育格局重构正成为决策层解决中国就业难问题的现实选择。

⑪比如，根据人口结构与人口数量的变化，及时将某些地区的二孩政策由“放开”转为“鼓励”。

参考文献：

- 蔡昉, 2013: 《通过改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程大中, 2010: 《中国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一般均衡模型及其经验研究》, 《世界经济》第10期。
- 干春晖 郑若谷 余典范, 2011: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经济研究》第5期。
- 顾乃华 李江帆, 2006: 《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 《经济研究》第1期。
- 胡宗彪, 2014: 《企业异质性、贸易成本与服务生产率》,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
- 金刚 沈坤荣, 2017: 《结构性减速真的存在吗:一个文献评述》, 《经济资料译丛》第2期。
- 江小涓, 2017: 《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增长》, 《经济研究》第3期。
- 林毅夫, 2016: 《经济放缓主要不是体制机制问题》, 《理论参考》第5期。
- 夏小文, 2017: 《中国杠杆率的特征事实、成因及对策》, 《经济学家》第11期。
- 刘鹤, 2012: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比较》第5期。
- 宋国青, 2015: 《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的含义》, 《2015年春季CMRC中国经济观察》总第40期。
- 刘志彪, 2015: 《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 《学术月刊》第2期。
- 刘伟 张辉, 2008: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 《经济研究》第11期。
- 李扬, 2013: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财贸经济》第11期。
- 李子奈 潘文卿, 2011: 《计量经济学（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刘丹鹭, 2013: 《进入管制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行业面板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家》第2期。

陆明涛 袁富华 张平, 2016: 《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冲击与增长效率:国际比较的启示》, 《世界经济》第1期。

裴长洪, 2013: 《2013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当代经济研究》第9期。

庞瑞芝 邓忠奇, 2014: 《服务业生产率真的低吗?》, 《经济研究》第12期。

沈坤荣 滕永乐, 2013: 《“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第8期。

单豪杰, 2008: 《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

吴敬琏, 2013: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增订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王恕立 滕泽伟, 2015: 《FDI流入、要素再配置效应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第4期。

王耀中 张阳, 201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实证分析》, 《管理评论》第10期。

袁富华, 2012: 《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一种解释》, 《经济研究》第3期。

袁富华 张平 陆明涛, 2015: 《规模效率模式向租金抽取模式的退化:经济演化低效率的原因》, 《天津社会科学》第4期。

杨天宇曹志楠, 2015: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是“结构性减速”吗?》,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杨青青 苏秦 尹琳琳, 2009: 《我国服务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2期。

张军, 2012: 《中国经济减速时代是否到来?》, 《金融市场研究》第2期。

张平, 2012: 《“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宏观政策和制度机制选择》, 《经济学动态》第10期。

张平 陆明涛, 2013: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展望2013年及后5年的中国经济》, 《现代经济探讨》第1期。

张平, 2015: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减速治理——2015年经济展望》, 《现代经济探讨》第1期。

张斌, 2014: 《结构转型期的潜在经济增速》, 《中国外汇》第13期。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等，2012：《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经济研究》第11期。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等，2014：《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经济研究》第12期。

张月友 董启昌 倪敏，2017：《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了吗》，《经济学家》第5期。

Baumol, W.J. (1967),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3):415–426.

Bell, D. (1976), “The coming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The Educational Forum 40(4):574–579.

Barcet, A. (1988), “The development of tertiary services in the economy, labourmarket and employment” ,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8(1):39–48.

Bosworth, D., S. Massini & M. Nakayama (2005), “Quality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17(1):1–23.

Evangelinos, C, B. Wieland & T. Kühnhausen (2012), “Baumol's cost disease in the local transit secto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 Germany and the USA” ,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Economia dei Trasporti 39(1):81.

Färe, R., S. Grosskopf, M. Norris & Z. Zhang (1994),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1):66–83.

Fuchs, V. R. (1968), “Front matter, the service economy” , in: The Service Economy, NBER.

Griliches, Z. (1994), “Productivity, R&D, and the data constraint”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1): 1–23.

Klodt, H. (1995), “Productivity growth in service and non-service industries: implications for convergence” , in: The Service Sector: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Physica-Verlag HD.

Last, A.K. & H. Wetzel (2011), “Baumol's cost disease,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performing arts: an analysis of German public theaters” ,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35(3):185–201.

Peneder, M. (2003),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growth” , Structural Change & Economic Dynamics 14(4):427–448.

Singlemann,J.(1978), “The sectoral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urforce in seven industrial countries, 1920–1970”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3 (5) : 1224–1234.

佚名.(2014), “Down and out in rural China” ,The Economist8(23).

Young, A. (2014).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mismeasurement of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cost disease of services”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4(11):3635–3667.

扬长补短 建设新型高校智库

徐宁[※]

作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高等院校作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力量，应把握时代机遇、找准自身定位、主动发挥优势，组织力量积极参与新型智库建设。

高校在智库建设中具有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对外交流广泛等优势，但也存在体制机制僵化、考核激励导向单一等问题。建设新型高校智库，应以服务中央和地方政府决策为根本导向，着力提升研究能力，确保研究成果务实管用。

对标中央要求与实践需求，概括而言，高校建设新型智库主要存在五方面的长项与短板。

理论性研究较强而应用性研究不足。理论性研究的目的是发掘知识与发现规律；应用性研究的着力点在于通过专业研究来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由于目前高校采用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主的成果评价体系，大部分学者的关注点仍放在能否取得理论研究进展及发表高级别论文的数量上；而智库必须聚焦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分析其形成原因、发展走势，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供决策部门参考。

理论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并非对立关系，而应相互促进、相互转化。高校在建设新型智库中具备明显的理论性研究优势，如对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和储备性研究的能力等，但如何将该优势有效地转化成智库研究所要求的应用性研究能力，需要高校从研究氛围、激励导向和体制机制上进行探索和创新。

个体研究居多而协同研究不足。很多高校学者进行研究时，习惯以自身的研究兴趣为主要考虑因素，对某个锁定的研究领域进行持续深入挖掘。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从事研究工作往往主要依靠个人或同领域团队的智慧与力量。而智库研究需要进行跨学科、跨领域、跨职业的协同与合作，这恰恰是高校学者需要加强的。

新型智库建设必须以服务决策部门需求为导向，聚焦主题，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开展协同研究。对于高校而言，特别要注意进行跨领域合作，将政府决策部门和社会实践领域的相关人士整合进来，在发挥高校在理论基础、分析方法、研究平台、科研队伍等方面优势的同时，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维度的协同研究。

研究的深度突出而速度不足。高校学者擅长深入挖掘分析的传统研究方式，而往往忽略研究的时效性与应用性，对现实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紧迫性问题关注不够或者反应较慢，在进行智库研究时，其研究成果难以满足时效性要求。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研究深度是智库研究的“基石”。高校建设高端智库，应当首先坚持其研究的“专”与“深”，聚焦某个领域或某个重要问题，在夯实研究基础、拓展研究深度的同时，保持对时势问题和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敏感性与关注度，基于坚实的研究基础对当下社会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判、跟踪、评估，形成研究分析报告，用其专业、深入、理性的研究成果支撑政府决策、引导社会舆论、引领公众认知。

学术语言能力较强而语言转换能力不足。高校学者习惯使用学术化的表达方式，注重概念表述的准确性，逻辑推演的严密性、完整性以及论据的有效性与支持性，部分文章中还大量使用模型、计量等专业性强的术语，仅有专业人士才能理解。

智库研究成果的受众包括非专业人士，因此智库的研究者应当具备学术语言转换的能力：了解政府部门的公文表达方式和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通俗表达方式，使学术研究成果易于被受众接受。

研究力较强而运营力不足。新型智库的研究是包含选题、调研、分析、行文、成果转化等各环节在内的完整“研究链条”，靠学者“单打独斗”无法实现，需要充分整合政府、学者、媒体、社会组织等力量，以实现咨政建言、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等职能。

高校的智库运营涉及行政、人力资源、传播、媒体、公共关系、国际外交等各方面。比如，在研究选题和调研方面，应充分注重与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对接联络，让参与研究的各方相互了解、深入合作，并进行有效整合；在研究的应用环节，应注重与政府决策部门的合作。在研究人员的遴选、培训、考核等方面，运营能力十分重要，这些却是高校研究机构经常忽略的。

鉴于以上分析，对高校建设新型智库提出以下四方面建议：

创新完善成果评价体系。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的评价体系都是基于教学效果、发表论文、申请国家项目等方面建立的，难以有效激励学者积极参与智库研究。建议在高校研究人员体系里建立“智库专区”，开辟专属智库研究人员的晋升通道，对智库类成果（如决策咨询报告、重要媒体发文、社会舆论引导、公共外交成就等）进行多元化评价考核，建立区别于传统科研成果的分类评价制度。

搭建互动平台。高校应积极为智库研究人员搭建与政府决策部门的互动平台，让相关领域的学者参与政府决策咨询的各个环节，如政策论证、评估，政策调研、研讨等，做到信息共享、问题共研、政策共制、效果共评；加强与社会实践主体的互动，从研究选题、数据采集、

现状调研、政策评估等方面形成与研究对象的沟通与反馈机制；注重与传播媒体的合作，让智库专业、理性的声音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声，引导社会认知。

建立“智力资源管理体系”。一方面高校应对自身的智力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在招聘、选拔、培训、考核、激励等方面设定一系列类似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和做法，引导学者围绕智库的需求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要着力构建“大外围”的智力资源体系，运用现代先进技术手段对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界别的智力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促使其在参与智库研究中更好地发挥所长。

提升智库运营团队的专业性与职业化水平。应摒弃高校传统的行政管理思维，对运营团队“去行政化”。要因校而异，按需设岗，选拔专业人士，并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待遇，注重绩效考核和激励。同时，实现运营团队的职业化，搭建晋升通道，提升其人力资本价值，让运营力成为智库研究力的重要支撑。

构建新型智库“三位一体”知识生产模式

徐宁[※]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肩负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智库的核心功能有二：一是以其科学性、全面性、前瞻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重要支撑，即“咨政”；二是将研究成果以专业、理性的方式向社会传播，塑造并引导大众认知，即“启民”。

智库研究的落脚点应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智库作为一个平台必须能够有效整合社会中广泛、专业的智力资源，形成优质高效的知识生产体系，才能汇智成库，生产出高水平成果。

智力资源在社会中通常处于分散、游离的状态，且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可谓纷繁复杂。智库要想将这些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就必须在汇智模式上打破传统的诸如线下研讨会、研究课题单向发包等方式，以创新性思维突破地域、界别、行业等限制，运用信息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手段，将“大外围”研究团队进行有机整合，充分调动各方智力资源。

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当构建“三位一体”知识生产模式。“三位”是指三方面主体：多元广泛的智力主体集、完备有效的规则体系和专业高效的运营团队。三者密不可分、有机融合、协同运作，形成“一体”的知识生产体系，为智库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研判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首先，多元广泛的智力主体，是“三位一体”知识生产模式的基础，这构成了智库知识生产体系的“硬条件”。

智库要根据自身的研究定位和研究领域，储备一支知识领域相近、来自不同界别、具备一定研究能力的“大外围”团队。该团队成员应当对现实问题保持较高的敏感性以及较为深刻的观察分析能力。这其中，智力主体集的广泛性和异质性十分重要，因为智库研究的现实性要求需要参与研究的主体来自各行各业，从不同视角看待同一个问题，探寻不同解决方案。因此，应当尽量避免智库汇聚的全部是来自高校或研究机构学者的情况，而应多吸引来自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媒体等机构的专家。此外，还应注意保持该群体的开放性，运用信息化手段对群体组织进行动态化维护和服务，用各种方式保证他们对智库研究的认可度，促使他们积极参与

[※] 徐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助理、办公室主任，博士。本文原载《经济日报》，2018年8月30日。

智库组织对各种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其次，完备有效的规则体系，是“三位一体”知识生产模式的保障，是智库知识生产体系的“软环境”。

规则的目标是引导智力群体积极参与智库的知识生产，提供高水平的知识供给，帮助智库生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规则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应注重完备性，即应制定从智力主体吸引、推荐、甄选，到鼓励智力主体以各种方式参与智库知识生产，再到对其产出结果进行充分激励等方方面面的规则，形成体系化制度。特别要注意奖惩结合，这一点有些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还要形成制度执行闭环，对制度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并持续优化，不断提高制度的有效性，发挥其“指挥棒”的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长期来看，智库还要考虑文化建设，以各种制度化方式和活动的形式推进文化建设，在研究主体之间形成积极向上、热情参与、理性研究的良好氛围。

再次，专业高效的运营团队，是“三位一体”知识生产模式的支撑，是智库知识生产体系的“执行力”。

作为“硬件”的智力主体集是分散游离的，需要一条连接纽带；作为“软件”的制度体系需要加强落实执行，而这些都需要强有力的运营力进行支撑，以保证各个措施、环节能落实到位，取得实效。运营团队应当年富力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个岗位还应具备较强的专业性，不仅传统的岗位如品牌传播、公共关系、编审校对等需要相关专业人才，新兴领域如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社区运营、通证经济等在智库平台也有很大运用空间，这些岗位更加需要专业化运营。此外，运营团队的搭建必须突破体制内的行政管理思维，要做到重运营轻行政，以市场化方式来运行。比如，待遇方面要与市场接轨，并与年度绩效考核挂钩，建立与智库长期发展相匹配的职业发展梯度岗位，以激发每个运营人员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上述三个方面主体有机融合、协同合作，共同构成了新型智库“三位一体”知识生产体系。

此外，在如今互联网与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智库应将运营方式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新兴形式相结合，使三个主体之间有效协同，发挥该模式的最大化价值，以软硬件相融合的方式，真正实现新型智库“柔性知识生产”，从而让新型智库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Yangtze IDEI



扫一扫
关注“长江产经智库”